史家名著书系

丛日云 主编

# 牛津欧洲史 I

EUROPE IN A WIDER WORLD


［美］罗宾·W. 温克 ［美］L. P. 汪德尔 著

吴舒屏 张良福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卷

1350-1650

# 进入世界视野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7-176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津欧洲史.第1卷，1350～1650年：进入世界视野／（美）温克（Winks,R.W.），（美）汪德尔（Wandel,L.P.）著；丛日云主编；吴舒屏，张良福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1
ISBN 978-7-80762-871-2

Ⅰ. 牛…　Ⅱ. ①温…②汪…③丛…④吴…⑤张…　Ⅲ. 欧洲-中世纪史-1350～1650　Ⅳ. K5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03579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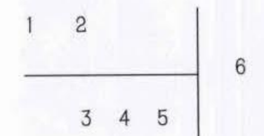
书　　名：牛津欧洲史（第1卷）
著　　者：[美]罗宾·W.温克　L.P.汪德尔
主　　编：丛日云
译　　者：吴舒屏　张良福
出 品 人：周殿富
总 策 划：崔文辉
策划编辑：曹海军
责任编辑：王　莹
封面设计：刘友丽
装帧设计：郭孟楠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 × 980mm　1/16
印　　张：23.5
版　　次：2009年4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80762-871-2
定　　价：52.00元



《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法国著名画家德拉克罗瓦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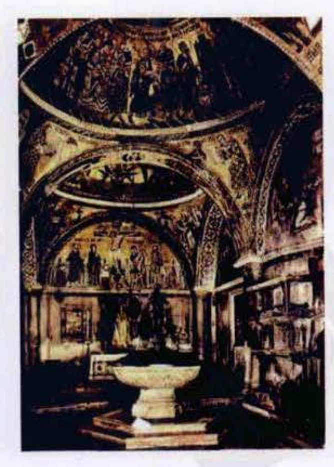





1. 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与英国都铎海军的大海战。
2. 1598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
3. 彼得大帝像。
4. 马丁·路德像。
5. 查士丁尼时代的建筑风格。
6. 土耳其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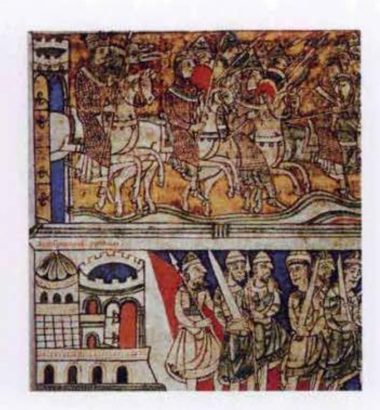












1 2 3

4

1．中世纪欧洲骑士战争画面。

2．东欧骑士狩猎图。

3．查理大帝的军团，这是查理大帝对外征服的工具，该军团在由法国境内的亚琛前往圣地亚哥途中。

4．罗马军队与“蛮族”混战的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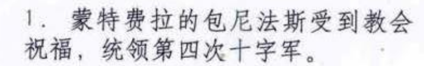

1. 《埋葬黑死病人》，从14世纪中叶起，欧洲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致命瘟疫，它被称为黑死病。

2. 在黑死病的威胁下，人们开展赎罪活动。

3. 画作中的阿金库尔战役。

4. 欧洲中世纪的领主与仆人。





1. 蒙特费拉的包尼法斯受到教会祝福，统领第四次十字军。

2.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即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查理曼和拿破仑之间，统治欧洲版图最广。



1
2 | 4
3





3. 欧洲封建社会中，社会各阶层等级分明，不得逾越。图中两个身份低下的农民正在为两个有地位的骑士让道。

4. 高达10厘米的木屐在15世纪的意大利流行，样式夸张奇特但有实际用途。外出时，这种鞋使当时长及脚踝的长裙不致被市街道上的污泥弄脏。

# 出版说明

《牛津欧洲史》是耶鲁大学著名史学家罗宾·W.温克(Robin W. Winks)的代表作品。该书分四卷阐述了从中世纪末到当代的欧洲历史，这也是欧洲进入现代，走向世界，从而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作者不拘泥于对历史事件和过程的细节描述，而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进行了全方位的宏观扫描，尤其重视各个历史时期在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变革和成就。如作者所言，本书其实是欧洲文明史。

作者以简约的大手笔，勾勒出欧洲数百年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的大脉络。其描述清晰精练，其分析深入透彻，堪称历史著作的精品。由于本书作者是西方学者，书中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西方人的历史观和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立场和观点，相信读者对之能够做出正确的分析和鉴别。

# 序言

## 历史的价值

历史不是一堆记录在案的数据，也不是一串被记载下来的事实的堆砌，它是一系列相互冲突的争论。这样，关于一个事件的实际意蕴，一个偶发事件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最准确地概括这个事件，这些争论在历史的解释中属于最有价值的核心内容。当然，历史让我们认识自己；当然，它教导我们理解我们集体的过去并对之保持适当的尊重；当然，它还传授给我们一种特殊的技能，即如何提问，如何找到答案，如何合乎逻辑地、令人信服地、清晰地、有目的的思考；当然，它还是或应该是一种乐趣。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个民族选择对其历史的何种阐释是至关重要的。当一个社会隐瞒其过去记录的某些部分，然后那个社会或其领导人向我们讲述他们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当一个社会试图改变历史记载所呈现的或已经有充分根据的事实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历史是如何出于政治目的而被曲解。

控制历史和控制如何写历史的人就控制了过去，而控制过

去的人就控制了现在。那些想压制历史争论的人持两条理由：其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其二，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知识的正确性毋庸置疑，那些欲攻击普遍认识的人一定有破坏性的目的。持这种观点的人的做法最终恰恰会毁灭历史学本身的价值。因为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教会我们相互展开建设性的争论。

显然，历史是社会的需要。它赋予我们认同感。它为我们提供了多少可以用来指导方向的导航图，从而帮助我们在当今日益复杂的时代确定我们的方位。当我们问，我们是谁？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的？我们会采取怀疑主义态度，求诸于批判性判断的起始阶段。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历史学为我们提供了解释和分析的工具。它帮助我们发现特殊事例，去了解过去的时代或过去的事件中的独特性，同时也帮助我们了解，特殊性和独一性如何为普遍性作出贡献。历史学就是这样向我们展示人性在社会中的表现和表演，以及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通过让我们体验其他生活样式，历史学向我们揭示了主观性和客观性双方的价值。这两者是我们个人认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不可分割的前提，我们总是在这两者间摇摆但却几乎意识不到。这样，历史既有真理的形式，也有意见的内容。对历史的认真研究会帮助我们区分这两者。做出这种区分是重要的，如沃尔特·瑞雷(Walter Raleigh)爵士所说："是意见而非真理能够无需通行证在世界上畅行无阻。"在大多数场合，我们从报纸、电视和朋友那里所读到、看到和听到并信以为真的东西是意见而不是事实。

历史学是一项活动，它通过追问具体的问题而达至一般性问题。像本书这样的教科书首要关注的是一般性问题，虽然它

不时会提出具体问题或展示具体的事实，但那只是讨论一般性问题的途径。伟大的哲学家卡尔·雅斯帕尔斯(Karl Jaspers)一次评论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首先学着从历史之镜中寻找答案。"严肃的历史著作所必须充当的正是这面镜子。

一谈到"文明"(本书即是文明的历史)立即就会陷入争论。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如此恐惧历史研究。谈到"西方文明"甚至更受限制，在某些历史学家那里，它的范围过分狭窄。不过，如果我们将历史理解为一个过程，就必须通过特定的空间位置来把握它：我们的连续性、我们的标准、我们的进程等。我们还必须识别内含于"西方文明"概念的固有的两大偏见：其一，我们知道什么是"文明的"并达到了"文明的"标准；其二，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是单一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文明单元。第二个偏见很容易发现。在我们大多数学者那里，在我们几乎所有的大学课程上，不讲"东方文明"(Eastern civilization)，只讲"东方的各文明"(the civilizations of the East)，这个术语表示，西方是一个单元，东方却不是。这些反映我们西方人世界观的习惯性的短语如同我们流行的地理书一样，表现了西方人的偏见。"近东"和"远东"中的"远"和"近"只是相对于西欧的地理位置而言。日本人不会将伦敦称为"远西"，将洛杉矶称为"远东"，尽管如果他们将自己所在的地方视为世界的中心，这两种说法或许都是正确的。由于这个习惯短语已经成为我们西方语言传统，所以本书仍然采用这种用法。一个历史概念的使用和像本书这样的写法提醒我们，在我们的语言中存在着偏见，尽管我们不得不继续使用这种简便的习惯形式。

不过，如果谈文明，从一开始我们就得给出何谓"文明化"(being civilized)的定义。关于这个问题的书籍已是汗牛充栋。

一般人常将那些说着不同语言、践行不同风俗的其他民族的人定义为“不文明”(noncivilized)(野蛮)的人。中国人习惯于将所有外国人都视为野蛮人,古代希腊人将不能用希腊语交流的人称为“吧尔吧人”(bar-bar),这些人不会说我们的话。如今,能够用一种以上语言交流仍是文明人的标志。这样,文明的定义至少在那些很少思考其用语的含义的人那里明显发生了变化。

可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给这个概念一个较为确切的定义。因为对于一部涵盖整个西方的历史著作而言,文明这一概念是全书的一个指导和基本框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其他人在诸如是否存在与英国和意大利文明不同的美国文明问题上存在分歧,他们也争论,这些文明是否仅是一个更大实体的变体,而那个更大实体——西方——才有资格称为文明。尽管这些争论是建设性的、需要的,但在我们这里无关宏旨。我们需要一个特别清晰的定义,以用来进行下面的叙述和分析。因此,这个操作性定义要求,“文明”包括一个社会或相互依存的一组社会的下列若干(尽管不需要全部)条件:

1. 要有某种形式的政府,人们通过它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和履行相应的责任。

2. 城市社会亦即城市生活要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从而使文化不是游牧的和分散的,这种游牧的和分散的文化不能留下有意义的物质遗迹。

3. 人类已经成为工具制造者,通过使用金属,改造他们的物质环境,从而也改造他们的社会经济环境,尽管这种改造是有限的。

4. 某种程度的功能分化已经开始,通常发生在工作场

所,而荣耀、地位和目标一起,成为社会的黏合剂。

5.社会阶级已经出现,不管他们是相互对抗还是相互依存。

6.书写形式已经发展起来,从而群体和群体间,更重要的是代际之间,可以通过文字交流。

7.闲暇的概念出现了。于是,生活不限于工作场所,也不是特定的阶级职责或分工。于是,比如说,艺术超出了(当然并不排除)仅仅作为装饰的局限,运动超出了竞技的范围。

8.要有更高存在的概念,尽管并不必然通过组织化的宗教。通过它,一个民族能够超越自己,在他们自身之外寻求事件的解释和发现他们的目标。

9.要有时间概念,通过它,一个社会将自己与过去和对未来的假想联系起来。

10.一种批评的能力发展起来。这种能力不需要西方的理性主义、直觉、特殊的宗教或政治机构,但是它必须存在。好使一个社会能够从内部进行变革,而不是等着来自外面的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

西方最常见的偏见是用技术变革来衡量"进步",根据这个标准,至少到历史的晚近时期,没有出现重大技术变革的社会是不开化的。事实上,尽管文字记录和重大技术变革存在于我们所称的"文明社会",但两者都不是文明开化的本质性内容。当我们研究历史时,或许我们应该记住英国批评家约翰·拉斯汀(John Ruskin)所记载的历史行为的三个内在要素:"伟大民族将他们的自传书写在三种稿本上:行为之书、言语之书和艺术

之书。”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从过去学到什么”。在大多数场合我们做不到,至少从简单的思维水平上来说是这样。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会在外交事务中根据行为的某种程式来做出决定,仅仅因为类似的程式曾在过去有效。我们有足够的智慧了解到,环境改变了情势,而新知识带来新的责任。当然,个人“向过去学习”,遭到过抢劫的人以后会有警惕性。可是,将这样的经历拔高为“历史教训”,是将个人从孩童向成年人的成长经历变成历史,最多,这种成长是个人传记中的经历而已。

我们有时会从历史中记取“错误的教训”。事实上,那些热心地争辩未来的特殊行动方案能够从过去找到答案的人会说服头脑简单容易受骗的人,使他们相信历史会重复,因此,过去是未来的导引图。可是,没有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会持这种观点。一般的模式或许重复,有时真的就会重复,但是,特殊的事件之链不会。政治科学、神学和科学等学科达到最高程度的概括,历史学与它们不同,它完全不相信铁的规律。但历史也不仅仅是一串没有联系的事件。的确存在一般性模式、因果链条、中间层面的概括,这是得到了证明的。这样,历史学就处在一个让许多人不满意的层面上:高于特殊(specific),而低于绝对(absolute)。

如果复杂的问题从不以同样形式或以可辨识的类似的形式重复——如果那样,借用一句惯常的军事比喻,将军就不必为了下一场战争而是为前一场战争做准备了——那么,历史研究能够为社会解决自己的问题提供什么帮助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历史为人类在各种场合的行为提供一套丰富的诊断报告,个人的和集体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的,然后详尽地告诉我们,人类曾经怎样处理他们的事

务,从而揭示出当今如何处理同样问题的方式。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的国务卿,前参谋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有一次曾评论说:如果不考虑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衰落,没有人能够理解20世纪50年代的问题。他当时提到了关于雅典与斯巴达战争的杰出的历史著作,这部著作由一位参加战争的雅典人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战争刚刚结束后完成。在公元前5世纪,没有原子弹,没有电子通讯,没有枪或火药,战争的后勤系统完全是原始的,但是,2300年后,美国一位最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发现,他思考问题还离不开修昔底德。

历史学只能大致把握人类行为的范围,把握某些极端行为或一般行为。尽管不能尽善尽美,但它能够揭示,如何或在什么范围内,人类行为会发生变化。这最后一点对于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管理人员、记者或外交官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些鼓舞人心的领导人,如先知、改革家、政治家等,如果掌握了历史所提供的材料,会在领导我们走上新的道路时做得更好。因为它能够告诉我们,人类的什么东西是可以持久的或不能持久的,如同科学和技术告诉工程师,金属能够承受什么样的张力。历史也提供关于空间和时间深度的知识,能够消解改革者的乐观主义和过分自信。比如,我们可能希望保护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消除酸雨,净化我们的河流,保护我们的野生动物,保留我们壮观的自然景色。历史也许告诉我们,大多数这样做的人都失败了。它或许能够给我们某种指导,以免重蹈覆辙。不过历史还会告诉我们,个人和公众在如何做才能最好地保护环境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有许多人认为,这种保护是没有必要的。有一些相信保护环境是必要,但他们也同样认为,低水

平的环保必须让位于利用自然资源的更高水平的生产。历史能够提供一种解决方案,使不同意见相互理解,但求助于历史并不能使立法通过,使愤怒变成兴奋,使未来更干净更安全。历史不能定义河流污染,但历史可以提供过去的数据作为比较的尺度。这个定义会来自于当前的政治或我们关于明天的判断而不是历史。历史服务于长跑、有时服务于中跑,但很少服务于短跑。

这样,如果我们愿意将"相关性"理解为不像科学的直接应用性那样容易看到,也比直接行动更遥远,那么,我们也许得承认,历史就是"相关联的"。它不是实际去建设高速公路,或清除贫民窟,但它能给做这些事的人大量的帮助。忽视了它,就会在实际行动中导致失败。

但是,历史也是娱乐,至少对那些乐得让自己的好奇心所驱使的人是如此。像俄国的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在一段时间里有多少情人,他们在皇帝卧室里的行为有多大影响,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宁愿将其视为历史的奇谈?历史调查的一些细节,譬如,在一艘沉没的维京人的海盗船上发现的珍宝与盎格鲁—撒克逊诗人所描述的沉船宝藏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还有更复杂的因果关系问题,如革命知识分子的作品对革命的实际影响是怎样的?以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如现代西班牙霸权的兴衰在多大程度上受新世界黄金和白银供给的影响?抑或文化议题,如西欧为什么采取复兴古典希腊和罗马的文学和艺术,而不是转向某种新的实验?那些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会如饥似渴地阅读以发现他们想得到的答案。找到答案后,他们还要进一步追问,我们已有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还要转向在时间上最接近相关人物和问题的材料,转向相关人物原始的语言。阅读苏格拉底、哥伦布、丘吉尔是有趣的,阅读他们自己的文字,仿佛

与他们本人交谈,更有意思。在语境中考察他们是重要的,至少同样重要的是,考察我们是如何理解他们的思想,并使他们的思想适合于我们的目的。读者会发现通向充满宝藏的历史领域的道路,如果依赖从过去和现在的意见中提炼出来的意见,对此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可怜的。他们还能够通过编年表、传记、图画、地图得到帮助,历史学家们通过这些东西与读者分享快乐和直观的感觉。

最后,认识过去就是认识我们自己——不是完全的,也并不充分,只是改进了一些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历史能够帮助我们养成优美和高雅的行为,中肯和彻底的思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的和谐与宽容。最为重要的是,历史给我们一种兴奋感,观察或参与我们周围那些有一天也会成为历史的事件的激情。

历史是叙述,是故事,它虽然承认许多令人着迷的节外旁枝的意义,但它首先关注宏大课题。因为历史主要关涉人们如何与为何如此行为,关涉人们的思想和信仰的模式。说到底,历史关涉到什么是人们确信为正确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几乎所有的历史都是认识和思考(intellectual)的历史,因为,特殊的条约、战争和科学发现的意义依赖于卷入其中的那些人,那些追随自己思想的人。历史证明,我们会死,就如我们可能会活着。这是因为,在久远的过去,一些人就对此确信不疑。

我们每个人不能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不断重构我们的过去,像侦探所理解的那样在我们的动机和态度的支配下去做事,但正规的历史学研究是相当严谨的研究。历史研究可能赋予我们某种非常有限的预卜未来的能力。更为确定的是,它会帮助我们将特定事件的原因组织在意义的模式中。历史还会帮助我们宽容其他人的历史观点,即便

它帮助我们形成了自己的信念。历史会帮助我们从不太重要中挑出重要,从不相关中挑出相关,从而使我们不至于以头脑简单的方案去应对人类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抵制一种倾向,将我们的问题归咎于一个团体或个人,我们也必须有力地捍卫我们的信仰。

承认甚至赞美全部文明的价值对于文明生活本身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通过我们特殊的历史经历的多棱镜认识全部文明。我们热爱自己的历史,在自己的历史中我们感到舒适和安全。借助于它,我们解释我们所遇到的所有其他事情。明了这一点,就是要承认我们也是历史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历史,以我们的方式提出我们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向我们的过去提问,也就不能向未来提问。

罗宾·W. 温克(Robin W. Winks)著

丛日云　译



# 目　录

# 地图与案例小品

## 地图



## 案例小品

# 第一章

# 中古后期的东欧

## 一、导言

“历史”并非远离我们而存在——在历史叙述中，我们也揭示了自身的情感、偏好、忧虑和问题。其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完全没有史料可以在细节、精确性和复杂性上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学家必须借助于残存的信息工作——我们永远不能拥有完整的、详尽的史料——而且越是久远的过去，史料就越少。战争、炮火和偷窃行为都使资料趋于衰竭。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探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定位于我们自身的生活和经验之上。那些（史料）收集活动根本不能为我们探究久远的社会或文化提供所需要的全部信息。无论是图书管理员还是原创作者，抑或编者，都不了解我们正在探究的问题。因此，当历史学家带着“妇女起到了什么作用？”之类的问题去探究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探究某位具体的女性，像纳瓦尔的玛格丽特（Marguerite de

Navarre),谴责其社会中的性别地位界定,但是玛格丽特的同时代人并非根据这样的问题来梳理知识。我们的史料和好奇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与沉默者之间的对话,而并非充分的交谈:我们可以问,而它们不会回答,或者我们根本无法听出其答案的微妙之处。

也许没有哪个时代能比 1350 年至 1650 年这段时期更好地证明过去对于现在的冲击。在 19 世纪,各欧洲民族文化在探讨其"起源"时关注了该时期的各个方面:"意大利文艺复兴"、"法国文艺复兴"、"德国宗教改革"以及"英国文艺复兴"。每种文化都将其视为一个大转型时代,在此期间,随着某些近代元素的出现,封建主义的、普世基督教化的中世纪文化被抛掷于后。19 世纪的欧洲史家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们"视为官僚主义的、理性"国家"的开端。这种政体,正如他们亲身体验的,伴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系和抽象的"权力"与"合法性"概念。他们在王朝和个人统治的年代搜寻官僚体制和官僚主义者。即使当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日益衰败的时候,法国和英国的君主们依然被认为是成功的典范。同样地,欧洲的路德教徒,像列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也没有将"新教"的"起源"置于早期教会,而是置于 16 世纪,确切地说,是马丁·路德呼吁宗教改革的时代。为了与"起源于 16 世纪的新教"这一独特的概念相适宜,许多历史学家将天主教视为不受时间影响的宗教,从教会的发端到 19 世纪都没有变化。于是,新教就演变为基督教的"现代"形式,用马克斯·韦伯的言辞来形容,就是 19 世纪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先驱,而天主教则被冠以"传统"和"保守"的标签。

"起源"一词,原本是 19 世纪的思维产物,当时达尔文提出

了物种“起源”的假设，阐明了时间的线性概念及其与不同植物群和动物群之间的独特联系。历史学意义上的“起源”概念则是寻求以一种更加原初的形式探究现今之事。同样麻烦的是，它倾向于否定现今以外的一切。现代国家可能尝试将其“起源”置于那些尚不能想象现代民族国家的君主们的各项活动之中，后者的财富、权力及法律概念皆与现代民族国家格格不入。现代美国教会曾追本溯源至欧洲（尤其是英国），那是一个与其“个人权利”和“正义”的观念相距甚远的时空。这两种观点都将现代人的偏好、价值观念和忧虑带到了过去。

也正是如此，所以不同的群体致力于该历史时期（1350—1650）的不同方面。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研究于 20 世纪 30 年代取得了巨大进展，当时欧洲学者们为了躲避纳粹来到美国，并且毕生致力于“文艺复兴”领域。在研究中，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人文主义者”身上，并发现了导致世界主义产生的“世俗主义”的发端和他们正在自己的世界中千方百计地寻找的学术宽容。文艺复兴，一个世俗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时代，其观念正以独特的力量回响于一个能够在大学课程和高中课堂上来阐释自身文明的国度里。70 年后，它继续塑造着数以百计的美国大学的课程设置，那里的“文艺复兴”课程同“宗教改革”分开教学，甚至像罗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和伊拉斯谟（Erasmus）这样同时属于两门课程的具体人物也不例外。

对“起源”的探求已经将那些彼此相连的人分开，阻断了其在影响和对话层面的微妙联系。同样地，它也有效地压制了令思想家的概念产生混淆的相似性，即共享导向，例如，在伽利略和加尔文对自然的讨论中的共鸣。在政治上，它也从 16 世纪欧洲最有权势的统治者的角度分别地看待意大利的诸多城市共和

国,前者的确曾对它们行使权力,封杀其政权,并掠夺其财富。美第奇家族就非常警惕哈布斯堡家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Habsburg Holy Roman Emperor Charles V):1530年,他任命亚里山德罗·德·美第奇(Alessandro de' Medici)为世袭统治者。

至少"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作为术语源于14世纪、15世纪和16世纪欧洲人的自我认知。由美国大学最近采用的,并且现已在欧洲大学流传甚广的"早期近代欧洲"的概念,完全是现代的创造。什么是"近代"?对一个15世纪的荷兰人而言,"近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是一个与"近代灵修社"相关的术语,用所有有学识的欧洲人的语言——拉丁文来描述,即"devotio moderna"。对21世纪的大学生而言,"近代"构成了一个在1650年根本无法想象的术语,它意味着16世纪的欧洲人所寻求建立的全球经济,以及在根本上是由20世纪的极权主义塑造的世界观念,甚至在19世纪就可以称做"我们已经丢失了的世界"。

在章节划分上,本册书承认这些划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17世纪——多么深刻地塑造了1350—1650年的历史的教学模式。然而,本书也寻求弱化这些划分。第一,它试图重建内在关联,例如"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神学家"之间关于圣经学成就的内在关联,或者古典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换言之,即这些结构所阻断的时间和空间的内在联系。第二,它以欧洲而非某一国家为对象来考察政治前景,将之视为一个富于外交和军事交易的地理统一体。也许最重要的,是本书试图纠正因追本溯源而产生的失衡。那些较早的历史著作结构,过于受19世纪民族主义的驱使,皆倾向于将欧洲孤立起来,并同那个如此引人注目地与之相遇的世界分离。因此,本书没

有为了保持传统的结构以“文艺复兴”开篇，而是代之以使文艺复兴成为可能的历史，即十字军运动和土耳其人的历史。十字军运动塑造了欧洲人的自我认知达300年之久：西班牙的小贵族们先是在伊比利亚半岛与穆斯林和犹太人为敌时将自己视为十字军，然后又以十字军的身份去攻打阿兹台克和印加帝国。如果没有土耳其人，也不可能有“文艺复兴”，前者攻占了君士坦丁堡，迫使希腊古典学者携带书籍逃往西方，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全数带到了西部拉丁地区。而且，土耳其人比美国人更早地注意到了路德和查理五世。

本书从十字军国家和土耳其人开始探讨1350—1650年这段历史，将欧洲人看世界的视角转变为非欧洲控制论。穆斯林或是在十字军传奇中的“摩尔人”、阿拉伯人以及土耳其人，依次威胁着“欧洲”。伊斯兰教在7世纪和8世纪以闪电般的速度占领了欧洲，直抵比利牛斯山脉。那些穆斯林讲阿拉伯语，并将丰富的阿拉伯医药、数学和哲学带进了伊比利亚半岛。在14世纪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和在16世纪围困维也纳的穆斯林是土耳其人。16世纪，土耳其人那种仿佛是不可遏止的进攻再次唤起了欧洲人先前军力衰败的体验。从7世纪到17世纪，欧洲始终处在伊斯兰教的地中海扩张的阴影之下。

## 二、十字军运动

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呼吁发起“十字军东征”，即一场从异教徒穆斯林的手中解放圣地的军事战争，因为后者的扩张已经占领了基督教史上的几个主要教会重地。1097年，欧洲骑士及其扈从们穿越小亚细亚，在多里留姆(Dorylaeum)

文献记载

## 教皇乌尔班在克莱门特

罗马教皇在宣布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讲道：

属于波斯种族的土耳其人，通过占领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的土地，已经弥漫于罗马尼亚境内，甚至抵达了地中海某地，他们称之为圣乔治湾。他们已经征服了那里的居民，摧毁了教会，并损毁了上帝的王国。如果你漠不关心地允许其存在，久而久之，上帝的忠实的信徒们将进一步地受制于……

我是对在场的人说这些话，我也会将之转告不在的人，而且，这也是救世主的命令。对于东征的人而言，如果他们在陆上、在渡海之时，或是在与异教徒的搏斗中结束其受缚的生命，其罪恶将获赦免。我，作为从上帝那里获得了这一圣赐之人，将把它授予那些远征者。

噢，如果一个如此被蔑视、腐化以及被魔鬼束缚的民族征服了一个被全能的上帝所信任的，并以基督之名荣耀的民族，那将是多么令人羞愧！噢，如果你不去帮助那些像你一样信仰基督之人，上帝将会把多少邪恶归罪于你！

就让那些惯于挑起私斗，甚至攻打基督徒之人，前去参加那值得参加而且必定胜利的反异教徒之战。现在，就让那些至今为止以劫掠为生之人成为基督的战士；就让那些从前与父兄剑拔弩张之人前去与蛮族开战；就让那些为几块银币而受雇之人去赢得其永恒之报偿。

---

"The Chronicles of Fulcher of Chartres" trans. Martha E. McGinty, from *The First Crusade: The Chronicle of Fulcher of Chartres and Other Source Material*, ed. Edward Peter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hiladelphia Press), pp. 30—33.

战役上打败了土耳其人，夺取了塞尔柱苏丹的财宝，并开辟了进一步前进的道路。诺曼贵族鲍德温(Baldwin)离开了大部队，来到爱德萨(Edessa)。在同当地的亚美尼亚(Armenian)统治者们协商之后，他在此当上了爱德萨伯爵——是即将建立的第一个十字军国家(1098 年)的君主。经过近七个月的围困，欧洲十字军在倒戈者的协助下于 1098 年占领了伟大的要塞城市安条克(Antioch)。安条克是第二个十字军国家，由诺曼人波赫蒙德(Bohemond)统治。其他几支十字军则在 1099 年 7 月突袭了耶路撒冷。布荣的哥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被选为"圣墓守卫者"。于是，第三个十字军国家建立了。

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舰队现在开始支援对海岸城市的占领。1109 年，图鲁斯的雷蒙(Raymond of Toulouse)之子，以的黎波里港为中心建立了第四个、同时也是最后一个十字军国家。耶路撒冷王国在理论上是其他三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却经常不能行使权力。拜占庭皇帝从未放弃对这些地方的权力，十字军曾经向阿历克修斯(Alexius)宣誓捍卫这些权力。

西方人的占领地分布在幼发拉底河到埃及边界之间的一块狭长的海岸地带，长 500 余英里，宽很少超过 50 英里。危险不断威胁着这里。西方人没有采取明显的措施来建立公共防御。大领主们虽然建立起富丽的城堡作为战略防御地，但是经常彼此相残，有时甚至与临近的穆斯林结为联盟。

耶路撒冷巡回法庭记录了十字军国家的政府实践。王国的高官都是国王的王室官员：管家、治安官、礼仪官等诸如此类。贵族法庭不仅解决纠纷，而且具有处理国事的国家议会功能。领主们在各自的采邑内拥有司法权。刑事和民事案件要在子爵、城里的王室官员指导下进行，而且还设有特别的商贸和海事

法庭。当时主要通过征收关税、对制革业及类似行业垄断税、土著居民土地税来提高税收。然而,由于货币很少,所以国王就千方百计地袭击穆斯林商队或富孀来稳固财政。教会组织非常复杂:虽然耶路撒冷和安条克两个拉丁大教长各自拥有一班由天主教的大主教和主教组成的教会统治集团,但希腊、叙利亚和亚美尼亚教会仍然继续存在,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教职人员。此外,还有穆斯林和犹太教信徒。

## 1. 军事骑士团(1119—1798)

早在占领东地中海的过程中,西方人就建立了军事骑士团。第一个骑士团是"圣殿骑士团",由一个对艰辛的基督徒朝圣历程持怜悯态度的勃艮第骑士于1119年创立。这些骑士发誓要守神贫、贞洁和服从,并且将总部设在索罗门神庙的废墟附近——因此命名为"圣殿骑士团"。圣·伯尔纳(St. Bernard)在西多修会会规的基础上亲自为他们制定了章程。第二个骑士团隶属于古代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医院,因此被称做"医护骑士团"。骑士团由骑士、随军教士和听命于团长的僧侣组成,是圣地最有战斗力的团体。每个骑士团都有特殊的制服,圣殿骑士穿绣有红色十字架的白衣,医护团骑士穿绣有白色十字架的黑衣。后来,又出现了第三个骑士团,一个纯粹的德国骑士团,称条顿骑士团,总部设在艾克(Acre),他们穿绣有黑色十字架的白衣。

这些骑士团在圣地拥有自己的要塞和教堂,同时还有可以从中获取各种产品的村庄。此外,在欧洲,西方的君主们也赠予其大量土地。骑士团经常与穆斯林结盟,而且甚至完全忘记了



这幅 14 世纪的缩微画描绘了十字军在 1099 年袭击耶路撒冷的场景，它是由一位法国人于 1337 年记述的。领导这次突袭的是布荣的哥弗雷，左边较远的一位是隐修士彼得。(The Granger Collection)

自己守神贫的誓言，参与到银行和大规模财政运作之中。在 14 世纪早期，法国的腓力四世（Philip IV of France）由于政治原因摧毁了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则将其部分地产和诸多理念传至近代的普鲁士国家。医护骑士团首先转移到塞浦路斯，而后又在 14 世纪早期移至罗得岛，1522 年被土耳其人驱逐至马耳他，并在那里一直存续到 1789 年拿破仑夺取该岛之时。

## 2. 穆斯林的再征服和后期十字军运动(1144—1291)

十字军国家能够存续那么长久是一个奇迹。并非是那些城堡或军事骑士团保护了它们,敌对的穆斯林的分裂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当穆斯林统一于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之下时,基督徒的确遭受过巨大损失。从12世纪20年代开始,底格里斯河畔的摩苏尔(Mosul on the Tigris)的统治者赞吉(Zangi),成功地统一了该地区的穆斯林首领。1144年,他占领了爱德萨,第一个十字军国家陷落。

作为对爱德萨陷落的回应,圣·伯尔纳在欧洲亲自布道呼吁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他引发了巨大热情,西方的君主们——法王路易七世(King Louis VII of France)和德皇康拉德三世(King Conrad III of Germany)——首次来到东方。但是,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却令人震惊地失败了。当法德军队路过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他们与拜占庭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恶化。这很可能是因为皇帝曼努尔一世(Manuel I Comnenus, 1143—1180年在位)为了让他们尽快渡海而在卖给他们面粉的时候掺入了白灰。

西方军队在小亚细亚几乎精疲力竭。当残余部队抵达圣地时,他们发现自己与当地领主陷入一种无望的冲突之中,因为后者唯恐新来者接手王国。1149年,十字军没能占领大马士革,却引来惩罚。1154年,赞吉的儿子,努莱丁(Nureddin)占领了这座城市,并联合叙利亚穆斯林共同反抗拉丁人。

穆斯林再征服的下一个行动是由努莱丁的一名将军来完成的,后者曾被派往开罗去援助派系之争中的一方。这位将军后

来成为埃及的维齐尔，并在1169年去世时将职位留给了自己的侄子萨拉丁(Saladin)，后者是十字军时期最伟大的穆斯林领袖。精力充沛、功勋卓著的萨拉丁将军把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穆斯林城市都纳入了自己的统治，并将之分封给家族中的忠诚之士。至1183年为止，其兄统治着埃及，诸子统治着大马士革和阿勒颇(Aleppo)，而一些近亲则统治着所有其他的重要中心。耶路撒冷王国的内部衰落和王位争夺给予萨拉丁一个时机，而不驯服的十字军领主违背休战协定的行为更给予了他一个借口。1187年，耶路撒冷陷落。不久，除了提尔港(Tyre)和一些城堡外，该王国对基督徒而言已经荡然无存。

这些事件引发了第三次十字军(1189—1192)东征。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弗里德里克·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率领一支德国军队穿过拜占庭帝国而至，但是在小亚细亚全军覆没。然而，其部队中的一些人继续行进到巴勒斯坦。他们在此被法王腓力·奥古斯都和英王理查一世所接收，二人至少都同样对钳制他人以促进共同目标感兴趣。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主要行动是对艾克港的长期围困，后者最终于1191年被攻占。虽然耶路撒冷没有被攻取，但萨拉丁与理查签署了一项条约，允许基督徒自由访问该城。

1193年，萨拉丁去世，基督徒获得了一个暂缓之机。然而，西方的增援已经缩减为涓涓细流。东方的失利部分地被在西班牙的成功所平衡，到13世纪末为止，那里的基督徒已经将穆斯林限制在半岛东南角的格林纳达王国。而远在东北，异教的立陶宛和斯拉夫人接受了波罗的海地区的条顿骑士团的传教。

1198年，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登上了教皇的宝座，发动了新一轮十字军东征，即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几个有实力的

领主做出了回应。威尼斯人同意供给运输工具和食品，并且以平等分享未来战利品为条件提供了 50 艘战船。如果十字军愿意帮助重新占领扎拉(Zara，一座曾经起义反对威尼斯统治的亚德里亚海东岸的城镇)，那么威尼斯共和国的总督恩里科·丹德罗(Enrico Dandolo，约 1108—1205 年)同意暂时宽免债务。因此，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 1202 年对罗马天主教城市的抢劫为开端。教皇气愤地开除了这些十字军的教籍。后者在继续进攻之前先在扎拉安营过冬。他们主要担心财政。领导者们过高地估计了愿意参加者的人数，并效忠于一个由威尼斯人力图控制的更大的合约。

在冬季，十字军将注意力转向一个新目标：君士坦丁堡。德皇——斯瓦比亚的菲力(Philip of Swabia)，提议派主力部队护卫阿历克修斯(Alexius)——一位声称拥有拜占庭皇位的年轻王子——回归君士坦丁堡，废掉篡位者，让阿历克修斯登基。如果获得成功，阿历克修斯将资助十字军继续东征。这个想法非常受欢迎，因为它有助于偿清债务，有助于通过将拜占庭置于一位公正、友善的继承人的统治之下的方式重建基督教世界的团结，而且也最有可能拓展威尼斯的努力。多数骑士都同意这项计划。

1203 年春，一支士气高涨的十字军舰队，在热心的威尼斯人的支持下，攻击了君士坦丁堡。攻击者在第一次进攻中赢得了完全的海上胜利。第二次海陆联合进攻则冲破了城市防御体系，阿历克修斯三世(Alexius III)逃离了君士坦丁堡。小阿历克修斯于是被加冕为阿历克修斯四世。当他离城追杀阿历克修斯三世时，君士坦丁堡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火灾，很可能是当地一伙法兰克人在撒拉逊人(Saracen)地区的清真寺放火时引发的。

阿历克修斯四世非常生气，并拒绝履行诺言支付款项。可以肯定的是，他既不能平息越来越不耐烦的十字军，也无法在战争中击败对方，于是，一群元老院议员、教士和平民罢免了阿历克修斯四世。

1204 年 3 月，十字军和威尼斯人协议再次夺取君士坦丁堡，意欲选出一位拉丁皇帝来掌管拜占庭帝国四分之一的土地及其上的战利品，将其余四分之三在威尼斯人和非威尼斯人中间平分。第二次围城以再次占领该城以及长达三天的劫掠而告终。

教皇本人也谴责了这次十字军的暴行。究竟帝国图书馆毁掉了什么是数不清的。除一般性的破坏以外，仅威尼斯人就在战火中劫掠了大量价值连城的精美物品，并将之运回自己的城市。其战利品包括自君士坦丁时代就成为城市标志的四匹铜马，希腊皇帝们长久以来收集的圣遗，以及数以百计的拜占庭艺术品。十字军现在完全偿清了威尼斯人的债务。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彻底玷污了驱使世人奔向圣地的热情。也许，在多数情况下，这将被教皇与其欧洲反对者之间的争斗淡化：首先，1208—1240 年间在法国南部出现阿尔比派异端；其次，在 1220—1250 年间又出现了德皇弗里德里克二世的反抗运动。在这些事件中，教皇把曾经给予反对穆斯林的十字军战士的赎罪券，同样授予了那些在欧洲与假冒基督徒之名的敌人奋战的战士。这一切发展，加之军事上的反复失利，给世人带来了幻灭。

这场悲剧式的无效行动的高潮，也许是 1212 年派出的所谓“儿童十字军”。法国和德国的儿童群集在地中海海岸，盼望海水能够在他们面前分开一条通往圣地之路，引导他们取得一场兵不血刃的胜利。然而，神迹没有出现，数千儿童涌进马赛和其

他港口。许多人在那里被卖为奴。

其余几次十字军的历程是短期胜利与长期失利相抗衡的历史。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8—1221)时,基督徒想要占领埃及,但没有成功。德皇弗里德里克二世个人发动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1228—1229)。这次没有发生武装战斗,部分原因是德皇弗里德里克二世过于世故,在能够运用外交手段实现目的时绝对不诉诸武力。由于在西西里的经历,他能够讲阿拉伯语并且十分熟悉穆斯林,因此他通过谈判为基督徒赢得的权力,远远多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来的任何一位军事长官通过武力所赢得的。1229 年,他和萨拉丁的侄子签署了一个条约,内容是将耶路撒冷交还给拉丁人。伯利恒和拿撒勒也被移交过来,同时双方还同意签署一个十年的停战协定。但是,埃及统治者当时从中亚吸收了数千土耳其人为之服役,后者在 1244 年占领了耶路撒冷。直至 1917 年,该城一直控制在穆斯林手中。

法王圣·路易发动了两次十字军战争,第一次被称做“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1254),目标指向埃及。路易本人被俘入狱,不得不交纳巨额赎金。1250 年,埃及苏丹的王室军队(称做马穆路克,或奴隶)攫取了埃及的实权。不久以后,刚刚在亚洲取得了胜利的蒙古人入侵了叙利亚,并被不久将登基为苏丹的马穆路克将军贝巴尔(Baibars)击败。他攻陷了一些残留着十字军的要塞,于 1268 年占领了安条克。1270 年,因为惧怕圣路易发动的新一轮十字军东征(第八次),他延迟了进攻。直至法王在突尼斯登陆并死在那里后,他才又恢复了攻势。1289 年,穆斯林占领了的黎波里;1291 年,占领了艾克。

长达一个世纪的、有几分世俗性的十字军运动的续集(前一百年更虔诚),现已宣告结束,而且基督徒的殖民地亦已消失殆

尽。即使在为其建立与防御耗尽财力、流尽鲜血的西欧，这也没有引起深沉的哀痛。这些殖民地已经证实了分裂，转移了在欧洲建立国家的注意力，并且也几乎没有什么精神创造。

不久，发动了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在 1305 年至 1378 年之间，罗马天主教会追求的不是收复巴勒斯坦，更多地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免受异教徒的侵袭。从亚历山大里亚到加纳利群岛，从立沃尼亚到希腊，十字军都在为捍卫信仰而战。同时，教皇也在计划、征税和战争中，尤其是海战中，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为了对抗威胁，教会还使用了经济制裁。然而，除占领士麦那(Smyrna)和亚历山大里亚以外，最后一次十字军运动依然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 3. 十字军运动对西方的冲击

十字军和东方朝圣者的返乡数目十分巨大。仅仅医护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的船，每年就从马赛运送 6000 名朝圣者。各种观念伴随着这些人来来往往地流动。西方语言中的阿拉伯词就验证了西方人在贸易中引进的概念和产品：市场、关税、法语中的“douane”和意大利语中的“dogana”(海关，源于阿拉伯语)、意大利语“diwan”(官员坐的沙发，源于阿拉伯语)。在食品中有糖、藏红花、大米、柠檬、杏、葱、韭菜、西瓜以及开心果；在制造品中有棉花、薄棉布、缎子(源于大马士革)以及许多其他产品。

新产品促进了西方贸易的增长。威尼斯和热那亚——东方货物集中进入欧洲的港口，迅速繁荣起来。佛兰德尔的城市也是如此，其自身的毛纺织业也因为东方奢侈品贸易的刺激而发展起来。在前所未有的复杂的商业和财政系统中，信用证明和票据兑换成为必需。意大利银行的办事处在圣地不断涌现。

文献记载

### 洗劫君士坦丁堡

一位在1204年亲眼目睹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劫掠的希腊史学家,描述了他以为人类不可能为之的暴行:

我究竟该怎样讲述这些邪恶之人的暴行呢?他们不再崇拜圣像而是将之在足下踩躏。他们将殉道者的圣遗扔进垃圾堆。他们让基督的圣餐流淌在地上,并且将之到处抛洒……

他们将圣索非亚祭坛砸成碎块,并将之分给士兵。当圣器和金银装饰被洗劫时,他们还将骡马牵进教堂,并走近圣所。当一些骡马滑倒在大理石地面上时,他们就地将其刺死,让血污沾染了圣地。一个妓女坐上了大教长的宝座,并哼唱着淫词滥调,摇摆着低俗的艳舞。对于任何反对者,他们都会拔剑相向。在大街小巷、在神庙里,到处可以听到哭泣和哀嚎,有男人的呻吟,有妇女的尖叫,有伤痛,有强奸,有被俘,有妻离子散。贵族在羞愧中徘徊,长者泪流满面,富者沦落为穷人。

Nicetas Choniates, *Historia*, ed. Immanuel Bekker (Bonn, 1835), pp. 757ff. Condensed; our translation.

因此,十字军运动有助于新产品的引进,并为近代财政体系提供了前提条件。它可能也刺激了乡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使相对少量的农村人口在土地上拥有更好的生活,并促进了农耕方法的优化。

有些人相信十字军运动有助于弱化封建贵族,从而有利于君主制的发展。无论如何,为了远征圣地,国王首次可以直接征

税。教皇的势力因发动如此大规模的国际运动而得以增强。然而,长期的损失将会超过短期的收获。宗教动机越来越被现实考虑所冲淡。教士的世俗化现象、十字军赎罪券的滥用以及失败和无能的累积结果,都造成了十字军运动原初理念的幻灭。此外,人们的观念也可能因为某些发现而发生变化,一些人认识到穆斯林并非野兽,在彼此贸易中存在着利润,而且彼此共存是可能的。

## 三、拜占庭帝国的陷落(1081—1453)

在最后 372 年间,拜占庭帝国的命运越来越依赖西欧。十字军的洪潮先令拜占庭人感到不适,而后又彻底毁灭了他们。从 1204 年到 1261 年,拜占庭政府一直在国都外流亡,其主要目标就是将拉丁人驱逐出境。但是,甚至在拜占庭人于 1261 年重新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以后,他们仍然不能摆脱西方。

西方人的态度在 14 世纪意大利诗人彼德拉克清新的言辞中有所揭示:

> 我不知耶路撒冷的失陷和对拜占庭的占领哪一个更糟。前者意味着基督不再为人崇信,而后者也在崇信中表明了对基督的忽略。土耳其人是敌人,但分裂的希腊人比敌人更可怕。土耳其人公开进攻我们的帝国;希腊人说罗马教会是教会之母,而他们是忠诚之子,然而,他们却不接受罗马教皇的命令。土耳其人痛恨我们因为他们不那么害怕我们。希腊人心里既痛恨我们又对我们怀有深深的恐惧。*

* From H. A. Gibbons, *Found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New York: Century, 1916), p. 133.

15 世纪的一位希腊教士揭示了希腊人的这种态度,他说宁愿在君士坦丁堡看到土耳其人的头巾,也不愿看到红衣主教的红帽子。那些持认同观点的人终于在 1453 年如愿以偿。历史最大的讽刺之一就是,西部教会决定了东部教会的命运,而西部拉丁人想方设法要击退的穆斯林的统治恰好是被西部基督徒的扩张引入的。

## 1. 拜占庭的衰亡(1081—1204)

在最后几个世纪中,拜占庭帝国上演了内部衰退的戏剧。阿历克修斯·科穆宁一世在 1081 年攫取了王位。其后,帝国的土地集中似乎已经任意发展。伴随着中央政府的弱化和地方权威的出现,封建主义形式演变为最具有特色的生活方式,因为自由农民迫于经济衰退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将土地出售给大地主,然后自贬为依附农民。接下来是农村人口的锐减,与此同时,城市里的帝国警备长官或地方驻军长官则表现得完全像独立君主一般。

经济崩溃和社会悲苦在 12 世纪不断增加。收税官要求提供食物、住宿、赠礼和贿赂。他们会以国家需要为由牵走牛,然后再卖还给主人,而把钱留给自己。不定期征收的防御税给予他们进一步压迫世人的机会。伴随着海军的衰落,海盗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希腊沿岸和爱琴诸岛成为袭击者的巢穴,后者不仅抢劫商船,而且也劫掠沿岸地区。

1171 年,皇帝曼努尔·科穆宁一世孤注一掷地要剥夺威尼斯商人的财产,突然在一天内将所有能抓到的威尼斯商人全部逮捕,有一万多人被关进了监狱。但威尼斯的经济控制力太强,

皇帝很快就被迫恢复了他们的特权。1182 年，一股激进的反拉丁情绪导致了对君士坦丁堡数千西方人的野蛮大屠杀。于是，1185 年西西里的诺曼人围困了萨洛尼卡来实施报复。科穆宁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安德罗尼库斯一世（Andronicus I，1182—1185 年在位）在诺曼人兵临城下的时候被疯狂的市民刑毙。衰落的安苴鲁斯王朝（dynasty of the Angeloi）一直持续到 1204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于西方人之手。

## 2. 拉丁帝国(1204—1261)

包围了君士坦丁堡以后，拉丁人推举佛兰德尔的鲍德温为第一个拉丁皇帝（1204—12050），在拉丁人占领的 57 年中，该称谓一直在其家族中传续。威尼斯人选出第一任拉丁教长，并一直垄断着那个肥缺。帝国的版图在纸上被划分，因为其中大部分尚未被占领。威尼斯人对最好的海岸城镇和战略岛屿申明主权，捍卫了一条始于威尼斯的长长的海上运输线。新建政府是一个混合政府，在皇帝的议会中，其封臣和威尼斯商人各占二分之一。尽管拉丁帝国的皇帝在理论上是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继承人，但事实上他们从未获得希腊人的忠诚，不经贵族封臣协商，就无法做出任何重要决定。

在小亚细亚，从君士坦丁堡逃出的希腊难民在尼西亚建立了一个国家，并不断威胁要夺回君士坦丁堡。由于进攻次数频繁、外交上失利，以及在拜占庭财富用尽之后的贫困，西方人无法保持他们的帝国。当教皇深深卷入与西部皇帝弗里德里克二世的争端的时候，拉丁帝国的命数已尽。1261 年，尼西亚的希腊人夺取了君士坦丁堡，并重新建立了拜占庭帝国。

然而,与此同时,拉丁人也已从君士坦丁堡散开。希腊划分成一系列的封建公国。伯罗奔尼撒演变为亚该亚公国,内有12个男爵领地和许多小贵族领地。萨洛尼卡变为一个新王国的首都,后来在1224年重新回到希腊人手中。在爱琴海,一位威尼斯的冒险家建立了纳克索斯公国(Naxos),而其他贵族,尤其是意大利贵族也在各个岛屿上建立了自己的微型统治。威尼斯占领了克里特,这些封建国家持续的时间各不相同,但大多数是在15世纪土耳其人占领期间消失殆尽的。

尽管已经衰落,但11世纪和12世纪的拜占庭仍然保持着活力。经济活动在政府管制松懈的前提下似乎有所发展。文学、法律和学术十分繁荣。本土文学十分流行,伴随着异端的增多,对异族文化的怀疑态度也日趋弱化。在新贵族政府出现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班专业知识分子。然而,这些社会变化并没能使拜占庭帝国保留早期的骄傲感。与西方不同,拜占庭的行省城市都演变成重要中心,拜占庭的城镇从来没有超越手工业城市的水平。国际贸易都留给了外国人。拜占庭帝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是清晰可见的,但远非像西方那样迅速。

## 3.1261年后的拜占庭帝国

当尼西亚的希腊人在米哈伊尔·帕略奥格八世的领导下重新夺回君士坦丁堡后,他们发现城市的人口减少、毁坏严重,帝国原有的版图大部分控制在拉丁人手中。米哈伊尔不可能夺回整个希腊或诸多岛屿,将疆域推进到小亚细亚塞尔柱王朝的首都科尼埃,或者有效地对付巴尔干的塞尔维亚人。然而,他也避开了来自圣·路易的弟弟、安茹的查尔斯的威胁。1282年,仿

佛为拜占庭帝国而凸显的一支新的强有力的队伍、被称做“西西里晚祷派”的起义阻止了安茹伯爵入侵，致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计划。

米哈伊尔八世的后继者大都无能并且容易轻举妄动，以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个被围困的帝国的灭亡。王位战争将帝国从内部分裂成几个部分。当萨洛尼卡因内战分裂时，社会动荡再现，货币贬值。新争议将深受决择之苦的教士划分为两部分：与罗马教会联合或者相反。

从 1330 年开始，一场新运动在整个东欧复兴了修道主义，这就是“静寂”(希腊语 Hesychasm)奋兴运动。10 世纪，东正教僧侣在北希腊的阿索斯山上建立了一所非比寻常的修道院，禁止一切女人抑或雌性动物进入。由于直接对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负责，这些僧侣保有独立，实行自治管理，并将全部精力都用于自给自足和学术活动。从阿索斯山运动开始，还有许多僧侣创建了其他运动。其中之一是西奈的圣·格列高里。他在保加利亚东南建立了一所修道院，强调“静寂”目标——一种神秘的回忆和沉静，这是人类战胜了情感以后的状态。尽管他承认有利于精力集中的身体练习方法也十分重要，但强调只有冥思祈祷才可以与上帝沟通。

14 世纪早期，君士坦丁堡城内的修道院教堂在富人的捐赠下得以重建。拜占庭教士对于学术、图书馆的维护以及希腊遗产都重新产生了兴趣，为后世保留了过去的知识。拜占庭社会既承认现世的生活也承认精神生活。一些僧侣强调希腊文学和哲学，即所谓“外在智慧”，认为它使人能够认识真理；另一些人，经常是不识字的人，则强调来自于神圣之光的“内在知识”，称其可以照亮人类灵魂。通过这种神圣之光，通过一种心灵和肉体

的直接体验,人类得以神圣化。这些教义明显地给传统的东正教观点带来了问题,有许多评论家嘲笑"静寂"运动。然而,这种神秘运动引发了知识和灵性的复兴。

## 4. 土耳其人的进攻(1354—1453)

14世纪末,土耳其人开始逼近拜占庭在小亚细亚的边境线。经济和军事的动荡导致该地区民众极度不满,他们宁肯让土耳其人来统治,也不要残酷而无能的拜占庭官员。农人主动向土耳其人缴纳贡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许多人为了免税而改信伊斯兰教。他们学习土耳其语,同时也向游牧的土耳其占领者传授农业定居生活的艺术。

吞并了拜占庭在小亚细亚的领土之后,土耳其人建立了一支海军,并开始在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一带进行袭击。1354年,拜占庭的王位争夺者之一允许他们在欧洲安顿下来。不久,他们就占领了色雷斯的大部分地区。1363年,他们迁都至亚德里亚纳堡(Adrianople),这里位于距海峡较远的欧洲一侧。君士坦丁堡现在已经陷入土耳其疆土的包围之中,外界只能从西部的海路抵达。为了生存,后世皇帝们与土耳其统治者签订了屈辱的和约。

尽管拜占庭帝国一直存续到1453年,但是其生存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土耳其人首先选择进攻巴尔干的大部分地区,并分别在14世纪70年代和14世纪80年代占领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人。1396年,一支抵抗土耳其人的法德十字军在多瑙河的尼科波利斯(Nicopolis)被打得溃不成军。

然而,土耳其人的征服延迟了半个世纪。因为1402年,帖

木儿领导的蒙古人从中亚蜂拥而至，在安卡拉打败了土耳其军队。像大多数蒙古军队的征伐一样，这次行动也证明了其暂时性，所以土耳其军队和国家能够恢复过来。15 世纪 20 年代和 15 世纪 30 年代，土耳其人迁入希腊。完全被土耳其军事扩张所震惊的西方，现在试图支持拜占庭人的防御。他们于 1439 年协议建立了东西教会联合，并准备于 1444 年向保加利亚派出一支新十字军。不过，二者都被证明是无效的努力。

伴随着穆罕默德二世（又称"征服者"迈哈麦德）于 1451 年登基，君士坦丁堡的命运已经不可逆转。博斯普鲁斯的新土耳其城堡阻止船只向城中运送给养。1453 年，强大的土耳其军队和火炮包围了城市，他们甚至派轻便船队北行阻截逃亡者，并将之困入金角湾。最后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在土耳其人进攻时勇敢地在城墙保卫战中战死。

1453 年 5 月 29 日，城墙被摧毁，皇帝亦已战死，土耳其人占领了这座城市。穆罕默德二世在圣索非亚教堂内感谢真主安拉，而后就将那里变成了一座清真寺。其后不久，他新任命了一位希腊人为东正教大教长，并宣布自己为基督教会的保卫者。就总体而言，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里，东正教接受了苏丹，并视其为拜占庭皇帝的世俗继承人。

## 四、土耳其帝国(1453—1699)

土耳其帝国的遗产，无疑部分地源于其在中亚时的久远的过去，当时他们必定会受到中国的影响，并且像该地区的其他游牧民族一样生活。其语言、作战能力以及对习俗的严守也许都要追溯到这个时期。从波斯人和拜占庭人那里，土耳其人似乎

学到了对统治者的颂扬,对国家宗教以外的宗教团体的宽容,以及在国家内部促使这些团体形成独立的、分散的社团。至于伊斯兰教,土耳其人则从中汲取了神圣的律法,阿拉伯字母以及宗教、哲学和其他抽象领域中的阿拉伯语词汇。

## 1. 土耳其的制度

直至 16 世纪,土耳其对于异教徒臣民一直持宽容态度,允许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为国家效力,并且允许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和拉比成为各自宗教社团的领袖。宗教领袖不仅代表其信众处理与土耳其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是处理内部事务的民政权威。非穆斯林需缴纳重税,但生活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

从 1280 年至 1566 年,共有十位有能力的苏丹统治过土耳其。在理论上,苏丹拥有治下的全部财富,其目的就是对所辖地区进行充分剥削。为此,他维持了一套精心设计的行政官僚系统,其官员的生命和财产绝对从属于苏丹。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后者必须忠诚于苏丹,努力去做一名真正的穆斯林、一名土耳其人——换言之,他必须掌握土耳其式的讲话和行为方式。任何缺少这些特质的人,都不是统治者中的一员,而是属民。任何属民也都可以通过获得这些特质而成为一名土耳其人。他们唯一的义务就是征集、扩展和提高帝国的税收以及保卫和增加帝国的财富。

土耳其的统治阶级包括四个部分:皇帝与宫廷人员、武士、文士和圣哲。宫廷构成了一个内在部门,包括苏丹及其妻子、儿女、仆从、私人管家、宫廷陪伴,也包括所有眷属。此外,还有一个外在机构,包括大维齐尔和国家的高级官员,后者指挥国家各

部。大维齐尔掌管国家政务,如果受苏丹信任,他可以发挥巨大的影响力;但是苏丹也能够罢免和处死他。

在帝国建立初期,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王族垄断了宫廷的内外部门。但是,至 14 世纪,苏丹已经学会运用从基督徒属民中招募新兵的手段来平衡王族的影响力。一些人以战俘身份进入了宫廷体系;另一些人则是作为礼物被接纳的。但是,大多数人是通过每四年在年满 10 至 20 岁的男孩中募兵的方式得到的机会。新兵必须接受伊斯兰教,因此所有从基督教改宗的新兵,都可以同土耳其旧贵族家庭竞争在宫廷服务的荣耀。

武士包括所有与土耳其军队相关的人。除通常的非正规部队和卫戍部队以外,他们都是在土耳其早期历史中占统治地位的骑兵。他们因服骑兵役而获得一块采邑,可以随心所欲地经营这块土地,向佃户收租,并且拥有司法权。伴随着火药的引进以及大炮和火枪的发展,土耳其人建立了一个使用这类武器的新军团,即"禁卫军"。大多数禁卫军来自那些没有入选宫廷训练营的新兵。他们住在首都的特别营房,并享有特权。他们既是国力之源,也是不断威胁国家的潜在力量。

文官们行使其他职责,力争使所有的土地都能被耕种,让所有的贸易都能获利,以便苏丹可以征税。一旦金钱入账,这些文官就将之用在必要的国务开支上,包括支付军饷和其他人的费用。为了保证官员的忠诚和热情,依据土耳其的体制,他们可以从苏丹的私人产业中获得一份任意剥削的采邑,借以代替薪金。乡村中的每个农场和村庄,城镇里的每个店铺和商号,政府中的每项工作,都演变为一种采邑。

圣哲(乌力玛)包括所有宗教人士:在法庭上应用穆斯林教法的法官,清真学校的教师,《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学者,法学

家等。法学家要对诉讼引发的问题做出解答。他们运用神圣的伊斯兰教法,并不加解释地给予简短答复。经常向苏丹提供咨询的伊斯坦布尔大法学家是伊斯兰教的宗教权威,伊斯兰教的长老,地位高于大维齐尔以外的任何官员。因为他对神圣教法具有最终解释权,因此他可以监察苏丹本人的绝对权力,他也可以对外宣战或指责苏丹逾越了神圣的教法。

## 2. 1699 年以前土耳其人的扩张和撤退

至 15 世纪 60 年代为止,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方都处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因此,新土耳其国家的核心是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在穆罕默德二世于 1481 年去世之前,土耳其人从这里跨过多瑙河一直扩张到罗马尼亚,并攫取了热那亚在克里米亚的前哨基地。他们也同威尼斯人和意大利陆军作战。其扩张的界限以匈奴人的贝尔格莱德要塞和爱琴海上的罗得岛要塞——医护骑士团的据点——为标志。

苏丹塞里姆一世(Selim I, 1512—1520),又称"无情者",几乎将帝国的疆域扩展了一倍。他在亚洲打败了波斯人,并在非洲控制了埃及,使后者于 1517 年变为土耳其的属国。苏丹承继了保卫穆斯林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义务。他也采用哈里发的称号。但该称号是否能够有力地强化其威信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已经被滥用了数个世纪。在其统治期间,塞里姆有一次曾经企图对治下的全体基督徒实行集体大屠杀,只是因伊斯兰教长的反对,基督徒才得以被拯救。这个插曲生动地反映了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基督徒生活的不安全感。

"高尚者"苏莱曼一世(1520—1566 年在位)重新发动了对欧洲



《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像》，由简泰尔·贝林尼(1429—1507)绘制。穆罕默德的统治从1451年持续到1481年。该画是在其死前不久完成的。贝林尼最著名的作品是对威尼斯庆典仪式的细致描绘，从1476年到1481年，他一直住在君士坦丁堡。(National Gallery, Lond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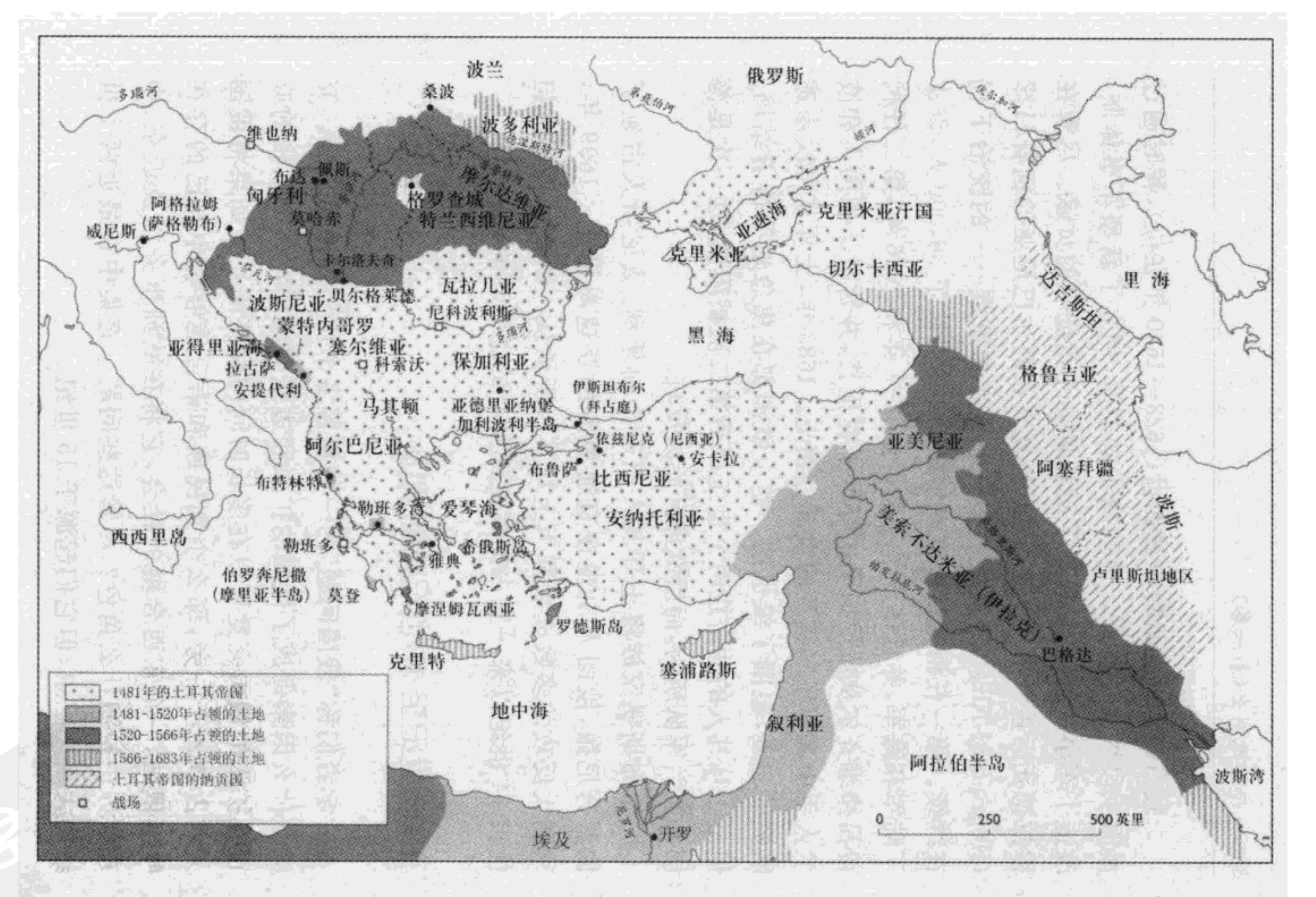
的进攻。土耳其帝国因此深深卷入到西欧事务之中。它参与了哈布斯堡家族与法国的战争，并且从西南方向以武力威胁德国，进而对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影响。1521年，苏莱曼占领了贝尔格莱德，1522年占领了罗得岛，进而除掉了西进的两个主要障碍。1526年，他在匈牙利的莫哈赤(Mohács)打败了基督徒的军队，并进入了多瑙河中游的匈牙利的首都布达(Buda)。1529年

9 月,苏莱曼曾包围维也纳,但两周后不得不放弃了围攻。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苏莱曼夺取了阿尔及利亚,把后者变成了土耳其的一个附庸国。在亚洲,他击败了波斯人,吞并了包括巴格达在内的近代伊拉克,并且同葡萄牙人展开海战以保卫波斯湾的出海口。

1536 年,法国和土耳其帝国缔结了一项正式条约,允许法国在土耳其境内像土耳其人一样进行贸易。在土耳其,法国人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并被承认为圣地保护国,那曾是十字军追求的目标。这些"投降主义条款"给法国带来了财富和威望,并给予其比其他任何欧洲势力更优越的地位。同时,它们也将土耳其人带入了西欧的外交世界。

在苏莱曼之后,虽然有偶然的成功,但已经显现出弱化迹象的土耳其体制开始恶化。土耳其占领了塞浦路斯,而以教皇为首的反抗土耳其的西方神圣同盟随即成立。1571 年,同盟在远离希腊海岸的地方赢得了一场海战——勒班托湾海战(Lepanto),摧毁了土耳其舰队。然而,西班牙和威尼斯人并没有乘胜追击,土耳其人又重建了自己的舰队。

1606 年,土耳其人和哈布斯堡家族签署了和约。以前和西方国家签订的所有条约,都以停战协定的形式由苏丹授予那些更小的当权者,并要求他们向苏丹纳贡。这次,土耳其不得不平等地与人协商,他们给予哈布斯堡皇帝适当的头衔,而不再要求纳贡。如果西欧不是关注于三十年战争,土耳其帝国也许会在 17 世纪上半叶遭到更严重的创伤。正如当时的情形,内部的无政府状态扰乱着这个国家:近卫军叛乱,军队暴动,数年内有几个苏丹被罢免。波斯人夺回了巴格达以后,叛乱便在各个行省肆虐。




1683年以前的土耳其帝国

较有权势的苏丹穆拉德四世(1623—1640年在位),暂时通过血腥手段恢复了秩序。他削减了禁卫军,创立了新型军事体制,改造了军事采邑,并且取消了对基督徒儿童征收的贡赋。尽管在穆拉德死后重新出现了叛乱,但是复兴在阿尔巴尼亚的柯普吕律(Köprülü of Albania)家族——一个维齐尔家族——的统治下仍在继续。第一任柯普吕律维齐尔在五年中处决了36,000人,重建了陆军和海军,并且镇压了起义。在1661年和1676年,第二任柯普吕律维齐尔从威尼斯手中夺取了克里特,并暂时从俄国人和波兰人手中赢得了乌克兰的大部分领土。1683年,土耳其再次渗透欧洲的心脏,包围了维也纳。整个欧洲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结局。但是土耳其人的冲击在两个世纪以后第二次被阻断,这一次是德国和波兰军队所为,而后欧洲开始大反攻。

哈布斯堡家族将土耳其人驱逐出匈牙利,威尼斯人占领了伯罗奔尼撒,俄国人出现在直通黑海的亚速海沿岸。1699年,欧洲大反攻的多数成果都为土耳其人所承认。西欧列强不再担忧自14世纪以来一直占据其全部身心的土耳其的威胁。

## 五、13世纪至17世纪末的俄国

学者们称"俄国问题"为一种包容多个历史层面的工具。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俄国的扩张和边疆的巩固?一个扩张的或正在扩张的俄国究竟可以在多长时间内保持静止?如果将俄国人的占领置于一旁,那么个别民族和语言能够重申自己的存在吗?俄国,一个东西合璧的社会,它将在欧洲事务以及近东、中东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尽管这些问题一直集中在最近两个世纪的大量文字中,但它们起源于15世纪。

## 1. 西北之地(1386—1478)

约在 1200 年,基辅罗斯的瓦解导致了一系列实际独立的小公国的产生。这些国家太过弱小和分裂,以致无法抵抗来自波兰和立陶宛的压力。到 14 世纪早期为止,立陶宛大公,以维尔那(Vilna)为都,在名义上统治着西部罗斯的大部分土地。异教徒依然占多数的立陶宛人,逐渐接受了其臣属罗斯人的语言和行为方式。但在 1386 年,大公同波兰的女继承人结婚,并成为波兰国王。结果波兰罗马天主教会和波兰贵族在立陶宛崭露头角。

如果没有信仰东正教的罗斯人与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之间的对抗,如果没有不同宗教和语言的贵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原初的立陶宛—罗斯联合体可能成为罗斯再度联合的核心。然而,甚至在与波兰联姻之前,该地区就已非常不和,以致其能否促进罗斯联合的潜在力量受到置疑。即使在立陶宛大公的统治之下,多数名义上从属于他的公爵领地,都在没有任何干预的情况下由地方贵族控制着,后者只受到效忠誓言和兵役义务的约束。贵族会议也限制了大公的政治权威。像西方一样,西部罗斯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庄园,并且很早就对农民的人身自由进行了限制。

在北方,诺夫哥罗德城市共和国统治着这片广阔的、空旷的、贫瘠的土地,该地区是由那些搜寻皮毛和其他商品的武装商人及其先遣队开发的。市议会或维克(veche)非常有势力。诺夫哥罗德内部有严格的等级体制。富有的商人代表控制着维克,而且少数有权势的家族将城市的财富集中在自己手中,并为政治权力而展开竞争。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能偿清债务之人将变成奴隶,奴隶们经常起义并成为盗匪。由于周边的乡村几乎没有肥沃的土地,所以该城市依赖莫斯科附近的东南地区供

应谷物。1478年,莫斯科的统治者占领了诺夫哥罗德,并将其社会上层放逐到中部地区。

## 2. 鞑靼人(1223—1400)

到13世纪早期为止,成吉思汗已经将中亚的蒙古游牧部落——匈奴人、阿瓦尔人、普罗茨克人——统一在自己的麾下,这些部落也曾反复涌入欧洲。在占领了北部中国和从东北地区到里海的亚洲地区后,成吉思汗率领鞑靼人越过高加索山进入罗斯南部的大草原,并于1223年在亚述海附近击败了罗斯与持不同政见的波洛韦茨人联军。然后,他又撤回亚洲,在1227年去世。13世纪30年代,拔都汗(Batu Khan,卒于1255年)率军而返,分别于1237年和1240年洗劫了莫斯科与基辅,先后进入西部罗斯、波兰、匈牙利和波西米亚。

鞑靼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应该归于其出色的军事组织:统一指挥、精兵减负、聪明的给养供应以及虚张声势的战术。尽管拔都汗在1241年打败了波兰人和德国人,但是亚洲的政治事端还是迫其东回,而后鞑靼人再也没有在西部出现过。拔都汗越过欧洲,撤退到伏尔加河大三角洲的萨莱(Sarai)。他在此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度——金帐汗国,同时也接受远在北京的蒙古中央政府的领导。

另一些蒙古统帅曾在1258年结束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的统治,而后又在1260年被马木路克击败。蒙古人和穆斯林之间的敌意令西欧的统治者奢望自己能够使蒙古统治者皈依基督教,并与之联合共同对抗穆斯林。在13—14世纪间,数位被派往蒙古和中国的使者都期待达成这个结果。然而,除了欧洲使节们的记述丰富了世人的地理知识以外,此举一无所获。

鞑靼入侵给罗斯带来了最持久的影响。鞑靼人的主要目的是在此地有效地征收贡赋。尽管他们在攻占之时给予罗斯以重创，但后来却转而实行剥削政策。他们调查了可利用的资源，并以运输承受力为限来评估贡赋。在其政治权威被承认期间，他们没有介入经济生活。他们的确拟定为军队招募罗斯新兵，但是由各地罗斯王公负责运送人力和金钱，而且除非人口普查、财产调查，抑或惩罚叛逆，他们大都在罗斯境外逗留。每位附庸国的罗斯王公在被选定后都要去萨莱或去中国朝觐。

14 世纪末，罗斯人变得越来越勇敢。1378 年，在莫斯科大公的领导下，罗斯人取得了对鞑靼人的第一次胜利。虽然他们在 1380 年遭到了猛烈报复，但却表明了鞑靼人是可以被打败的。直至 15 世纪早期，金帐汗国一直没有分裂，也没有从罗斯人的生活中消失。他们选出了三位独立的可汗，并形成了三个鞑靼国家：一个是位于伏尔加中游的喀山汗国，一个是位于伏尔加河口的阿斯特拉罕汗国，最后是克里米亚汗国。

俄国在 12 世纪晚期没有发展成为一个有特色的欧洲国家，并非由于任何内在原因。然而，在鞑靼人统治了两个世纪以后，以西欧的物质发展来衡量，它仍然没有发展。当代人感到，鞑靼的束缚是一场灾难，而历史学家尚未能证明其他的说辞。当鞑靼人的势力在 15 世纪最终瓦解的时候，俄国文明远不如西方那么多元化。

### 3. 莫斯科公国的发展

莫斯科地处俄国北入波罗的海和南入黑海的河流的分水岭。它比北方富有，能够为国中百姓提供足够的食物，并且拥有繁荣的森林工业。因此，莫斯科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每当鞑靼人的盘剥有所放松的时候，贸易便能够复兴。此外，莫斯科还有

北冰洋
乌拉尔山脉
普斯科夫
诺夫哥罗德
特维尔
苏兹达尔
弗拉基米尔
莫斯科
波罗茨克
斯摩棱斯克
立陶宛
波兰
基辅
撒莱
克里米亚
黑海
高加索山脉
里海
君士坦丁堡
1300
鞑靼人控制区
莫斯科公国

北冰洋
乌拉尔山脉
普斯科夫
诺夫哥罗德
喀山
莫斯科
斯摩棱斯克
立陶宛
波兰
基辅
哥萨克
阿斯特拉罕
克里米亚
黑海
高加索山脉
里海
君士坦丁堡
1689
（彼得大帝登基之时）

中古和近代早期的俄国

幸拥有诸多能力超群的大公。他们与有权势的家族联姻,通过买卖和取消抵押赎回权等方式获得土地,然后再通过遗嘱将之承继下来。他们夺得了抗击鞑靼人的首次胜利,堪称是罗斯的赢家。最后,莫斯科大公们还得到了俄罗斯教会的支持。在14世纪早期,“都主教”的称谓使莫斯科成为俄罗斯教会之都。

到15世纪中期,莫斯科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俄罗斯民族国家,它运用战争手段成功地抗击了波兰—立陶宛王国和鞑靼人。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声称自己是基辅大公的继承人,欲夺回丧失在波兰和鞑靼人之手的古罗斯土地。西部的许多贵族逐渐改变了立场,将财产觐献于他,并宣布放弃对立陶宛—波兰国的效忠。1492年,立陶宛大公被迫承认伊凡三世为“全俄罗斯君主”。

1472年,伊凡与佐伊结婚,她是1453年在君士坦丁堡抵抗土耳其人的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伊凡于是开始采用拜占庭独裁君主的头衔,并模仿拜占庭皇帝行事。他有时使用“沙皇”(恺撒)的称谓,也不再与贵族商议国事。一位意大利建筑师为他建造了一座巨型宫殿,即克里姆林宫(或要塞)。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15世纪80年代决定与伊凡三世建立联盟,并安排一场王朝联姻时,伊凡回复说他已经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了无限权力。

在沙皇伊凡四世(1533—1584),即恐怖的伊凡的统治下,一名逃离俄国的反叛贵族曾从国外给沙皇写信,公开谴责他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不同贵族协商。伊凡回复说,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给予奴隶恩惠或施加任何惩罚。伊凡四世首次正式使用了沙皇的称号,击溃了鞑靼人的势力,占领了喀山、阿斯特拉罕和西伯利亚,并且有步骤地、血腥地镇压了最有权势的贵族的反叛,

建立了绝对专制的政府。

对于专制主义观念的迅速增长,部分解释是因为俄国人生活在一个不断进行或准备进行战争的国度。也许更有意义的解释是,莫斯科的封建主义没有像西方那样衍生出一个团结的贵族阶层,即能够为了自己的特权与势力日益增长的君主抗争的贵族阶层。莫斯科贵族非但没有联合起来反对君主的主张,而且还分化出不同的党派,这使得君主可以将之各个击破。

但是,最重要的是教会倡导的意识形态。在西方,教会本身就是封建制度的一部分,对封建特权心生妒忌。在俄国,二者的关系则变成了君主与某种类似国家部门的机构的联盟。俄罗斯教士对罗马人声称的世界帝国和君士坦丁堡存续了的数世纪之久的"新罗马"地位都非常熟悉。伴随着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他们精心阐明了一个理论,即莫斯科就是前两个世界帝国的承继者。

俄罗斯教士传播了一个故事,言及俄罗斯的第一位政治领袖留里克(Rurik)是奥古斯都的兄弟的后代。他们宣称俄沙皇不仅从拜占庭而且从巴比伦继承了徽章与王权。所有沙皇,直至最后一位尼古拉二世(1894—1917 年在位),都使用拜占庭式的冠冕和袍服。因此,教会通过阐释国家行为的合理性来支持其存在。帝国的专制主义是近代俄国的主要政治特征之一。

## 4. 贵族和农奴

从 1462 年伊凡三世即位到 1689 年彼得大帝即位,专制体制战胜了旧贵族的对抗。旧贵族的世袭地产,变成了军役地产。至该时期结束为止,这两种贵族和两种地产渐进地趋同:世袭贵

族经常提供军役；军役贵族也经常获得世袭地产。

这个重要的社会过程与农奴制的增长相伴而生。俄国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动荡迫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向大地主请求保护。农民将接受一份以产品和在地主的自营地上服劳役的形式支付租金的合同，以此来作为必须在数年限期内偿还的有息贷款或附加额外义务的贷款的回报。至17世纪早期为止，农民在偿付所有债务前是不能离开土地的，但是由于债务经常大得难以偿还，因此农民实际上根本不能离开。

当沙皇将地产授予新军功贵族时，这个过程便加速运行。除非有农人劳作，否则地产并没有多好。在16世纪和17世纪严重的农业和政治危机中，是政府帮助军役贵族将农民留在原有土地上。因为农民要缴纳大部分税收，如果将农民留在原有土地上，那么政府收税也更容易。佃农离开地主越来越难，至1649年，逃逸途径已经完全被封闭，农奴被禁锢于土地。农奴的身份变成世袭身份，农奴的孩子也像其父母一样在该地产的人口普查簿上被登记为农奴。

## 5. 伊凡雷帝的统治(1533—1584)

16世纪和17世纪俄罗斯历史的标志性的混乱，多数始于"恐怖的伊凡"的长期统治。伊凡幼年登基，带有一种病态的神经错乱。1547年，他剥夺了贵族们的监护权，并着手进行彻底的政府和机构改革。他限制了那些压迫地方百姓的各省行政官员的贪婪。他还召开了缙绅会议(zemski sobor)，即由贵族、教士、城市代表组成的咨询团，来协助管理帝国事务，尤其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

1553年,贵族们在伊凡患病时拒绝向其子宣誓效忠。此举明显唤起了他的怒气。在恢复健康的基础上,他创立一种只从属于其个人新体制——特辖区,或称“分立王国”,而在俄罗斯其他地区继续沿用以前的管理体制。伊凡任命管理特辖区的人(称“特辖军团”),身着冷酷的黑衣,骑黑色的坐骑,鞍前挂一狗头(象征警觉)和扫帚(象征清洗)。他们是长久以来标志俄罗斯社会特色的秘密警察的前身。他们针对贵族发动了一场残暴无情的战争,没收其财产,放逐和杀戮其肉体。及至伊凡去世,许多特辖军也在他的命令下被谋杀了,俄国行政管理近乎混乱。然而,伊凡将俄罗斯的权威扩展到远东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的鞑靼人那里,首次向俄罗斯贸易开放了全部的伏尔加河水路。

## 6. 动乱的年代(1598—1613)

尽管帝国的疆域扩展,并实行专制统治,但无知、目不识丁和无能弱化了俄国社会。尽管旧贵族已经衰落,但新贵族也不能有力地控制国家机器。伊凡之子、继承人费奥多尔是个白痴,在他死后,从基辅大公延续下来的莫斯科王统中断。相互对抗的贵族派系密谋求得权力。费奥多尔的姐夫鲍里斯·格都诺夫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

格都诺夫无法克服伊凡留下的混乱、贵族的阴谋诡计以及1601年出现的饥荒和瘟疫。盗匪在乡村游荡。当波兰国王支持的一位觊觎王位者于1603年假冒伊凡之子时,竟然赢得了许多不满于现状者的支持。俄国完全陷入了所谓“动乱的年代”(1598—1613)。

格都诺夫死后,那位假王子以沙皇的身份统治了极短一段

时间。但他在一年内就被谋杀了，由一名旧贵族的代表继任。于是，新王位觊觎者不断涌现了出来，农民暴乱、盗匪集结时有发生，内战在继续，同时波兰军队也占领了莫斯科。波兰国王很快就计划亲自统治俄国。然而，正是对异族和天主教统治的恐惧激发了俄国人的民族感情。作为对全俄牧首召唤的回应，俄国集结起一支民兵队伍，他们大多是来自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富裕的自由农民。其组织者是库兹马·米宁(Kuzma Minin)，统帅是贵族迪米特里·波扎尔斯基(Dmitri Pozharski)。在他们的领导下，这支民兵赢得了其他反叛者的支持，在1612—1613年，把波兰人逐出了莫斯科。

### 7. 缙绅会议的作用

缙绅会议现在选举伊凡四世的长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沙皇。米哈伊尔成功地使自己的权力免受缙绅会议或其他组织的限制，他是一位经推举产生的专制君主。在其统治的第一个十年，他尚定期召开缙绅会议。缙绅会议主要通过签署沙皇及其幕僚的政策文件来协助尚未稳定的新王朝，为之赋予了深受民众支持的外在形式。但是，在1623年以后，缙绅会议只是在宣战或媾和、征收新税、颁布重要新律法的时候才会召开。它还签署了米哈伊尔之子阿历克塞(1645—1676年在位)的登基文件，并于1649年确认了新法的颁布。1653以后，阿历克塞没有再召开缙绅会议，其子和继承人费奥多尔三世(Fëauedor III，1676—1682年在位)亦是如此。专制政体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了。

## 8. 教会的作用

教会一直是专制君主的伙伴。沙皇控制着莫斯科全俄牧首的选举,这是1598年由大主教晋升而来的。17世纪,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案例,其间牧首与沙皇共同分享着权力。1619年,曾为修士的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父亲费拉莱特(Filaret),出任牧首,并被授予"伟大君主"的称号。他可以协助其子处理各项国事。在下一辈人中,沙皇阿历克塞任命教士尼康出任牧首,并赋予其相同的称号和职责。历史后来证明,尼康是非常自大之人,他甚至引发了教俗双方的抗议,尤其当其为了与希腊教会实践保持一致而改革俄罗斯教会礼仪的时候。

尼康也反对牧首在精神事务中的权威超越沙皇,反对由于精神王国高于世俗王国而认为牧首事实上高于沙皇的观点。1666年,尼康被宗教会议罢免,至死都只是一名修士。

教会也赋予莫斯科公国时期的文学艺术以灵感。修士们以编年史的形式撰写历史。游记主要体现为对朝圣旅程的记述。神学著作首先抨击了天主教,后来也对基督新教予以抨击。文学是受限制的,而且它在西方已经开始产生世俗作品后的数个世纪仍然受教会的控制。几乎所有文学作品都是用古老的教会斯拉夫语,即圣餐礼仪语言写成。尽管它庄严而感人,但并非适于创新的语言工具。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世俗知识,没有科学,没有繁荣的本土文学,亦没有哲学辩论。

## 9. 1682年以前俄国的扩张

在16世纪和17世纪,俄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领土扩张。由寻找适于销售的皮毛和拓殖土地的俄国先遣队率先开路,政府



1555—1560年在莫斯科红场修建的的圣·瓦西里大教堂。
(Photograph by William C. Brumfield)

随后而至。俄国的边远居民称做哥萨克,它逐渐演变为相对定居的居民,并且建立了两个哥萨克共和国,一个在第聂伯河,另一个在顿河流域。伴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哥萨克群体出现在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山区以及其他地方。

边境扩张运动使俄国人向东进入到乌拉尔山,横跨西伯利亚。虽然由于鞑靼人、土耳其人和波兰人的反对,其扩张减慢了许多,但在东南方向还是趋近高加索,向南则趋近黑海。他们在乌克兰与波兰人多次开战。哥萨克有时拥护波兰人,有时支持俄国人。1682 年,波兰在衰落后迅速投降。在其欧洲边境上,瑞典人仍然控制着波罗的海沿岸,他们是俄国未来的战争对手。俄国人与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也不断产生冲突。鞑靼人的最高君主土耳其,把守着亚速海的要害地带并控制了黑海。但他们在 1681 年放弃了在乌克兰的利益。

## 10. 俄国与西方

俄罗斯在这两个世纪的最后阶段的发展,证明对于其未来是至关重要的。这是西方人和西方理念缓慢渗透的过程,是一个令某些人带着复杂的情感加以接受的过程,他们既珍视从西方获得的科学技术知识,又害怕西方对俄国社会及风俗习惯产生影响。这种对于西方人和西方理念的矛盾态度演变为日后俄国人的特点。

第一个来此的外国人是意大利人,他在 15 世纪末帮助建造了克里姆林宫。但是俄国并不鼓励他传授知识,甚至在伊凡三世的宫廷里,他也没有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在 16 世纪中期,作为商人来到白海的英国人,受到伊凡雷帝的欢迎。他给予英国

人颇有价值的特权，鼓励他们用毛纺织品来换取俄国的木材、绳索、沥青和其他海上供给品。英国人是最先向俄国人传授西方的工业技术的外国人。至17世纪中期，荷兰人取代英国人成为在俄国从事贸易和制造业、开办玻璃、造纸、纺织工厂的最重要的外国人群体。

在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于1613年登基以后，一直称做“德语郊区”的莫斯科外国人居住区迅速发展。外国技师可以从国家领取到丰厚的薪水。外国商人销售其商品，外国医生和药剂师也很时髦。到17世纪末为止，西方影响在宫廷生活中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少数贵族开始购置书籍并筹建图书馆，学习拉丁语、法语和德语。与此同时，人民却不信任、痛恨外国人，当后者敢于当街嘲笑他们的时候，就会去劫掠其房舍。

对外国影响的怀疑，不仅分裂了俄国教会，而且也切断了与变化之源的联系，扼杀了适时的代议体制，并保证了农奴制的延续。它与土耳其帝国的冲击共同作用，将东方的中世纪环境保持到17世纪末。中世纪在东西方存续年代的差异，反映了各自不同的变化速度。

## 六、本章小结

到11世纪后半叶为止，穆斯林和拜占庭帝国的不稳定性以及塞尔柱人的扩张，都使得基督徒前往巴勒斯坦朝圣充满了危险。当拜占庭特使请求教皇乌尔班二世出兵协助对抗塞尔柱人之时，教皇作出反应，发动了十字军东征。十字军运动，或称做教皇支持的反异教圣战，早在8世纪穆斯林入侵之时就曾在西班牙发动过。

人们出于宗教和世俗双重动机响应教皇的号召。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封建领主们建立了四个十字军国家:爱德萨、安条克、耶路撒冷和的黎波里。圣殿骑士团医护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等军事骑士团是为了保护朝圣者前往巴勒斯坦而建立的,但伴随着这些组织的财富与权势的增长,他们背离了原初目的。

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法、德、英的国王尝试在东方抵制穆斯林的进攻。导致了君士坦丁堡陷落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及后来的其他十字军东征,皆显示了十字军战士在偏离十字军精神的道路上究竟走了多远。

十字军运动期间贸易和旅行的增长,导致了新产品、新理念以及新贸易方式的引进。十字军运动也鼓励了 14 和 15 世纪的探险活动。然而,十字军运动的失败也意味着东地中海地区对西欧的封锁。

拜占庭帝国甚至在十字军战士于 1204 年洗劫其宫廷和教堂之前就日益衰落了。官员的腐败造成了经济和社会的衰落。在拉丁皇帝统治下,拜占庭帝国虽然分裂为数个封建小国,但尼西亚的希腊人于 1261 年夺回了君士坦丁堡。

王位争夺、社会动荡以及宗教纷争都导致了帝国的进一步衰败。实力的衰弱使得拜占庭帝国无法承受 14 世纪土耳其人的冲击。1453 年,想象中固若金汤的君士坦丁堡城陷入侵略者手中,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统治者对于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其他宗教普遍采取宽容态度。他们在一个强有力的统治阶层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包括皇帝及其宫廷人员、武士、文士和圣哲。土耳其人把帝国扩展至非洲、波斯和欧洲。然而,土耳其帝国从 17 世纪

开始进入长期衰落阶段。

13 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入侵俄国。在 200 年中,他们允许俄国诸王公自治,但向他们征收贡赋。在 14 世纪和 15 世纪,莫斯科大公向鞑靼人的统治进行了挑战,并且最终在教会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专制君主制国家。

历史学家讨论了鞑靼人在俄统治的影响,认为它导致俄国落后于西方。在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即位之后直至 17 世纪,俄国都不了解西方的理念和知识。此间,俄国向乌拉尔山东扩并进入西伯利亚,向南抵达高加索和黑海,向北抵达波罗的海,向西与波兰接壤。



# 第二章

## 国家的兴起

在东欧,中世纪的体制在土耳其于 1453 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继续繁荣了很长时间。事实上,俄国的中世纪结束得相对较晚,是伴随着 1861 年农奴制解体而发生的。在西欧,与之相对,中世纪的结束早了近五个世纪。没有任何年代或事件能够被单列出来,而且一系列重要发展都发生在 15 世纪的后半叶和 16 世纪早期这半个多世纪: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王权的强化;美洲的发现;西欧农奴制在事实意义上的消失;对中世纪教会的国际性的反叛。

### 一、一个混乱的世界

在 14 世纪和 15 世纪,旧有的西欧政治形式和政治理念虽然存在,但已经失去了灵活性和创造力。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

七世在14世纪早期曾经寻求运用旧有的皇帝党传统来整顿意大利事务，即使他并不拥有弗里德里克·巴巴罗萨所支配的资源。法国和英国的贵族，利用百年战争的混乱，建立私人军队和城堡，并试图使权力从君主回归到自己手中。其举动被称做伪封建主义，因为这些新封建军队是以金钱为转移的，而非建立在个人忠诚、相互尊重和各种保证的基础之上。

这些表现一直被解释为衰落的征兆，但它们也可以被视为旧体制和新要求相协调的一项实验。当法国和英国国王不能维持其军事行动的时候，这些实践新封建主义的贵族也让战士务农。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变过程的特征就是金钱的重要地位。

15世纪末，形势非常明显：未来属于实行强权政治的新君主而非新封建领主。尽管政治和权力永远密不可分，但是新君主们不再将对权力的追求隐藏在教会背后，而且有更好的政府机构、装备更精良且更训练有素的士兵、外交官和官僚主义者为其服务。新观念的最杰出的代表是法国的路易十一、英国的亨利七世以及西班牙的费尔南德和伊莎贝拉。德国各王公和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僭主也经常成为新式有效率的政治行为的楷模。

与此同时，西欧经济和社会也一直经受着更多的紧张和剧变。在乡村，传统的庄园制、农奴制和支付模式与自由农民并存，后者为市场生产，以现金支付租金和财税。经济和社会同样表现出某些影响政治生活的衰落的征兆。从前自认为在法律上是自由农民的农奴，发现领主经常强迫他们使用烤炉和磨房或者葡萄酒榨汁器，并且为之支付高额费用。同时，他们还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在动乱的年代向领主寻求保护。自然气候和政治气

候的不确定性及不安全感为无数乡村暴力事件的发生做了铺垫。危机也震荡着城市生活。内战在繁荣的佛兰德尔的毛织业城镇中爆发,而在佛罗伦萨的贫富阶级之间则衍生着长久的对立。

农民的生活——无论是农夫或是农妇——是受约束的、艰难的,并且在总体上非常匮乏。然而,尤其在英国,乡村生活也显现出一种令人困惑的多样性,在进行概括的时候,很难不注意到西欧的劳动力价值的缓慢提升,以及东欧的农奴制的缓慢降落。

婴儿的高死亡率不仅揭示了医药知识的局限性,而且也表明了生活本身的艰难:疾病、营养不良以及气候都能带走人的生命。许多妇女在整个生育年龄期间都在生养小孩。有记录记载某些妇女共生养了 8 个、12 个,甚至更多的孩子,但竟然无一活至成年。没有现代医药的保护,许多妇女死于分娩。

对贫困而言,强者也非常容易受到冲击:干旱和洪水之年可以把一个富裕的农家变得一无所有,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内沦为经济上的附庸。对大多数欧洲人而言,“贫穷”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经常徘徊在生活的边缘地带。在饥荒的年代,农民在挨饿,而领主却仍在排摆盛宴——贫富之间的冲突不只是存在于两个小规模的少数人群之间,而是出现在可能占人口 10%,甚至 60%和 70%的人群之间。

城市经济的规模和复杂性在 13 和 14 世纪不断增长,为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机会。城市最初还不能吸引住在城堡、塔楼、庄园中的大土地贵族,抑或富裕农民。这个时期最稳定的财富形式就是持有土地和农产品。然而城市,尤其是意大利的城市,已经日益成为富有特色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中心。

在一个具体的方面，中古后期的欧洲似乎比接下来的数世纪都更为光彩夺目。妇女所起到的作用比16世纪危机以后更大。贵族妇女可以进修道院，即一种由女修道院长管理的颇具势力的妇女社团。许多修女痛悔因16世纪修道院的关闭所导致的自我决定权的丧失，尤其是贵族妇女。农妇经常在田里与丈夫和父兄一起干活。类似制作蜡烛、梳毛、纺线、织布以及缝纫等家务劳动，在中古后期的农户中可能一直都属于女性劳动。只有伴随着生产系统的发展，这些家庭产品才演变为男性产品占据主导地位。城市妇女在丈夫死后也可以成为工场的主人。一些人为了保持其管理权而嫁给了工场中的学徒。

那些有财产的人，无论是农民还是贵族，为了保持祖产和保护财产的完整都实行包办婚姻。幼子和没有嫁妆的女儿都不能结婚。这些孩子可以进入修道院或到有钱人家里从事家庭服务。因为大多数婚姻不是为爱而安排的，所以学者们也不再反驳婚姻是无爱的。文集和书信使人联想起柔和、信任与亲密的情感。在商人家庭里，妻子可能是丈夫最信任的顾问。那些文集也管窥了父母对超过半数子女的夭折表现出的悲痛。

由贵族妇女委托制作的祈祷书和账本为我们理解中世纪晚期妇女提供了某些证据。数百本祈祷书让人联想起贵族女子和富有的商人妻子们私下里实践着自身的虔诚，也许只是为了自己阅读。账本则表现出市民妻子中的一部分人不仅识字而且还懂计算。它们也使我们管窥到家庭与社会双重经济生活以及妇女在其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多种资料表明妇女已经变成丈夫非正式的经营伙伴。

犯罪的妇女使我们得以从另一层面洞察中世纪晚期的性别概念。虽然关于“女性”的描述定义在奢谈“柔弱”的性别，但法庭却不仅通过巫术而且还通过刑讯来审问女性的谋杀罪、杀婴罪、卖淫和经营妓院罪，甚至是非法经营罪。法庭提供了各种不同的证据证实这些妇女像男子一样完美地进行了(前文中的)多种活动。女性的角色依据道德规则而塑造，但并不绝对。即使是从前教会反对的离婚也在进行之中。一些女性只是逃离辱骂自己的、令人不满的丈夫，但另一些女性则利用“未完成婚姻”的漏洞正式与其婚姻决裂。某些中心角色是永远对妇女封闭的：如市民、教士。然而，还是有许多角色已经被证实存在于既定社会之中。

有许多秘密签署的私人婚姻合同，没有经过教士的祝福。这些合同经常导致财产和婚姻协议纠纷，并且最终还将在教会法庭进行裁决。

有两个社会性创伤明显地破坏了14世纪欧洲的士气和恢复能力。第一个创伤是1315—1317年的大饥荒。1322年和1329年，终年颗粒无收，而后也一直产量不足，以致欧洲人长期营养不良。由于欧洲不能种植足够的谷物，饥荒是普遍现象。第二个而且更大的创伤是1347—1351年的黑死病，估计它毁掉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业已弱化的欧洲人口。这种可怕的传染病标志着在欧洲首次出现了腹股沟腺炎瘟疫，它是由中国去克里米亚的骆驼商队传入的，后来经海路传到西西里。这种瘟疫经由跳蚤叮咬传播，只要有老鼠就会流行起来，而且还会因为打喷嚏和咳嗽而产生空气携带传播，因此毁灭了全欧洲。经由14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复发，这场瘟疫改变了社会经济的金字塔，引发了人口数量的不断下滑，并

且一直持续到 1480 年左右。这场瘟疫所导致的一个主要社会后果是劳动力的严重短缺，这使得从瘟疫中存活下来的农民和工人勇于争取更多的权利，并且通常都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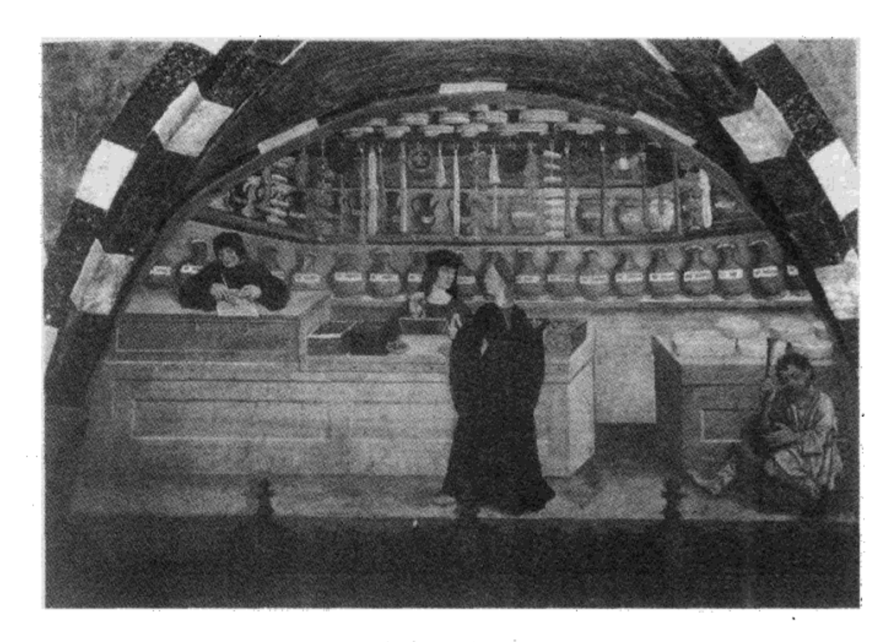
黑死病改变了欧洲人的想象力。没有人记得有这样一个灾难性的事件。的确，人们不得不追溯到罗马时代去寻找如此重量级的自然灾难。直到 12 世纪早期，科学家们也没有最终确定导致疾病的原因、治疗方法、传播途径及检疫方法。它避开了所有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在治疗和控制疾病方面的努力，貌似随意地击倒和杀死一名健康的成年人，留下另一个更为脆弱的人独处。对许多欧洲人而言，死神仿佛正在街道上行走，随意地拍拍陌生人的肩膀，并逮住他们。没有人——无论贵族、富商、形貌美丽者、畸形人、纯真之人，还是罪犯、强健的工人、隐遁者——能对死神的碰触免疫。来自于腹股沟腺炎瘟疫的死神尤其可怕，开始是腹股沟、腋下或颈部出现折磨人的烧灼式疼痛，然后是皮下出血和血液扩散、失禁、大量出汗以及黑尿，总而言之，从发病到死亡通常只有三天。城市中尸体堆积，健康的人都逃离病源，这是能够想到的唯一求生方式。腐败的尸臭和弥留之人的呻吟充斥着每一处人类居所，从家庭，到乡村、城市和城堡。14 世纪末，出现了“死神祭礼”，一些诗人、艺术家寻求用词句、笔墨和油彩与死神的漫不经心决斗。在诸多努力中，最著名的就是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的《死亡之舞》，这部书刻画了生活中为骷髅死神碰触的各色人物。

所有欧洲人都非常清楚一件事。在封闭的空间里，一个人的死亡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可能死亡。在一个许多人都生活在封

闭空间中的社会——修道院和修女院,庄园和乡村中的家庭——全社会都会被毁掉。想要将病患隔离的努力失败了,因为瘟疫似乎在看不见地方游走。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魔鬼、魔法、上帝的愤怒、天启——但没有哪一种是为所有人接受的。人们也试图与亚洲保持距离。有谣言传出,言及瘟疫严重地侵袭了印度,以至于整个地区人口锐减。

黑死病使中世纪的医学实践颇感挫败。当瘟疫开始横扫欧洲的时候,医学理论却仍然有赖于伽林阐释的经典的人体概念。根据伽林的观点,人体有四种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每种体液都代表着一个器官:黏液源于大脑,血液源于心脏。良好的健康状态就意味着某个人四种体液处于平衡状态。疾病则需要医生通过放血或者使用可以控制某一体液的草药将体液调至平衡。进入 17 世纪,医学更多地还是理论的而非临床的,是一种哲学式的而非实验性的科学。

那些由于人类的健康问题而受责难之人的回答是绝对不成功的,虽然这更加重了整个欧洲的普遍的绝望情绪。数以百计的医学论文中没有一篇对这场瘟疫的原因进行了正确的鉴定。几乎没有一篇论文看到瘟疫爆发与爆发前发现的堆积的啮齿动物的尸体之间的因果联系。论及原因,大多数评论家都赞同星象论或环境论。星象论认为三高星——火星、木星和土星——进入宝瓶座使空气污浊,同时将有毒物质带入了心肺。环境论则认为 1345—1347 年间的一系列地震释放出有毒的地心气体。另外还有一些人将瘟疫归咎于南风和气候转暖。



在中古后期，草药师和其他医药爱好者建立了使人们可以买到药品的药房、商店。药剂师负责调制并且研究药物。在13世纪末，一位对医药感兴趣的化学家维拉诺瓦的阿诺德(Arnald of Villanova)，研究了复合药物的定性效果，并借鉴了9世纪阿拉伯哲学家阿尔基缔(Alkindi)的著作，成为第一个将呈几何级增长的药物数量与呈算术级增长的药效联系起来的人。(Scala/Art Resource,NY)

无论这些假定的解释如何，所有人都明白，一般意义上的医生不能治愈他们，因为瘟疫像带走无知者一样地夺去了有学识的人的生命。在中世纪的医学等级中，"内科医生"是大学培育出来的，通常也掌握扎实的神学知识，他们的地位高于"外科医生"，并且与之分开工作；而后者则与"工匠"地位接近(理发师的灯柱，传统上皆为红白相间，总是使人记起外科医生将染血的布片挂出晾干的年代)。药剂师的地位本低于内科医生，但由于他

们了解不同药物和草药的特性,这种神奇的知识令他们受到外行人的尊敬。药剂师也是商人,因为他们也贩卖香料,而且他们因为相对富有而被列入社会上层。其下的所有人都是非专业的,他们要价很低,在失败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最早被发现于乡村,可能了解一些源于经验的"土方"(country remedies),但也可能依据某些过时的知识。这个群体中多达 20%的人是妇女,她们主要充当助产士、草药师以及病患的陪伴。

瘟疫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对治疗方法的寻求导致了医学的专业性进步。当老一辈医学权威在瘟疫中消失后,其他医生取而代之。外科医生取代了传统的内科医生。1390 年,巴黎大学医学院一视同仁地邀请外科医生加入学院。行外民众也开始要求用本国语言来撰写医学论文,以便患者可以尝试了解自身的问题。医院的功能也在以后的三个世纪中发生了缓慢的变化。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贫穷患者的慈善机构,后者的家庭无论在财力和人力上都不能照顾他们。因此,患者之所以来医院,主要不是因为其病情——即使最绝望的病患在 19 世纪以前都是在家中被照料的——而是因为其亲属的境况。然而,这些医院日益出现了现代医生的雏形,即那些为挣薪水而照顾病人的当地医生和医治者。也许最重要的是,人们试图将在瘟疫中病倒的患者或某些陷入无形病痛的人与那些陷入有形病痛之人分开,例如骨折病人或其他受伤之人。

从 14 世纪中期到 15 世纪末,日复一日地,没有人知道自己将会活着还是死去。虽然影响到宗教信仰、社会组织和实验科学的发展,但周而复始的瘟疫也给人类以教训,使世人了解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无助。那些在瘟疫中幸存下来的人们也许景况更好一些——人口数量减少,工资因劳动力稀少而提高,许多受限

制的封建主义的残余不复存在——但是，正如当时的诗中所指出的，这个世界对多数人而言是完全颠倒的。

14 世纪尤其可怕的是，甚至气候也转而与乡村人口作对。在更早的地球气候大变动期间，当时的瑞典可以种小麦，纽芬兰岛则生长着葡萄，欧洲度过了一连串潮湿的年代，谷物腐烂、恐慌、饥荒和死亡在乡村非常普遍。卫生条件普遍缺乏，即使在宫廷也是如此。即使没有瘟疫，疾病也是事物的正常状态，因为人们还不懂得消毒，简单的伤口也很容易导致死亡。甚至在预期中的纯真的儿童时代也毫无乐趣，因为虽然富有的孩童拥有玩具，但多数玩具都只是缩微版的成人，而且孩子早在十几岁之前就被期待能像大人一样行事。

历史上没有哪一次行动不带有反作用力，而且也极少有灾难没有导致有益的变化，黑死病以后医药知识的增长正是如此。有一个群体深受裨益：即中产阶级妇女，尤其在英国，她们经历了学者们所称道的“1370—1470 年间的黄金时代”。妇女能在社会中处于更稳固的位置，部分是源于人口的锐减，这使得妇女的工作、知识和财产都变得更有价值；部分是由于社会变化。在这个时代以前，妇女在法律上只被视为丈夫身体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寡妇已经可以打破这一习俗。她们能够制定遗嘱，特别是在伦敦，她们可以继续丈夫的生意，并占有家庭房产（而在更早些时候和其他地方，寡妇必须在 40 天之内将死去的丈夫的房屋腾空），她们可以加入社会和经济生活，加入基尔特、公司以及兄弟会，尽管她们被排斥在这些组织的政治活动之外。某些妇女——例如，制革匠人的遗孀——不得不为了在行会中保留一个位置而斗争，并且很少被准许加入行会，但总的来说，“伦敦的习俗”的准入日渐增加。

在伦敦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寡妇对她们的嫁妆和结婚时所

带来的财产拥有完全的合法权利。寡妇对房地产的权力因地域而有所差异。一些人依法有权支配丈夫的部分地产;另一些人则没有权力支配丈夫结婚时带来的土地。她也能依据特留份惯例来分享丈夫的货物和动产,这意味着她可以保持丈夫动产的一半(如果有子女存活,则拥有三分之一)。地产形式的嫁妆在寡妇死后将回到丈夫的继承人那里,但动产形式的嫁妆属于她本人,可以出售或按照其意愿使用,这都使得她们将为了自己而进入生意界。上层妇女也会得到财产,而且有些人拥有大量地产,例如伊丽莎白·德·伯格(1295—1360),她经常参加重要的慈善活动,是社会捐款的核心人物。

然而,的确不是所有的寡妇都涉及继承问题,因为再婚、进修道院,或者指派他人继承并非罕见。修道院也给那些不是注定当修女的女孩提供教育,而且没有进入修道院的妇女也可以公开立贞洁誓出家修行,以便阻止一场包办婚姻或者谨防使死去的丈夫蒙羞。在某些司法权限中,没有父亲的孩子就被视同为孤儿,这至少部分地反映出世人对于没有母系家庭支持的寡妇在家庭赡养方面的经济能力和作用的一种预期。然而,在帝国的某些司法权限中,寡妇被视为在财政方面对子女负有同等责任的人,表明政府至少相信她们有能力工作抚养子女。国家对无父儿童的政策可能是寡妇选择再婚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有清晰的证据表明妇女总是用各种方法来维持其家庭,尤其要与孩子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依据亨利三世的法令,寡妇一般免税,除非她是富商的遗孀,而且再婚也会导致税收,因此大部分人或者保持着寡妇的身份,或者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婚姻后继续孀居。英国女性多于男性,而且寡妇也多于鳏夫,因为妇女倾向于在年轻一点儿的时候结婚。自匈牙利的伊丽莎白以后,贵族

的遗孀可能会选择以女圣徒为榜样过独身生活，并进入修道院。农民的遗孀会在更大的压力下而再婚，以便保持以往的农业产量。贫穷的工匠的遗孀很少能独立养活一家人。商人和工厂主的遗孀则在许多方面都与众不同，其财富不是土地，而且经常可以通过从前与丈夫合伙经营时所了解的方式使之升值。我们知道，一些人选择不再婚，正如某些人是因为不能再婚一样。这些女性越来越有文化，自己会写信，并在女性与支持女性的社团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忠诚亲密的圈子，在社会对女性形成矛盾评估时支持她们。

对普通人而言，中世纪晚期似乎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灾难和艰难的时期。黑死病肆虐于街道和乡村。百年战争使西欧大部分地区陷入政治和经济崩溃，将旧习惯置于一旁。当火药和大炮首次广泛使用的时候，军人经历了空前的死亡率。教会大分裂迫使基督徒在复杂的争论中表明立场，这甚至包括教皇选举在内。当西欧的实力军队彼此残杀的时候，土耳其人正在进攻，并威胁着欧洲的门户。然而，尽管这个时代似乎异常衰落和不稳定，但他同时也预示着再生。中古后期的危机宣告了近代的到来。

## 二、民族国家的出现

1314 年，美男子腓力去世的时候，法国的加佩王朝似乎正进化成为一个忠诚而富于效率的官僚政府。腓力·奥古斯都、路易十一和美男子腓力以牺牲包括英国国王在内的封建诸侯为代价建立了统一王权。然而，法国不久便卷入了与英国之间的长期战争——1337—1453 年间的“百年战争”，君主制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受到了削弱。

## 1. 百年战争的爆发:1337 年

百年战争的外部原因是关于法国王位继承的争论。法国的王位已经父子相承了三百多年。这种引人注目的继承方式截止于美男子腓力之子,其下一代无一幸免于夭折。于是王位落入美男子腓力的侄子瓦罗亚的腓力、腓力六世(Philip VI, 1328—1350)之手。但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1327—1377 年在位)宣称自己作为加佩王朝最后一位国王的侄子将比瓦罗亚的腓力更有权利即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法国的律师追溯了《萨利克法典》,后者论及女性不能继承土地。尽管《萨利克法典》在法国并未实行几个世纪,但现在律师将之解释为妇女不能将遗产继承转换成王国继承。这种法律诡辩为爱德华提供了发动战争的借口。英国外交官坚持认为爱德华的要求是合法的,虽然法国视其为叛乱贵族。对低地地区的丰厚的商业利益的争夺,使得双方都在寻找战争的借口。

英国一直占领着富有的阿奎塔尼公国,包括那些利润丰厚的葡萄园和繁荣的葡萄酒海港波尔多港,这对日益统一的法国而言非常刺目。阿奎塔尼的封建领主和法国国王们曾经蚕食了英王的许多封建利益。对英国来说,他们希望保持所有,并重新夺回诺曼底以及在腓力·奥古斯都时期丧失的大部分疆土。

更远的北部——佛兰德尔唤起了最紧迫的问题。这个小而富庶的地区,今天横跨比利时和法国边界,受法王封臣的佛兰德尔伯爵的统治。繁荣的佛兰德尔毛织作坊从英国进口大部分羊毛,并将大部分成品销往那里。英国王室对羊毛出口和毛织品进口都收取关税。佛兰德尔内部的工匠和商人几乎一直与富有

的商业统治阶级之间存在着冲突。城中富人试图让佛兰德尔伯爵回来，而伯爵则希望其封君法国国王能够回来统治。工匠们则得到了英国的帮助，因为后者害怕中断有利可图的贸易。14世纪早期，武力事件成倍增加，其高潮是法国军队对佛兰德尔的占领。爱德华三世随之同根特的佛兰德尔商人雅各布·冯·阿尔特维尔德(Jacob van Artevelde)联合起来，后者曾被统治佛兰德尔的寡头执政团和法国人驱逐，后来又组织了自己的佛兰德尔政府。为了回应来自佛兰德尔同盟者的压力，爱德华三世声明兼领法国，并于1337年宣战。

战争的第一次重要行动是英国于1340年在斯莱斯(Sluys)取得海战胜利。当佛兰德尔盟友阿尔特维尔德于1345年被杀之时，英军侵占了法国北部，并且于1346年取得了克雷西大捷(Crécy)。尽管英军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但英军利用了法军将领的无能，同时也善于依赖手持长弓的步兵，其射手总是把箭像雨点一样射向拥作一团的法国骑士和手持笨重的十字弩的雇佣兵们。接下来，英军又占领了加莱(Calais)。当战争在黑死病以后继续展开时，英军不仅再次于法国西部的普瓦提埃(Poitiers)战败了法军，而且还俘获了法国国王约翰二世(John II，1350—1364年在位)。约翰之子，十几岁的查理，即未来的智者查理五世当上了法国的摄政王。

1360年，百年战争暂时停止，因为爱德华三世依据和约终止了对法国王位的要求，而和约的交换条件是整个法国西南部和以海峡为界的加莱附近的土地。1369年，战事再起，法国在智者查理及其幕僚的指挥下战绩辉煌。至1380年他去世为止，已经把英军赶出了法国的土地，只有包括波尔多和加莱在内的一串港口还在英军手中。法国海军现在可以自由地在海峡航

行,并在英国沿岸劫掠。

瓦罗亚王朝的君主远没有加佩王朝富于效率。英国曾赢得主要战役并依据和约取得了法国的大部分土地。法国败后则遭受黑死病的蹂躏并且历经了社会危机和内战。然而,英国过于扩张,所以法国最终还是将之驱逐出去,并在一个强有力的王权的领导下实现了国家统一。现实需要还迫使瓦罗亚君主发展起一支常备军,后者主要靠直接税供养,并且还取得了中产阶级的支持。事实上,法国的一切成就都有赖于这种支持。

## 2. 三级会议

在这些年间,法国君主制越来越面临着国内的一些敌对的批评。1335 年,法国曾召开三级会议以通过征税,会议坚持决定了税收形式——普通销售税和特别盐税——同时要求三级会议代表而不是王室代表出任收税官。在普瓦提埃战败后,他们要求摄政王查理开除并惩罚王室幕僚,用从会议中选出的 28 名代表来替代他们。当查理犹豫不决时,三级会议的领袖巴黎商人艾顿·马塞(Etienne Marcel)就在首都领导了一次大罢工和起义,迫使摄政王同意。但马塞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他同反对王权的对手联合,并支持农民起义——扎克雷起义。

在经历了黑死病的痛苦之后,农民还要忍受增加税收和赎金的要求,借以赎回与约翰国王一起被俘的贵族。农民对于三级会议已经厌倦,后者要求他们修补战争毁坏的贵族产业。1358 年,他们在几个地区起义,杀死贵族并焚烧了城堡。王室军队镇压并屠杀了这些农民,死亡人数据计有两万人。扎克雷起义的后果表明,国家事实上既没有支持激进的巴黎人也没有

支持乡村的暴民。在最后的喧嚣中，马塞被谋杀，查理镇压了起义。

尽管三级会议有效地治理了法国两年，但他们并没有把宪法规定的限定原则用在国王的身上。由于国家长期处于被侵略的危险之中，即使叛乱者也希望强化而不是弱化王权。此外，王权的批评者——教士、贵族、市民——彼此因为阶级利益冲突而互不信任。甚至三级会议的成员也因各自省份的利益而分化。智者查理敏锐地利用了阶级对抗和地方势力对抗带给王权的有利条件。

### 3. 勃艮第和阿马尼亚克(1380—1467)

新国王查理六世(1380—1422)，是一位间歇发病的精神病患者。在他统治期间，王权受到王室早期政策恶果的威胁，该政策将各省指派给王室的男性成员为属地。这样的亲戚本人可能是忠诚的，但在一代或二代之内，其继承人就会同王室疏远以致变成其对手。1363 年，国王约翰二世将勃艮第变为其幼子腓力的属地。智者查理把奥尔良作为属地赐予其子路易。

在查理六世统治期间，勃艮第公爵和奥尔良公爵之间的权势之争非常激烈，其继承人们也继续着这种争夺。1407 年，约翰继其父腓力之后成为世袭的勃艮第公爵，他安排了对奥尔良公爵路易的刺杀行动。现在整个法国都被勃艮第和奥尔良之间的派系之争所折磨，后者依据其领袖阿马尼亚克的伯纳德伯爵的名字被称做阿马尼亚克派，阿马尼亚克派控制着南方大部分地区和西南部，而勃艮第派则控制着北部和东部。勃艮第派是亲英派，主要得到了城市上层资产阶级的支持。谨慎的英王亨利五世(1413—1422)再次宣战，并于 1415 年赢得了阿金库尔战役(Agincourt)，而法国骑士则因为沉重的装备而陷入了泥沼。

勃艮第人占领了巴黎,大肆杀害阿马尼亚克党徒,致使其余党都逃到卢瓦尔河流域,并建立了一个对立政权。英国人于1419年占领了诺曼底的首府鲁昂,勃艮第人试图修复与阿马尼亚克的停战协定,但勃艮第公爵约翰被暗杀了,表面上是为了报复12年前对奥尔良公爵的谋杀。

接下来,尚不稳固的查理六世宣布其子,即法国皇太子为非法(皇太子的称号以及对法国东南皇太子省的所有权都应该留给国王的长子)。根据《特鲁瓦条约》(1420年),查理选定英王亨利五世为继承人,并在其有生之年让亨利出任其摄政王。亨利迎娶了查理的女儿,并被允许保留他目前所占领的卢瓦尔河北部地区,直至查理死后继承整个法国。如果亨利五世一直活着,那么整部法国的历史很有可能改写。然而,1422年查理六世和亨利五世双双亡故。

由于被勃艮第人排斥在巴黎之外,法国的皇太子在阿马尼亚克派的支持下控制着布尔日(Bourges),称查理七世(King Charles VII,1422—1461年在位)。当英王亨利六世的摄政王准备南下进攻查理的时候,神秘的圣女贞德(约1412—1431年)拯救了法国。这位富于冥思的洛林农家女孩鼓舞了查理七世士气委靡的军队,她的身上闪烁着当时似乎所有人都已丧失的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贞德告诉令人同情的法国皇太子:圣徒和天使告诉自己将会使其在法国传统的加冕地兰斯加冕。于是,她戎装加身,率领一支特遣队,将英国人驱逐出奥尔良。1429年,国王加冕,但是贞德在第二年就被勃艮第人俘获并出卖给英军,然后又被交给法国宗教裁判所,最终于1431年在鲁昂以异端和女巫之名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历史写真

### 对地名的偏见

不仅历史地名会发生变化，而且一些地方经常同时有两个或更多的名称或发音。例如，文中提及的比斯开湾（Biscay Bay），就是西班牙语“Viscaya”的英文形式；“Napoli”则是那不勒斯（Naples）的意大利语形式。如果这部书以英语以外的某种语言成书，那么另外一些形式就会用到。并非一种较之另外一种更“正确”。其选择知识反应了语言的偏见。

然而，在这种偏好背后也许就是严重的历史歪曲，因为针对某地或某人使用哪一个名词、哪一种拼写，或者哪一种发音，趋于反映出“胜利者撰写历史”的方式。“阿金库尔”的发音就是一个例证，英语称之为“ag'-in-kort”；法语的发音则相应地变成“ä-zhan-kor”。通过对发音的选择，人们可以在争论中含蓄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通过在文字材料或地图中使用民族语言的名称，人们可以表明与民族认知相关联的政治观点。因此，爱尔兰的国都“都柏林”经常以“Baile Atha Calaith”的面貌出现，而“爱尔兰”则表现为“Eire”。某一个地区被冠之以“上”或“高”抑或“超”这样的前词，比之于其他地方，通常只是意味着这里是一条重要河流发源地，但这些词可以很容易地被误认为在暗示品质。

最后，地方性的傲慢和习俗也可以导致发音与最初命名时明显不同。在北美尤其如此，那里的英语形式的泰晤士河（timms）变成了美语形式的“Thames”（发音与拼写一致），埃及的开罗城（Ky-ro）则变成了“kay-ro”，希腊的雅典城（ā-thens）变成了“á-thens”。

虽然双方差距悬殊,但法国王权设法维持了由贞德殉难所带来的动力。1453 年,查理七世和勃艮第单独达成和解。尽管查理收复了巴黎,但其乡村已经被士兵们洗劫。此外,皇太子即未来的路易十一所支持的贵族联盟在 1440 年发动叛乱。对王权而言,值得庆幸的是三级会议在 1439 年准许国王永久享有常备军权和征税权(一种由王室包税商征收的直接税)。

在该机构的作用下,加之富商雅克·科尔(Jacques Coeur)的贷款的支持下,查理七世进行了军事改革。他将 20 支特别骑兵队置于他选定的指挥官的麾下,然后派遣他们去守卫重要城镇,派专业人士监管火炮的引进。新法军在 1449—1451 年间将英军逐出了诺曼底和阿奎塔尼,至 1453 年百年战争结束时,只有加莱还保留在英国人手中。

与此同时,查理也开始行动起来以反对另一有可能弱化王权的机构。1438 年,《布尔日国事诏书》(一种正式的王室声明)提出了所谓"高卢主义"政策,宣称高卢人的教会在本质上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内部的自治教会。它极大地限制了教皇对教职任命及法国财政的控制,声称宗教会议的权利高于教皇。

## 4. 勃艮第的威胁与国王路易十一(1419—1483)

然而,查理在对付敌人的联合围攻时并不成功——反叛的封臣们,其中很多是伪封建主义的受益者,仍然控制着近半个王国。这些封臣中最有势力的是勃艮第公爵,慈心腓力(1419—1467 年在位),其权势已经扩展到了佛兰德尔和低地省的其他主要地区。勃艮第王国已扩展为一个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这是一个个人化的国家,一些土地是世袭封土,另一些是通过征服和协商,腓力公爵既凭运气也凭良好的管理将之联为一体。然

而，这也是一个险象环生的国度，置身于法国和德国之间。腓力的举止风范俨然是一位重要的君主。佛兰德尔和荷兰城市的财富使他可以拥有欧洲最奢华的宫廷，而其资源至少同法国国王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多。

法国和勃艮第之间具有决定性的实力较量发生在查理七世和慈心腓力的承继者——"蜘蛛王"路易十一(1461—1483 年在位)和勇者查理公爵(1467—1477 年在位)统治时期。尽管法国的新国王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就反复密谋反对父王，但他现在却能量十足地实施着查理七世奉行的国策。即位之时，路易就已经是一位富于心计而又经验老到的政治家了，曾为发动战争而实行秘密外交。他迫使抗争的臣民们缴纳高额税收，但在管理机构中给中产阶级留有要职。他曾为了安抚教皇而撤销了 1438 年的国事诏书，但在实际上仍然对教皇控制高卢教会进行了较多的限制。他扩展了父亲留下的军队，但只是用来对付紧急情况。

路易十一非常小心，而查理则鲁莽到了愚蠢的地步。他决定连接勃艮第和低地省之间的空隙，并占领洛林和阿尔萨斯。因为阿尔萨斯是与北瑞士接壤的封建权限的拼凑物，所以他的计划威胁到了独立性很大的瑞士邦联。在路易十一的支持下，瑞士分别在 1476 年和 1477 年先后三次打败了查理，在最后一次战役南锡战役(Nancy)中，查理被杀。

因为查理没有留下儿子，所以他的领地被分割了。勃艮第伯爵领永久性地转到了法王手中。低地省属于查理的女儿玛丽，她嫁给了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哈布斯堡家族的马克西米利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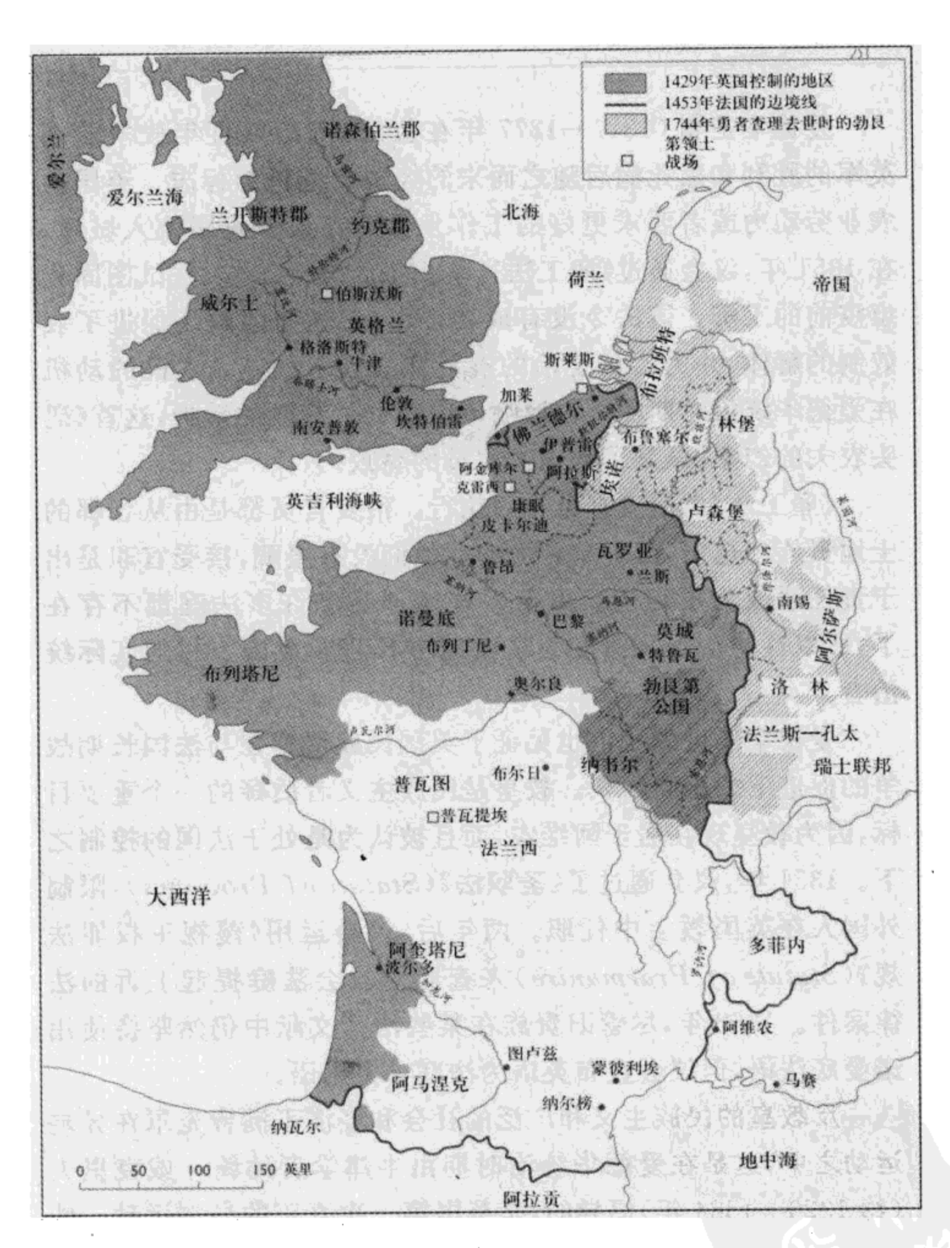
尽管路易十一没有从潜在的对手那里获得全部的勃艮第遗产，但是他粉碎了要建立一个中间王国(法德之间)的梦想。他也粉碎了阿马尼亚克派的势力，重新控制了大部分封臣属地，进

而将王室领地扩展了一倍。在他去世的时候，法国的伪封建主义在本质上已经消除。唯一仍然拥有较大独立性的地区是布列塔尼公爵领地，后者在路易之子查理八世（1483—1498 年在位）统治时期转移到王室的控制之下。然而，虽然路易十一尚非羽翼丰满的民族国家的君主，但他通过巩固疆域和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为在未来几个世纪建立一个辉煌的、有凝聚力的、自信的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 5. 爱德华二世和爱德华三世时期的英格兰（1307—1377）

英格兰也是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国家。直至爱德华四世和亨利七世时代，伪封建主义制度依然繁荣，约在 15 世纪后期，英国重申了王权，就如同路易十一在法国之所为。然而，在相似的边缘，也存在着一项非常重要的差别。当法国的三级会议日益演变为君主的仆从时，英国议会却正缓慢地获得一种能够让它在未来控制王权的权力。

1307 年爱德华一世去世后，政治趋势急转为反对君主政体。其子爱德华二世（1307—1327 年在位）是一位无聊、软弱而又无能的君主，受亲信和法国皇后伊莎贝拉的操纵。1314 年，他在班诺克本战役（Bannockburn）中败给了苏格兰人。他也面临着地方贵族们的反对。在 1311 年颁布的法令中，地方贵族成为由 21 人组成的英国王室法令制定委员会的核心成员，王室的任命、宣战以及国王离开王国都不得不经由他们同意。议会在 1322 年废弃了该法令，不满的贵族们都聚集在皇后伊莎贝拉的周围，发动了一场反抗国王的叛乱。爱德华二世被投入监狱，然后又被谋杀，由他 15 岁的儿子即位，称爱德华三世。



1429年英国控制的地区
1453年法国的边境线
1744年勇者查理去世时的勃艮第领土
战场
爱尔兰
爱尔兰海
诺森伯兰郡
兰开斯特郡
约克郡
北海
荷兰
帝国
威尔士
伯斯沃斯
英格兰
格洛斯特
牛津
伦敦
坎特伯雷
南安普敦
加莱
斯莱斯
佛兰德尔
布拉班特
伊普雷
阿金库尔
阿拉斯
克雷西
布鲁塞尔
林堡
埃诺
英吉利海峡
康厩
皮卡尔迪
卢森堡
瓦罗亚
鲁昂
兰斯
南锡
诺曼底
巴黎
莫城
布列丁尼
特鲁瓦
阿尔萨斯
布列塔尼
奥尔良
勃艮第公国
洛林
法兰斯一孔太
瑞士联邦
纳韦尔
布尔日
普瓦图
普瓦提埃
法兰西
大西洋
多菲内
阿奎塔尼
波尔多
阿维农
图卢兹
蒙彼利埃
马赛
阿马涅克
纳尔榜
纳瓦尔
地中海
阿拉贡
0 50 100 150 英里


百年战争时期的英法

爱德华三世(1327—1377 年在位)的统治以百年战争前期英军的胜利和黑死病后随之而来的经济大危机为标志。英国的农业劳动力或者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或者离开家园流入城镇。在 1351 年,议会通过《雇工法》,禁止工人放弃工作,并试图固化瘟疫前的工资。该法令没有成功,而且劳动力的缺乏促进了农奴制的解体,并为后任统治的混乱状态埋下伏笔。农民的动机在爱德华统治时期的一首讽喻诗中得到了有效的辩护,这首《码头农夫的幻象》讽刺了教士和官员的腐败。

《雇工法》由治安官员强制执行。治安官员都是由从各郡的土地贵族中选出,由王室任命的。他们没有报酬,接受官职是出于责任感或为了声望。由于一些老郡县和许多法庭都不存在了,所以这些治安官演变为主要地方长官和英国乡村的实际统治者。

爱德华三世的统治也见证了英国民族情感在与法国长期战争的促进下的不断增长。教皇是民族主义者质疑的一个重要目标,因为教皇现在居于阿维农,而且被认为是处于法国的控制之下。1351 年,议会通过了《圣职法》(*Statute of Provisors*),限制外国人在英国教会中任职。两年后,议会运用《蔑视王权罪法规》(*Statute of Praemunire*)来查验对教会法庭提起上诉的法律案件。1362 年,尽管旧贵族在某些法律文献中仍然坚持使用诺曼底法语,但议会宣布英语为法庭官方用语。

反教皇的民族主义和广泛的社会和经济不满皆笼罩在异端运动之中,这是在爱德华统治时期由牛津学者约翰·威克里夫(约 1320—1384 年)倡导的,是英国第一次真正的异端运动。威克里夫主张早期基督教的神贫精神,号召个体与上帝的直接沟通,无须教士为中介。他还同追随者一起首次将《圣经》翻译成

英语，尽管教会坚持认为拉丁语《圣经》是唯一权威的圣经版本。他的观点，世人称之为“罗拉德派”，虽然被斥为异端，但威克里夫本人在世时并未受到审判，死后他的尸体于1478年被挖出，并依据康斯坦斯会议的决议被焚毁。

在爱德华三世的长期统治期间，最富意义的宪政发展是议会的发展。议会分成上下两院，最早出现在14世纪。爱德华一世于1295年召开的模范国会已经包括高级教士、低级教士、贵族、各郡骑士以及市民的代表。尽管下层教士拒绝出席，但其他几个群体继续出席。高级教士——属灵的上院议员——作为国王的封臣进入上议院。属灵的议员及时地加入到属世的议员——伯爵和男爵们——之中，构成了上议院；各郡的骑士和市民则融合成下议院。

骑士和市民的缓慢结合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为未来下议院的壮大奠定了社会基础。它将两种要素合为一体，一者是代表贵族的第二等级的下层，另者是第三等级的代表，在大陆国家的议会中一直保持独立的群体。14世纪，各郡的骑士和市民之间几乎没有社会联合的意识。但是有一些小市镇的代表是来自于附近乡村的骑士。到14世纪末，下议院开始选出一名代表向国王报告其商议结果，该职位后来就演变为“议会发言人”一职。

与此同时，这也为未来下议院壮大奠定了政治基础。14世纪，议会的主要事务是司法层面的。骑士和市民偶尔要运用司法策略向国王请愿。无论是否被允许，都要在请愿书中以法律条例的形式表现出来。爱德华三世频繁要求议会筹款以支付百年战争的巨额军费，这也进一步促进了议会权力的增长。当爱德华使王权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削弱的时候，议会逐渐控制了财政大权。

## 6. 理查二世和伪封建主义(1377—1399)

当爱德华三世去世之时,他年仅 10 岁的孙子即位,称理查二世(1377—1399 年在位)。理查的统治以不断攀升的派系之争和农民的不满情绪为标志。这两种冲突都与其对手法国的情形极端相似——勃艮第和阿马尼亚克的冲突以及 1358 年的扎克雷起义。

社会失衡引发了对强制征收人头税的抗议,该税平均落在全体臣民的头上。较贫穷的阶层非常痛恨缴纳人头税,每人超过 15 先令。各种因征税所挑起的暴乱导致了农民起义。在教士约翰·保尔(John Ball)和雇工瓦特·泰勒(Wat Tyler)的领导下,农民焚烧了庄园中的档案以毁掉他们被奴役的依据,杀死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并且要求解除农奴制和没收教会财产。当他们向伦敦进军时,年仅 15 岁的国王允诺要解决他们遭受的不平。但是理查并没有履行承诺,而且对起义者进行了残酷的报复。

流传最久的有关乡村不满情绪的描述是《罗宾汉传奇》,他似乎是 13 世纪时约克郡的一名罪犯。第一次有文字提及他的是《码头农夫的幻象》。15 世纪,传奇已经成型,而罗宾汉的冒险演变为故事的一部分,约有 30 多首由鲁特琴和竖琴伴奏的民谣。这些民谣讲述了经济和社会的不平,讲述了贵族的追随者们不断开垦土地和森林地的野蛮,讲述了对暴君和城市的恐惧。

在理查二世及其继承人的统治下,派系之争呈现出危机的状态。在 14 世纪,贵族男爵们演变为一个规模更小但更富有的大富豪阶层,他们与封臣的关系也逐渐以现金而非以军事义务

和保护为基础。这些大地主通过雇佣小型私人军队为其作战的方式来募集供给国王的军事武装。这些军队中的战士受制于成文的契约和聘用定金。这被视为侍从—赡养关系,因为领主为其侍从提供衣食,而侍从再依次赡养其他人。尽管1390年法律明文禁止,这种作法仍然很盛行。私人军队的危险在对法国战争的每一个和平间隙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届时惯于在国外掠夺的雇佣兵们返回了英国。

冲突始于爱德华三世统治的后期,此时对政府的有效控制从年迈的国王转移到年轻的王子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手中。冈特的约翰动员了一支1500人的私人军队,并且其派别在理查二世统治下一直持续着。同时也出现了以国王的两个叔叔——约克公爵和格洛斯特公爵为中心的新党派。在打败理查二世的支持者之后,格洛斯特公爵指使王室大臣在精心挑选的议会中谴责其叛国行为(1388年)。理查二世等待了几年,而后于1397年逮捕了格洛斯特,并对其同盟者采取了行动。国王依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议会成员,并指使其通过了有追溯力的叛国法。理查对堂兄——冈特的约翰之子,博林布鲁克的亨利——封地的没收引发一场革命。1399年,在博林布鲁克回到英国之后,理查被迫退位并被杀害。博林布鲁克成为亨利四世(1399—1413年在位),兰开斯特家族的第一位君主。

## 7. 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1399—1485)

亨利四世将自己的登基部分地归功于议会的确认,后者曾经对于承认任何王权声明非常敏感。此外,亨利还面临着一系列反叛。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他经受了来自健康和亲子亨利

五世(1413—1422 年在位)叛乱所引发的巨大痛苦。亨利五世曾用令人炫目的胜利刷新了百年战争,在英国重申王权,后来因为他需要保证议会从财政上支持对法战争而有所缓和。他还对罗拉德派进行了大规模迫害。

1422 年,亨利五世的早亡结束了兰开斯特家族短暂的辉煌时代,因为这导致了查理六世(1422—1461 年在位)的登基。他是一个年仅 9 个月大的婴儿,长大以后还证实患有精神疾病。由于英国军队在百年战争的最后一役被打败,亨利六世的衰弱更强化了议会的控制,同时也强化了私人武装侍从的增长。当腐败的贵族派系争相控制政府的时候,在亨利六世的王后、安茹的玛格丽特及其英国同盟者,与曾经一度为法国摄政王同时也是英王的继承人的约克公爵理查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吵。这直接导致了玫瑰战争(1455—1485),它得名于兰开斯特家族的红玫瑰族徽和约克家族的白玫瑰族徽。

在 30 年沉闷而零散的征战中,议会变成了对立派系手中的工具,王国也反复更迭。1460 年,约克的理查被杀,野心勃勃的沃里克伯爵夺取了约克党事业的领导权。沃里克伯爵迫使亨利六世退位,而将约克的理查之子推上王位,称爱德华四世(1461—1483 年在位)。国王和王位拥立者之间很快出现不和,于是沃里克又在短时间内恢复了兰开斯特家族的王位(1470—1471)。然而,爱德华四世迅速收复了控制权,并且杀死了亨利六世和沃里克。伴随着爱德华统治的安然确立,强有力的王权政府又回到了英国。

然而,因为爱德华四世于 1483 年去世,稳定的前景再次消失。其子爱德华五世年仅 12 岁,很快就被其监护人和叔父推开,后者自称理查三世(1483—1485 年在位),是约克党最后一

位当政者。有才干、有胆识、又无情的理查三世不断成为许多争论的焦点。世人仍然在争论理查是否应该为爱德华五世及其年幼弟弟的死负责。无论如何,在理查的对手从兰开斯特党的领导人亨利·都铎那里寻得支持后,派系之争再度骤然爆发。1485 年,理查三世在伯斯沃斯菲尔德(Bosworth Field)被杀,玫瑰战争结束。这场战争带给英国一位新君主亨利七世和一个崭新的都铎王朝。

## 8. 亨利七世的统治(1485—1509)

亨利七世(1485—1509 年在位)是兰开斯特家族的旁系。然而,其成为国王的权利并非源于这一含混的继承宣言,而是源于其在伯斯沃斯菲尔德的胜利和其后在议会中的表现。新君主拥有出色的能力胜任整治战后分裂的工作。亨利七世在许多方面与法国的路易十一一样,精明又富于才干,倚重幕僚,运用外交而非武力手段来转变对外政策。与路易不同的是,亨利虔诚而慷慨。他通过迎娶约克家族的女继承人,爱德华四世的女儿,在形式上调和了玫瑰家族之间的对立,并且通过禁止侍从—赡养关系剥夺了贵族的私人武装。

在玫瑰战争结束后,亨利将从对手那里没收的土地赏赐给许多幕僚。国王及其幕僚不时运用高压手段,将中央政府的税收增加了两倍以上。当高级教士应诏向国王缴纳特殊税金的时候,那些衣着华丽的人总是凭高级教职的花费来请求免除土地税,而他们会被告知其富有的衣着已经证明他们有能力缴纳大笔的税金。那些为了表现贫穷而衣着破旧的人会被告知,其节俭也有力地表明他们有能力支付大笔的税金。这些做法使得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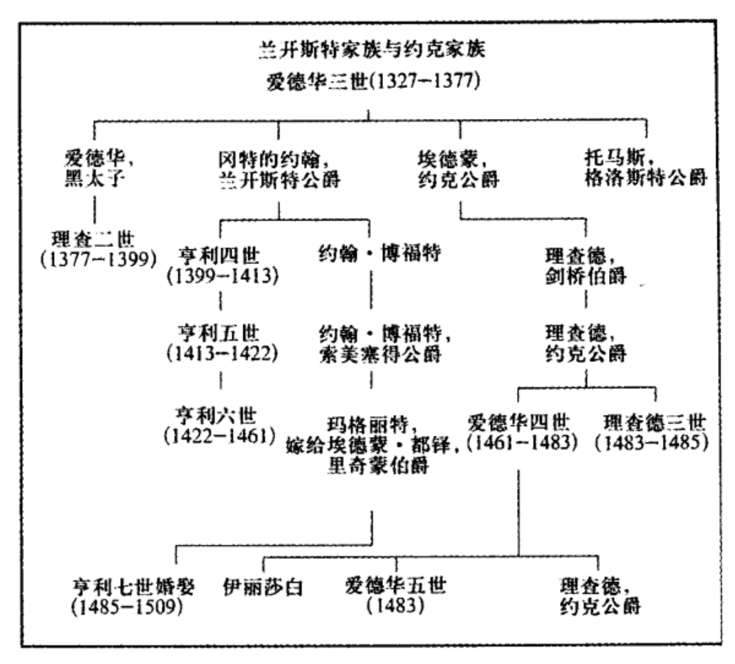
利避免了与议会的冲突,因为他很少需要议会通过纳税提案。

亨利七世重新建立繁荣,同时也在这个疲于叛乱、内战和不安的英国重建了法律和秩序。他恢复了王权的威信,使它成为英国民族主义的凝聚点。他修正了都铎王朝对议会政策的模式。亨利尽可能少地为钱而求助议会,在其统治的最后 12 年,他不得不召集了唯一一次议会,该会在 1054 年持续了几个星期。即便如此,当它拒绝给予他所需的全部款项时,他也体面地退让了,从而避免了一次正面冲突。

## 9.1492 年以前的西班牙

中世纪早期伊比利亚半岛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穆斯林的征服,他们几乎将整个半岛都置于其控制之下。在公元 8 世纪和 9 世纪,幸免于穆斯林统治的基督教社会唯有最北部地区。从公元 9 世纪开始,这些基督教国家不断向南推进,直至 1492 年最后一个穆斯林据点格林纳达陷落。正如圣地的伟大的十字军运动,收复西班牙是一场有些混乱的圣战。既然它是由那些相互对立的国家一时兴起而为之,所以各国有时将更多的精力耗费在彼此争斗上,而不是用于同穆斯林作战。

在 15 世纪中期,伊比利亚半岛由三个基督教国家统治着。卡斯提尔地域最广,人口最多,是收复运动中的领袖。但是,卡斯提尔的王权的增长同其疆域并不成正比。牧场主的组织麦斯塔(Mesta)控制着卡斯提尔广大的地区。贵族和城市皆保持了许多与王权相抗衡的权力。二者与教士一同出现在议会中,它相当于英国国会或法国的三级会议。然而,到了 15 世纪,议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权力。




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谱系表

在卡斯提尔的西方，沿着大西洋海岸线，坐落着第二个基督教王国葡萄牙，它曾经是卡斯提尔的一个行省，于12世纪赢得了独立。尽管与卡斯提尔保持着密切联系，但葡萄牙已经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语言，并且致力于自己的民族事务，尤其是探险和海外贸易。

第三个王国是位于西班牙半岛东北部的阿拉贡，它既是地中海列强之一，也是一个伊比利亚国家。它的国王控制着巴利阿里群岛，统治着在法国一侧的比利牛斯山脉的地中海沿岸土地，并且在南意大利有重要利益。在霍亨斯陶芬帝国崩溃时，阿拉贡占领了西西里岛（1282年），“有雅量者”阿方索五世（1416—1458年在位）又于1435年占领了那不勒斯。在阿拉贡，正如同在卡斯提尔一样，古老的政治体制限制着王权——贵族、

城市和议会都比卡斯提尔更有势力。此外,阿拉贡王权在西班牙大陆的领土,像瓦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以及后来形成的以繁荣的巴塞罗纳港为中心的领土各自拥有自己的议会,它们实际上是独立的国家。

1469 年,未来阿拉贡国王费迪南(Ferdinand, 1479—1516)迎娶了未来卡斯提尔女王伊莎贝拉(Isabella, 1474—1504),进而形成了一个王朝联盟,并最终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西班牙。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是巨大的。不仅两国的王权十分弱小,而且卡斯提尔和阿拉贡居民的语言也不相同。阿拉贡面向地中海,卡斯提尔面向大西洋,所以或许卡斯提尔与葡萄牙结盟更为自然。

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形成了良好的政治伙伴关系。费迪南是一位审慎的现实主义者,在宗教上持怀疑和宽容态度。另一方面,伊莎贝拉则是虔诚到了对异端邪说毫不宽容的程度,并且享受王权的华丽和威仪。她在一个由王室任命人员组成的新机构卡斯提尔议会中授予了许多特权。她与城市的中产阶级结盟反对贵族,并得到了城市民兵而非封建军队的支持。当她发现其权力已被 12 世纪为收复失地而建立的三个军事协会所削弱后,就坚持费迪南出任每个协会的首领。

尽管十分虔诚,但是女王决心将教会置于王权之下,而且她开了一剂多方需要的清除教会腐败的药方。西班牙君主也从教皇那里得到了任命西班牙主教的权力。正如法国的高卢教会一样,西班牙教会是半独立于罗马的教会。西班牙高级教士枢机主教希门尼斯·德·西斯内洛斯(Jiménez de Cisneros, 1436—1517)成为伊莎贝拉的首要大臣,并贯彻其净化教会、遏制贵族统治以及博取城市支持等政策。

1487 年,西班牙引入了宗教法庭。最初它是王室的而非教

皇的工具。西班牙宗教法庭通过推行普世的天主教教义寻求促进西班牙民族主义，通过迫使所有人成为教会的服从者来为王权创造忠诚的子民。其主要目标是新基督教徒或改宗者——那些被强制从犹太教转而皈依基督教之人。因为担心犹太人继续秘密地实践从前的宗教，它积极地进行严密的调查。对改宗者的迫害是将10万余人驱逐到低地国家，在那里他们被称做“马拉诺”(Marrano)，暗示他们在荷兰人和佛兰德尔人心目中的异国外貌。1492年，未改宗的犹太人面临着或受洗或弃产流放的抉择，约15万人选择流放。10年后，轮到穆斯林了，他们除了受洗外别无选择，天主教因此赢得了许多名义上的新追随者，后者的顺从只是源于宗教法庭为那些在信仰上摇摆不定之人所准备的一切。

相应地，1492年也可以被视为西班牙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代。1月2日，费迪南和伊莎贝拉胜利挺进格林纳达，标志着穆斯林西班牙的最后一块领土被收复。在这一年的后期，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驶离卡斯提尔港首次开始向新大陆航行的时候，新征服之路就已经开启。

## 三、德国和意大利的地方分立主义

德国的权力逐步从皇帝手中转移到地方小诸侯手中。在近乎20年的时间里，根本没有皇帝。这就是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最后一位皇帝康拉德四世死后的“大空位时期”(1254—1273)。在此期间，诸侯的势力甚至以牺牲君权为代价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德意之间的古老的联系也被切断了。

### 1. 诸侯与帝国(1254—1493)

帝国的称号幸存于世。它传至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

(1273—1291 年在位)手中,其领地多数在现今的奥地利,还有一部分在德国南部,还有一部分在瑞士。鲁道夫希望为自己的家族建立一个世袭君主制,并使之尽可能地富强。他将奥地利纳入家族领地,他的后代直至 1918 年以前一直统治着维也纳。鲁道夫为了获得法国对新兴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支持,在西部向法国做了让步。

结果在 1270 年以后,法国进兵帝国的疆域,主要目标就是那些曾经属于古老的加洛林王朝的中王国的领土。然而,德国诸侯反对哈布斯堡家族安抚法国的政策。于是,在大空位以后的 100 年中,德国发展出两大派别。以东部为基础并且具有亲法倾向的哈布斯堡一派,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世袭君主政体;以西部为基础并且反法的对立派则反对建立世袭的君主政体。

及至 14 世纪中叶,诸侯们作为一个阶级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这体现在皇帝查理四世于 1356 年颁布的《黄金诏书》之中。它确认:帝国的权威源于上帝,德国皇帝由选帝侯推举,选帝侯以多数票达成的人选无需教皇确认。选帝侯的数目为七:三名教会选侯——美茵兹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和科隆大主教;四名世俗选侯——莱茵一巴拉丁伯爵,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边疆伯爵和波西米亚国王。四位世俗选侯可以将这项权利传给长子,其疆域不能再分割。七位选侯中的任何一位在其领地中都享有近乎君主的权威。

整个 14 世纪,德国诸侯都面临着新政治分裂的威胁,尤其是来自行政官员和大臣们的威胁。为了征税,诸侯们不得不取得贵族和骑士的同意,同时也要征得另外两个阶层——教士和市民——的同意。这些阶层以金钱为交换不断取得特权。这一时期也可以看到德国北部贸易城市的汉萨同盟的兴起以及独立

的“自由城市”在整个德国的凸显，例如汉堡和法兰克福。

约在1400年以后，非选帝侯的诸侯们逐渐将长子继承制和《黄金诏书》为选帝侯公国所确立的不可分割的原则应用到自己的公国。诸侯们借助于罗马法阐明其权威，这有助于他们成功地阐释对公共权利和职位的绝对控制。在许多小诸侯国，有序的财政、不可分割的公国疆域以及为各阶层所承认的税收，逐渐演变为典型特征。

伴随着无数稳步地确立了统治的诸侯以及享有实际独立的自由城市的出现，帝国几乎毫无意义。它不仅已经失去了对法国占领的西部土地的控制，而且也失去了对其他边境地区的控制，尤其是瑞士。到16世纪早期，瑞士在法国的支持下，阻断了勃艮第和德国两方想要使之就范的努力。瑞士邦联尽管在名义上还从属于帝国，但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因此，另一个民族国家尽管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却正在兴起。

1438年，神圣罗马帝国尽管仍然还是推举皇帝，但帝位永久地传到了哈布斯堡家族手中。55年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3—1519年在位)没有经过教皇加冕即登基。通过迎娶勃艮第的玛丽，他所获甚丰。马克西米利安在奥地利及其属地重建了强有力的哈布斯堡王权。他还为子孙安排了婚姻，以保证扩展家族土地，使其孙查理五世成为半个欧洲的统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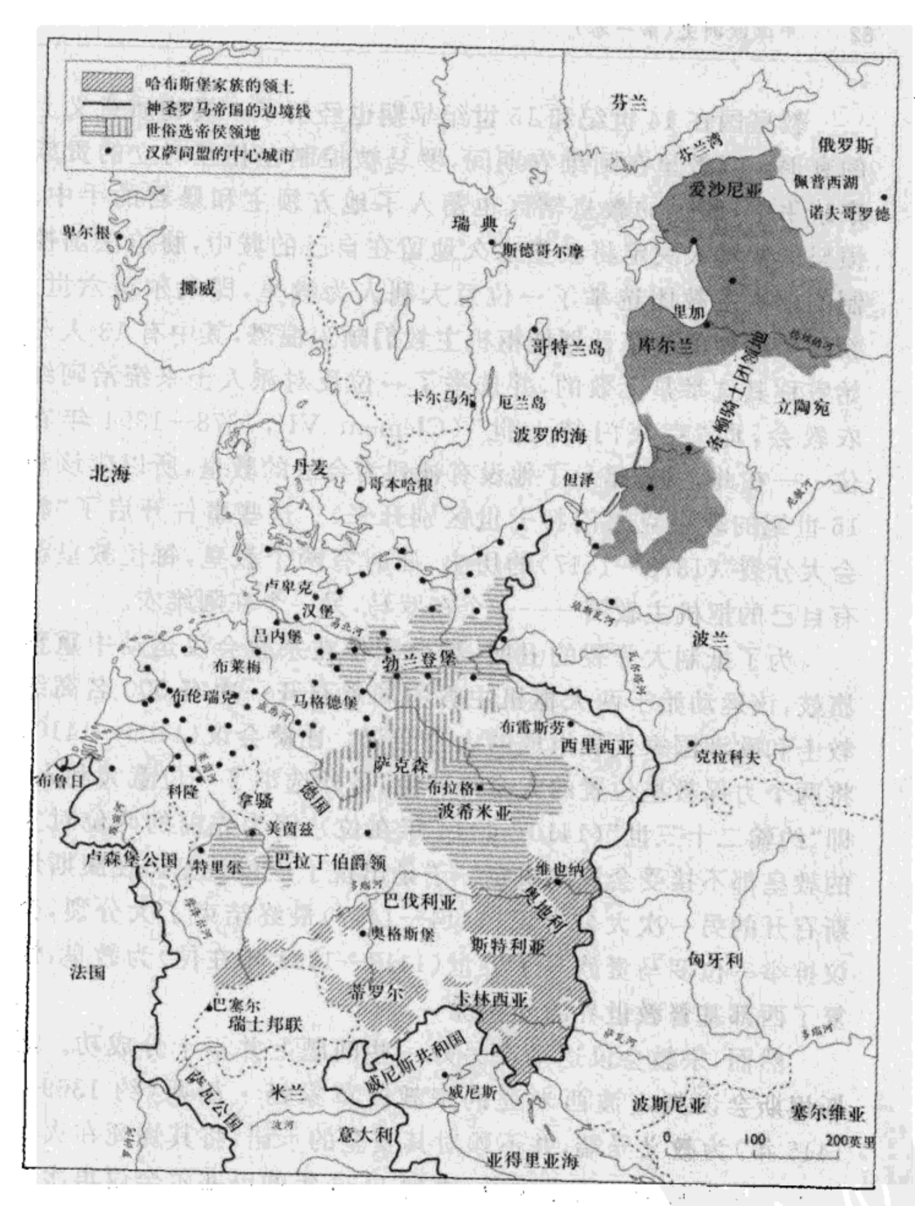
## 2. 意大利的专制君主和雇佣兵(1268—1513)

中古时期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冲突，促进了意大利独立城市国家的成长，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在12和13世纪，城市公社都是贵族寡头共和制。然而，占统治地位的寡头执政

团也因为亲教皇的圭尔夫党和亲神圣罗马帝国的吉贝林党之间的对抗而分裂。与此同时,一方面是富人中兴起的与武士阶层相近的阶层,另一方面则是小店主和雇工们。争执愈演愈烈,似乎建立一个个人独裁政府是唯一可行的良方。有时是暴君攫取了权力,间或是斗争中两派从外部邀请来的某人,经常是雇佣军队长,即各国依据合同雇佣来为自己征战的唯利是图的司令官。第一位值得注意的雇佣军指挥官是英国的约翰·豪克武德爵士,作为一名为钱而战的士兵,他将自己标给不同的城市公社。15 世纪,最著名的雇佣军指挥官都是来自贵族世家,例如曼图亚的冈泽亚(Gonzaga of Mantua),或者是一些野心勃勃的平民,例如后来的米兰公爵弗兰西斯·斯弗尔查(Francesco Sforza,1450—1466 年在位)。

到 15 世纪为止,战争的命运和政治在意大利的版图上引发了重大变化。许多在一两个世纪以前很重要的城市国家正在政治的湮埋中沉没。几个小国现在却控制着意大利的政治——南部的那不勒斯、中部的教皇国,以及北方的米兰公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和威尼斯共和国。

包括西西里岛在内的那不勒斯王国,长期以来臣服于外国的统治。1266 年,安茹的查理占领了这一地区。西西里王国爆发了起义(1282 年)后,转到阿拉贡的控制之下,并最终传至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的手中。那不勒斯王国一直由安茹省人统治到 1435 年,是年阿拉贡王国的“有雅量者”阿方索占领了这里。他死后,在其私生子费兰特(即费迪南一世,1458—1494 年在位)统治时期,那不勒斯再次独立。在安茹省人和阿拉贡人的统治下,该地区根本没有完全恢复早期的繁荣和文化领军地位。




15 世纪的德国和波罗的海

教皇国在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也经历了一场物质意义上的衰退。当教皇在阿维农期间,罗马被控制在相互对立的贵族家族手中,偏远的教皇辖区也落入了地方领主和暴君的手中。愤怒的罗马人决定将教皇永久地留在自己的城中,胁迫法国控制的枢机主教团选举了一位意大利人为教皇,即乌尔班六世。新教皇激烈的改革计划使枢机主教们颇为惶恐,其中有13人开始宣称其选举是无效的,并选举了一位反对派人士来统治阿维农教会,即“克莱门特七世”(Clement VII,1378—1394年在位——在此,引号暗示了他没有被列为合法的教皇,所以应该和16世纪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区别开来)。这些事件开启了“教会大分裂”(1378—1417)的历史,届时有两个教皇,每位教皇都有自己的枢机主教团——一个在罗马,另一个在阿维农。

为了抵制大分裂的丑闻,教会团体在宗教会议运动中重整旗鼓,该运动始于两大枢机主教团同意召开一次有500名高级教士和欧洲国家代表组成的大公会议。比萨会议(1409—1410)将两个力保教皇位置的人全都罢免,另外选举了一位意大利人,即“约翰二十三世”(1410—1414年在位),因为先前的两位对立的教皇都不接受会议的决定。于是出现了三位教皇。在康斯坦斯召开的另一次大公会议(1414—1417)最终结束了大分裂,会议推举一位罗马贵族马丁五世(1417—1431年在位)为教皇,恢复了西部基督教世界的外在统一。

然而,宗教会议运动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并不十分成功。康斯坦斯会议判定波西米亚的宗教改革家扬·胡斯(约1369—1415年)为教义异端,并不顾对其安全的承诺,将其烧死在火刑柱上。胡斯运动一直在继续,直到1436年的巴塞尔会议再次允许胡斯派传教。无论是这次会议还是以后的会议,在1449年以



佛罗伦萨的安德烈·德·威罗其奥的著名纪念像《雇佣军长官巴托罗米奥·科勒尼像》(1488年),主人公于1454年成为威尼斯的最高统帅。(Alinari/Art Resource. NY)

前都是偶然召开的,都千方百计地要净化教会的腐败和世俗化。其关于将教皇制由绝对君主制转变为议会君主制、将大公会议变成教会政府的一个永久性特征的努力被阻断了,但是它们却对教皇权进行了重要限制。一个值得注意的例证就是《布尔日国事诏书》,它在1438年给予高卢教会许多自治条款。

伴随着宗教会议运动的失败,教皇们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到中部意大利。从西克斯图斯四世(1471—1484年在位)开始,一系列野心勃勃的人攫取了教皇的位置。他们一般都非常有教养,而且也很入世。他们将罗马恢复为艺术和学术中心,并开始

在罗马以外重新夺回教皇的领地。一位来自波基亚家族(Borgia family)的西班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年在位)在臣服意大利中部领主和粉碎罗马贵族世家的权势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亚历山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子,后者凭借暴力、背叛和毒药来达成目的。这些好战的教皇中最可怕的一位是朱利叶斯二世(Julius II,1503—1513年在位)。他的教皇任期标志着教皇世俗权力的巅峰状态,而那以后由于宗教改革给教会带来的创伤,同时也由于意大利作为哈布斯堡王朝和瓦罗亚王朝之间的战场所带来的持续性破坏,教皇权日益衰退。

## 3. 米兰(1277—1535)

米兰坐落在肥沃的伦巴第平原的中部。它是源自北欧的贸易路线的终点,同时也是一个纺织和金属加工业中心。自从12世纪它成为伦巴第同盟的领袖以来,它在政治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米兰当时是一个由贵族和议会,或称"大议会",联合执政的共和国,拥有一定财产的市民都可以参加议会。贵族制和民主制之间的不稳定的平衡被教皇党和皇帝党的党派之争的爆发所打破。贵族维斯康蒂家族于1277年控制了权力,并于1395年最终从皇帝那里获得了米兰公爵的称号。

当1447年维斯康蒂家族直系血统中断后,弗兰西斯·斯弗尔查于1450年篡夺了公爵之位。最著名的斯弗尔查公爵是弗兰西斯的幼子路多维科·莫罗(1451—1508)。路多维科通过招募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使米兰宫廷成为欧洲最炫目的宫廷之一。其间最著名的便是列昂纳多·达·芬奇(1452—1519)。在15世纪90年代法国和西班牙侵略之时,他的狡猾不

能保护他对抗敌人的军队。1500 年,他被迫退位,并在 8 年后死于法国的羁押之中。米兰公爵在 1535 年陷入西班牙人的控制之下,并在其手中延续了近 2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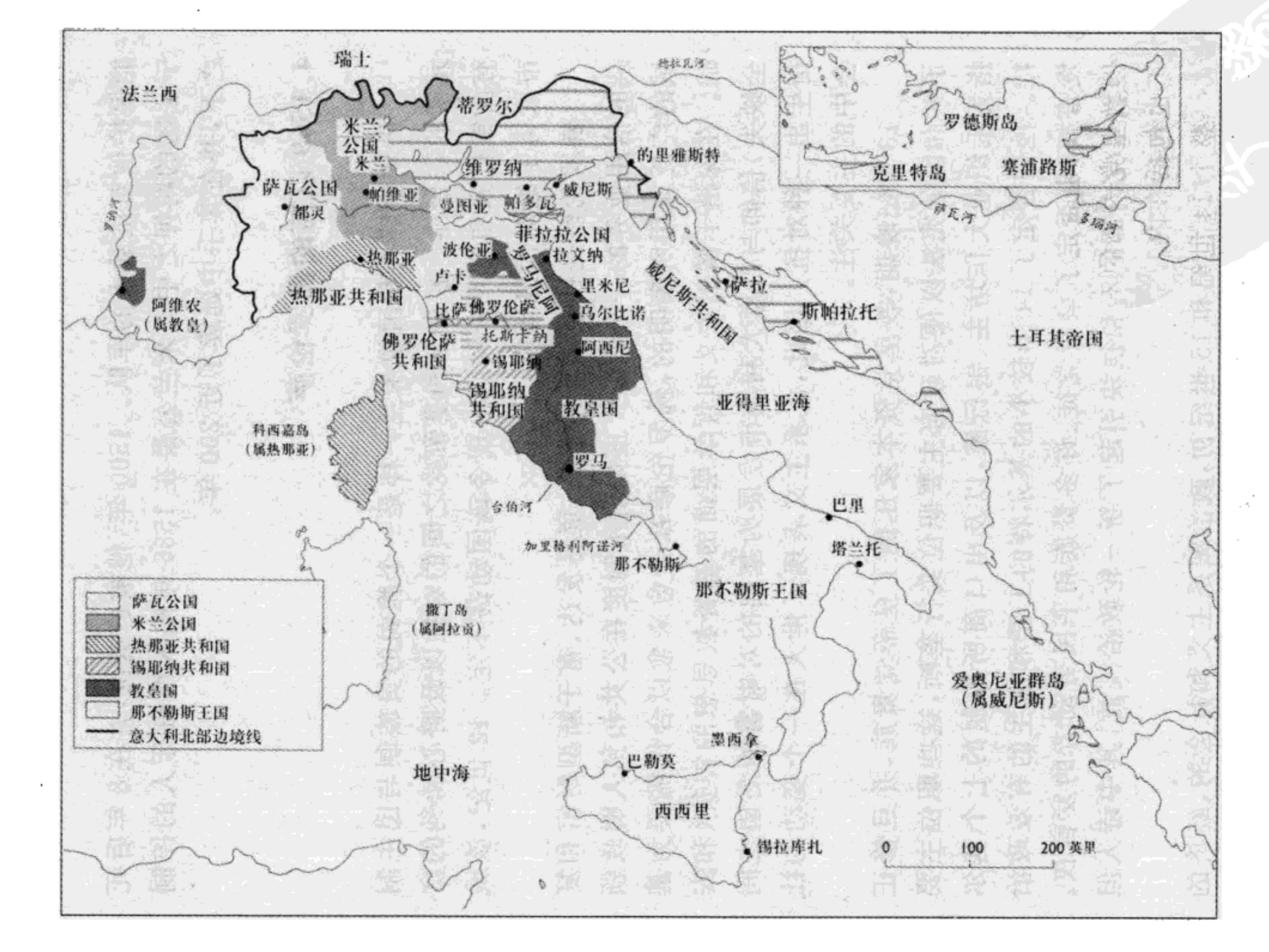
### 4. 1569 以前的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共和国像米兰一样是一个脆弱的贵族制与民主制元素的联合体。教皇党和皇帝党之间的对抗以及野心勃勃的富有的银行家和商人阶层的出现令该国动荡不定。12 世纪,该城市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

佛罗伦萨是社会流动性增长、贸易发达、富于新型财富和复杂的信用业务的一个例证。正如信用制度在公共和私人财政领域的广泛应用所表明的,佛罗伦萨社会愈来愈以合作需要为基础。在深植于僧侣主义和哲学层面的基督教思想的神贫(和安全缺失)信仰与以意大利城市发展为基础的对财富的渴望之间衍生出一种对抗。因此,派系主义表现了世人在一个变动的社会中的主要关注。

13 世纪晚期,教皇党资本家压倒了皇帝党贵族,并且修正了共和国的宪法以便对政府主要职位实行垄断,这些职位主要指为毛织业大作坊主、银行家,以及出口商所控制的七个基尔特。他们否定了 14 个较小的基尔特的工匠和店主的有效政治发言权,也否定了皇帝党徒、许多贵族和平民劳动者的发言权。但教皇党内部的不和很快引起了新一轮政治流放,其中诗人但丁也包括在内。

整个 14 世纪和 15 世纪初,政治派系主义和社会的、经济的紧张状态折磨着佛罗伦萨,尽管这些并没有阻碍文化的显著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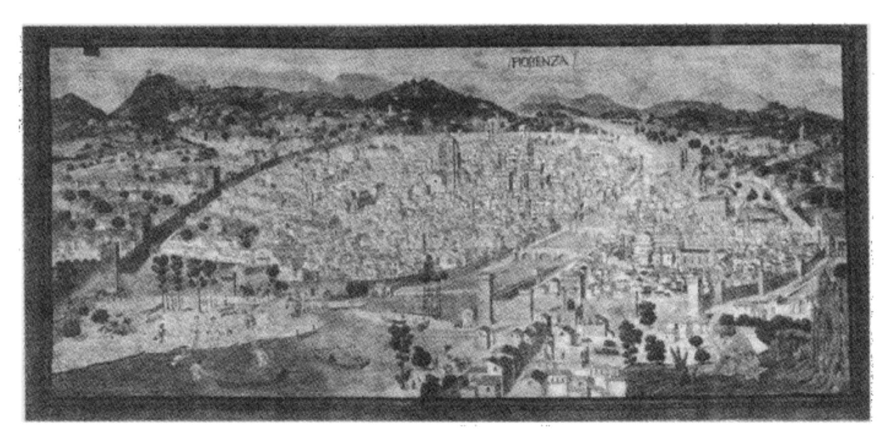

1494年左右的意大利

长。政治无权者欲促进共和政治的民主化，但他们最后失败了，这既是因为贵族寡头执政团的顺应力，同时也由于改革者自身因小基尔特和奇奥皮或称贫穷的雇工的对立而分裂所致。对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亏欠佛罗伦萨银行家债务的批判，与 14 世纪 40 年代银行业的惨重损失接踵而至，这足以将大基尔特削弱到允许 14 个小基尔特获得最高权力的地步。

然而，动荡依然在继续，并在 1378 年雇工起义中达到高潮。梳毛工、织工和印染工赢得了组建自己的基尔特的权力，进而在政治上拥有了较小的发言权。持续的动乱使富人获得了对贫穷雇工和小基尔特的控制权。重新恢复的寡头执政团在反对米兰的维斯康蒂家族的城市保卫战中威望再起。最后，在 15 世纪早期，新一轮破产和一系列军事逆转弱化了贵族寡头的控制力。1434 年，一些领袖被迫流放，权力转至穷人的政治斗士克斯莫·德·美第奇手中。

在以后的 60 年(1434—1494)中，佛罗伦萨便在美第奇家族的非正式统治之下，他们也许是全意大利最富有的家族。他们实行累进所得税，对富人尤其是其政敌征收重税，而美第奇银行的资源也在为削弱对手、扶助友朋而运作。他们在共和制的幕后静静地操纵着一切。例如，克斯莫很少担任公职，他一直站在后台。

克斯莫的孙子洛伦佐是 1469—1492 年间佛罗伦萨的统治者，被称做“伟大的洛伦佐”。尽管洛伦佐拥有许多为时人所羡慕的兴趣，但他也并非没有缺点。他忽视军务，在财政上麻痹大意，导致美第奇银行落败，致使佛罗伦萨在 15 世纪后期席卷意大利的战争中没有充分备战。




1490 年的佛罗伦萨地图。(Scala/Art Resource,NY)

## 5.15 世纪的威尼斯

北意大利的第三大国威尼斯政治稳定,与米兰和佛罗伦萨的动荡形成鲜明对比。到 15 世纪,圣马可共和国,这是当时的称谓,实际上已是一个帝国,它控制着意大利陆地上的波河下游河谷、亚得里亚海的达尔马提亚海岸、爱奥尼亚岛屿以及部分希腊陆地领土。波河流域是为了防御安全和首都的食品供应而并入的,而其他地方则是十字军时期其侵略行为的遗产。

威尼斯宪法在 14 世纪早期定型。在此之前,首席执政官一直是道奇,或称"公爵",最初是由拜占庭皇帝任命,而后经选举产生。立法机关一直是由全体市民组成的市民大会。然而,威尼斯商人害怕强有力的道奇会建立世袭君主制,而且他们也发现市民大会的臃肿和缺乏效率。因此,他们将道奇归为一个仪式性的角色,并将市民大会变成大议会,其 240 名成员仅限于特殊的功勋录上所列出的家族。大议会依次选举道奇和小议会成员,后者将管理政府。其中最重要的是 10 人议会,负责保卫共

和国的安全。

威尼斯的制度给予被列入功勋录的古老的商人家族以永久的政治垄断权。然而，威尼斯的寡头执政团，在否定了多数人的政治发言权并严惩一切反对者的同时，也设立了许多为公共福利服务的方案，从临近的喷泉到大海军兵工厂。他们公正而慷慨地对待帝国的附属城市，发展出一个外交使团，专门为庞大商业帝国的远方利益服务。威尼斯在意大利诸国中是政治平和、秩序井然的奇异之国。

## 6.“欧洲的学校”

15 世纪的意大利国家一直被称为“欧洲的学校”，在新型现实主义权力政治方面教导了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像莫罗或凯撒·波基亚、“高贵者”洛伦佐以及威尼斯的贵族寡头这样的专制君主可能会给英国的亨利七世或者法国的路易十一留下治国的教训。在国际事务中，威尼斯、米兰的维斯康蒂以及曼图亚的冈泽亚家族的外交使团的经历，是永久性外交使节的早期阶段。意大利在战争中对雇佣军的依赖，预示着雇佣兵使用的增多和对古老的封建募兵的放弃。

然而，意大利也在不当的政治行为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教训。15 世纪末，意大利诸国之间的平衡明显地极不稳固，以致不能保持其独立。从 1494 年法国入侵开始，意大利就变成了法国、西班牙以及哈布斯堡的新式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者的战利品。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正如他们所仿效的古典希腊人一样，成为强邻的牺牲品，并因为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意大利而受到了惩罚。源于“欧洲的学校”的这些教训，最初是

由尼古拉·马基雅维利(1469—1527)所描绘的,他曾于1494—1512年任复兴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外交官,并于1512年被美第奇家族所流放。此后不久,他撰写了《君主论》(*The Prince*),并把它进献给美第奇家族的统治者,徒劳地希望重新赢得政治支持。《君主论》从总体上表达了对于人性的蔑视:

> 他们忘恩负义、善变、虚伪且伪善、远离危险、热衷于利益,你成功时他们围绕着你;你不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为你流血,为你献出财富、生命和孩子;但当你需要时,他们就会避开。*

《君主论》的政治观念直接源于其对人性的评价:

> 如果……君主有必要像动物那样行事,那么他应选择百兽中的狐狸和狮子,因为狮子不能躲过陷阱,狐狸不能躲过豺狼。君主必须既是狐狸以躲过陷阱,又是狮子以吓退豺狼。……一位审慎的统治者决不应守信——而且他也不能守信——当实现诺言会反对自己的时候,或者当遵守诺言的理由不复存在的时候。如果人都是好人,那么这句格言就不对,但由于人都是坏人并且不会对你遵守承诺,那么你同样不必对他们遵守承诺。**

---

* Niccolò Machiavelli, *The Prince*, in *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 trans. Allen Gibert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65). 1. 62, © 1965 Duke University Press.

** Ibid., 1,65.

《君主论》是针对16世纪早期意大利所遭受的严重政治疾患的一剂良方。但是马基雅维利的诊断究竟多么准确？他推荐的良方又多么准确？学者们不能完全苟同。一些人相信《君主论》可以依据字面理解，相信意大利在外敌入侵面前的那种绝望状态需要一剂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良方。另一些人则认为马基雅维利意在讽喻，认为他正在警告意大利人不要依赖专制，即使是在民族危机之时。

当《君主论》被置于马基雅维利的鸿篇《演说集：论李维著作前十卷》之旁的时候，很难说《君主论》中有关人性的阐述是马基雅维利本人的信念。在《演说集》中，马基雅维利没有在16世纪早期意大利变幻莫测的背景下阐释关于建立一个稳定、持续的政府的问题，而是将之作为一个抽象的问题来阐释。他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论点，在精神上与那些服务于佛罗伦萨短暂的共和实践的人非常接近。

《君主论》在论述专制君主——其中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君主都是从前的雇佣军将领——的缺乏节制以及由宫廷和朝臣文化所孕育的异化的公民美德时，也许有点儿讽喻。然而，它却被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这样的君主视为必备手册，而且是一长串诸如此类的手册中最富理性的一本。无论是通过讽喻式的表达还是超然的推理，《君主论》都展现了一种政治图景，已证明比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任何其他著作都更具影响力。其间，马基雅维利将宗教道德和政府行为分开，将统治者与其留给臣民的印象分开，将“权力政治”与表象分开，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为那些致力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的、自觉的、理性的工具主义者作辩护。这部著作是同类著作中的第一部，它所支持的政治实践已经在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瓦罗亚家族的路易十一、

阿拉贡的费迪南、意大利的斯弗尔查、美第奇和波基亚王朝的统治中有所发现。

这些统治者与其前辈截然不同。没有谁为其圣徒般的行为而被封圣。亨利七世、路易十一以及费迪南,皆通过深思熟虑、时人所标榜的无情以及稳定政局时的工具主义,为近代早期的新兴国家奠定了基础。对自我表现的关注、对外交和官僚机构的准确运用、对权威的范围与限制的清晰认识以及他们为强化权力所做的努力,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世纪晚期生活方式的变化。

## 四、本章小结

从中古向近代的转变是以王权的强化、农奴制的解体、对中古教会的反叛以及日益重要的货币经济为标志的。中世纪后期的灾难和艰辛,包括百年战争、黑死病、教会大分裂以及土耳其人的入侵,加速了上述变化。

在法国,王权的强化为百年战争(1337—1453)所中断。这场战争在英国的爱德华三世宣布兼领法国王位之后爆发。战争初期,英国赢得了克雷西战役(1346 年)和普瓦提埃战役(1356 年)的胜利,并且俘获了法国国王。

扎克雷农民起义、阿马尼亚克与勃艮第之间的派系之争使得法国更无力联合起来反对英国。在阿金库尔战役(1415 年)之后,法国国王查理六世,收养英国的亨利五世为王位继承人。在贞德出现后,其神秘的信仰鼓舞了法国的爱国主义,法军重整旗鼓,开始将英军逐回本土。尽管贞德被作为女巫烧死在火刑柱上,但法国的新国王查理七世还是夺回了对领土的控制权。

到百年战争结束之时,法国君主制已经从三级议会赢得了

重要权力：设立常备军和税收权。路易十一，一位狡猾多端的政治家，集中了王权的管理体系，消除了伪封建主义，为法国绝对君主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英国也于15世纪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民族国家。然而，与法国三级议会屈从于王权的情形不同，英国国会有补助金批准权，因此可以对君主施压。

在14和15世纪，英国受到黑死病的影响，导致社会和经济错位。英国民族主义的出现反映在英语取代诺曼底法语成为官方语言上。在议会中，开始出现两院，并且在下议院的骑士和市民中间衍生出一个意义深远的联盟。

都铎王朝的创立者亨利七世（1485—1509年在位）是一位精明的统治者，在派系之间的玫瑰战争（1455—1485）后恢复了地产、法律和秩序。他也集中了王权，并开创了新式财政政策。

15世纪的西班牙涌现出三个国家：卡斯提尔、葡萄牙和阿拉贡。阿拉贡的费迪南和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之间的王朝联姻导致西班牙王权的强化。在教会的支持下，西班牙强制实行宗教同一政策，迫使数万犹太人和穆斯林改宗。到1492年，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将穆斯林从其在格林纳达的最后的据点驱逐出去，并且开始实行不容异己的宗教和民族政策，这标志着历经数世纪的西班牙君主制的到来。

在德国，推举君主的原则于14世纪获胜，并在1356年的《黄金诏书》中被加以确认。独立的诸侯国和自由城市统治着各自的区域。在西部，瑞士邦联实际上已经独立于神圣罗马帝国。1483年以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尽管依然是由推举产生，但却总是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

在意大利，各城市国家而非任何中央权威阻碍了民族自觉

意识的发展。在北意大利的三个最有实力的国家——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中,只有威尼斯享有商人寡头治下的政治稳定。威尼斯提出了在全欧洲建立外交使馆的思想。

佛罗伦萨外交官尼古拉·马基雅维利(1469—1527)撰写了两部著作,《君主论》和《演说集》,它们集中体现了构架近代世界的思想:世俗利益高于宗教利益,权力政治的实现及民族认同的重要性。



# 第三章

#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再生——在传统意义上是对与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新纪元转型阶段相伴随的知识与艺术天才的杰出贡献的称谓。然而，就广义而言，“文艺复兴”是19世纪学者们的创造，当时他们回忆起那强烈绽放的文化之花，想要寻求一个名字来指代它。这个词也经常被扩展至政治和经济领域。

多数学者认同文艺复兴在14世纪左右始于意大利，并在以后的三个世纪中继续发展，其间这股经济的、知识的和文化的潮流还从其故乡最终流向了法国、低地国家、德国、英国，后来尽管其影响力已经消退，但还是波及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到1600年，它实际上已经结束，并让位于一种被称做“巴洛克”的新文化和一种表现古典艺术的新途径。

很少有学者将文艺复兴的起点定在1350年以后。许多人为两个文艺复兴的概念而争辩：其一是古老知识的复兴并以传

统方式传播的时期;其二是新知识产生并通过新媒介即印刷术传播的创新时期——印刷术意味着一个范围更广的社会可以分享和讨论这些变化。还有另外一些学者发现文艺复兴具有三个明显的阶段,大致上与人类的三个年龄段相一致:青春期、成熟期和衰老期。除15世纪更为绽放的文艺复兴以外,还有一种"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不过这个术语可能已经过时了。

很难确定文艺复兴一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照字面解释。古希腊和罗马的古典价值真的在中世纪末期复兴了吗?如果是,那么为了谁?仅是为了有闲又有钱的精英群体要探求古典文化的内涵?或者为了更广泛的人群,尽管是用一种简陋而不明显的方式?这样一种再生能仅仅解释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雕刻家、画家、建筑家、音乐家以及科学家的具有非凡意义的创造性事业吗?直至19世纪中期,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会对上述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

今天这种简单的回答已经不够了。现在,被广泛认同的观点是,一个伟大的基督教文化实际上已在中世纪走向成熟,而古典文化的遗产从来没有在西方消失。此时,欧洲社会逐渐从口传型文化转向印刷传播型文化,从哥特式到意大利式的书写方式,从知识的保存到因印刷力量而达成的知识爆炸。一些历史学家主张文化的再生始于加洛林王朝时代的文艺复兴或以阿奎塔尼的埃莉诺的宫廷为中心的"12世纪的文艺复兴"。但是如果这样,那么在14世纪以前很早就萌生的文艺复兴萌芽就成长了太长时间。

文艺复兴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将许多成就归功于他们的先辈,而且他们经常像其祖先一样具有宗教虔诚和"封建"情结。然而,他们也是唯物论者、怀疑论者和个人主义者。人类试图创

造、行动、研究事物本身,因为他们乐在其中,他们能够从中获得成就感,感觉正在为自身的安全和富裕而努力,而非视之为荣耀上帝和获得救赎的手段。

## 一、货币经济

### 1. 贸易

亚得里亚海和易北河以西的欧洲地区正从中世纪早期以生存为导向的经济转变为货币经济,从一种大量依靠家庭产品的、以物易物的经济,转为一种严重依靠进口商品的、以货币或信用证为支付手段的经济。到 15 世纪,西方长期进口东方的香料,德国矿山的盐或者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海盐饼,以及莱茵地区、勃艮第和波尔多地区的葡萄酒。东欧的皮毛、英格兰和西班牙的羊毛、佛兰德尔和意大利的毛料控制着畅销市场。在中世纪末期,美味食物和御寒衣物的供应是稳步增长的。

贸易在 14 世纪早期的严重经济萧条期间急剧衰退,这同时也是多雨夏季、黑死病及百年战争长期作用的结果。复兴出现在 15 世纪,而且到 15 世纪末为止,西部的贸易已经首次可以在相关种类和数量上堪与罗马帝国、处于巅峰状态的拜占庭以及诺曼和霍亨斯陶芬时代的西西里相媲美。同时,西部的商人也发展出更为复杂的贸易程序和组织。

在 14 和 15 世纪,汉萨同盟("汉萨"在德语中意为"同盟")的成员几乎包括一百余个城市,其中卢卑克、汉堡、布莱梅以及但泽为其领军城市。其政策由各个城市代表会议决定,通常在

卢卑克召开。神圣罗马帝国的羸弱以及许多汉萨城市皆源于自治的边境村落这一事实，使得汉萨同盟能够在实行经济权力之余扮演一个独立的政治和军事角色。

汉萨同盟不是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同盟，伦巴第同盟和佛兰德尔同盟曾分别阻止了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皇帝及法国国王的野心。然而，汉萨同盟的运作范围更广，其船队将波罗的海的鱼、木材、谷物、皮毛、金属和琥珀运送到西欧市场，然后再把布匹、葡萄酒和香料带回来。汉萨商人，在陆上用大车或小型车队将波罗的海的陶器运送到意大利。汉萨同盟在布尔日、伦敦、威尼斯、诺夫哥罗德以及挪威海岸的卑林根等地都有大货栈。这些机构与汉萨帝国的殖民村落非常相像。汉萨同盟本身有自己的法律（卢卑克法典）、外交官和旗帜。

然而，1500 年以后，汉萨同盟的运势迅速衰落。贸易路线从波罗的海向大西洋的转换结束了许多汉萨城市的繁荣。松散的组织结构也无法与沿着波罗的海禁区的边缘成长起来的君主制政府相抗衡。在内部，汉萨同盟受到商人们日益增强的保守性、成员城市之间的对抗以及商业家族间的竞争的削弱。通常只有少数成员派代表去卢卑克议事，而且在危急时刻他们很少能被指望出动人力与武力。此外，汉萨同盟的贸易活动也是以相对原始的方式进行，即通过多数个体商人加入某一单项冒险的临时性商团的方式，而不是建立永久性的公司。

中世纪晚期，真正的大生意可以在奥格斯堡、纽伦堡以及地中海城市中发现：像威尼斯、比萨、佛罗伦萨、米兰和许多意大利其他城市；法国的马赛、蒙特利埃和纳尔旁以及西班牙的巴塞罗纳。威尼斯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研究案例。东西方贸易给威尼斯商人带来了财富：从东方运来香料、丝绸、棉布、糖、染料和定色

的明矾;从西方则运来羊毛和布匹。威尼斯商业的范围是巨大的,从英格兰和佛兰德尔到亚洲的腹地,13 世纪威尼斯的马可·波罗(1254—1324)正是穿过那里抵达中国的。

威尼斯贸易的主要运输工具是一种狭长的舰船。到 14 世纪,威尼斯军械厂(最初是官营的船厂)的设计师将传统的狭长的桨船转变为更快和容量更大的商船,主要依靠帆来航行,而使用桨手来进出港口。在 15 世纪,这些商船可以承载 250 吨货物。15 世纪早期的记录表明,每年约有 45 艘商船从威尼斯驶向佛兰德尔、南部法国、黑海、亚历山大利亚、贝鲁特以及圣地加法。驶往佛兰德尔的船队,提供在意大利和西北欧之间的航运服务,这比陆路更廉价更安全,当然该船队也抵达过伦敦和南汉普顿。

国家负责管理这些商船的活动。因为商船的平均寿命是 10 年,所以政府专家要定期检查它们是否适于出海,而军械厂会做出必要的替代。政府为商船及其货物提供防御,船员中至少要有 20 位弓箭手。佛兰德尔船队的船长还征募内科和外科医生以负责保护船员的健康。威尼斯共和国在英国派驻了一名外交官,以此来为商人铺平道路。

船的设计变化缓慢,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商船到大西洋去冒险,北欧和地中海之间的设计差异消失了。大型中古商船都是装备齐全的三桅船,能够改造成军商两用的大帆船(可以运载大宗货物)、小吨位轻快帆船(可以用来横跨大西洋的船)、大型平底帆船(可以将财宝从美洲带回西班牙)和适于波罗的海贸易的商船,它们最终还可以被改造成北欧小商船,即一种用来运谷物、葡萄酒和明矾,并且后来演变为欧洲商业船队的典范的荷兰船。

伴随这些变化,还有更好的仪表、优化的海图以及对船长而

言更清晰的权威航线。航海的进步将商业世界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加快了运载货物的速度以避免其变质,创建了一个仪器制造组合,并且使绕非洲运载货物的梦想成为可能。在热带水域航行给船体设计、新运载、病理知识以及新财政形式都带来了变化。例如,会腐蚀木质船底的蛀虫,在热带特别活跃。因此,在这些水域的航船不得不经常替换。伴随着航行距离的增加以及进一步运载货物和加快速度的需要,这将导致比从前更复杂的商业安排。欧洲人在驯养马匹之前就已经航行,水上工具是欧洲人占领世界的首要工具。

## 2. 工业

贸易的扩张刺激了工业。佛兰德尔的城市已经在 13 世纪发展起毛纺织业,有许多工人,利润丰厚。在 14 世纪早期,也许有 200 名工匠控制着佛罗伦萨的羊毛基尔特,每年生产近10 万块布料,雇用了 3 万人。

由所有匠人从事制造一件产品的简单基尔特的早期集体实践,已经让位给近代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以及在劳动者阶级内部的技术高超者和缺少技能者之间的分工(和对立)。在 14 世纪晚期的佛罗伦萨,7 大基尔特、14 个小基尔特以及奇奥皮(被排斥在行会之外的雇工)之间的对立非常尖锐。

尽管资本主义日益发展,但欧洲还没有经历一次彻底的革命,而且多数"制造"仍然像拉丁词根所表现的——是一种"手工制作"。但是,少数地方已经发展出具有近代倾向的工艺:产量的提高,标准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以及劳动力的专业化。在卢卑克,汉萨同盟的资本家通过雇用念珠工匠并给他们提供生产资

料促进了玫瑰念珠的大规模生产;在中欧的汉堡,银矿通过将工人分成三班轮换制的小组而发明了昼夜开工;在佛罗伦萨,20或更多不同的工艺加入到羊毛生产过程中——洗毛、梳毛、分摊、纺线等。但是具体工作都依据生产流程转包给小的家庭店铺,这件工作被转至工人家内进行,而不是去工厂完成。

欧洲最大的工业设施可能就是威尼斯的军械厂(造船厂),通常会雇用1000人。这些船械工人构成了一个技术金字塔,没有技术的雇工在最下层;接下来,是为商船切割木材的锯工以及使木船具有航海价值的填缝工;然后,是滑轮工和桅杆工;在金字塔的顶端是技艺高超的木匠,他们给船定型。到16世纪,为船体安装甲板上部结构的过程非常有效率,只用两个月的时间就为抗击土耳其人的战役装备了100多艘船。

### 3. 银行

贸易和工业的扩张促进了银行业的兴起。借贷的风险巨大,但是即便如此也有潜在的利润。在1420年,佛罗伦萨政府曾徒劳地要为利率设立一个20%的最高限度。银行家就是货币交换者,因为只有专家能够在流通中确定数以百计的金属币的相对价值。银行家也提供便利,开展将汇票远距离地转换成货币的业务,他们买卖汇票并从中赚取佣金。信用证意味着尚未在物质意义上兑换的货币证明,它也比金属币安全,因为很容易藏匿起来,然后再由教士或其他不被怀疑之人加以携带。

伟大的欧洲银行家是意大利人。到13世纪晚期,意大利银行家已经成为教皇的财政代理。13世纪,佛罗伦萨银行家族巴迪和佩鲁兹曾经资助英国羊毛进口以及成料的出口。二者的商

号都在百年战争爆发之时预付给英王和法王大笔金钱,而且当爱德华三世赖账时双双倒闭。银行业倒闭的回响包括促使佛罗伦萨政府民主化的新努力和奇奥皮反对羊毛基尔特暴政的起义。佛罗伦萨银行业在克斯莫·美第奇的领导下于 15 世纪重振旗鼓,他的活动包括建立毛纺和丝纺业,美第奇银行及其在威尼斯、罗马、米兰、阿维农、日内瓦、布尔日以及伦敦的分号。然而,分号经理的效率缺失与伟大的洛伦佐的奢华导致了美第奇银行在 15 世纪末的破产。

与此同时,货币和银行在其他地方非常繁荣。威尼斯的达克特金币与佛罗伦萨的弗洛林一同在国际流行,而 1407 年在热那亚创建的圣乔治银行最终接管了西班牙犹太人的地中海事业,这些业务在后者于 15 世纪晚期受迫害之前一直是属于他们的。在法国,布尔日的雅克·科尔(1395—1456)使用私人财产来保住公共官职,当上了铸币厂的老板以及查理五世的王室开支总管。在德国,有势力的银行业家族在奥格斯堡和纽伦堡都很繁荣。最著名的是奥格斯堡的福格(Fugger)家族,其创立者是 14 世纪晚期的一位麻织工兼商人,其子孙从威尼斯进口纺织品和奢侈品,并且开始买进银矿和铅矿。在 15 世纪晚期,福格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银行家,在美第奇银行倒闭后,他又成为教皇的银行家。在 16 世纪 40 年代,该家族的财富可能超过五千万美元。那以后,由于美洲金银的流入结束了中欧的采矿业的繁荣,同时也因为福格过多地贷款给反复失败的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出自哈布斯堡家族),因此,其规模开始缩小。1562 年和 1563 年,加之 17 世纪,该家族的商号曾经破产,每一次都由于西班牙的君主中断赔付所致。

## 4. 城市和乡村

奥格斯堡的总人口在雅各布·富格权势最高的时候可能从未超过40,000人。14世纪的一组评估数字表明威尼斯、佛罗伦萨和巴黎的人口在100,000人左右;热那亚、米兰、巴塞罗纳和伦敦的人口在50,000人左右;汉萨同盟最大的城市以及佛兰德尔的城市人口在20,000和40,000人之间。大多数欧洲人仍然住在乡村。

然而,居住在城市的占人口比例较少的人群却开始给居住在乡村的多数人口的生活带来重要的变化。商人经常将财富投资于农业资产;那些已经在城市中获得利益的贵族通常也会保留其乡村产业;而农民则经常作为工匠移居城市或者成为乡村手艺人。城市的政府有时也会按照中世纪米兰和锡耶纳城市共和国的模式改造附近的乡村,二者都曾排干沼泽来增加耕地面积,从而确保食物供应的可靠性。但是,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每个人都因这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变化而被拉进到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共同体之中。

货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西方的农业体制。货币由于剩余品的交换而日益重要。许多庄园专门生产一种产品,像谷物或羊毛、橄榄油或葡萄,然后再去购买他们不能生产的商品。这些单一农产品庄园主在规模适当时就演变为资本家。那些更富于进取心的人会要求农民缴纳货币租,而不再采取缴纳日用品或劳务的方式。16世纪英国从事养羊的资本家获得了圈地权——在农民可以依据传统放牧自家牲畜的公有地上圈起自己的牧场。在西班牙,麦斯塔牧场主同盟也在捍卫对大牧场的权

力。城市商人希望获得容易买卖、不受封建占有权限制的财产;希望得到不受农奴身份限制、可以随意雇佣和解雇的劳动力。所有这些愿望,加之劳动力的短缺和黑死病给农民造成的动荡,共同导致了农奴制的解体。

因此,在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核心地带,资本家的货币网络正在取代中世纪的等级与义务联合体。普通人不必再成为农奴,而可以通过成为雇工或地租农来挣到更多的钱。然而,他们同时也丢失了一些东西——那种微弱的安全感、承袭的工作和对某块土地的使用权。在城市中,伴随着行会排外的与日俱增和富有的工匠与普通雇工之间差距的增大,社会压力也在增强。

14、15世纪,商人和城市手工业者也进入了所在城市的控制层。全欧洲的城市都见证了一场"革命",其间行会工匠和富裕商人组成联盟,剥夺了地方贵族和政府枢纽机构的行政和司法权。美第奇家族,从前就是一个乡村的织工,他们是城市转换过程的缩影:历经三代人,他们从雇工崛起为银行家及君主,从无公民权者演变为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商人和手工匠人的联盟,在城市的背景下成为可能,逐渐被称为"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这个词,在严格意义上是指居住在城市中的人。现代用法反映了从对居住地的限定到以自己的价值观对经济等级的描述。商人和富有的作坊主吞食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和领主的经济优势。他们也同时改变了艺术品市场和艺术的主题。"文艺复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肖像画时代,大多数肖像画都是资产阶级的,由发达的城市市民委托制作的。各种新型的世俗化主题出现了,产生了艺术家即"天才"的观念,这是一种通过竞争使艺术天才成为可能的观念。

最后,城市精英也开始转变学习地点和特征。私人图书馆,

不仅是君主的，也包括富商和银行家族的，向修道院图书馆发起了挑战，它们经常可以提供修道院图书馆所没有的藏书。美第奇家族就是古典文献的著名收藏家。洛伦佐·德·美第奇将拜占庭的希腊学者带到佛罗伦萨，建立了柏拉图研究院，欧洲人和拜占庭人在那里研究柏拉图文集并将其中的大部分译成拉丁语。这是一种建立在购置和收集稀有的古典文献基础上的学问，而不是以机械的背诵和重复为基础的知识，它强调语言知识重于对深奥教义的掌握，并且传播了一种新的书写体——公证人和文书的书写体——来取代修士的书法。

尽管文艺复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经济转型时代，但却不是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多种因素导致了周期性的经济萧条。商业化的分布非常不均衡，而农业则经历着动力阶段和惰性阶段。国际贸易模式中断了传统经济，使一些社会蓬勃发展，另一些负债累累。就总体而言，繁荣有所增长，但绝非千篇一律和始终如一的。

## 二、印刷术、思想和文学

由印刷机带来的交流变革，书籍作为一种变革力量的重大意义，以及印刷机先于作为宗教改革之源的新教徒起义这一简单事实，都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转变的诸多层面，这一转变也许比其他变化更能界定从中古向近代的转变。人类开始将知识世俗化、具体化，考虑知识的增长胜于发现。由于从抄写向印刷的戏剧性转变，科学调查变得尽人皆知，并且从修道院和富人图书馆的抄写员那里解放出来。

那些强调技术在促进人类变革时的意义的历史学家们，以

及那些认为印刷术的发展也许是在车轮和蒸汽机之间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技术革新的人,也认为文艺复兴在本质上存在两个阶段:在印刷机出现以前的早期文艺复兴和与印刷术的传播相伴的晚期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确有两个清晰的阶段,二者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印刷术是令科学知识的传播成为可能的革命性事件,将科学转化成变革力量,并且拉近了工匠实践与学者理论之间的距离。

在乡村社会引进印刷术要比在城市更为缓慢。也许至多有10%的人会写自己的名字,但一些人学会了字母,并且从印刷材料中学会了怎样记账,一些雇工之子找到了大学之路。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带来了聚会习俗——村民或者农场的家庭每周相聚两三个夜晚,彼此讲述鬼或者狼人的故事,并最终演化为舞蹈和闲谈式交流,也就是交换信息。在16世纪,聚会添加了听说书人讲故事的情节,后者通过参考一些书籍不断扩展其保留节目。某些人——通常是乡村学校的老师——在聚会上为村民读书。《伊索寓言》、《玫瑰传奇》或者是本国的《圣经》都是当时的读物。牧羊人日历,写满了用木刻展示的实用农业建议,也会被大声诵读。

## 1. 本地语和拉丁语

西欧诸国的本地语是逐步出现的,它最初是人们的口语,而后成为流行的写作工具,并最终得到了官方承认。许多地方语言——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和法语——都是从拉丁语中发展过来的,它们过去都是罗曼语(罗马人的语言)。卡斯提尔语,现代文学中使用的西班牙语的核心,在13世纪赢得了官

方语言的地位，当时卡斯提尔国王命令使用该语言做官方记录。在意大利，本国语在文艺复兴以前很少作为文学语言出现，但丁在《神曲》中使用了托斯卡纳方言，而且直到16世纪早期托斯卡纳意大利语才战胜了罗马方言的竞争成为本地语的表达媒介。

在中世纪的法国，出现了两支地方语族：南部法国人讲“oc语”，该称谓源于他们使用“oc”（拉丁文 hoc）来回答“是”；其北方同胞讲“oïl 语”，语言中的“是”用“oï”（现代语言中的 oui）来表示。史诗《罗兰之歌》就是用“oïl 语”写的，而阿奎塔尼的埃莉诺宫廷里的行吟诗人则用普罗旺斯的“oc 语”的形式来吟唱。到1400年为止，巴黎地区的“oïl 语”正日益取代拉丁语成为整个王国的官方语言；而普罗旺斯的“oc 语”最终消失了。“oc 语”的另一分支以加泰罗尼亚语的形式存在，在地中海一侧的比利牛斯地区的西班牙和法国目前仍然使用这一语言。

在德国和英国，其本国语源于古代日耳曼语。13世纪德国的游吟诗人使用中高地德语，即现代文用德语的前身，来编辑诗歌。英语在14世纪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同时，伴随着《码头农夫幻象》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流行，英语也日益成为一种文学语言。

某些地方语言演变为国际语言。在近东地区，由十字军带来的意大利语就变成了一种混合语言，一种最广为人知的西方口语；至17世纪，它逐渐为法语所取代；至20世纪，则为英语所取代。与此同时，拉丁语仍然是教会和学术界的国际语言。学者们勤奋地工作以便使拉丁语更完美，同时在文艺复兴后期，又开始研究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他们之所以被称做人文主义者是因为他们致力于西塞罗规范的人文学，或人学，主要包括逻辑学、语法、历史、诗歌和伦理学。

人文主义彻底改变了对古典遗产的态度。中世纪的教师没有轻视这种遗产；他们崇尚并模仿其形式，但对之加以改变或者使其思想适于强化基督教理念。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用那个时代更为世俗的精神以及更为广泛的古典知识之光改变了中世纪遗产的外形。对古典的崇敬并没有阻止一些人文主义者成为本地语言的积极倡导者；其对立面也同样真实，因为一些本地语作家为了改进自己的写作风格而研究西塞罗的作品。

## 2. 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

在但丁·阿利盖利（1265—1321）的作品中，我们首次发现了即将界定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表达形式。一方面其鸿篇诗作《神曲》在结构上与哥特大教堂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基督教的神秘数字 1 和 3 控制着整个篇章、每一分卷以及每一章节的组织方式——同时他又使用意大利本地语言来写作。而且，这部诗作描绘了数百名人物，每个人物不仅可以用好坏来区分，而且也可以用言语和个性来辨别。维吉尔、柏拉图、苏格拉底以及凯撒都住在地狱边缘，可以通过其古典主义的美德而立刻被认出来，同时也因为被指为品格高尚的异教徒而与基督徒区别开来。这部诗作也探讨了爱：畸形之爱、不当之爱以及神圣之爱。虽然他利用了游吟诗人的比喻，但最终还是表现了西方传统中人类核心情感的最复杂的概念之一。此外，在每一部作品中，他都自觉地使自己的言辞与众不同，力求不卷入传统的权威之中，而是作为一个具有杰出天赋和杰出精神的独特之人在讲话。

对名誉的追求和对古典事物笃定的追求，是其后的意大利文学家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的标志。因

为父亲是佛罗伦萨的一位政治流放犯，小彼得拉克曾经在阿维农的教皇宫廷中住过一段时期，而后又到波伦亚大学研究法律。作为一位专业文学人士，他搜集并抄写古代作家的手稿，制成了第一部准确版的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著作，并且在一座意大利教堂中发现了已经被遗忘的西塞罗的书信，为西塞罗的政治活动增添了新的亮点。

极为讽刺的是，现代所崇尚的彼得拉克的多数作品都不是用其心爱的拉丁文写成的，而是用他最不看重的本地语写给在黑死病中死去的爱人劳拉的爱情诗。在这些抒情诗中，彼得拉克将当时的意大利十四行诗写得尽善尽美——十四行诗的前八行为一组，后六行为另一组，每组都有自己的韵律。因此，几乎无论他自己如何认为，他都被证明是现代意大利语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彼得拉克凭借对古典学的热爱和对世界之美的深沉的情感为正在涌现的人文主义树立了榜样。他批评中世纪的学校教师强调辩证逻辑，将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永无谬误的权威加以依赖，并且专注于细节。但是他敬仰奥古斯丁几乎像敬仰西塞罗一样多，相信前者的宗教信仰和后者的斯多葛式道德可以与他所遵守的唯物主义相抗衡。

彼得拉克的朋友和学生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分享了他对人文主义的评价，却没有分享他对人类进步的可能性的信心。佛罗伦萨商人之子薄伽丘青年时代曾在那不勒斯的法庭待了一段时间，在经过一段在银行界的学徒生活后，他翻然醒悟转而做学问。他学习希腊语，并且资助他的老师搜寻古老的手稿，并在蒙塔西诺的本尼迪克修道院发现了塔西陀的抄本。他的《十日谈》叙述了在黑死病期间躲进乡村别墅的一组佛罗伦萨年轻人所讲的故事。其中的大部分情节并非薄伽丘

原创,他以优雅的文艺性的笔调,一种建立在个人尘世经验基础上的快乐的觉醒,重述了这些人世间的故事。

## 3. 古典学

这一时期文学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古典文化的收藏家,彼得拉克的人文主义式的古典热情的承继者;第二类是以《十日谈》为代表作的使用本地语写作的作家,从 14 世纪末的乔叟到 16 世纪的拉伯雷和塞万提斯;第三类是综合性作家——那种将基督教、古典学以及其他因素融合为一种通用的人类哲学的哲学家式的人文主义者。

15 世纪的那些全身心投入的古文物研究者发现了大量古代手稿。他们遍寻诸修道院,复原了西塞罗、塔西陀、卢克来修以及其他拉丁作家的作品。为了保存、分类和研究这些文字的瑰宝,第一批现代图书馆应运而生。克斯莫·美第奇维持了佛罗伦萨及其附近的三个图书馆,雇用了 45 名抄写员。人文主义教皇们则修建了梵蒂冈图书馆,甚至意大利北部的乌尔比诺的小公爵也拥有一个人文主义的宫廷及一座重要的图书馆。

希腊学者们从拜占庭来到意大利。其中最早的学者之一曼努尔·赫利索罗拉斯(1368—1415)是为了给被土耳其围困的拜占庭人寻求支援,而后便一直在佛罗伦萨和米兰教学。他对文学颇有助益,坚持从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不能只停留在字面意义上,而应该传递其原初的信息和精神。15 世纪 60 年代,伴随着被称为柏拉图学院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非正式学术圈的出现,希腊研究的复兴日臻成熟。然而,希腊语从未像拉丁语一样流行,因为它非常难学,令世人对希腊戏剧的兴趣降低,并导

致多数人文主义者使用拉丁文译本来研究柏拉图。

洛伦佐·瓦拉(约1407—1457年)竭力展现了古典学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罗马和那不勒斯度过的。他性情多变而且好争辩,还用渊博的学识和巨大的勇气来驳斥先贤。他甚至批驳被视为毫无瑕疵的西塞罗的散文,并责难托马斯·阿奎那不懂希腊语。精湛的语言知识使他能够指出拉丁文《圣经》(圣·哲罗姆的拉丁译本)的错误和曲解,从而为人文主义者的圣经学奠定了基础。

瓦拉的声誉首先在于他证实了《君士坦丁赠契》是伪造文件,而后者是教皇宣称其具有合法的世俗统治权的基础。他通过展现撰写赠契的拉丁文和相关事件都发生在君士坦丁之后的数世纪,证实了自己的见解。当瓦拉于1440年发表了这一揭秘时,他正担任阿拉贡国王"雅士"阿方索的秘书,而教皇正以赠契为基础向阿方索的那不勒斯权利宣言提出挑战。

哲学家式的人文主义者不仅向往普遍的知识,而且也向往普遍的真理和信仰。由于受1462年由克斯莫·美第奇创建的柏拉图学院的吸引,他们聚集在佛罗伦萨。美第奇曾将翻译柏拉图著作的任务委托给马西利奥·费西诺(1433—1499),一个转变为古典主义者的医学院学生。他也曾将一些新柏拉图主义者的作品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对基督教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兼容性的强调为费西诺及其学术圈赋予了强烈的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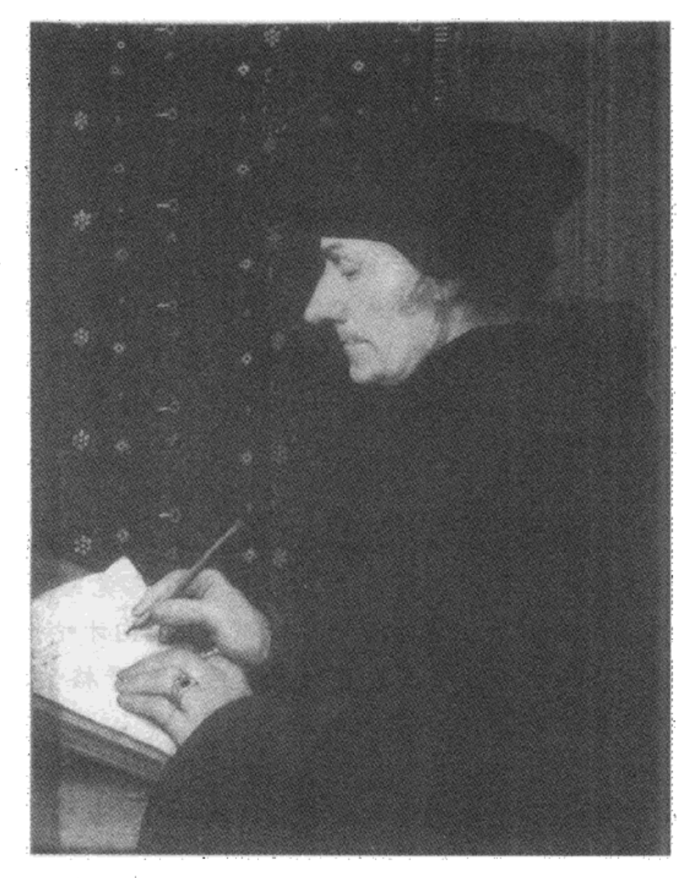
费西诺反对将宗教情感及其表达视为人类的自然本能,仿佛狂吠之于犬类一般。他写道,人类具有被称为"智力"的独特能力。他杜撰了术语"柏拉图之爱"来形容那种超越感官并且有可能会导致与上帝之间的神秘沟通的爱。费西诺似乎正尝试将所有哲学和宗教加以综合。

这种尝试被费西诺的学生乔万尼·皮科·德·米兰德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推进一步。皮科在31年的时间里学习了太多的东西:他懂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他还研究了犹太寓言、阿拉伯哲学以及中世纪经院哲学。皮科的宽容像学识一样广阔。在《演讲录:人的尊严》中,他赞许地引用了占星术士、波斯神学家、阿波罗祭司、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西塞罗、摩西、保罗、奥古斯丁、穆罕默德、阿西西的弗兰西斯、托马斯·阿奎那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言辞。

皮科加之费西诺,对比较宗教学和比较哲学的人文学研究的创立颇有助益。他强化了费西诺关于人是独特的人观点——在世间的物质的世界与永恒的精神世界之间的联系。这个概念是文艺复兴风格的核心。

然而,将之概括为所有智者的推动力的最成熟表达的,是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1466—1536)。最初,他在近代灵修社那里受训,然后到鲁汶和巴黎学习,在伦敦、牛津、巴塞尔和意大利生活期间,他仍然在继续从事研究。他特别喜爱像低地国家中的鲁汶、瑞士的巴塞尔以及莱茵地区的弗莱堡等小城市的氛围。在瓦拉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伊拉斯谟出版了一部学术版的希腊语《新约全书》。他汇编了一系列格言和谈话文章,以便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拉丁文写作的榜样。最具影响力的是其讽喻性的作品《愚人颂》,将愚人的自发的纯良的反应与自诩聪明之人的那种深思熟虑的自私的做作加以对比。伊拉斯谟嘲笑一切自我膨胀之人——商人、哲学家、科学家、朝臣、教士和国王们。

伊拉斯谟将对人性所持的扭曲的观点与对人的尊严的信念结合起来。他将对古典学的爱与对基督徒价值观的尊崇联系起来。他很少使用不切实际的经验哲学的论点,而是不知疲倦地宣



《伊拉斯谟像》汉斯·霍尔拜因绘于 1523 年。(Erich Lessing/Art Resource,NY)

扬所谓"基督教哲学"——贯彻基督的慈善与爱之教义。但是,他的希腊文《新约》唤起了世人对通行的拉丁文本《圣经》以及天主教释经学之准确性的怀疑,而且他对教士纪律松弛的攻击也暗示了教会的崇高形象与腐化现实之间的鸿沟已令人不能忍受。对基督教传统的忠实和人文主义者的信念将伊拉斯谟置于

这样一个位置,只有理性和论证才是唯一有价值的武器。也许因为他寻求一种非暴力改革,所以他也颇受20世纪人文主义者的欢迎。

在法国人弗兰西斯·拉伯雷(1490—1553)的作品中,中世纪的价值观已经飘逝。拉伯雷研究古典学,尤其是柏拉图和古代内科医生的作品,同时也进行医学实践和教学,而且还创造了两个伟大的喜剧文学人物——高康大和庞大固埃。这两个人是巨人,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皆属于英雄的范畴。高康大帮助建立的赛莱姆修道院(Abbey of Theleme)允许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偶尔有非修道体验:

> 他们没有将整个生命荒废在法律、条例和院规上,而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喜好去生活。他们在感觉睡好之后起床;当他们想起并且想要做什么的时候,他们才吃饭、喝水、劳作以及睡眠。……在所有院规和修会最严格的约束中,唯遵守这一条,即做你想做的。*

对拉伯雷而言,自由意志意味着大规模的自我提升。高康大鼓励庞大固埃学习一切。他除了拉丁语以外还要掌握阿拉伯语,阅读希腊文《新约》和希伯来文《旧约》,并且学习历史、几何学、建筑学、音乐以及民法。他也必须了解"鱼类、各种鸟类、所有树种……所有地上生长的植物花草、各种藏于地下的金属"。高康大曾做出结论:"简而言之,让我看到你知识渊博,深不可测。"**

---

* Rabelais, *Gargantua and Pantagruel*, trans. Sir Thomas Urquhart and Peter Anthony Motteux(London: Gibbings, 1901), I, pp. 165—167.

** Ibid., II, 32—35.

拉伯雷非常努力地学习口语规则和其他形式的流行文化。他探究那些使用本国语演讲和写作的人；享受日常生活的狂欢氛围，并且将流行的文化形式与古典知识、神学、医学以及法律结合起来。他借用了民歌、民谣以及德国和法国的诗歌集，很少以传统的方式看待各种类型的读者之间的屏障。他认为存在着一种潜文化，即那些渴望创造自己的文学形式的流浪者、水手以及女性的文化。通过在作品中对这些人的描述，拉伯雷迅速成为一位真正将所有人视为一个整体的人文主义者，一位创造新流派的改革家，同时也是一位能通过语言将学术品质带人流行文化的危险分子。

在某种意义上，拉伯雷将文艺复兴时期生活中的精神与肉体的紧张状态典型化了，因为他对两者都加以利用。他将自己视为“基督哲学”的代表，而后又将这个词阐释为好色、粗俗，甚至淫秽。他尤其解释了农民在大斋节和狂欢节中将这种对立仪式化的过程。狂欢强调饮食、肉体和性，它属于节日时刻，也结束于节日本身。（“狂欢”一词本身就指在复活节大斋前可以食用的肉；同时也指代性意义上的肉体）强烈的欲望符号公开展现在狂欢节上；攻击总是指向动物、妇女和犹太人；而化装服饰的普遍使用使得男人和女人可以自由地转换角色，使混乱无序变得合理，使其行为不受谴责，因为即使从面具下被认出，他们也不是他们自己。

与狂欢节相对，传统的大众文化设立了大斋节，一如老彼得·勃鲁盖尔在名画《狂欢节与大斋节之战》(1559 年)中所表现的。其中，狂欢节被刻画成一名正在暴食狂饮的肥胖男子，而大斋节则被描绘成一位瘦弱的女人，没有食物或者性爱，换言之，被剥夺了最珍贵的快乐。宗教改革家们日益将大斋节与狂欢



勃鲁盖尔的《狂欢节与大斋节之战》(1559年),原作存于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Erich Lessing/Art Resource,NY)

节区分开来,并为了说教的目的而使用了流行的农民的消遣方式。天主教改革家欲修正狂欢节,而新教改革家则要取消它。大斋节的禁欲与狂欢节的纵欲,在拉伯雷的作品中同样彰显。在二者的对立中,文艺复兴时代的多样化生活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在17世纪大斋节的胜利中,自律的宗教改革的成功将得以明证。

## 三、科学与宗教

1948年,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剑桥大学的系列讲座中提出,"科学革命"产生于17世纪。从那以后,许多学者将愚昧的

中世纪与那些像伽利略(1564—1642)一样的英雄人物加以对立,后者曾在16世纪、17世纪勇敢地站出来反对传统与迷信的社会制度,尤其反对天主教会。我们所了解的事实却非常复杂。中世纪的学校教师不仅对保存亚里士多德的文稿卓有贡献,其中的逻辑分类仍然在宣示着科学的思想,而且还将阿拉伯科学和数学引入了西方的课程。我们的数字系统,在效率上比罗马数字显示出巨大进步的数字系统,是在中世纪的西欧即已采用的阿拉伯数字。零,或许是最富概念意义的重要符号,也是通过阿拉伯数字系统进入西方的。

现在,"科学"意味着一种特定的知识,它源于对特定方法的不断应用。这种含义是新近出现的。科学一词本身源于拉丁语词"scientia",名词源于"scio",即一种实践知识,一种技艺。对于多数历史时期而言,"scientia"都是与抽象的思想领域的哲学和神学分开的,也许更重要的,是与思想活动,即哲学家或神学家的活跃思维分开的。

文艺复兴与"科学"的关系是荒谬的。人文主义者收集各种古典文献,其中有伽林关于人体的论文,托勒密的绘图法,也有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但是,他们用近乎对待神明的态度对待这些文献,认为它们在权威性和准确性上近乎《圣经》。他们的批判能力没有用来验证这些文献或古典作家的真实性,而是用来构筑该文献的权威版本。

直到"新世界"以不可阻挡之势证明了古典传统中的缺陷,大多数欧洲学者才转而质疑古典遗产,质疑其前提和结论。例如,托勒密曾经假设已知世界覆盖经度为180度,将地球圆周低估了近四分之一——如果某人想带着有限的食品和淡水横渡大西洋,这一估算将具有特别的意义。

再以伽林为例,他认为血液会从心脏的一侧,通过将器官分隔成两面的厚组织壁上的看不见的小孔,流向另一侧。事实上,正如威廉·哈维(1578—1657)将在1616年展示的,血液通过在周身和肺部循环而从心脏的一侧流向另一侧。伽林关于不可视的小孔的理论阻止了列昂纳多·达·芬奇先于哈维而有所发现;每当其解剖研究导向发现的边缘时,他都逐渐退缩,因为他不相信伽林会犯错误。

达·芬奇(1452—1519)既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成就,也体现了其不足。他并不关心系统的解剖研究,也不关心发表其发现和推测。然而,列昂纳多却表现出了杰出的创造力,绘制了车床、水泵、武器、飞翔器以及许多其他奇妙装置,虽然并非全部可行,然而具有高度的想象力。他几乎对与人类和自然的相关的事物都充满好奇。他激进而准确地描绘了人类的晶胎,这与原有的完美缩微人形式的胚胎概念完全不同。其地质学研究使他相信,地球应该比同时代学者们所认为的更古老。据他估计,波河可能已经流淌了两万年才冲积沉淀成意大利北部的冲积平原。

伴随着"新世界"的"发现"——这种表达准确地捕捉了欧洲人曾经在怎样深刻的意义上接受了古典认知的精确性——观察取得了一种权威性,这在中世纪只是零星出现过。列昂纳多的光学实验——既包括眼睛的工作原理,又包括眼睛在望远镜和显微镜下的工作原理——只是16和17世纪光学理论领域研究的开始。展望未来,文艺复兴时代绘画的"新现实主义"以及荷兰静物画的杰出细部描绘,都开始对人的眼睛及其观察力感兴趣。根据列昂纳多的绘画和笔记,16和17世纪的光学理论家将形成新的人眼功能和光之功能的概念,而16世纪北方的人文

主义者，例如蒙田和拉伯雷，也将把概念问题置于其工作的核心地位。的确，蒙田设计了一种崭新的写作形式，“随笔”(essai)。这是一种很不确定的尝试，他试图在修辞学的意义上反映出自己的见解，即每个人的知识和理解力是密不可分的。或者，正如他在第一次辩论的八年后所力争的观点，人类的知识并非绝对的，并非全然来自对人类经验及其差异的抽象。

在启蒙运动以前，“科学”尚非统一的领域，而经常是人类进行的微小而分散的举动，其中一些人彼此之间有通信联系，另一些人则孤立地工作，无视他人的研究。许多人(并非全部)，普遍地受过古典教育，熟悉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和关于自然界的著作，熟悉普林尼的《自然史》，也熟悉希腊数学。这种教育透过人文主义者的哲学判断力使得他们有能力致力于文献收集，并且绝对尊崇每一部古典文献的最精确版本。许多“探讨”只有在事后才完全被视为解决科学知识难题的人，以及许多解决了这样或那样小难题的人，都是修补者或像哥白尼一样的教士。他们对某一简单问题的经年探索——为什么行星会如此运行？——衍生出思考较大问题的新方法，例如(太阳)系是怎样构成的？但重要的是，要看到个体研究的分散性和方法上的特殊性——缺乏被称为“科学”的界定分明的主干知识。

## 1. 发明、技术和医学

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发明——图书印刷技术——为多项个别进展将促成最终结果的观点提供了一个例证。书籍制造的革命开始于 12 世纪，当时西班牙的穆斯林率先引进了一项由中国人在 2 世纪发明的技术，并开始用粉碎旧织物的方法造纸，将

之用水处理后,再把水从精美的纸中挤压出来。这一新产品的成本只有羊皮纸和牛皮文纸的一小部分。羊皮需要分离才能制成羊皮纸,因此非常昂贵并且耗费人力,而新式造纸过程则迅速而廉价。

当雕刻工人采用另外一项中国技术在木块或铜盘上制作镜像图画,并用它来生产诸多相同的木版画和雕版画的时候,印刷技术下一阶段到来了。接下来是在盘子或木块上添加一些句子来解释图画。最后,活字被设计出来,每个微小的雕刻活字代表一个字母,可以和其他活字一起构成单词、句子、一整页文字,然后再次组合并重新使用。这项重要的发明在 15 世纪 40 年代发展得尽善尽美。昔日因其发明而名声远播的约翰内斯·古腾堡(约 1397—1468 年),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尽管第一部印刷版《圣经》仍然归在其名下,但其他人也可能发明了印刷技术。

这项新发明广泛流传,因为印刷图书不仅比手稿图书便宜得多,而且也较少有抄写员的错误。到 1500 年为止,印刷图书已达数百万册,而仅意大利就有 73 家出版社使用活字印刷。其中最著名的威尼斯阿尔杜斯出版社[依据其创始人阿尔杜斯·曼努提乌(1450—1515)而命名],就出售廉价的古典学著作。

一旦书籍成为易得之物,世界便因此而改变。对多数技术而言,印刷术漫长的进化将有赖于基本元素的稳定发展,即这一个案中的纸张。直至 18 世纪发现了从植物纤维中造纸的方法以前,相对廉价的纸尚未出现。1874 年,碎布纸(这种纸是用亚麻和棉布的碎屑制造的)仍在继续生产,对新纸的急需始于西方对新纸书籍的制造。即便如此,在 1870 年以前,使用木材原浆造纸的技术在瑞典仍不完善。

尽管其他单项发明无法在成效快捷明确方面与印刷术相提

并论，然而许多革新最终还是取得了相同的影响力。例如，同样从中国传入中世纪欧洲的火药，就在百年战争后期战役中加以运用。在航海方面，重要的航海器材也普遍使用，尤其是罗盘和航海图。工程师们还解决了在提炼和熔化银、铁及其他矿石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附有清晰的解剖学插图的印刷书籍的广泛出版，也促进了医学知识的发展。而后，由于部分解禁了 13 世纪颁布的禁止解剖人类尸体的法令，它又得到了进一步优化。由于古怪的瑞士内科医生帕拉塞尔苏斯(即塞奥法斯都·波姆巴斯都·冯·霍亨海姆，1493—1541)的药物化学实验，药物学也有所进展。他驳斥了伽林的疾病论，提出化学药物应该用来治疗特定的疾病。法国外科医生安布罗斯·帕内(约 1510—1590 年)通过发明新技术而为现代外科学奠定了基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使用线来缝合血管，而不再用热烙铁烧灼它们。当然，许多所谓的内科医生还在叫嚣，而且许多医学教师也只是在重复伽林早在一千年前进行的论证。

帕多亚大学的学者和内科医生们是一个惊人的例外。他们坚持科学探究的传统，这预示了实验方法在 17 世纪的胜利。1537 年，一位年轻的比利时人安德里亚·维萨琉(1514—1564)驳斥了伽林关于心脏组织壁上看不见的微孔的观点，因为他根本没有发现这些微孔。1543 年，维萨琉出版了《关于人体的结构》，该书关注了具有解剖学意义的准确和细节，并且带有精心制作的木刻插图。

然而，医学知识的增长不太可能给生命周期带来直接的影响。直到 18 世纪早期，典型的医院手术室——如果有的话——还非常像一间屠夫商店。的确，患者们经常被蒙上眼睛进行手

术,以便他们不会因为看到手术工具而感到害怕,这只是些修改过的屠夫用具而已。像在屠夫店一样,地板上铺着锯末来吸收血水,而且多数手术都包括用锯实施的切断手术。患者被灌服鸦片或烈酒。为了预防手术休克,手术进行得非常迅速,而且可能一半患者会死——或者死于手术本身,或者死于术后感染。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黑死病与习惯上的文艺复兴的初始日期恰好一致。隔离观念于1346年被引入,而关于隔离疾病携带嫌疑者的规则直到1485年才在威尼斯完全被接受。虽然如此,瘟疫一直继续到1720年马赛爆发的最后一次大瘟疫。那种可以掉下老鼠和跳蚤的流行的茅草屋顶,使得感染率极高。从6世纪开始即在欧洲司空见惯的麻风病消失了,这部分是由于气候的变化,部分是由于疾病生存竞争模式的变化。由于肺结核在文艺复兴时期越来越普遍,汉萨病(麻风病的特定名称)的感染链可能已被截断,一如某种前抗体,可以阻止缓慢移动的杆菌与其他杆菌接触。雅司病戏剧性地消失了,而梅毒却在15世纪同样引人注目地爆发了。

社会和经济条件比医学知识更能影响疾病模式。越来越多地使用毛织品,家庭卫生条件的变化,以及发现美洲后在新旧世界之间传染病的自由交换,都改变了疾病和免疫的平衡。例如,旧世界将麻疹传给了新世界,同时从那里带回了异国食物——包括玉米、西红柿、马铃薯——而最终是蚜虫,后者在19世纪80年代几乎摧毁了欧洲的葡萄园。与此同时,城市的兴起、临近社区的成长,以及1500—1700年间全欧洲范围内更便利的交往,降低了毁灭性流行病的概率,因为疾病的频繁循环也刺激了人类的适应性。尽管关于疾病的科学知识有所增长,然而普通百姓还是继续依靠魔法、巫术、炼金术以及占星术来对抗不可预

知的事物，以期寻得护佑。

## 2. 天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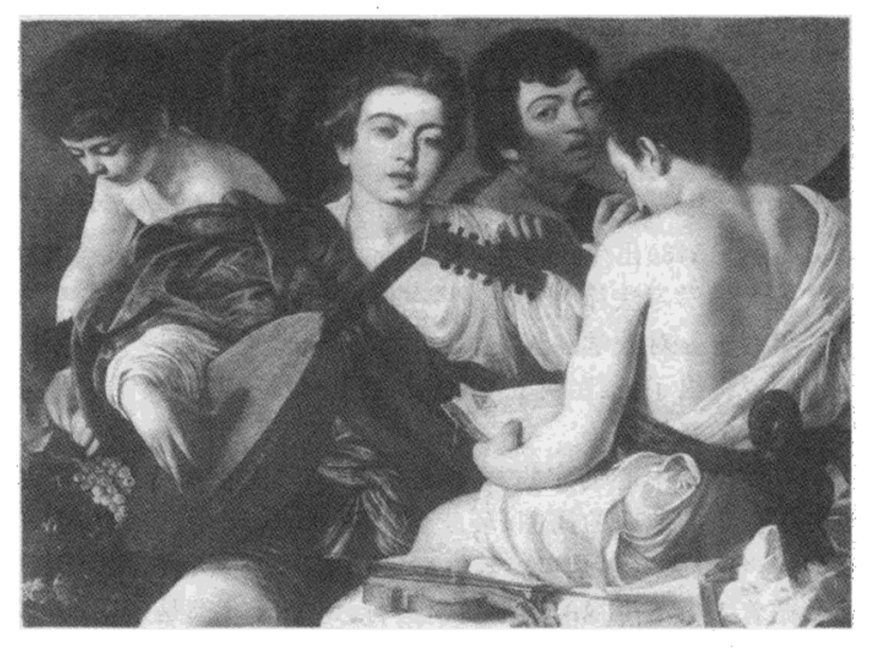
1543年以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为标志。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出生于波兰，有德裔血统，曾在帕多亚和意大利的其他大学学习法律和医学，并在但泽附近的一座大教堂里当了3年教士。对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致使他对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假说提出了批评，并适时地发展了一套宇宙以太阳为中心的革命性的新假说。

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概念囊括了一个精心阐释的天穹系统。在静止的地球的周围，环绕着大约80个天穹，正如从前所认为的，每个天穹都是包容着许多天体的独立的天空，每个天穹都遵循着一个不可视的圆形轨道运行，每个天穹都是透明的，以便世人可以看到其上的天空。这幅宇宙画面在哥白尼之前就已经受到攻击，因为观测者无法使之与天体的实际运行相吻合。哥白尼利用了这些早期批判，加之自己的计算，衍生出以太阳为中心的概念。

哥白尼的假说带有激进的暗示。它指出地球像其他天体一样运行，从而摧毁了有关地球的独特性的观念。然而，即使哥白尼完全颠倒了太阳和地球的角色，空中仍然布满了绕着不可视的轨道运行的天穹，只是现在它们围绕着一个静止的太阳运行而已。

## 3. 音乐

在中世纪的课程中，音乐与科学为伍，因为数学是音乐理论



米开朗基罗·卡拉瓦乔(1565—1609)的《乐师》描绘了乐师及其乐器:鲁特琴、小提琴和短号。(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Rogers Fund, 1952)

和符号的基础。中世纪宗教音乐的支柱是格里高利圣咏,或单声圣歌,它是依赖于单一旋律的诗句。在中世纪末,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的音乐家们发明了复调音乐的演奏技巧,将数个声音和谐地结合在一起。15世纪,当法国和佛兰德尔的音乐家去意大利旅行时,他们带来了复调音乐,并且作为回报,他们也借鉴了在南欧遇到的舞蹈和民歌的流行曲调。交互作用的最终结果,是路易十二宫廷中出现的若斯坎·德·普雷(约1450—1521年)的宗教和世俗题材的复调音乐作品以及梵蒂冈唱诗班指挥乔万尼·巴勒斯特里那(约1526—1594年)的弥撒曲。

文艺复兴的世俗主义、个人主义及其对实验的兴趣，也影响到了音乐。新乐器已经发明或进口：有小提琴、低音提琴，以及大键琴等；此外还有风琴、定音鼓和鲁特琴。安特卫普和梵蒂冈大教堂的唱诗班成员都是领薪水的专业歌手；乐师扈从成为宫廷生活的固定组成部分。德国艺术家，自称为诗乐协会会员，组成了合唱队。音乐已经成为流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国、西班牙、德国、波兰以及英国的小旅店里全都回荡着流行的民歌。

## 4. 文艺复兴和教会

19 世纪，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将文艺复兴的特征概括为“一个世俗的时代”。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学者们已经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之间进行了区分：马西利·费西诺和皮科·德·米兰德拉对古代的隐修主义沉思入迷；而罗伦佐·瓦拉和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则运用哲学知识来阐释《圣经》的深层含义。此外，所有人文主义者都是基督徒：没有人诋毁基督教或拒绝参加宗教仪式。

我们曾经探讨过关于文艺复兴与科学之关系的某些问题。伽利略所受到的耶稣会士训练使他了解了亚里士多德，而他与教会之间的冲突是《圣经》与其所谓“自然之书”之间的冲突，后者即是他用肉眼观察到的一切。《圣经》描绘了一个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但可以找到的观测资料却支持一个不同的理论，一个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然而，伽利略有关宇宙的理论并未使其陷入麻烦，麻烦来自他的辩论，一次关于某物与原子相似的纯理论辩论。其辩论并非基于观察，而是基于思考，进而将天主教会的核心教义“变体说”置于危险之中。天主教之所以视其为异端

思想,是因为接受它就意味着将天主教会构筑的圣餐礼大厦推倒。在圣经主义与思考之间的辩论中,被置于险境的事物太多了。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一个多世纪以来,布克哈特的描述塑造了对文艺复兴的认知,他认为文艺复兴乃“个人主义”的时代,该观点既形成对文艺复兴的理解,同时也构筑了分析 16 世纪的马丁·路德之言行的方法。

学者们都同意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间存在着明确而重要的联系:伊拉斯谟的作品——收集、比较并出版了学术版的希腊文《新约》——本身即是一种表现,人文主义者对语言学和文献学的参与不仅使路德,而且也使数以百计的教会改革的呼吁者的圣经主义成为可能。伊拉斯谟本人是要通过为基督教会提供一部最真实的、因此也是最权威的《圣经》文献,来展现一种伟大的虔诚。但他自己也认识到“圣言”——《圣经》当时的称谓——在质疑各种教会实践时的非凡力量。此外,伊拉斯谟和瓦拉也分享了路德的“反教职主义”,即公开地、明确地批判教士的现行实践与生活:傲慢、无生气、暴饮暴食、无知——在太多方面都偏离了基督在尘世生活中所表现的虔诚的典范。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尤其是伊拉斯谟,与路德的区别在于其对原文献传统的尊崇。路德只赋予《圣经》以权威,视之为检验现行宗教实践、信仰以及教义的唯一依据。伊拉斯谟则对古典文献怀有一种人文主义者式的尊崇,将《圣经》置于人类评论和讨论的背景之下,他直接反对路德,认为任何人阅读《圣经》都必须与其他知识相结合。虽然二者明显地不同,但最终还是强调人的阅读。路德和伊拉斯谟并非在《圣经》的权威性

问题上决裂——二者都对文献的准确性带有一种人文主义者式的尊崇——而是在如何解释它的问题上分道扬镳。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路德的"个人主义"就如同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多，也一样少，但他远不如其人文主义先辈那样认为人类的解释是值得信赖的。

最糟糕的缺点也许存在于教会上层，即教皇本人。在 14 世纪和 15 世纪早期，教皇放弃了罗马去阿维农，然后经历了大分裂危机和议会运动。虽然他又在危难中恢复了权力，但其精神威信急剧下降。在 1450 年以后的 75 年间，一些在政治和军事上颇为成功、并且在学术和艺术上挥霍无度的人登上了教皇宝座。当他们将梵蒂冈图书馆、西斯廷小教堂以及圣・彼得大教堂的前期工程留给后人时，他们也增加了教会税收。在一个需要强力控制和改革的时代，教皇对精神事务的漠不关心使教会更为衰落。

教皇已经步人了长期受到国家事务影响的阶段，最初是德国人，而后是法国人，再后是反宗教改革运动中的西班牙人，而后又接着一个法国人控制的时期，再后又是西班牙。教皇们都依然很有学问，但已经不那么虔诚，而是更富于变化和政治睿智。第一批教皇是讲希腊语的，而后是讲拉丁语的。第一位德国人于 996 年当选，第一位法国人于 999 年当选，唯一的一位英国人于 1154 年当选，第一位西班牙人于 1455 年当选。然而，来自教会以外地区的多样化并不为教皇们所接受，尽管教会刚刚经历了异常巨大的海外扩张。

## 四、美术

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在兴趣与天赋上极富于创意，甚至超

过了当时的作家和该运动的倡导者。他们既能在教会诸侯中，也能在商业巨子、雇佣军以及世俗统治者中找到艺术赞助人。他们以其赞助人、异教神祇以及古代英雄为主题，同时也涉及基督、圣母和圣徒。尽管他们收入微薄，但他们以能成为地位日益提高的画师和创作名人为乐。

艺术家们将绘画和雕塑从建筑的仆从地位中解放出来。对罗马式和哥特式教堂卓有贡献的雕塑、雕刻、群塑和彩绘玻璃通常只是更大作品的一部分。在文艺复兴时代，独立绘画和雕塑的数量稳步上升。

绘画方面的重要进步与明暗法的进一步发展相伴而生，后者强调光影对照，并且对透视的使用越来越多。在文艺复兴早期，画家们作湿壁画或蛋清画。在作湿壁画时，他们将颜料用在一面墙的湿石膏上，所以画家必须在颜料变干之前快速作画；在作蛋清画时，他们将颜料与胶料，经常是数个鸡蛋混在一起，后者使得他们在石膏变干以后仍然可以继续作画，但成品看起来很模糊。油画克服了湿壁画和蛋清画的不足，让画家可以从容不迫地、细致地作画，并且可以确保色彩更清晰、更长久。

如果没有列昂纳多、米开朗基罗以及其他意大利的天才艺术家，文艺复兴可能永远都不是艺术史上的伟大时代。在雕塑层面，它堪与古希腊的黄金时代相媲美；在绘画层面，它将一种十分有限的艺术形式转变一种炫目的工具。不必惊奇为何经常用意大利文来标志这些世纪，14 世纪、15 世纪和 16 世纪(依照字面意义，300s, 400s, and 500s，分别是 1300s，1400s 和 1500s 的缩写形式)。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之都。伟大的洛伦佐资助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约 1444—1510 年)和柏拉图学院的

人文主义者。在其他国度,无论是意大利还是其他地方,宫廷画家们都很平庸。在米兰,摩洛二世让列昂纳多·达·芬奇出任美术大臣和公众艺术的指导。在斯福尔查家族的财富衰竭后,列昂纳多又在恺撒·波基亚、教皇以及法王路易十二和弗兰西斯一世那里找到了艺术赞助。

在艺术赞助人中间,世俗动机和宗教动机相互混杂,这也赋予其委托的作品以某种特征。艺术家对诸多场景都施以相同的技巧,从古典神话,到同时代世俗人士的画像,甚至到圣母像、基督降生以及基督受难这样的宗教题材。经常可以在一幅画中同时发现圣徒和世俗人士。例如,在阿瑞纳小教堂的《末日审判》中,乔托就用与真人相同的比例将该画作的委托人斯克罗弗基尼描绘为圣徒。

赞助人的身份,就像艺术一样,非常复杂。许多赞助人就是想要一幅宗教画来装饰家宅的世俗男女;许多是诸如兄弟会一类的社团或教会赞助人,他们想要一幅与教堂命名相关的圣徒主题画;许多是像羊毛基尔特一样的世俗团体,他们也许希望表达某一特别主题;许多是教皇、大主教以及主教一类的个体教会人士;而且还总是有一些国家,例如佛罗伦萨政府曾委托米开朗基罗制作大卫铜像(与其大理石大卫相对)。赞助人可以而且的确会言明主题趋向、所使用的材料以及成品的位置。因此,商业、声望、地位意识、渴望荣耀某一瞬间以及社会习俗都会影响塑造艺术,并且会依次被艺术家对其委托人的反应所塑造。

文艺复兴的艺术家最初只是将古典的异教主题,例如朱庇特或者维纳斯,描绘成武士阶层的另一个上帝或圣母。后来,他们通过使用古典背景和刻画裸体人物适当恢复了历史感。然而,他们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来世的品质。当波提切利被美第奇



波提切利的《春》,也称做《春天的寓言》。(Scala/Art Resource, NY)

委托画《维纳斯的诞生》(1485 年)时,他使这位女神以完全成熟的模样从一只海贝壳中呈现,天上的气韵多于尘俗,并且将之置于通常绘制基督领洗的氛围中。在《春》(约 1478 年),即波提切利的《春天的寓言》中,主要人物——墨丘利、维纳斯、优美三女神、花神(以花为点缀)以及春神自己(在西风的吹送中)——都是如此的年轻、精致而平和。

列昂纳多·达·芬奇完成的画作相对较少,因为他的科学活动耗去了其大部分精力。此外,其著名壁画《最后的晚餐》(1495—1498)在其有生之年就开始脱落了,因为米兰修道院潮湿的墙壁上的霉菌破坏了他使用的颜料。幸运的是,列昂纳多的天赋及其广泛的兴趣也可以通过其素描和草稿加以研究。素描包括其画作的预备草图、诸多神奇的战争机器、一些涂鸦之作

以及写实的人类胚胎和畸形的病患形象。

在构筑《最后的晚餐》之时，列昂纳多引人注目地背离了从前的认识。他将使徒分成四个三人组，都围绕着核心人物基督。他另一次背离常规在于选择了耶稣宣布即将到来的背叛时的紧张时刻，在于在使徒中间设置了犹大，借助面部表情和身体的姿态传达了后者内心的愧疚以及其他人的惊慌失措。

尽管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1475—1564)以雕塑家而闻名，但也跻身于流芳百世的画家之列，这应该归因于他在梵蒂冈西斯廷小教堂绘制的湿壁画。他在一个巨大的空间绘制了343位独立的人物，并且是躺在脚手架上独自画了四年，有时甚至连夜间休息也不下来，其间只有一位石膏师和颜料师协助他。他从小教堂入口处的《诺亚醉酒》开始，一直画到祭坛上方的《创世纪》而宣告结束。上帝曾反复出现在画卷之中。在水上盘旋的上帝，是仁慈的；给予静止的亚当以生命的或命令夏娃站起来的上帝，是温柔而又居高临下的；创造日月的上帝，是强大的全能的神。

米开朗基罗和列昂纳多都在佛罗伦萨接受过绘画训练，而提香(1477—1576)因威尼斯而闻名，其标志性的鲜艳的红色和紫色也显示着该城市的华丽与壮观。最初，他受雇为该城的德国商人总部绘制湿壁画，然后他又继续画富商肖像、圣母像、教堂和修道院的祭坛组画以及道奇王宫的战争场景。一半以上的意大利的僭主和欧洲国王们都向他支付过佣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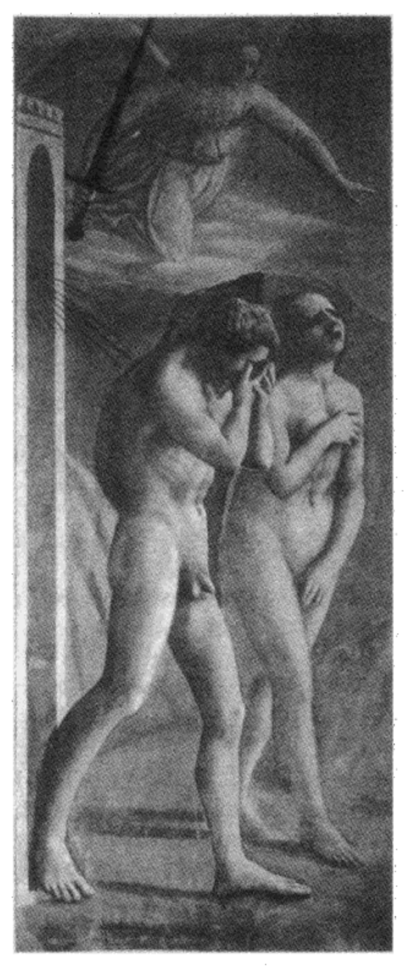
## 1. 北欧的绘画

在北欧，15 世纪的大师们深受哥特式的传统以及提香和其他意大利人的影响。北部出色的画家有两位德国人，阿尔伯

特·丢勒(1471—1528)和汉斯·霍尔拜因(约1497—1543年),以及两位来自低地国家的希罗尼穆斯·博斯(约1450—1516年)和彼得·勃鲁盖尔(约1525—1569年)。丢勒接受了皇帝马克西姆利安的委托,而勃鲁盖尔则接受了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富商们的委托。霍尔拜因完成了亨利八世及其朝臣的肖像,同时也为伊拉斯谟绘制了肖像,极好地捕捉到了这位人文主义者的智慧。

丢勒创造了被称为最伟大的新教艺术:他通过去掉被路德教徒视为天主教的点缀方式,简化了传统的基督教主题。但是这只是丢勒诸多才能的一个方面。他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使他创作了许多以野生动物为题材的画作。其现实主义和充满情感的年迈母亲肖像几乎像是从达·芬奇的草稿本中拿出来的一样,而他对木刻和雕刻技艺上的改进使他能够将自己的绘画大量制作成印刷书籍的插图。

北方的艺术沉迷于怪诞与超自然力。丢勒以一系列木雕的形式呈现了哥特式的风格,这些木雕包括"四骑士"和启示录中的可怕的人物。博斯使其绘画成为图解式的布道,充满了噩梦般的离奇古怪,表明邪恶无处不在,并预示着20世纪超现实主义的技艺与效果。勃鲁盖尔的作品包括会作战的盾形纹章,会飞的贝壳,长着昆虫翅膀、洋蓟形体,以及盘状花头的怪诞的杂糅动物。勃鲁盖尔的其他作品,例如《盲人的寓言》,则对社会公益服务出现以前的人类痛苦进行了现实主义的和感性的评论。勃鲁盖尔还擅长两种被同时代人忽略的绘画。一种是风景画,他的表现全年农耕活动的系列绘画是按中世纪晚期祈祷书的传统来完成的,但是对光的变化和季节的氛围给予了新的关注;另外一种是描绘日常生活中人口稠密的场景以及当时流行的文化的画作——儿童游戏和农民婚礼、舞蹈以及节日等。



尽管该时期宗教主题继续流行，但人物越来越丰满和逼真。在此，曾经在短暂的生命中促成绘画革命的佛罗伦萨人马萨乔(1401—1428)为我们展示了他的《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强烈倾斜的外部光线是为了创造出一种距离感，同时也捕捉到了画中人物的动态和绝望。因为被剥夺了神赠，夏娃哭号着，而且亚当和夏娃都因为已经知晓了邪恶而遮挡着自己的赤裸。没有一个人试图反抗驱逐他们的天使。(Erich Lessing, Art Resource,NY)

## 2. 雕刻

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和绘画密切相关,而且意大利的绘画则将其三维性归功于画家对雕刻的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首位雕刻家是多那太罗(1386—1466)。其雕塑的雇佣兵《帕多瓦的盖特莫拉特》后来甚至成为艺术史上标志性的雕塑。该主题是世俗的,处理手法是古典的。多那太罗创作了自古以来第一座男性裸体雕塑——大卫铜像。然而,与其说主题人物是一个受神灵启示的杀死哥利亚的凶手,不如说他更像一个英俊的青年。而多那太罗的木雕《玛丽·抹大拉》,那平直的头发,粗糙的皮肤细瘦的骨骼,则俨然是一个尽职的圣徒的模样。

另一位天才的佛罗伦萨人安德烈亚·德尔·韦罗基奥(1435—1488),则对这种社会和政治现实主义关心加以拓展。他雕塑的雇佣兵《威尼斯的克列奥尼》,骑着一匹骏马,比多那太罗的《盖特莫拉特》更有动感和活力。雕塑家韦罗基奥,同时也是金匠,列昂纳多的老师,以及建筑学、几何学、音乐和哲学方面的学者,在文艺复兴时代是多才多艺之人中的一员。贝温尤托·切利尼(1500—1571)也是如此。他身为金匠、雕刻师,热爱奢侈阔绰生活,并且还是一部著名自传的作者。切利尼以其资助人中有两位罗马教皇、法国的弗兰西斯一世以及托斯卡纳的梅迪西斯公爵而自豪,后者委托制作了《珀尔修斯》(1553年)雕塑,主人公将把所杀的蛇发女怪美杜莎高高举在头上。

佛罗伦萨委托米开朗基罗制作了大卫的巨幅雕塑。作品中的大卫为裸体,肌肉发达,高16英尺之多,是用另外一位雕塑家所不用的一块巨石雕刻而成。而后,米开朗基罗继续从事雕刻,

达到了自伯里克利时代以来从未达到的高峰。他在解决圣·彼得大教堂的雕塑《怜悯》(约 1499 年)的技术问题时,表现出其独创性。这座雕塑展现的是圣母悼念死去的基督的情景。她坐着,膝盖上面抱着一个无力的成年人的身体。要处理好这样一位妇女的坐姿,难度极大。然而,他成功地做到了。

## 3. 建筑

1546 年,70 岁的米开朗基罗同意出任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总建筑师。圣·彼得大教堂的许多特点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与哥特式的区别开来。哥特式的大教堂的顶部为塔式尖顶;圣·彼得大教堂的顶部为高出地面 435 英尺的巨大而厚重的圆顶。哥特式的建筑窗户宏大,尖状拱门,高抛的拱顶,营造出一种渴望恩典,不为凡俗所缚的印象。圣·彼得大教堂由于其厚重的墙体、坚实的圆柱以及原形的拱门,看起来似乎十分稳固、牢不可破。

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分享了人文主义者对柏拉图完美理念和完美几何形式的热情。安德烈亚·帕拉第奥(1508—1580)是 16 世纪意大利风格的最主要的建筑理论学家,强调按照希腊十字架平面图设计教堂的象征意义。这种设计具有四个等长的臂状结构,与用于哥特教堂的拉丁十字架设计形成对比。这种风格使用一种长臂结构,从而形成教堂的中殿。如果希腊十字架臂状结构的两端为圆形,并且臂状结构之间的空间全部设计为圆形的小礼拜堂,那么,此结构就构成了一个圆形建筑。帕拉第奥本人设计了许多雅致的建筑物。其中有位于威尼斯大运河河口处一岛屿上的圣·乔吉奥·马焦雷大教堂,众多的宫殿、公

共建筑物、别墅以及其家乡维琴察地区的一个希腊剧院。他还著有四卷本的关于建筑的研究著作,后者传播了帕拉第奥风格的影响。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私人买得起豪华的住宅。世人法律意识的增强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意味着一个家庭不再需要成为一个堡垒。精致的别墅点缀着意大利乡村,而在城市,雄伟壮丽的公共建筑别具特色,将商业区和住宅区连接起来,这样的情景今天在全意大利依然可见。

## 五、日常生活艺术

就室内而言,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反映出富人阶层日渐提高的生活水平。较小的房间比中世纪通风良好的大厅更易于供暖。而且家具也开始在补足中世纪的内置床、长凳、食橱和桌子的基础上呈现多样化。尽管椅子仍然留给房宅的主人或重要的客人,但长凳或矮凳越来越普及。箱子通常会精致地着色或雕刻。新款家具用于更专门的目的:用来装新式印刷书籍的书柜(中世纪的手稿一直被置于箱子内)、写字台、珠宝阁以及带有象牙包嵌工艺的微型高脚柜。

胸针、垂饰以及其他形式的带有复杂黄金工艺的珠宝见证了文艺复兴时期上流男女的财富和品位。银器匠精心制作出蚀刻的银盔、银盾以及成套铠甲,后者更适宜炫耀而非军事用途。精美的玻璃器皿非常受人喜爱,尤其是威尼斯制作的工艺精湛的精美器物。富有的和较富有者都有绣花亚麻家饰以及黄铜和锡铅器具。

## 文字记载

### 艺术家的生活

贝温尤托·切利尼以其艺术并且同样也以其自传而闻名。从1558年开始，在佛罗伦萨到处都充斥着宫廷流言，对社会地位低下的画家的攻击以及对切利尼的经常性狂欢生活的渲染。他面对如此之多的分心之事，因此要完成一件别人委托的艺术品，他可能得花上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珀尔修斯》(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之子)用了特别长的时间。这是因为他收到了其他的委托作品，当时的工作条件很艰苦，一些助手的技艺很差，加之其姐夫的去世，这一切常常打断他的正常工作。

当《珀尔修斯》的雕塑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我常常在一楼的房间工作。在此，我用石膏做雕塑的模型，使其具有铜像所要求的大小，并想以此模具来浇铸。但是当我发现以这种方法来进行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时候，特别是当我现在一块砖一块砖地建起了一个可怜的小工作室——那个只能带给我痛苦回忆的糟糕建筑的时候，我断然决定用另外一个权宜之计。然后，我开始了塑造美杜莎的工作，并用铁来做骨架，然后放上黏土。当做成模型之后，进行烘焙。

除了一些小伙计，我没有什么助手。其中有一位小伙子十分英俊，他是一位叫做拉·甘皮塔的妓女之子。我利用这个少年做模特，因为传授这种艺术的唯一教材就是人体。与此同时，由于我不能独自来做一切工作，我就四处找人以便加快进度，但是，我找不到……于是我就一人着手，尽己所能。劳动强度巨大：我不得不日夜绷紧每一块肌肉，而就在此时，我姐夫病了，几天之后，离开了人间。我的姐姐被抛下了，她还年轻，有个

孩子需要我的照顾……于是,我绝望地回到家里,回到我那不幸的珀尔修斯身边,我哭泣起来……三天过后,噩耗再次传来,我的独生子被护士所窒息。这是我一生所从未有过的悲痛。然而,我跪在地上,流着泪水,还是像以往一样由于上帝而迷途知返。我大声叫道:"上帝啊,你给予了我孩子,可是你又将他带走,对于你的一切行为,我都全身心地表示感谢。"这巨大的悲伤萦绕着我,使我失去了理智。然而,按照习惯,我养成了一种必要的优点,能够使自己尽可能地适应环境。……不过,我自信,当我的珀尔修斯完成之时,所有这些对我的考验将变成无比的荣耀与幸福。

Benvenuto Cellini, *The Autobiography of Benvenuto Cellini*, trans. John Addington Symond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Edition, 1942), pp. 382—383, 399—401, 412.

当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照镜子的时候,他们看到外罩着披肩或斗篷的礼服或束腰外衣全部都是用色彩越来越鲜艳的雅致的布料制成。伴随着周浴习俗和贴身亚麻制品的变化,个人的卫生状况也有所改善,身体内的废物被排在室外厕所或室内便桶里。在意大利,餐桌礼仪日益复杂,已经用叉子代替手指,进餐中往桌下扔骨头或其他残屑的习惯也逐渐消弭了,而且容易清洁的瓷砖或马赛克地板也已经使用。在其他地方,变化较为缓慢。在英国,叉子直至 17 世纪尚未普及,而许多房舍的大厅的地板仍然遍布灰尘,有时就用新一层灰尘和芳香植物来消除上一层的恶臭和害虫。

农民可能在黑死病以后生活得比以前要好一些,因为那些

幸存者可以要求较高的工资并用来购买较好的食物，这也包括特殊场合所用的肉在内。然而，到15世纪中期为止，白面包和肉再次成为富人的专用食品，而农民则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劳动力议价衰落再次沦落到食粗面包和稀饭的境地。农田里的劳动者被认为应该是满身泥土，仿佛这就是衣服一般。无论如何，隐私是不存在的，而且甚至富人也在走廊或装饰性的矮树丛内大小便。这个世界是腐臭的。在黄昏降临时，人们就被剥夺了视觉，因为蜡烛非常昂贵。

对富人而言，奢华并非意味着舒适。旅行非常艰难，因为路况恶劣，而且路匪横行。既没有内衣裤也没有肥皂。东方的香水被用来遮掩西方人的体味。男子也像女子一样非常关心时尚，蝴蝶结的大小、袖子的长度、褶皱的自然都很重要。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人们会以一定数目的黑人相赠，并且这能起到重要作用，因为富人都以拥有尽可能多的黑人为时尚。数以千计的奴隶在热那亚、威尼斯、巴塞罗纳、塞维勒以及马赛销售。从12世纪开始，圣莫里斯的崇拜盛行，这是一位在4世纪殉难的黑人。因为圣莫里斯被刻画为一名骑士，贵族给予他特别的关注。在波兰和西班牙，教堂里供奉着黑人圣母像。在威尼斯，自由的黑人受雇为冈多拉手和码头工人，而在整个西地中海地区，他们多受雇为娱乐演艺人员和职业小丑，或者成为被供养的家庭艺人和宫廷及上层阶级以外的另类文化的代表。世人对黑人的态度非常暧昧：中世纪和早期文艺复兴艺术经常将魔鬼刻画成黑人，但黑色也是谦卑和哀伤的颜色。在16世纪，当欧洲人的船队开始探索非洲海岸时，越来越多的黑人开始出现在港口城市。

伽林的医学至少塑造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妇女的典型。体

液论特别假设,女性的身体是由冷湿体液组成的,这种生理学基础被认为是不可预知的行为。一些医学理论家认为子宫界定了女性本质:其存在主要决定了女性的言辞和感知。在说明性的文献中,女性经常代表着过度感性或不稳定,是一种混乱无序的力量。一些关于女性的观点弥漫着对她们的谴责,大约80%的谴责都指向了女巫。尽管类似宾根的希尔德加德和海洛薇兹这样的妇女早在两个世纪前就已经表明了毋庸置疑的阅读拉丁文的能力,并且可以进入学术界,但大学依然保持着男性特权,许多学科,从神学到医学也都是如此。正如一位有学识的女作家,比萨的克里斯丁(约1363—1431年)于1405年所言:"啊,上帝,为何我没有生为男性?"

也许文艺复兴的外在形式与其鲜活现实之间的差异无处可寻,而它就如同各种学者的女性观念与妇女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差异一样明显。早在13世纪,女性就投资于商业。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丈夫而言,女性通常是可信赖的顾问和伙伴。贵族妇女在其管辖的区域内行使更大或较小的权力,这依据一系列广泛而不同的因素而定。在16世纪,文艺复兴最伟大的君主之一,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资助了威廉·莎士比亚等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巨匠。文艺复兴是一个新财富的时代,也是一个以新形式展现财富的时代。发达的商人和工匠的妻子们、公爵夫人们、公主们和王后们——都通过资助人的身份塑造了文学和艺术。诸如阿尔特米西亚·真蒂莱斯基一类的女性艺术家以及像纳瓦拉的马格丽特一样的文学女性,都通过其绘画、诗歌、雕塑和文学作品加入到文艺复兴文化的创造之列。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对妇女在文艺复兴中所发挥作用的本质和程度有所了解而已。

史海钩沉

## 完美的朝臣

据说意大利的巴尔达萨雷·卡斯第里欧尼(1478—1529)是“世上最好的绅士之一”。在许多年的时间里,他解读了文艺复兴时期贵族的行为隐秘。理想的朝臣应该通晓希腊语和拉丁语、意大利诗歌、马术、军事技能、音乐和绘画。他应该像往日的骑士一样,擅长运动,应该擅长狩猎、摔跤、游泳、“打网球”。他还应该接受过演讲和史料编纂方面的良好教育,而且还应该在韵文和散文的写作方面,尤其是使用本国语方面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下文摘自卡斯第里欧尼的作品《完美的朝臣》。

我们也有理由这样讲:老年人能够相爱,而不应受责备,并且可以比年轻人更加幸福。然而,谈起“老年”一词,并非意味着衰老或者是身体的各个器官已经如此衰弱,以至灵魂不能通过器官执行其操作功能,而是说知识于我们正处于其真正的青春年华。我不禁可以这样讲:我认为虽然感官之爱于不同年龄的人并非好事,但于年轻人而言,它应该得到谅解,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是可以允许的。因为虽然它给年轻人以苦恼、危险、辛劳以及我们所言的悲哀,但是,仍然有许多人为了赢得他们所爱姑娘的青睐,他们会有可敬的举动(虽然这些行为并不一定收到良好的结果,但是对其本人却有裨益)。从这一大苦大难,他们可以汲取一点甘甜,通过他们忍受的不幸,他们最终可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因此,正如我认为这些按理智能征服自己的欲望和性爱的年轻人非常可爱,我同样可以原谅这些年轻人,他们由于人性的弱点产生了感官之爱,但他们却使自己战胜了它:假如在这种爱中,他们表现出绅士们所倡导的温柔、

礼貌、自身的价值以及其他贵族般的品质。又假如当他们不再年轻之时,他们能完全地放弃这种感官欲望,将之作为攀登至真正爱情的初始阶梯。但是,如果甚至当他们年迈之时,他们的欲望之火依然藏于冷淡的内心,任强大的理智屈从于柔弱的感觉,那么,也不可能说他们应该受到多少的责备。像没有感觉的白痴,其丑名只配与无理性的动物为伍,因为其感官之爱的思想及方式与成熟之年龄极不相称。



对妇女日常生活而言,文艺复兴时代的性别学并不像它们在政治论文中那样重要。夫妻之间的理想关系是对清晰表达的期待中的君臣关系的模仿。一个"有序"的婚姻就好比一个有序的国家,彼此间的关系并非依据优势而论,而是依据自然秩序,丈夫的权威不是力量和诡计的产物,而是因理智和马基雅维利所谓"美德"而生的自然权威。文艺复兴就如同中世纪一样保留了一个十分等级化的社会,其间"自然"和上帝决定了世界:在每一场婚姻、每一个家庭、每一家族、每一城市以及每一国家中的正常秩序之中。

## 六、本章小结

学者们曾经讨论过文艺复兴的本质及其产生的时间。然

而，多数人认为它始于约 1300 年的意大利，并且一直持续了约三个世纪之久。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精神迸发不仅以对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兴趣的复活为标志，而且也应归功于中古时期的基督教文化。

在文艺复兴期间，西欧经济从一种以易货贸易为基础的经济转变为货币经济。船只设计上的改进和更优良的航海仪器的使用促成了海上运输贸易的勃发。工业，尤其是纺织业，金属制造业以及造船业也获得了发展。

资本主义的早期形式，诸如大规模生产和生产的专门化已经出现。为了支持日益增长的贸易和工业，银行业迅速发展。国王、教皇以及商人都从意大利银行家那里借贷了大笔资金。类似德国的富格尔一类的银行家族获得了权力与财富。

城市扩张给周边居民带来了巨大变化。货币经济导致了庄园中商品作物的增长以及地租的货币化。各阶级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因为金钱取代了中世纪以等级和服役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此外，作为新商业阶级，资产阶级兴起并慷慨地支持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及艺术。

在文艺复兴期间，尽管拉丁语依然是学术语言，但本地语文学或流行文学已经出现。印刷术的发展导致了一场交流革命，其间印刷书籍演变成为一种意义深远的变革力量。

彼得拉克印证了文艺复兴时代新旧语言的混合。在法国，巴黎地区的语言取代了拉丁语成为官方语言。

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们，像揭露了《君士坦丁赠契》为伪造物的罗伦佐·瓦拉一样，搜集、保存并研究古代手稿。一些人文主义者寻求将基督教和古典传统加以混合，以期有益于创建宗教比较研究和哲学比较研究。其中的伊拉斯谟就将所有人文主

义的、语言学的以及哲学的专门知识集中于《圣经》文献上,促成了希腊文版的《新约》的诞生,而后者被证明是在其有生之年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基石。

古典学著作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的流入,对古典科学和数学的研究,同时也包括对古典哲学、历史学和诗歌的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1492年,托勒密的权威,同时也是希腊罗马自然史的权威,无可挽回地弱化了,因为欧洲人完全陷入了亲眼目睹之实与古典传统所教授的事理之间的矛盾。列昂纳多·达·芬奇在诸多方面成为了文艺复兴学者的缩影:虽然他探讨了我们现今认为是科学范畴的问题,但是其观察却没有导向与古典传统相对立的结论。

伴随着15世纪40年代活字的完善和印刷机的改进,书籍变得越来越便宜,而且也很少有字误。许多特殊学科都有印刷手册可以利用。

哥白尼通过提出太阳中心宇宙说而于1543年掀起了一场天文学革命。在150年间,哥白尼的革命又为伽利略和牛顿的努力所确认。

音乐反映了文艺复兴时代对世俗与个人方面的强调。新式乐器被制造出来,而音乐也同时变成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大分裂毁掉了教会的威信。此外,教会为支持奢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所形成的税收重负和对改革需求的漠不关心,都使教会受到公开抨击。

在美术方面,创造力的流露发生在绘画和雕塑领域。波提切利、米开朗基罗、列昂纳多以及拉菲尔在具有文艺复兴气质的教皇和统治者中找到了资助人,他们所创作的作品反映了世俗与教会主题的融合。

在 15 世纪,北欧画家诸如丢勒、霍尔拜因、博斯和勃鲁盖尔受到哥特艺术和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影响。其作品中明显表现出怪异和超自然因素。

许多一流画家,诸如米开朗基罗和切利尼,同时也是雕塑家和其他方面的艺术大师。文艺复兴建筑的伟大作品是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屋顶冠以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巨大穹顶。

尽管并不舒适,但富人享有奢侈,而农民的日常生活却一直没有太大变化,而且直到 19 世纪都一直如此。那种奢华包括了世俗人士对艺术和音乐前所未有的资助,其中妇女尤其越来越有影响力。在一个女性摄政的时代,出现了像凯瑟琳·德·美第奇、玛丽·都铎或伊丽莎白一世一样的女君主,却有许多论文将"女性"描绘成本性混乱无序、不可预知和不稳定的个体。文艺复兴的自相矛盾也许最好这样展现:即使最有知识的男人将"女性"描绘成在智力、自律及道德方面不如男性,我们依然可以听到更多的女性声音,看到更多的女性在文艺复兴时代的表现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



# 第四章

## 探险与扩张

在15世纪，葡萄牙率先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欧洲扩张，它依次将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荷兰、英国以及法国的商人、传教士、冒险家、殖民者和水手带到全球的各个角落。欧洲人所谓的“已知的世界”——就是他们所知道的世界——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外扩展。在荷马时代，“已知的世界”的范围只相当于东地中海。当罗马人把这一世界扩张到不列颠，并且向东抵达当今德国，向南进入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时，世界就以地中海为中心了：这片水域因此而得名。虽然中世纪的探险没有使欧洲人的自我认知产生多大变化，但是中世纪晚期的技术变革和绘图法的引进，却使15世纪晚期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人们借此“发现”大西洋原比任何“已知的”任何水域都要宽广，同时更令人震惊的是，人们发现它还被另外一个大陆所围绕。

## 一、西方的扩张

西方人并非首批跨越辽阔的水域进行移民的民族。甚至在维京人于大西洋中航行之前,玻利尼西亚人就已经定居于遥远的太平洋诸岛。但是,玻利尼西亚人以及其他早期移民并非扩张中的群体,他们是成群地迁移中的个体。西方的扩张却有所不同。从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早期扩张开始,他们就留有记录、绘有地图,核心家族始终与其殖民地的旁系保持着联系。

始于 15 世纪中期的近代西方扩张,不同于将古代近东文化传播至西欧和北欧的那些扩张,这体现在如下四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近代扩张速度更快、范围更广。整个世界的多数地方都在 1450 年后的三个世纪内展现在欧洲人的眼前。第二,近代扩张是西方社会首次跨越大洋。古代和中世纪的西方航海都是沿着狭窄的海域和海岸线航行。而在近代,西方人横越了大西洋和太平洋,远离陆地的保护,一次就达数周之久。第三,这种扩张使西方人超越了从前熟悉的与拜占庭人和穆斯林人联系的轨迹,而进入到与一些令人困惑的种族、教义和文化相联系的轨迹中。第四,欧洲填补了优越的物质和技术力量的空白,这使得西方社会能够将其影响延展至世界各地。该空白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拥有各种轻武器。

欧洲人征服世界的力量是科技和经济力量的融合,同时还要加上允许优秀的军事企业存在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物质优势被几个具有竞争力的西方国家所运用,每个国家都相当愿意武装和组织本国国民以对抗其西方竞争者。北美的法国人武装当地人对抗英国人,而英国人又武装他们对抗法国人。在远东,英国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还有后来的德国人和美国

人,都密谋对抗另一方。西方的优势是如此明显,以至于竞争对手都在刺激和加速扩张的进程,而没有人推迟它。

当然,扩张的动机各式各样。虽然执行扩张的人经常被贪婪、对本国命运的彻底失望,或对新事物的热情所鼓动,但是他们也自信自己是在为上帝做事,他们带来了一种更美好的生活方式。帝国的形成通常归因于四个主要的动机:人类对荣誉的渴望、为上帝服务的愿望、对黄金的热望以及为了实现上述三种目标而控制某些地区或资源的战略需要。虽然个别的帝国缔造者首先拥有了其中的一个动机,但所有动机都是一致的。

磁性指南针使海洋航行成为可能。没有指南针的时候,早期的水手一直非常无助,除非天气晴朗,太阳或星星可以当做向导。到 15 世纪,不仅有了更好的仪表和更好的船只定位的方法,而且造船者能建造比地中海的传统船只更长、更窄、更能长时间抵挡海洋巨浪的船只。

此外,由于原有的近东航线为土耳其人和意大利人所控制,所以,伴随着大西洋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势力的崛起,其商人便寻求通往印度的新航线。倾向于从经济学角度解释发展的历史学家还提出,欧洲人发现了新世界是因为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的侵略动力使他们走上了扩张的道路。然而,欧洲人的探险也是以实证科学的新精神为指南的。

近代早期探险和殖民的连续性、计划性以及科学性,与较早年代航海的零星性、无计划性和神秘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口传文化中有很多早期航海故事。腓尼基人的、爱尔兰人的、挪威人的、威尔士人的和法国布里多尼的渔夫的故事,都被认为对美洲的"发现"有所贡献。在前哥伦布时代的"发现"故事中,维京人于 1986 年抵达北美大陆的故事,比较具有坚实的证据支持。

欧洲文明
伊斯兰文明
印度文明
土耳其帝国
远东文明
鼎盛时期的蒙古帝国，1259
約1250年的其他农业地区
食物采集者和狩猎者
1552年前的航行发现
战场

欧洲大航海与文明的碰撞

毫无疑问,挪威人曾定居于冰岛。他们在格陵兰建有村落;他们在北纽芬兰的安斯梅多大约建有1000个定居点。其英雄传奇将之归功于雷夫·埃里克森曾经抵达温兰德,那里几乎就是沿着现在的新英格兰或加拿大海岸的某个地方。然而,即使数以百计的欧洲人先于哥伦布抵达新大陆,他们也不会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建立永久的联系。他们并非是由盼望完整报告的国家或商人们所支持的探险家,他们尤其不为社会或科学目标所驱动。

## 二、向东航行到达印度

纵观欧洲帝国的成长过程,其明显趋势是:一个国家往往只统治百年左右便衰落下去。15世纪和16世纪,主要由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来统治;17世纪,则由荷兰人统治;18世纪,由法国人统治;19世纪,由英国人统治。第一个登上政治舞台的是葡萄牙。

### 1. 亨利王子和葡萄牙人

葡萄牙的亨利王子(1394—1460)是一位闻名的"航海家"。他虔诚地信仰宗教,其航海或许一直是被宗教欲望所驱使,因为他想使印度和远东的人们皈依基督教。事实上,许多西方人都相信这些远方的人们已经是基督徒了,而为了灵魂真正得救,他们只需与罗马天主教建立直接联系。

亨利王子及其伙伴想要促进葡萄牙的贸易、国力和基督教的信仰。他们认真着手这一工作,频频派遣装备精良的探险队。他们的船只发现了马德拉群岛和亚述尔群岛。这些大西洋岛屿

当时无人居住。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人大约于1420年首先开始定居。

向南推进的进程主要是沿着非洲荒芜的沙漠海岸线逐渐展开，那里是撒哈拉沙漠与大西洋交会之处。直到1445年，葡萄牙人才向东越过了佛得角。亨利本人是否认为以适当的技术可以环航非洲，不得而知，但是，根据传说，腓尼基人环航过，希腊—罗马地理学者也提出非洲为海洋所环绕。问题是遇到大风和洋流，返航几乎不太可能，除非能在大西洋中将一个巨型的弧状航线分割成小块，而且船只——用阿拉伯和地中海的工艺建造的船只——也能够改进得足以抵御这样的海水。

亨利王子死后，葡萄牙人于1472年抵达了喀麦隆附近的西非凸出部分的一端，并且沮丧地看到海岸再次向南延伸。但是，在皇家赞助的激励之下，他们继续前行，终于在其后一代人中，有两位伟大的探险者完成了这一任务。1488年，巴塞洛缪·迪亚士(1450—1500)在航行时被强烈的暴风雨带到远远的南方，在向东北转弯后，发现自己已经绕过了一个大大的海角，这就是后来的好望角。在他之后，瓦斯科·达·伽马(约1460—1524年)于1497年乘4艘船出发，前往印度。他沿非洲东部海岸向北航行，很快来到了阿拉伯人的贸易区，那里的人非常熟悉通往印度的航线。达·伽马在一位领航员的安全引领下，终于在离开里斯本后的第10个月零14天抵达了印度卡利卡特的马拉巴尔海岸。从此，葡萄牙人拥有了一条通往东方的航线。

1500年，佩德罗·卡布拉尔(约1464—约1520年)沿着达·伽马的航线出发前往印度。但是，葡萄牙人到如今已经习惯于在宽广的海洋上进行远距离航行。卡布拉尔从非洲凸出部分继续大胆向南航行，然后向西，在南美大陆突出的部位登陆，

这就是现在的巴西。他立刻派船前往葡萄牙宣布他的发现。6年前,根据1494年签订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西班牙和葡萄牙一致同意沿亚述尔群岛以西大约1000英里的南北分界线分割他们新发现的陆地。这样,巴西东部就落入到葡萄牙的势力范围之内。

然而,葡萄牙的主要推进进程依然是面向印度和远东。紧随探险家之后的,是受国家资助和保护的商人。他们的目的是建立对新发现大陆的贸易垄断。早期葡萄牙帝国主义的伟大人物是1509—1515年印度群岛的总督阿方索·德·阿尔布科尔科(1453—1515),在其领导下,葡萄牙人在印度的果阿创立了贸易中心。从果阿,他们组织了有序的通往东南亚和中国的贸易线路。到1577年,他们已经在广东附近的中国沿海澳门建立了基地,并开始和日本人进行贸易。

## 2. 文明的新碰撞:非洲

两个新的世界就这样对欧洲开放了。他们不同于欧洲,甚至彼此之间也不相同。非洲气候湿润,人口相对稀少,按欧洲的标准,他们被认为是贫穷的。印度、中国以及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人口稠密,大量财富积聚在少数人手中,而且还有欧洲人梦寐以求的香料、丝绸以及其他大量的名贵奢侈品。因此,虽然欧洲人在西非建立了许多海岸据点,并且很快就展开了繁荣的奴隶贸易,但是,非洲还是被暂时弃置一旁。

非洲大陆西突出部分的诸多部落,早已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中世纪的加纳控制着比现在的面积大得多的地区,直至11世纪,才被来自北非的穆斯林人侵者所推翻。当葡萄牙人抵达

西非的时候,其部分内陆地区是由位于尼日尔河上游的、以廷巴克图为中心的马里帝国所控制。由北非贸易者所组织的商队来到廷巴克图购买黄金和奴隶,并出售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商品。

在中非和南非的内陆,有一些政治上非常复杂的部落国家,尤其是在津巴布韦和刚果人、卢巴人、隆达人以及库巴人的各王国中。但是这些文化鲜为欧洲人所知,后者仅凭他们在靠近海岸地区所遇到的情况判断非洲,而海岸地区的族群关系远非那么复杂。内陆地区的文化与欧洲文化截然不同,以致很少有欧洲人曾努力了解过它们。欧洲人当然也不会采取太多措施去破坏土著文化。除荷兰人于 17 世纪开始定居的非洲的南端以外,直至 19 世纪的合并与瓜分运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才直接遭受到殖民主义统治。

### 3. 印度

数千年以来,印度一直处在对欧洲联系的边缘化地带。在整个中世纪,阿拉伯人成为贸易的纽带,而 16 世纪,西方和印度之间的直接联系建立起来,并且再也没有中断过。

当葡萄牙人抵达印度时,穆斯林侵略者正在巩固其统治。穆斯林帝国被误称做"莫卧儿"(蒙古),因为其统治者是来自中亚的土耳其人。它对印度南部地区没有什么威胁,欧洲人首先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据点。当地的印度统治者,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印度人,都愿意获得欧洲人许诺,帮助他们对抗另一方。欧洲列强发现,不仅能够很容易地争取到印度的王公的支持,而且还能轻松地征集和训练当地的军队,使其在葡萄牙、法国、荷兰或英国的旗帜下作战。



这幅16世纪晚期的印度莫卧儿帝国的绘画，展现了葡萄牙海军雇佣兵对当地人的袭击场面。一个士兵在炎热的天气里顶盔束甲。一艘船正运载着供指挥官着陆后使用的战马。由于这幅绘画并非出自西方人之手，因此就东方人如何看待西方人这一问题，它可以提供一个清晰的概念。(The British Library/The Heritage Image Collection)

在德干高原地区的一些较与世隔绝的地方或半岛的南部，居住着一些在欧洲人看来似乎刚走出石器时代的部落。其中，位于北部边缘地带的是武士部落，他们非常像从中亚高原侵略欧洲的部落。在印度河谷、恒河河谷以及德干高原的富庶地区，生活着一个富有的、人口稠密的群体，他们在文化上基本上是印度教徒——虽然当欧洲人到达的时候，他们在许多地区仍然为穆斯林侵略者所统治。

印度社会是早期土著居民与北方侵略者相融合的产物。然而，关于印度的早期历史仍然有争议，而且虽然入侵明显发生在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1200 年之间，但是人们对入侵者的数量或来源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根据印度等级制度的规定，世间男女将按其出生情况被终生固定于一个封闭的群体，从事特定的职业，拥有固定的社会地位。印度有一千多个世袭等级，外加一个没有等级的、位于社会底层的“贱民”阶层。统治集团由两个主要的世袭种姓组成，即婆罗门或祭司阶层，以及刹帝利或武士阶层。第三大种姓吠舍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职业或行业而划分。理论上，不同种姓成员之间禁止通婚，但随着社会的变迁，这一点亦有所改变。

祭司种姓婆罗门享有特权。婆罗门信仰是对来世信仰的强化，主张避免尘世生命的邪恶，通过神秘的、苦行式的否定来寻求获得解脱。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灵魂轮回的教义，即有罪的生命将会像更低级的动物生命一样转世，而积善业的生命，将至少以印度人相信的某些形式，完全超越肉身，并与至善合一。正统婆罗门教要求一系列严格而复杂的仪式，但是在平民中间，该教从早期就延续了一种复杂的多神体系——按照后希腊的欧洲标准，其男神与女神们都是世俗化的。与世俗主义相对，在公元前

6世纪,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宗教领袖佛陀乔达摩。虽然佛教接受了婆罗门教关于尘世邪恶的基本观念,但是它在苦行而非遁世的生活中、在仁慈与善举中找到了解脱之法——即进入安宁的、超越生死轮回的涅槃状态。

尽管佛教已经在印度消失,但是它以强大的力量传播至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在这些土地上,它以两种形式存在。在中国和日本,大乘佛教依旧强调一种与人性相符的佛愿,即要让人人都能够抵达涅槃。在东南亚和锡兰(今斯里兰卡),则盛行小乘佛教,它在理论上更加依赖仪式,其僧侣是完全与世隔绝的。

## 4. 中国

中国也抵御过西方。每当与欧洲人或由欧洲训练的军队、舰队发生正面军事冲突时,中国军队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也被迫向欧洲人作出许多让步——开放通商口岸,而且尤为重要的是,给予对方治外法权,即欧洲人在中国领土上犯罪可以在其本国的法庭受审的权利。然而,与印度不同的是,中国从未被某一个欧洲强国所吞并,也从未丧失其主权。

正如地处辽阔的欧亚游牧地区边缘的其他文明一样,古老的中国文明也遭受到游牧部落的周期性的入侵。正是为了抵御这样的入侵,长城才于公元前3世纪应运而生。基本上,中国人的文化没有受到胜利的游牧部落的破坏,游牧部落通常在几代以后被融合。早在17世纪,女真部落就建立了自己的政权。1644年,攻陷北京,建立了清王朝,一直延续到1911年。但是,正如从前的其他外来者一样,满族人并未对中国文化产生什么影响。

中国的历史充满了朝代兴衰更迭。它既有高效的中央集权时期，也有封建割据时期。它经历了战争、瘟疫和饥荒，同时也经历了中国文化向中国南部，越南、朝鲜和日本的渐进传播。文化的变迁与连续性并存。中国社会生活的基层是以家庭、祖先崇拜以及辛勤耕作的传统为纽带的村社组织。皇帝，即天子则位于社会的顶层。

管理该庞大帝国的事务都落在官员，一群官僚知识分子，或者说至少是一群通过了文学和哲学典籍考试的知识分子身上。官员统治这个国家上千年，其存在是中国社会超级稳定的原因之一。虽然在理论上，该阶层对所有人才敞开大门，但是除了少数有才华的、幸运的和坚持不懈的穷家子弟之外，这种必备的教育对普通人而言太过昂贵和艰辛。

在中国，上层社会对玄学和来世几乎不感兴趣。他们注重现世，关注人际关系，关注进退得宜。传统的儒教是其行为和道德准则，而不是一种宗教。孔子（公元前 551 年—公元前 479 年），这位活跃于公元前 5 世纪的圣贤，是一位道德家，他向君子传授一种节制、谦恭与服从的伦理秩序。最令像耶稣会士利玛窦这样的欧洲人感到挫败的是，中国人对西方的观念和制度一直不感兴趣，这也许是受到孔子的影响。

## 5. 葡萄牙帝国的兴衰

葡萄牙人在非洲、印度和中国沿岸建立了一系列贸易站点，并升起国旗以表明这些领土已经被葡萄牙皇室所兼并。这些站点经常被称做代理商行，并冠之以代理商或商务代办的名字，后者驻扎在那里与当地人进行贸易。葡萄牙人提供枪支、刀具、廉

价布料、与新技术相关的各种惹人喜爱的物品。作为交换,他们得到了黄金和白银、胡椒和别样香料、丝绸以及其他奢侈品。在巴西,他们最后还得到了诸如棉花、烟草及蔗糖一类的原材料。

有两条指导性的贸易原则几乎为当时每一位欧洲人所接受。首先,在这种贸易中,宗主国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一方,并且提供产品和服务,而殖民地则生产原材料。其次,其他欧洲民族将被排斥在这种贸易之外,他们不能直接与殖民地交易或分享宗族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大体而言,葡萄牙人遵循一项重商主义的政策,该政策所针对的不是个体商人,而是一个中央调控的商业或贸易系统,后者为了帝国的利益,通过展现对船只、贸易和生产的权威而进行管理。

对殖民体系而言,军事力量是基本的保证。规模较小的陆军不仅能够使"土著人"处于控制之下,而且可以抵御来自贸易站点的欧洲竞争对手。庞大而有效的海军对于保护殖民国家的海上航线同样是必不可少。海盗经常是海军的一个非官方助手,被称做武装民船,只用于对付敌方或中立国的船只。

葡萄牙人很少定居在炎热的非洲海岸或印度和远东的人口稠密国家,他们也没有试图将这些人口转变为伪葡萄牙人。许多当地居民应征入伍,或被用做家庭服务,抑或在贸易站点作为办事员,在不放弃自己语言的情况下,他们不可避免地学点殖民国的语言及其文化。但是,无论在非洲部落,还是在印度人和中国人中间,欧洲化过程进行得极其缓慢。葡萄牙人尽可能把从前的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留下来掌管当地权力。当地的贵族阶层垄断了多数有限的欧洲商品。西方的东西很少能够触及老百姓,或者是吸引他们远离其传统的方式。

也有一个例外。葡萄牙人的确曾经试图使其遇到的当地居

民皈依基督教。其中一些努力甚至包括武力，例如在印度的果阿，葡萄牙人就拆毁了所有寺庙，使人无法再去进行传统的宗教实践。从最初，早期传教士就低估了即将遇到的障碍。在某种意义上，许多传教士部分地改变了自己的信仰。或言之，他们逐渐附属于被传教者，并且使自己相信这些人几乎就是基督徒了。

从一开始，麻烦就在传教士与商人及殖民官员之间产生了。前者渴望保护他们眼里的那些传教对象，而后者则受物质利益的驱动而要剥削当地人。对于地方官员和君主而言，皈依者是潜在的叛逆者，他们很可能比忠于统治者更甚地忠实于西方人的信仰。对于传教士而言，金钱和人力一直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因为有如此之多的人需要改信基督或即将皈依，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力和物力却十分有限。从统计层面来看，促使印度和远东地区皈依基督的努力并没有给人以多大的影响，至 1600 年，有不到一百万的人皈依。传教士最大的成功往往发生在佛教地区，然后是腐败的国度，而最失败的地区则为伊斯兰教地区，因为穆斯林很少放弃其信仰，皈依其他任何宗教。

不久，葡萄牙人便不得不屈从于新的竞争对手。其银行业、商业模式、创新性皆不能胜任与富于侵略性的，正在扩张中的西北欧强国之间的竞争。虽然他们垄断了东方的胡椒进口，但是他们在把胡椒分销到欧洲市场时依然要寻求安特卫普的更专业的商人团体的协助。他们在东方贸易中所用的布料和其他商品，经常是从工业更为发达的、更有竞争力的欧洲国家进口的。16 世纪之后，葡萄牙人停止了扩张帝国领土，财富也不再增加，并最终沦为国际政治中的二流国家。路易·德·卡蒙斯(约 1524—1580 年)在帝国巅峰时期所作的一首伟大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1572 年)成为其历史的丰碑。

1580—1640年，葡萄牙和西班牙君主之间的60年联盟，使其卷入了与西班牙的主要对手荷兰共和国的长期世界大战，因此加速了葡萄牙帝国的衰亡。装备精良、纪律严谨的荷兰军队把葡萄牙人从现今的印度尼西亚、锡兰以及印度沿岸地区的多数贸易站点里驱逐出去。然而，葡萄牙帝国却依然沿着从非洲到果阿的古老航线，在东南亚的帝汶岛、澳门，以及巴西幸存下来。

## 三、向西航行到达印度

在共同努力探索海洋的早期，西班牙的统治者一直忙于消灭信仰伊斯兰教的格拉纳达摩尔王国，忙于西班牙各分离地区的统一，以便能够像葡萄牙人那样资助科学探险。但西班牙商人非常活跃，所以西班牙也呈现出繁荣发展之势。当葡萄牙水手发现大西洋的三组岛屿——亚述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和加那利群岛——的时候，罗马教皇颁发教令，将加那利群岛分配给卡斯提尔王国，而其他群岛则分给葡萄牙。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婚姻使阿拉贡和卡斯提尔连为一体后，伊莎贝拉女王就想赶上葡萄牙人。于是，在1491年，当格拉纳达即将陷落之时，她就委派克里斯多弗·哥伦布尝试向西航行以抵达印度。

### 1. 哥伦布与后来的探险家

哥伦布(1451—1506)，生于热那亚，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水手，并且不止一次去过非洲黄金海岸，他可能还去过冰岛。他极力主张从西班牙向西航行可以抵达远东(东印度群岛)。这一想

法在当时并非标新立异。1492 年,没有哪一位受过教育的人怀疑地球是圆的,但事实上,多数学者将其大小低估了 20%到 30%。主要问题存在于实践中,如果一个人愿意接受托勒密过去对地球圆周的估算,那么当时的船就不能完成这一伟大的航行。但是哥伦布坚持认为,富庶的齐潘戈(日本)岛就在只有 2400 英里以外正西方,这一距离尚在船只和船员可以轻松掌控的范围之内。

如果以抵达印度为唯一目标,那么哥伦布可能不会出发。但是他是受委托去为西班牙国王发现并保护新的岛屿和疆域。因此,即使他没有到达印度,似乎也有机会到达一些新的地方。

1492 年 8 月 3 日,他从加迪斯附近的巴洛斯出发,乘三艘非常小的船只,于 10 月 12 日登上了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并最终发现了我们称做古巴和圣多明各(今天的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大岛屿。由于他认为自己到达了印度,因此,他称他在那里所遇到的人为“印第安人”。在 1493 年的又一次航行中,哥伦布率领 17 艘船只和大约 1500 名殖民者出发,在加勒比海进一步探险,并为美洲的西班牙帝国奠定了基础。在第三次航行中,从 1498 年至 1500 年,他到达了南美洲奥里诺科河河口,但是他在殖民者中间遇到了麻烦,并被以国王名义接管东印度群岛的皇家总督遣送回国。在返回西班牙的途中,哥伦布被释放,在 1502—1504 年间,他进行了第四次和第五次航行,并最终在 1502 年 8 月到达了洪都拉斯。后来,他在西班牙默默死去。

哥伦布航海的消息很快在欧洲口口相传,因为那时印刷出版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关新世界的最有效的印刷式传播是由在西班牙服役的另一位意大利冒险家亚美利哥·韦斯浦奇(约 1454—1512 年)完成的,他仿效哥伦布详细地描述了他的探险

过程。韦斯浦奇的信件引起了德国一位理论地理学家马丁·瓦尔德斯密勒(约 1470 年—约 1522 年)的注意。他于 1507 年出版了一幅地图,上面以韦斯浦奇的名字的拉丁语形式“亚美利加”标出新世界南部的陆地。

哥伦布之后,新发现层出不穷。胡安·庞塞·德·里本(约 1474—1521 年)于 1513 年抵达了佛罗里达,而瓦斯·纽菲斯·德·鲍伯(1475—1519) 同样在 1513 年横穿了巴拿马地峡,并发现了辽阔的太平洋。在 16 世纪前 20 年,还有许多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详细地探索了被称为拉丁美洲的海岸。

在此之后,海上探险转为如何从海上环绕美洲并进入太平洋的问题。北美洲的确被证明是一个障碍,因为那里的大河只是深入该大陆,河流的宽度完全不为人所知。圣·劳伦斯河流看起来比较有希望,对于其首批探险者而言,似乎更像是在探寻海峡。但是它也被放弃了,因为蒙特利尔附近的急流表明这是另外一条河流,后者被起了一个具有讽刺名称“拉欣加”(意为“中国”)。直到 1903—1906 年间,北极地区被冰阻塞的“西北通道”才最终被一支英国探险队所穿越。

然而,“西南通道”是由哥伦布之后的那一代人发现的。一位在西班牙服役的葡萄牙人费迪南·麦哲伦(约 1480—1521 年),肩负着要找到一条向西通往亚洲香料群岛的皇家使命,于 1519 年扬帆起航。环绕着南美洲的海岸,他发现了那条难以航行的、雾气缭绕的通道,即以其名字命名的麦哲伦海峡,然后又沿着一条尚不为人知晓的航线跨越了太平洋。在抵达了现在的菲律宾群岛后,麦哲伦在一场与当地首领的小规模冲突中被杀害。而后麦哲伦的一位船长,继续沿着已知的印度洋和非洲海岸航线前行。1522 年 9 月 8 日,维多利亚号及其 18 名船员——

这是1519年出发的五艘航船及243名海员中的一部分——抵达了加迪斯。环球航行的实践，首次证明了地球是圆的。

## 2. 西班牙帝国的成长

按照《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西班牙和葡萄牙沿着一条大西洋上的切割线划分了世界贸易和帝国版图，因此巴西归葡萄牙所有。这同一条线延展至两极，并切分了太平洋，所以麦哲伦发现的岛屿中有一些属于西班牙那一半。西班牙对待菲律宾群岛的做法就仿佛它们也属于西班牙的范畴一样，尽管它们实际上正好处于其管辖范围之外。

新世界的西班牙人很快开始了探险活动，并获得了数以千计平方英里的领土。紧随着最初航海探险家的是西班牙征服者，他们经常是穷困的、不太高贵的西班牙下级贵族——一半是探险者，一半是军官，并且是百分之百的冒险家。在西班牙征服者中，有两位很特别——赫尔南多·科茨（1485—1547）和弗兰西斯科·皮萨罗（约1478—1541年）——他们征服了大片领土。他们以少数的兵力夺取了新世界里两个最文明的地区：在1519—1521年间，由科茨率领600人占领的墨西哥阿兹特克帝国；在1531—1533年间，由皮萨罗率领180名士兵攻占的秘鲁印加帝国。

其他寻求黄金、救赎、荣誉以及刺激的西班牙人，也在这些新奇的大陆上来回奔波：弗兰西斯科·万克斯·德·科罗纳多（约1510—1554年）、赫尔南多·德·索托（约1500—1542年）以及奥瓦尔·卡别扎·德·瓦卡（约1490—约1556年）主要在西南部，那里后来成为美国的区域；塞巴斯蒂安·卡伯特（约

1484—1557 年)在大巴拉圭和帕拉那河流域;佩德罗·德·瓦尔迪维亚(约 1502—1553 年)在智利;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1485—1541)在危地马拉;巴斯克人佩德罗·德·门多萨(约 1487—1537 年)带领许多奥地利人、佛兰芒人,以及撒克逊人于 1536 年抵达了拉普拉塔(在今天的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普拉塔河附近的地区),并建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西班牙人探险所付出的生命代价是难以置信的,尤其是在南美洲。仅在 1535 年的一次秘鲁远征就损失了 150 名西班牙人、150 名奴隶以及 11,000 名印第安人的生命。海上通道经常是可怕的,到 1540 年为止,已有 2000 多人和 12 艘船只在试图寻找最终由麦哲伦绘制的航线过程中失踪。直至 1925 年,还有一支探险队全部消失于巴西内陆。

在欧洲人的冲击下,美洲的土著文化已经衰落。从墨西哥到玻利维亚、巴拉圭和巴塔哥尼亚(阿根廷南部),幸存至今的数以百万计的居民都是那些土著人的后裔。任何一种对于拉丁美洲的理解,都需要某些与其文化和社会传统相关的知识。但是阿兹特克人和印加帝国的社会结构已经荡然无存。

就在 16 世纪结束之前,西班牙征服者的活动告一段落,第一个真正的欧洲殖民帝国在拉丁美洲建立起来。只有阿根廷北部和智利中部还有土著居民的存在,后者几乎全部为来自旧世界的人口所消除或取代。在广阔的墨西哥地区以及中美洲和南美洲,一个人数稀少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阶层构成了社会的上层,并以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为文化语言。在其下面,“混血”阶层逐渐形成,他们是欧洲民族和土著民族的混合体。在某些地区,印第安人依然保留着古老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受到触动。在印第安人被消除的地方,例如在加勒比海地区,或者在劳动力短

缺的地方,例如巴西,则引入了数以百万计的非洲奴隶。

冒险家们在每个地区所建立的殖民地的地理及环境,形成了几个独立的单位,它们仅凭对国王依从而维系在一起。例如,在这类明显的亲密邻邦之间,像今天的阿根廷和智利,就绵延着安第斯山脉,翻越高山非常困难,唯有通过各个山口。在拉普拉塔的殖民地和秘鲁及新格拉纳达殖民地之间,则横亘着安第斯山脉和亚马逊盆地大片的热带雨林,后者在20世纪仍然杳无人烟。

然而,西班牙人将卡斯提尔的中央集权管理制度输送到了新世界。在这一等级制度的顶端有两位总督:一位来自秘鲁利马,他为国王统治着除委内瑞拉以外的西班牙在南美洲的地区;另外一位来自墨西哥城,他统治着巴拿马北部的大陆、西印度群岛、委内瑞拉以及遥远的菲律宾群岛。每个首府都有一个检审团,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人员由专业的律师担任,它既是一个法庭,又是一个咨询委员会。在16世纪,检审团在圣多明各、危地马拉、巴拿马、新格拉纳达、基多、马尼拉以及其他主要中心建立起来。马德里的印度群岛特别委员会负责阐释殖民地政策,并监督其执行。

既然帝国政府统治下的地区如此广阔、民族如此众多,那么这个中央集权的、具有家长式作风的政府在实践中就远不像在理论上那么严格。最后,官僚机构里逐渐充斥着众多殖民地的居民,他们从来没有到过宗主国,并衍生出一种地方性爱国主义和独立意识。马德里和塞维利亚遥远得简直无法执行其所有的决策。特别不可能的是,维持严格的垄断,将贸易全部限制在宗主国范围之内,并禁止或严格限制殖民地的本土工业。

在殖民地开发之初,西班牙的干预政策最为严苛。当时墨

西哥和秘鲁的那些易于开采的、储量丰富的贵金属矿层,都是由西班牙王室和征服者双方共同开采的,而国王总是提取五分之一。到17世纪早期,当贵金属的产量开始长期下降的时候,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的经济和社会已经趋于稳定。殖民地的产品——食糖、烟草、巧克力、棉花、皮革以及其他产品——源源不断地从拉丁美洲流出,用以交换工业成品和服务。克里奥尔人(生长于美洲各地的欧洲人后裔)和梅索蒂斯混血儿(欧洲人与美洲印第安人的混血儿)是这种贸易的主要受益者。在社会金字塔中,位于非洲奴隶之上而在梅索蒂斯混血儿之下的,是土著居民。这是一种社会等级的制度,它基于血统和文化,而非19世纪的"种族"观念,后者从来没有变得像在北美那么严格。

在所有的地方,尤其是在加勒比海,欧洲人试图将土著劳力用于农场、矿山和运输业。结果是灾难性的,因为天花的流行和其他由欧洲人传入的疾病,给土著居民带来了可怕的灾难。在西印度群岛,加勒比印第安人被灭绝。在墨西哥中部,全部人口从科茨到达时的大约2500万降至8年后的大约250万人。"疾病先锋队"可能先于征服而至,其间天花和流感使得印第安人部落如此虚弱,以致他们不能抵抗欧洲人的主要军事进攻。然而,一种生物学交换也发生了,虽然关于梅毒的起源尚有争议,但是许多医学史学家都认为梅毒来自西印度群岛。在那里,梅毒无害,而对于欧洲人,它却极具传染性。

试图将土著劳动力用于种植园,或强迫其在被称为"恩康米恩达制"半庄园制度下劳动,结果证明几乎都是灾难性的。恩康米恩达制给农业村庄分组,其居民被"委托"给西班牙征服者或殖民者保护。"保护者"因此获得了收入来源,同时也拥有了潜在的可以挑战中央权威的经济基础。

文献记载

## 探索的冒险

安东尼奥·皮迦弗塔（约1491年—约1536年）完成了由麦哲伦开始的环球航行。他在航海日记里的一则例行公事式的记录中，讲述了每天痛苦而又清苦的生活。

11月28日，星期三，我们从前述（麦哲伦）海峡，向前航行了1520海里，进入了太平洋海域。在此，我们停留了3个月又20天。船上没有携带任何食物饮料或其他点心，我们只吃一些不新鲜的，老鼠吃剩的，已经成为了粉末的饼干，里面全是虫子，还有老鼠在上面撒的尿臭。我们喝的是不纯净的而且发黄的水。我们还吃过因为日晒、雨淋、风干而变得非常坚硬的牛皮。我们把它泡在海水里4—5天，然后，再将它置于热灰烬之上烤一会儿，就这样把它吃掉。至于老鼠，由于每只卖到0.5埃居（法国银币），因此我们中的一些人不能得到足够的老鼠。除了上述的麻烦外，有一种疾病最为糟糕，即我们多数人的齿龈上上下下都膨胀起来，以致吃不了东西。他们就这样死去，我们中间有29人死去……在此期间，我们没有遇到风暴，除了两个无人居住的小岛，我们也没有看见陆地。在岛上我们只看到了鸟儿和树木。因此，我们称这两个小岛为“不幸之岛”……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再次许诺进行这样的远航。

---

Antonio Pigafetta, *Magellan's Voyage: A Narrative Account of the First Circumnavigation*, trans. and ed . R. A. Skelt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I, p. 57. Another version of this manuscript adds that the men ate sawdust from planks; the disease referred to was scurvy.

为了对抗这些势力,产生了抵消力量。1542 年颁布的《新法》禁止恩康米恩达制的传播,进而约束了封建的分权现象。这些法律也禁止对印第安人的奴役。他们被视为受国王监护的人。土著居民的利益受到某些声望巨大、地位显赫人士的捍卫,特别是墨西哥的恰帕斯主教、"印第安人之父"巴特罗米·德·拉斯·卡撒斯(1474—1566),他一直在为限制奴隶制度而忘我地战斗。

与非洲和亚洲的被征服民族不同的是,新世界的印第安人皈依了基督教。但西班牙人更为骄傲的是由殖民者建造起来的宏伟的宗教建筑及其复杂精美宗教仪式。许多牧师希望填补由于印第安人神庙被毁以及对复杂异教仪式的压制所造成的空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新世界殖民地中,性质的国家与教会紧密相连。巴拉圭的耶稣会士试图为巴拉圭瓜拉尼印第安人建立一种慈善专制主义的和家长式的乌托邦。在西班牙世界的北部边缘,加利福尼亚以及西南美洲的一长串传道区,成为未开拓的新领域。

在教会与国家关系、与宗主国之间的密切联系、重商主义经济举措以及其他诸多方面,葡萄牙在巴西的殖民者都效仿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殖民者。然而,二者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葡萄牙殖民地几乎完全是乡村,许多黑奴被输送到热带的巴西,而且因为奴隶比较多,同时也因为白人男性经常不划分种族界线,所以这里的种族混合比除古巴以外的多数西班牙殖民地更加彻底。最后,也许是因为巴西距离欧洲相对较近,葡萄牙人与对立国家所产生的麻烦比西班牙要多一些。

## 四、北大西洋强国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建立殖民地帝国方面，几乎领先了一个世纪。然而，北大西洋国家很快弥补了这一延迟。早在1497年，在英国服役的意大利人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约卒于1498年)与其子塞巴斯蒂安，就发现了北美洲沿岸的一些地区，并且在探险地宣示了英国的领土主权。在16世纪的上半叶，另一位意大利人乔瓦尼·达·韦拉察诺(Giovanni da Verrazano，约1485—1528年)和法国人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1491—1554)的探险活动，也给予法国一个堪与英国媲美的领土主权宣示，而17世纪早期塞缪尔·德·尚普林(Samuel de Champlain，约1570—1635年)的具体探险活动更使其得以进一步强化。荷兰人的领土主权宣示始于亨利·哈得逊(卒于1611年)的航海。他本是英国人，于1609年开始在荷兰服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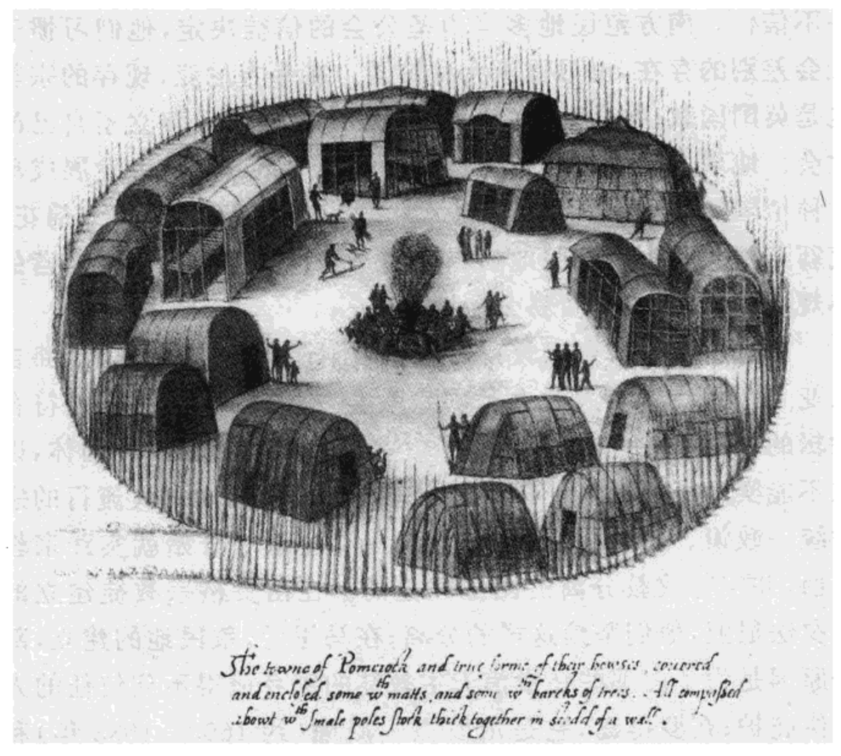
### 1. 北美洲的英国人、荷兰人和瑞典人

英国人并没有立即进一步执行卡伯特的计划。相反，他们把精力用于打破西班牙的贸易垄断。1562年，约翰·霍金斯开始了英国的奴隶贸易。他的侄子弗兰西斯·德雷克，到达了太平洋，并以新阿尔比恩的名义声称加利福尼亚为英国所有。德雷克经太平洋和印度洋返回伦敦，从而完成了英国首次环球远航(1577—1580)。1583年，在汉弗莱·吉尔伯特(约1539—1583年)的领导下，英国人坚持要求纽芬兰岛的领土主权，以便他们能够分享北美洲东北沿海的大渔场。

1584年,华特·拉雷(约1552—1618年)试图在罗诺克岛(今天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建立一个殖民地,未果。该岛屿位于英国人称之为弗吉尼亚的地区。它是英国人以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命名的。在下一个世纪的早期,英国人在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1607年)以及马萨诸塞湾的普利茅斯(1620年),建立了两个永久性的据点。二者均由总部设在英国的特许贸易公司所建立,并且他们都满怀希望,相信自己会找到储量丰富的贵金属。然而,他们的期望都落空了,只是设法度过了最初的艰难岁月。于1612年开始种植的烟草,加之探险家和殖民理论传播者约翰·史密斯(1580—1631),挽救了弗吉尼亚殖民地、毛皮(以海狸皮最为著名)、腌鳕鱼以及加尔文教徒的决心拯救了普利茅斯。两个殖民地都逐渐建立起了农业经济,并以同英国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作为补充。二者所接受的海外移民数量都不过几万人。然而,它们以及后来的殖民地都由于富饶土地的自然增长而发展起来。到1763年,英国人的陆上殖民地已达14个,其人口近300万。

如果这些英国的陆上殖民地要想安宁,就必须铲除两个外来集团。荷兰人已经在哈得逊河口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1626年),并且已经开始推动毛皮贸易。这使他们成为远在更北部的加拿大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竞争对手。不过,在17世纪60年代的英荷战争中,他们失去了新阿姆斯特丹,这个地方在1664年被英国人兼并,更名为纽约。

瑞典人在今天威尔明顿附近的特拉华建立了克里斯蒂安娜要塞(1638年)。但是新瑞典公司从来就不是一个大公司,于1655年被荷兰吞并。在1681年被特许给富有的英国人奎克·威廉·潘(1644—1718)的宾夕法尼亚,取代了特拉华的瑞典人和荷兰人的地位。




我们对于欧洲人在抵达北美洲之时的生活的了解，多来源于英国艺术家约翰·怀特（全盛期为1585—1590年）的画作。他是首批弗吉尼亚移民之一。其水彩画中的63幅被完好地保留下来，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细节。这幅画作展现的是华特·拉雷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在1585年探险时所见到的一个土著村庄的情景。（New York Public Library Picture Collection）

以宾夕法尼亚州为中心的殖民地，其范围已经从新斯科舍到乔治亚，总共达到14个，每个都独自建立，并拥有自己的宪章。新英格兰的事务多半是由加尔文教中的独立派（公理会的教友）来决定，它被托付给地方自治政府，而对拥有土地的贵族

并不信任。南方殖民地多半由圣公会的信徒决定,他们习惯于社会差别的存在,也习惯于大种植园。在弗吉尼亚,现存的宗教也是英国国教;在马萨诸塞,清教—公理会的教友建立了自己的教会。地理、气候以及社会与经济因素的结合,使南方发展成单一种植园经济,主要栽培烟草、水稻、能产生靛蓝的植物或棉花,使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朝着由独立的农场主和工厂主经营的小规模农场、工厂和贸易方向发展。

这些殖民者来自宗教自由概念刚刚开始萌发的英国。弗吉尼亚人和新英格兰人建立了国家教会,这在许多方面都是符合逻辑的。然而,这些移民代表了太多的相互冲突的宗教团体,以致不能实施任何类似于在西班牙殖民地或法属加拿大流行的宗教统一政策。此外,有些殖民地是由那些从一开始就实践宗教自由,并实行政教分离的团体建立的。在由贵格宗教徒建立的宾夕法尼亚,他们坚信这样的分离;在马里兰,殖民地的建立,部分原因是为了向那些在崇信天主教徒的家乡最得不到信任的人提供庇护;在罗得岛,它是由罗杰・威廉(约 1603—1683 年)和其他不愿意信仰马萨诸塞湾东正教的人们建立的——在这些殖民地中,存在着某些与宗教自由相似的思想。

虽然早期移民很容易接受阶级差异,但是民主的种子还是播撒下来。事实上,并没有产生正式的殖民贵族阶层,部分原因是土地相对便宜。此外,早期在沿海地区培养一批享有特权的精英或乡绅阶层的倾向,已经与边远地区的自由氛围和各种向城市人才开放的事业相互抵消。协商政府的概念从一开始就坚定地扎根于殖民地之中,而且所有殖民地都有某种立法机关。

这就是英国在新世界的殖民地与西班牙和法国所属殖民地的关键性差别。在西班牙和法国,宗主国政府早已是中央集权

的、带有官僚机制的君主政体，其代表议会只是没有税收权的协商机构。西班牙所属美洲和新法属殖民地的皇家总督可以真正控制其行省。但是，英国是一个议会君主制。虽然在多数殖民地，总督代表国王，但是英国政府却没有像西班牙和法国一样的庞大官僚机构。英国殖民地的皇家总督甚至没有一个文书职员，在筹款时他们会遇到来自立法局的诸多麻烦。此外，在所有的殖民地内部，现存的地主、商人以及专业人士，不仅参与殖民地议会，而且还参与地方政府。最后，殖民者还带来了英国的习惯法、审理陪审团以及对高度官僚化的行政准则的蔑视。

## 2. 北美洲的法国人

从上述 14 个殖民地向北、向西，在圣·劳伦斯盆地地区，法国人开始在卡蒂埃和尚普林的探索的基础上进行拓展。与横亘于英国人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阿巴拉契亚山脉相比，圣·劳伦斯河与五大湖使法国人容易进入大陆的中心地带。对于毛皮的寻求也推动着法国人向西部迈进。毛皮是很有价值的商品，体积比较小，易于独木舟和小型船只的运输。此外，受到耶稣会会士的指引，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人比信仰新教的英国人表现出更加巨大的传教热情。教士，还有毛皮贸易商（字面意思是“森林漫游者”，或为取得毛皮用捕兽机捕兽的人），引领着殖民者向西前行。

拉萨尔（Sieur de La Salle，1643—1687）发现了密西西比河河口。1682 年，他为法国正式占领了一片辽阔区域。他的探险以路易斯·朱略特（Louis Joliet，1645—1700）和神甫雅克·玛库特（Jacques Marquette，1635—1675）的探险为基础的。前者是一位在美国出生的年轻的法国人，毛皮贸易商；后者是被派往

内地的六个耶稣会传教士之一,他沿着大河漂流,从而证明这条河流是流入海洋的。颇有才干的法国殖民地总督们进一步强化了法国在土著民族中的力量、声望与权威。到1712年,法国人建起了一系列独立商栈。商栈与商栈之间有几英里的未被占领的地区,其间土著美洲人人口稀少,他们都是被迫或被劝说与之合作的,以便使新法属殖民地和路易斯安那(根据路易斯十四命名)可以连接起来。

虽然法兰西帝国的推进在地图上看起来给人印象深刻,但是,它还不足以轻松地将英国人推进大海。它是一个具有军事野心的贸易帝国,除了在魁北克,它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移民殖民地。没有足够多的法国移民移居海外,而那些移居海外者则像商人和冒险者一样,分散在各地。

## 3. 西印度群岛与东印度群岛:征服之地

法国人、荷兰人以及英国人都寻求在南美洲获得据点,但是不得不满足于不太重要的圭亚那地区。然而,他们彻底瓦解了固守在加勒比海的西班牙人。在近代早期,这些岛屿对于帝国主义者而言是非常有价值的地区之一。廉价的奴隶劳动力在那里种植烟草、水果和最有利可图的甘蔗。

到1715年,法国人、荷兰人以及英国人也都在亚洲和非洲奠定了贸易和殖民帝国的基础。印度被证明是最富庶和最值得竞争的地区,同时也是争斗最强烈的地方。莫卧儿帝国虽然无法把欧洲人赶出南印度,但是的确将之大致限制在沿海地带。17世纪,法国人和英国人也逐渐使自己立足于印度。英国人于1612年击败了葡萄牙舰队,并立即取得了在印度西海岸苏拉特(Surat)的

贸易权。尽管莫卧儿帝国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1658—1707年在位)曾于1685年试图废除他们的权利,但很快就发现其海军和商业力量强大得令自己无法承受。1690年,英国人建立了加尔各答。与此同时,法国人在彭提治里(Pondichéry)的马德拉斯(Madras)附近获得了一块立足地,并很快建立了其他的贸易站点。到18世纪初,英法之间就海外帝国问题展开了一场决定性斗争——这场争斗现在被视为"帝国大战"——它一直持续到1763年。

两国都通过特许贸易公司进行经营: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年)和法国东印度公司(1664年)。这些公司均由其政府支持。虽然两国都卷入印度政治和战争以支持其贸易公司,但是二者都没有试图在东方建立大规模的永久性的殖民地。

荷兰人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竞争之列。他们建立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1602年)和西印度公司(1621年)。与西班牙和葡萄牙施行政府严密监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荷兰人对于这些私有商业公司给予充分的自主权。他们有权拥有自己的舰队,有权对外宣战与媾和,同时也有权管辖依附地区。荷兰东印度公司成功地将葡萄牙人从锡兰赶出,随后又把主要精力放在东南亚,尤其是东印度群岛。在此,他们又一次逐出葡萄牙人,并有效地挫败了闯入者。通过这种方式,公司每年能够向其股东支付平均值为18%的红息。尽管荷兰作为一个帝国在18世纪迅速地衰落了,但是荷兰人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岛的控制力却非常强劲,以致其在印度尼西亚的统治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

## 4. 非洲和远东:有影响的地区

为了到达东方,三个北方海上强国都采用葡萄牙人在15世

纪所发展起来的航线,绕非洲而行。随着荷兰人于 1652 年占领了非洲大陆南端具有战略性的好望角,三者都巩固了在非洲的据点。好望角最初还只是一个荷兰船在长途航行中的一个修理站和补给站,那里的气候温和,后来荷兰人和一些法国胡格诺派教徒逐渐将之发展成为一个小型殖民地。在西非,荷兰人夺取了葡萄牙人在几内亚和黄金海岸的据点。

法国人也沿大西洋海岸而下,在非洲西部最突出的地方夺取了塞内加尔(1626 年),然后到达了较大的马达加斯加岛,并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印度洋中的毛里求斯,这是一个较小的岛屿。英国人加强了位于塞内加尔附近的冈比亚河口的据点(1662 年),并以牺牲法国人和荷兰人的利益作为代价,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到 18 世纪为止,在非洲和毗邻水域的地图上,可以看到由欧洲各个强国所控制的一系列沿海站点;在该大陆内部,除了有奴隶贩子和土著商人来过,多数地区依然未被开发,保持原貌。

远东直到 19 世纪才真正向西方帝国主义开放。在中国,葡萄牙人占据着澳门,荷兰人在台湾(1624 年)获得一个据点。台湾是一个岛屿,葡萄牙人将它命名为“福摩萨”(意思是“美丽的”)。中国人允许耶稣会传教,但是皈依者寥寥无几。就一般而言,中国人认为多数欧洲人是未开化之人,应该向自己进贡。

在日本,世人对欧洲势力渗透的反应比在中国更为强烈。葡萄牙人在 16 世纪已经赢得了贸易特权,随后荷兰人也于 1609 年也取得了这一权利。与此同时,伟大的耶稣会传教士弗兰西斯·泽维尔(Francis Xavier, 1506—1552)已经于 1549 年开始宣教。许多日本人都皈依了基督教。德川家族——1600—1868 年间日本的封建统治者——却对基督教充满恐惧。他们将之视

## 文献记载

### 日本的一则民间故事

探索、发现和征服的年代是双向的，因为非西方文化经常对于欧洲人的到来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下面的这则日本故事，是格言“盲人世界里的独眼人为王”的一个聪明的变体，它暗示了一种相互作用。

从前，有一位男子终日无所事事——他仅仅是在等待并希望他能得到突如其来的一大笔财富，无须努力，就立即成为富翁。

他就这样生活了许多年，直到有一天，他听见传说：有一个岛屿住着只有一只眼睛的人们。

“终于来了！它将是我的大笔财富，”此人自己暗想，“我就要去那个岛屿，我要把长有一只眼睛的一个家伙抓来，并在市场上展示，谁看一眼，我就收一便士。很快我就会成为一个富人。”

他越想，就越喜欢这个主意。

终于，他下定决心。他变卖了为数不多的财产，买了一只船，就出发了。经过长途航行，他到达了那个独眼人的岛屿。的确，他几乎还没有到岸，就看见那里的人们真的每人只长有一只眼睛。

但是，独眼人当然也注意到来了一位双眼人，于是几个人聚集在一起，说：“终于来了！这将是我们的大笔财产！让我们抓住他，把他拿到市场去炫耀，看一眼，一便士。很快我们就会致富了！”

说到做到。他们抓住了这个双眼人，并把他抬到市场，在那里展示，看一眼，一便士。

这就是将要发生在那种坐享其成、等待天降红运之人身上的事情。

From *The Fairy Tale Tree*: *Stori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retold by Vladislav Stanovsky and Jan Vladislav, trans. Jean Layton (New York: Putnam's, 1961), p. 244. Copyright © 1961 by Artia.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G. P. Putnam's Sons.

为对国家传统与个人统治的一种威胁,因为基督教有可能为欧洲强国干预日本政治提供机会。因此,他们决定闭关锁国以杜绝一切外来威胁。在17世纪早期,他们无情地镇压了基督教,并封闭了日本。外国人被拒绝入境,而日本人也被拒绝离境,甚至建造远洋航船也被禁止。由于荷兰人说服日本人相信新教徒不像天主教徒那样具有颠覆性,所以他们在严格的监管下被允许在长崎港拥有一个岛屿。

## 五、俄罗斯

无论从编年史(俄罗斯人于1483年越过乌拉尔山脉从欧洲进入亚洲)还是从政治的角度,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探险和征服都与欧洲人在新世界的扩张相伴而生,因为扩张中的莫斯科公国是一个"新式"君主国。俄罗斯跨越这片大地的动作非常迅速,令人惊讶——在40年左右的时间里,扩展大约5000英里。因此,俄罗斯的东进在一系列正规殖民地以外留下了大片未占领区域。西伯利亚河谷盆地的辽阔平原使拓展相对容易,西伯利亚的部落人口似乎已经基本上与俄罗斯人口相互融合。

## 1. 从陆路东进抵达太平洋

恐怖的伊凡对伏尔加河流域鞑靼人的胜利，导致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拓展运动，其间，私营公司成为开路先锋。到 16 世纪末，斯特罗加诺夫家族(Stroganov)已经获得了在乌拉尔地区的特许经营权。他们在此进行毛皮贸易，获取了丰厚利润，同时他们还发现并开采了俄罗斯第一家铁矿。斯特罗加诺夫家族雇用了大批哥萨克探险者，后者引领了东进运动。"西伯利亚的征服者"季莫费耶维奇·雅尔马克(Timofeyevich Yermak，卒于 1584 年)，其功绩颇具传奇色彩，将俄罗斯的控制力延展至托波尔河口。远征队的先头部队，总是在河谷盆地的某个适当的地方建起木制栅栏，并开始从周围地区收集毛皮。几乎每个新据点的防御还没有来得及加固，尚未休整的先锋部队就已经继续向东前行了几百英里以重复这一进程，直到他们于 17 世纪 40 年代抵达了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为止。

每当一个新区被开发后，政府将随后派来行政管理人员、收税官、士兵和教士。莫斯科的西伯利亚局在名义上负责治理这一广大地区，但是由于通信缓慢，任何决定都不得不在当地作出。因此西伯利亚人在传统上总是有一种与开阔空间相连的独立感。因为鄂霍次克海及其沿太平洋周围地区非常寒冷，并且太平洋全年经常结冰，所以俄罗斯人很快就嫉妒地向南部阿穆尔河流域张望，后者在一个全年畅通的港口处流入太平洋。

在该地区的扩张使俄罗斯人与中国人有所接触，他们侵占了中国的外围地区。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这些地区几乎不感兴趣。1689 年，中国人与莫斯科签署了《涅尔琴斯克条约》(即《尼

布楚条约》)。虽然该条约承认了俄罗斯人进一步向北部的扩张,但是它却稳定了边疆,使阿穆尔河流域非武装化,并将俄罗斯人逐出了满洲。该条约也给两个强国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后者承认中国的封建君主。这样,俄罗斯快速地成为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帝国,并标志着未来也将是一个对太平洋事务感兴趣的强国。

### 2. 向北航行进入北极

在加拿大遥远的北方,亨利·哈德逊不仅发现了哈德逊河,而且还发现了哈德逊湾。1670 年,英国冒险家和投资者成立了哈德逊湾公司。起初它的建立是为了在通往法国魁北克西北的大湾沿线做毛皮贸易。在 16 世纪晚期,荷兰人已经进入了远在欧洲的北极地区,在挪威以北发现了斯匹次卑尔根岛,其地域范围向东已经横越了以其领队威廉·巴伦支(William Barents,卒于 1597 年)命名的海域。在 18 世纪早期,俄罗斯人也在漫长的西伯利亚北冰洋沿岸的大多数地区进行了探险。一位在俄罗斯服役的丹麦人,维达斯·白令(Vitus Bering, 1681—1741)发现了阿留申群岛以及现在用他的名字命名的白令海和白令海峡,后者将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分开,最终证明了亚洲并非与北美洲相连。

## 六、扩张的影响

欧洲的扩张也记录了一些与历史上其他事件同样残酷的内容。非洲的奴隶贸易——它始于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然后由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将之变为一种有利可图的海上运输业——从当地酋长对奴隶的围捕,中间经过横越大西洋的奴隶

运输，一直到将他们在印度群岛出售，这是一系列恐怖的行为。

美洲的殖民者实际上消灭了密西西比河东部的土著居民。当然，这种血腥统治也有例外。在新英格兰，像约翰·艾略特(John Eliot, 1604—1690)这样的传教士的确创办了“祈祷中的印第安人”乐队，而贵格宗教徒在宾夕法尼亚也与土著美洲人之间保持着良好关系。然而，无法控制的欧洲疾病加之酒精饮料，的确比刀剑更有效地灭绝了土著美洲人。

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近代早期的欧洲扩张比单纯的“剥削”和“掠夺”更为复杂。在对待土著居民方面，存在着太多用具有名义价值的“礼物”换取土地和贵重商品的现象。几乎普遍应用的重商主义政策是将资金和制造业保留于宗主国。这就使殖民地降为原料产地——即一种趋于保持殖民地的相对原始性和经济依赖性的角色。

在近代的早期，当欧洲人攫取了殖民地财富之精华的时候，美洲的白银也为欧洲进口亚洲的香料及奢侈品提供了资金。公共健康几乎没有多大改善，后来英国人带到东方的卫生设备尚未出现，而市区以及郊区的公共秩序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在印度或非洲呈现。就根本而言，殖民主义破坏了已经存在了数百年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却没有提供相应的稳定的替代物。结果，多数土著社会长期动荡不安。

西方也深受与其他民族关系的影响。在16世纪中叶引入西班牙的烟草已成为许多欧洲人消遣娱乐的必备品。从新世界引进玉米或印第安谷物(在欧洲谷物一般是指其他粮谷)，被广泛种植于西班牙和意大利。另一方面，马铃薯没有立即流行于欧洲。在法国，马铃薯不得不经过一场宣传运动才变得普及。番茄或“爱之果”，长期被视为有毒物，其种植只是为了观赏而已。

文献记载

## 奴隶贸易

荷兰的圣·简号贩奴船于1659年起程前往西印度群岛的古拉索岛(Curaçao)。其航海日志记录了奴隶在船上死亡的情况。在1月30日和10月29日期间，总共有59名男子，47名妇女和4名孩子死亡。当灾难袭来的时候，仍然有95名奴隶在甲板上，如实的记载如下：

11月1日，我们的船在罗卡斯暗礁处迷失方向。由于大浪冲天，我们必须弃船，挽救奴隶的希望渺茫了，全体船员立即借助小船逃走。11月4日，乘船到达了古拉索岛。尊贵的总督……命令两艘单桅纵帆船前去将奴隶从失事船只的残骸中救出，其中的一艘单桅纵帆船连同甲板上的84个奴隶后来被一艘武装民船俘获了。

下面是该总督向荷兰董事会提交的报告：

使我们极度悲伤的是，阁下因此失去了如此之多的健康黑人，以及如此优良的快船，后者一直是我们最得力的快速帆船。

虽然正如我在上次报告中所陈述的那样，我已经竭力要制伏抢劫黑人和帆船的海盗，然而，我还是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取得成功……

为了阁下您的利益……为了增加贸易和贩卖越来越多的由您的船只载送到这里的黑人，并为了您的缘故……我们曾热情去吸引西班牙商人前来此处，但是非常遗憾，这些海盗一直是我们无法成功的原因。

我已经高兴地看到，勤勉的阁下您，在此不时地给我们提供黑奴。要吸引西班牙人、大陆以及其他地方的商人来此贸易，这将是唯一的诱饵。但是岛上的贸易进行得越隐秘越平静，对此地和您就越是有利。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Slave Trade to America*, ed. Elizabeth Donnan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0), I, pp. 143, 150—151.

中国的茶叶、阿拉伯半岛的咖啡，以及新世界的巧克力使人们的品位和社会交际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茶社与咖啡厅给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环境——不仅可以啜饮热饮料，而且可以公开讨论政治问题。巧克力和糖果为欧洲引入了一种全新的奢侈品种类。

在西方人中间，对于非欧洲人信仰和习俗的了解最终进入到流行文化的层次。许多词汇成为这种文化的标志，例如，巫师、磕头、禁忌、图腾等。然而，在宗教和伦理学方面，西方却没有从哥伦布之后开放的各个新大陆学到什么。当西方人接触到新世界和东方的各种文化时，他们的第一印象是没有什么可学习的。一旦交流的过程进一步深入，一些欧洲人就对印度哲学和宗教的神秘主义与来世以及中国儒教的伦理学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其他一些人则开始钦佩许多“质朴的”人们的高尚而又平静的生活。但是就多数人而言，给欧洲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在印度和中国人中间所发现的贫穷、脏乱与迷信。

史海钩沉

## 棉花的重要性

自古以来，棉花就在埃及、印度和中国广为人知。它于公元9世纪被引入西班牙，但是直到15世纪，才为英国人所知。到了17世纪，它才被广泛地从印度引入，然后进入其他“各式各样的地区”，包括英国在北美洲南部的殖民地，最后，被引入到非洲。因此，是大英帝国使棉花成为世上最著名、最重要的植物纤维。

最终，棉花将在工业革命中处于中心地位，将在服装产业中生成一种革命，将有助于保障数以百万人的工作机会。但是在1589年，当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出版其选集《航海与发现》之时，棉花的潜力还没有被认可。哈克卢特对棉花的描述将好奇、精确的观察以及对新鲜事物强烈的爱好结合起来。

这种作物生长在某种小树上或石楠上，其高度不超过人的腰部，或者略微高一些。这种树长有细长的类似石楠或者康乃馨上的花梗，树枝很多，每个树枝上结有果实或壳儿，长成圆形，里面就是棉花。当这种花苞或壳长到胡桃大小时，它就打开并露出棉花，棉花一直长得很大，像羊毛，当大到像一个人的拳头时，就开始变得松散，然后，人们就将它采摘下来，因为它已经成熟了。这些树的种子像豌豆那样大，色黑，有点扁平，不圆。人们把它种在耕地里，种子在田地里生长，在波斯以及其他不同地区的许多乡村都长势良好。

在独立战争后的美国，因为棉花的耕作对于密集型劳动特别容易形成控制，所以棉花有助于种植园制度以及奴隶制度的发展和存在。南部各州因此变得依赖于棉花出口，而未能跟上北方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步伐。在美国内战期间，美国南部联邦

希望得到英国的支持，因为英国的纺织业依赖美国的原棉。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支持，因为在1861年战争爆发时，英国的棉花50%供大于求，而且从埃及、印度和后来的巴西也可以有选择地得到货源，并且这种能力在不断地增长。因此，棉花在经济史和政治史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Richard Hakluyt, *Voyages and Discoveries: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ed. Jack Beeching(New York:Penguin Books,1972),pp. 230—231.

涉及欧洲人如何看待美洲和亚洲多元文化时，学者们甚至会为命名事件的用语而发生争论。当“征服”记录了许多军事经历时，它决不表现对有所“发现”的欧洲人的影响。“发现”记录的是一些很新奇的知识，但是只有通过对科学“发现”的类推，它才反映知识在欧洲思想的每一个领域所引发的革命。近来，学者们已经更加喜欢用“碰撞”一词，因为它更加中性，但是它却不能够表示惊诧与惊奇或暴力的一面。

也许，最好还是从观察开始：欧洲人没有用以表示他们所遇到的许多植物和动物的名称。在欧洲人的语言里，没有一个词语可以表示鹦鹉、橡胶、咖啡、食蚁兽或负鼠。最早的描述，哥伦布、科尔提斯和迪亚士的描述，使用类推法去明晰欧洲人所见的事物——一些好像已知、熟悉的东西，但是最终并不是那种植物和动物。欧洲人曾经以编写古典和中世纪故事的方式来表示他们之所见。这些故事讲述的是：巨人种族、侏儒、以黄金铺路的理想中的黄金国、神话和小说中的动植物等。然而，在第一代航海家那里，甚至在哥伦布的航海日志里，欧洲人就试图叙述、命

名,并用描述性的语言确定了其基本属性,如植物、动物、天文等。那些"新世界""碰撞"的结果之一就是有意识地创造出了一种描绘性语言,该语言然后又转向"旧世界",并在门和属类学科中达到顶峰。

另外一种结果是对于文化的基本比较性的研究。在早期,人们曾对游记进行收集和整理。在这些早期成就中,就有理查德·哈克卢特于 1589 年——即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英国的后一年——所编辑的英语版选集。在这些不同的描述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越来越细致的观察,而且可以看到早期对外国文化进行辨别的努力,例如,为了描述阿兹特克文化与印加文化之迥异,它们就从科技知识、军事才能,或具有特色的艺术审美等不同的层次来对其进行描述。

"新世界"的"发现"在欧洲思想的每一个领域都引发了革命。在人类知识的一个又一个领域,欧洲人发现,无论是李维还是托勒密所撰写的古典文献都存在错误——那些一直被赋予权威地位的知识不仅仅是有瑕疵,而且在许多例证方面都是错误的。托勒密的推测明显地不适当,以致没有虑及完整的大陆和海洋。古典史家对于人类文明的经典描述不能够说明欧洲人在美洲所发现的文化。"碰撞"挑战的不仅仅是古典学的权威性,而且还挑战了基于人类肉眼观测所做的文字记录,以及对于观测数据所作的抽象论证的权威性。欧洲人开始质疑,基督教是否是唯一正确的宗教?"无罪"在欧洲以外是否真的不存在?"人"的内涵是什么?其中最善于思考的欧洲人认识到,对于知识本身的追求永远都不会是相同的,仅凭阅读不能保证知识的正确。而其中的一位思想家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就问过如下问题:"我知道什么?"带着这个问题,他

明确指出了“大发现”的破坏性后果，或者引用约翰·多恩(John Donne)的话，即“一切已被破坏，一切已无连续性”。

大发现有助于使欧洲经济和社会发生彻底变革。在长期的通货膨胀和扩张过程中，一些群体获利，而另一些则损失惨重。就一般而言，商人、金融家、业界人士享受到了生活水平的提升。那些依靠相对固定收入的人，包括土地所有者，则遭受了损失——除非他们转而经营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场。如果不能找到新的收入来源，那么政府也会蒙受损失。赚取工资者、技工以及农民通常不会认为其收入能够跟上物价上涨的速度。简而言之，扩张的效果既令人不安又富于刺激性。

对于西班牙而言，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新世界所得到的既有助益也有伤害。也许，在列强之中，只有西班牙由于所谓的17世纪普遍经济危机而陷入长期衰落。加泰罗尼亚起义、1640年葡萄牙的暴动以及1647年西属意大利的起义，都使得西班牙越来越难以捍卫其遥远的帝国免受其他列强的侵犯。尤其是英国，已经开始有条不紊地蚕食这个帝国。到1670年，英国和法国开始密谋来决定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未来。

1665年，腓力四世去世，王位传至其4岁的儿子手中，而腓力的遗孀担当起摄政者的角色。她全神贯注于宗教问题，而皇家军队则在保卫佛兰德尔的斗争中、在与法国路易十四的对抗中被有计划地摧毁。1670年，西班牙与英国签订条约，同意英国参与新世界的贸易，并承认英国对牙买加的占领。两年前，葡萄牙及其殖民属地的独立也已经得到正式承认。西班牙在欧洲的统治结束了，而伴随着统治的崩溃，腓力二世的帝国、西班牙对新世界与亚洲之间海域的掌控，以及西班牙对南美洲殖民地的控制也都迅速走向衰落。

从中世纪史到近代史的过渡是以欧洲的扩张为标志的。的确,一个辽阔而又崭新的国家在北美洲的成功——起初它只是欧洲历史的产物,然后成为这段历史的一个独立部分,并最终演化为历史的主旋律——是殖民帝国的主要后果之一,也是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的标志之一。即使西班牙衰落了,但是,其帝国将部分地由另外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国所继承,该事实也意味着世界正在由多元走向一体化。

"世界只有一个,虽然我们提及旧世界和新世界,但是这是因为后者是我们不久前发现的,而不是真的有两个世界。"* 这些文字是由 16 世纪秘鲁的一位西班牙人所写。到 18 世纪,一种国际政治体制已经很清楚主宰着这个世界。欧洲战争日益成为"世界大战",为七大洋和遥远的大陆而战。迟早,任何海外领地的大规模交接以及全球任何地区权力或财富的大变动都会影响国际力量的平衡。

18 世纪的世界并非精神上的统一世界,大部分的欧洲人并不了解其他文化。但是西方商品已经几乎渗入世界各地。一少部分受教育的人正在出现,从专业的地理学家到新闻工作者、外交官和业界人士,他们处理着在现代词汇中所谓的世界事务。也许,帝国主义最强有力的作用是,世界历史以及西方文明史似乎日益重叠,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开始以西方的语言、以强加于它的西方地名来撰写。

依据惯例,大发现时代结束的时间是 1779 年——是年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船长在桑威治(或夏威夷)群岛遇害。正是库克,在三次大航行中使太平洋的完整轮廓为世

---

* Quoted in J. H. Elliott,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59.

人所知,从合恩角到白令海峡,从新荷兰(今日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到日本,还包括南极海的内部。当然,还有许多地方尚有待发现,还有许多荣誉尚有待赢得,但是从现在开始,更多的发现和荣誉存在于各大陆的内部而非海洋之上。

## 七、本章小结

在近代的早期,代表西欧国家的探险者跨越浩瀚的海洋去发现其他的文明。凭借着优越的物质条件以及科技力量,尤其是轻武器,欧洲人创建了诸多帝国。欧洲扩张的动机各不相同,从为上帝服务的渴望,到对荣耀、黄金的追求,同时也包括战略需要。

亨利王子为了促进贸易、国力和基督教事业的发展,指挥葡萄牙人开始了早期探险。1488 年,B. 迪亚士绕过好望角;1497 年,瓦斯科·达·伽马乘船抵达印度。其后不久,葡萄牙在东方贸易中获得了支配地位。

就一般而言,欧洲人蔑视东方文明。利用印度军事和政治的矛盾,欧洲人能够以相对较少的人来控制这个次大陆。在印度,欧洲人发现了一种不容易改变的种姓制度。进一步向东,在中国,他们发现了一种古老而又历尽沧桑的文明。借助于由高级官员运作的官僚机构,中国的皇帝统治着庞大的帝国,而后者则牢固地建立在乡村基础之上。

葡萄牙以重商主义的原则建立了贸易帝国。它认为宗主国应该提供工业制成品来换取殖民地的原材料。其他国家被排除在宗主国所建立的贸易垄断之外。尽管葡萄牙人开始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在 16 世纪,他们受到了法国人、荷兰人以及英国人的

挑战,并最终他们失去了在东方的支配地位。

1492年,一位经验丰富的航海者哥伦布,发现了“新世界”,并宣称它属于西班牙。在哥伦布之后,特别是当探险家寻找绕过美洲的西北或西南航道之时,所“发现”的新世界越来越多。欧洲人对于“世界”的范围和多样性的认识成倍地增长。

科茨和皮萨罗的征服行动使西班牙在美洲拥有了一个辽阔的帝国。西班牙在其新世界殖民地建立了一个由总督代表国王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制度。印第安人皈依了基督教,并受到1542年颁布的《新法》的保护。尽管如此,数以百万计的印第安人仍死于来自欧洲的疾病和虐待。

17世纪,英国侵占了荷兰与瑞典的早期殖民地,并在北美建立了永久殖民地。虽然新英格兰居住着加尔文教徒,南部殖民地居住着圣公会教徒,但是殖民地之间的差别还是受地理、气候以及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与西班牙和法国殖民地不同的是,英国殖民地的皇家总督缺乏广泛的官僚式管理,而前者的皇家总督则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庞大官僚机构。

在由卡蒂埃和尚普林探险的圣·劳伦斯地区,法国人建立了新法兰西贸易公司。虽然寻找毛皮促进了对北美内地的开发,但是该地区并没有大量殖民。

无论是西班牙占据的西印度群岛——那里的食糖、烟草、水果和咖啡作物都是有利可图的出口产品——还是东印度群岛,都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战场。法国、英国与荷兰在非洲都建立了沿海据点,但是却没有向内陆扩张。在中国和日本,统治者将法规强加于外国人。到17世纪中叶,日本实际上将自己封闭起来,这种自为的与世隔绝一直持续到1853年。

在西欧国家扩张于海外的同时,俄罗斯也拓展出一个辽阔

的亚洲帝国，从西伯利亚一直延伸至太平洋。

欧洲扩张的时代导致了恐怖的奴隶贸易、土著人口的灭绝以及存在数世纪之久的社会结构的弱化。新的产品以及对其他信仰和习俗的了解，在西方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扩张使欧洲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当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以及俄罗斯在非洲、亚洲和新世界探险之时，他们为国际政治搭建了数世纪后即将出现的历史舞台。



# 第五章

## 宗教改革时代

"宗教改革"在以下几个方面处于基督教的核心位置：在基督与犹太教的关系上，在克勒沃的圣・伯尔纳与本尼狄克修道院规之间的关系上，在圣佛兰西斯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上，在威克里夫与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的正式信条之间的关系上，在宗教会议运动与教皇之间的关系上。基督教是《圣经》的宗教，而且《圣经》易于受到影响，正如欧洲人在16世纪所发现的，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解释。一代代人将会回归到其中的某一个或其他方面——四大《福音书》中阐释的耶稣生平，《使徒行传》，《保罗书信》关于真正的基督徒实践的特别描述。一代代人都将会发现教会实践的弊端、教士行为与基督本人所力行的规范之间的差距，财富和权力与日俱增的教会对耶稣所阐释的全部教义都充满争议。

16世纪的问题并非"为什么要进行宗教改革？"马丁・路德(1483—1546)没有将自己视为新教会的创立者，而是认为自己恢复了那个已经被中世纪的虚构腐化了的教会。约翰・加尔文

的教会,被鲜明地称为"改革教会",它再次记录了这样一种感觉,即他们的教会是保守的,并且真实地复原了古老而纯正的教会。再洗礼派比其他派别更加以模拟《使徒行传》和《福音书》中的文字描述:他们不仅实行成人洗礼,而且还在简陋的桌子上,用朴素的器具、普通的面包和葡萄酒举行圣餐礼。

正如殉教史传记作家约翰·福克斯所论及的,每个新教群体都认为他们是在向一个更纯洁的教会回归,而不是在创建一种新型的教会实践、新教义或新信仰。许多改革家所呼吁的主张都确有先例,至少可以从威克里夫和胡斯那里寻得一些,但经常还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克勒沃的圣·伯尔纳或者唯名论神学家那里。在16世纪的欧洲,数以千计的虔诚教徒正在寻求复原《圣经》中所描述的纯正教会。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为什么对宗教改革的呼吁在16世纪会导致统一的纯正教会的分裂,而且每个新生教会都自称是唯一的纯正教会。

想要了解16世纪的改革与以前有什么不同,最好从集中反映基督教世界的教徒皈依情形的文献着手:这就是伊拉斯谟的希腊语《新约全书》。伊拉斯谟(1466—1536)收集和比较了希腊语《新约》文献的残片,并于1516年出版了一个新版本,即乌里希·茨温利(1484—1531)热衷的那一版本。1519年,与第二版希腊语《圣经》同时出版的拉丁文《圣经》,直接显示了《福音书》的内容,强调公元3世纪哲罗姆译本拉丁《圣经》没有耶稣演讲的记载。《圣经》的鲜活,最初是那些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等文献语言之人的贡献,而后很快便归功于那些在16世纪20年代后阅读本地语《圣经》译本的人。

在16世纪,《圣经》已经成为一部革命性的文献,因为木匠、农民、城乡雇工、富人和穷人都仰仗《圣经》来告诉他们基督徒应

该怎样生活,应该如何崇拜上帝。伊拉斯谟认为任何阅读都应该结合"传统",即在此前150年中阅读《圣经》的诸多学者的解释。然而,路德呼吁基于信仰的阅读,呼吁基督徒与《圣经》之间的直接联系。用市集语言,即本地语成书的各种版本的《圣经》在16世纪以几何方式裂变剧增,这是因为新技术的使用、活字印刷术,以及由城市贸易和艺术精英所构成的新消费者市场的出现。数以千计的基督徒阅读《圣经》,或让人读给他们听,第一次聆听耶稣的布道——耶稣并非是地方教区中的教士,他告诫每一位聆听者应该怎样过一种基督徒的生活。《圣经》将耶稣带进家庭,带至炉边,带到作坊,带进各类欧洲人的日常生活。

《圣经》给予16世纪的世俗人士一种权威,让他们可以借此来批评教会,特别是教皇。长期以来,许多教俗基督徒已经意识到教会需要净化。然而,教皇的反对阻碍了欲提升宗教会议代表权力的努力。伊莎贝拉皇后和红衣主教吉米尼兹的大革新运动仅限于土地。与此同时,共同兄弟会的活动也悄然推进了天主教的复兴。14世纪70年代在低地国家创建的兄弟会都是世俗男女,他们在共同生活中共享资源,并且遵循那种没有誓言的精神化的修道规则。

与烦琐哲学相对,兄弟会创建了自己的学校。在其中的一所学校中受过教育的伊拉斯谟,虽然曾经抱怨其课程太过正统和严格,但却将兄弟会的宗旨融人其"基督哲学",后者坚信耶稣的行为范式应该成为世人日常生活的指南。兄弟会成员之一托马斯·坎皮斯写道:一个用更加神秘的术语表达的相似主题贯穿了这种极为流行的仿效基督行为。

多米尼克修士吉罗拉莫·萨佛纳罗拉(1452—1498)发动了一场更为激进的、横扫一切的改革。其雄辩的布道和久负盛名

的预测未来的天赋,使他迅速成为佛罗伦萨最受欢迎的传教士。在谴责非基督徒行为时,他决不放过任何一项,曾经发表了诸多激烈长篇演说,借以批判佛罗伦萨贵族和主教。在伟大的罗伦佐死后(1492 年)的政治混乱中,萨佛纳罗拉在佛罗伦萨取得了权力和声誉,并吸引了许多热情的支持者。至 1494 年为止,他实际上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独裁者,曾组织儿童军去收缴所有"无价值的东西"——从化妆品到异教书画,然后在公共篝火中焚毁。对毁坏圣像运动的热衷并没有持续太久,当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颁布禁令停止佛罗伦萨的宗教权,并且开除萨佛纳罗拉教籍以后,其追随者便散去了。1498 年,萨佛纳罗拉被斥为异端,并处以绞刑,随后其尸身也被焚毁了。

作为后世人,我们能够辨别出不同教会的"创始人",即那些为新宗教团体和寻求创建新思维的社团提供核心思想的人们:马丁·路德,乌里希·茨温利,以及最重要的约翰·加尔文。然而,同时期还存在着许多"宗教改革家",数以百计的男子和少数妇女都积极布道,呼吁改革教会、与罗马教会脱离关系,以及做真正的基督徒。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些人如何创建"教会"?——这并非只是简单地将男人、女人和儿童在某一时刻聚集起来,而是建立一种拥有相关组织、官僚机构、礼仪、教义、信条和宗教认同感的体制。

"新教徒"一词始于 1529 年,当时在斯比尔召开的国会——神圣罗马帝国的立法及司法院——废除了三年前颁布的针对路德派的宽容法案。路德派的代表,即少数派诸侯正式对国会提出"抗议",该词是法律行为上的一个专业术语。因此,他们以"抗议派"而闻名。该词的政治背景是理解如下问题的关键:即为何今天的教会并非像基督徒一样多?一名奥古斯丁派修士如

何只身创立了一个教会,一个连罗马教皇都无法像对待威克里夫和胡斯那样进行镇压的教会?

宗教改革的历史与我们正在追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是不可分离的。如果没有印刷术,没有城市的密集人口,没有频繁宣讲《福音书》的市集,没有诸多寻求通过虔诚之道来摆脱与其社会地位相适宜的封建桎梏的新社会群体,没有出现那些运用马基雅维利的工具论来实现稳固及自治目标的王公诸侯,那么 16 世纪的转变是不可思议的。路德和加尔文都是在与各自地域的政治权威的对话中精心构思了其教会。他们不仅分享了中世纪改革家坚定的信仰观念,而且能够将之迅速、广泛地传播给更多的基督徒。最后他们还提出,信仰不仅是内在的,而且对每个人而言也是独特的。它不是由教士或教皇进行评定,而是在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私密关系中获悉的。

在 16 世纪末,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真教会,只是有天主教、路德宗、改革派①、安立甘宗、浸礼宗以及许多更小的派别。所有派别都源于中世纪的基督教会。所有派别都允许世俗人士比中世纪前辈更广泛地参与教会生活。所有派别都在教义、礼仪和伦理层面有所改革。只有一派继续尊教皇为真教会领袖:即天主教。最有力的影响是,欧洲人不再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信徒团体,而是属于"真正的信徒团体"——数以千计的欧洲人已经接受了将自己与其他人分开宗教认同感:父子之间、夫妻之间、臣民与君主之间的信仰都各不相同。基督教世界已经不在,只有基督徒的概念尚存。

① 加尔文宗。——译者

## 一、新教创始人

### 1. 马丁·路德(1483—1546)

马丁·路德(1483—1546)是威腾堡大学的神学教授。1517年,他经历了一次伟大的宗教顿悟。路德的父亲曾经将其送至当时德国最富声望的爱尔福特大学去学习法律,但路德却渴望代之以宗教生活。在返回爱尔福特的路上,他被一场剧烈的雷暴雨所惊吓,并发誓成为一名僧侣。于是,不顾父亲的反对,路德加入了奥古斯丁修会。

然而,在圣职授任仪式之后,路德经历了一次长久的深刻的个人危机。他被确信已经迷失——完全地迷失。任何事都无法将其从自我苛责的情感中解脱出来,他认为自己不能得到上帝的恩宠并且注定要下地狱。最后,一位忏悔神甫建议这位绝望的年轻人去研究《圣经》,做一名《圣经》导师。通过阅读《保罗书信》和圣·奥古斯丁的著作,路德逐渐找到了其焦虑原因的答案:即他应该对上帝以及自身救赎的可能性充满信心。

路德本人强调信仰,即某种不可视的,但假如我们能看见,又存于我们内心的事物,而不是由现存的宗教机构所实施的神功。由于对信仰的坚信增强了路德的勇气,所以他对天主教会的宗教实践提出质疑,认为其充满弊端。他以《九十五条论纲》的形式记录了这些问题。《论纲》试图证明有违基督本质的具体弊端是出售赎罪券,尤其是多米尼克僧侣约翰·泰臣(约1465—1519年)的活动,后者正在为重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而发动自愿捐献。一位德国的教会诸侯也与赎罪券利益攸关,

这就是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弟弟艾伯特,他已经为了获得“赠与”赎罪券的特许权而向教皇支付了一大笔资金。

赎罪券使得豁免原罪的世俗惩罚成为可能。只有上帝能够饶恕原罪,但悔改之人也一定要通过苦行和死后炼狱的形式经历世俗惩罚,在炼狱中,他们以临时性惩罚来弥补过失,并为进入天堂做准备。赎罪券不能确保对罪的宽恕,但他们能够缓和苦行、部分或者全部炼狱中的惩罚。教会宣称,能够施以这种赦免的唯一权威是善功宝库——一种存贮基督、圣母以及其他圣徒的神圣活动积累起来的过剩善功的宝库。

将“出售”一词与赎罪券联系起来是新教的一种宣传形式。天主教坚持赎罪券不能“出售”,而是由教士“赠与”,并且接受方的任何财政捐助都是一种自主奉献。然而,在这方面非常成功的泰臣却将赎罪券的复杂理论简化为一句口号:“钱币在金库边缘叮当一响,炼狱中的灵魂即自由而上天堂。”

在神学上,路德与教会长者的争论已经超越了基督教思想冲突中最古老最持久的一次:即信仰与善功之间的冲突。信仰是内化的,而善功是信念的外化示范,表现为个人的善行、对圣礼的参与以及对苦行的顺从。赎罪券提供了一种允诺,即人类可以通过利用善功宝库中的贮存来赢得更多的善功。

在回复路德的论点时,教皇非常强硬,而这又激起路德派的进一步反抗。此外,路德也因之而被驱使去弱化善功的重要性,甚至完全否定其有效性。在对抗的压力下,路德断言世人唯信而称义。接下来,他也否定了教士是必要中介的观点,并肯定了所有真正信众的祭司品质:“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祭司。”

其中令人费解的是,为何天主教会花费了那么长时间才答复路德?路德在 1517 年发表了论战檄文。当时,泰臣显然是在

保持沉默,因为其无耻的兜售技巧已经在德语区遭到了广泛批评。至于教会本身,无论是美因兹大主教还是教皇代表,都没有直接就路德的抗议发表言辞,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一年以后。这位大主教与罗马的最初通信关注了路德对泰臣的批判所带来的灾难性的财政后果,而不是路德对整个善功理论体系的批驳所产生的更具灾难性的潜在影响。在罗马,来自于美第奇家族的教皇立奥十世(1513—1521 年在位)是一位有教养的文学人士,他深陷于意大利政治,进而没有特别关注路德挑战的重要性。他反应迟缓,甚至给予路德一个更重要的发表言论的舞台。1518 年,路德被召到奥格斯堡的教皇使节和多米尼克修道院院长面前,被命令放弃某些关于赎罪券的主张。路德拒绝合作。1519 年,一位博学的神学家约翰·埃克在莱比锡指控路德在辩论中违背了教皇和宗教会议的权威判决。路德否认了教皇和宗教会议是必要的权威,并且明确宣称自己拥护在一个世纪前被康斯坦司会议斥为异端的扬·胡斯的某些教义。

路德并非简单地挑战教皇引领基督徒的权威。他将《圣经》的权威性置于教皇权威之上,这一举动不只是反叛,还是革命。他不接受教皇的权威,不接受以罗马为领袖的教会的权限。在 16 世纪 20 年代末,一份教皇训令谴责了路德的教义,路德便将之焚毁。在 1521 年 1 月,路德被施以绝罚。1521 年 4 月,在沃姆斯帝国会议上,他也否决了皇帝在精神事务上的权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对其颁布帝国禁令。到 1521 年夏天为止,马丁·路德既是一个被逐出教会之人,同时也是丧失公权者。

尽管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已经正式宣布路德有罪,然而路德不仅存活下来,而且还走向了成功。路德已经集结了大量追随者。他拥有萨克森选帝侯智者弗雷德里克(1493—1525 年在位)



卢卡斯·克拉那赫绘制的《马丁·路德肖像》,现存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Scala/Art Resource,NY)

的保护,并且很快赢得了其他诸侯的支持。在路德从沃姆斯返回的路上,弗雷德里克安排绑架了这位丧失公权者,然后路德隐居在瓦特堡,并在那里开始将《圣经》翻译成鲜明而生动的德语。第二年,路德变成了民族英雄,回到威腾堡着手重建萨克森教会。

## 2. 路德成功的原因

如果我们进行反思,那么,这将是一段非凡的历史:一位修

士只身反对欧洲两个最有权势的统治者的权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二者都拥有不可估量的财富和广泛的影响力——而且，他还不只幸存于世，同时也非常成功。这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答案部分存在于路德神学及其威力：它呼吁信仰超越于善功之上，内化的信仰超越于外化行动之上，直接理解《圣经》重于教士的中介作用，同时认为教会中的世俗男女都拥有如教士一样的成就信仰的能力，在教会中应该使用生活中的语言，而非教会精英的语言。印刷机将其思想传播给一个世纪以前不可能实现的更广泛的读者群。路德也受益于萨克森选帝侯的保护，后者在其阵营中颇具威慑力。此外，教皇立奥十世的误算也有利于路德的成功，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让其把注意力转向这位反叛的僧侣，尤其是从对神圣罗马帝国政治前景的关注中转移开来。

在路德成功的过程中，分歧远不止于神学。凌驾于诸多地方议会之上而得意的教皇，已经卷入了意大利政治。路德青年时代所访问的罗马是一幅让其震惊的弥漫着阴谋与奢华的场景。路德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批判了与许多人都格格不入的教会实践；另一原因是他具体批驳了意大利人对德国的剥削。在《致基督徒贵族书》中，他宣称：

> “因为罗马是世上曾经出现过的或即将出现的最大的盗贼……即使我们是可怜的德国人——因为我们一直被欺骗，……现在是光荣的条顿民族应该停止做罗马教皇的傀儡的时候了。”*

---

* Martin Luther,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in *Document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ed. H. S. Bettenson,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96.

文献记载

## 路德论基督徒的自由

1520年,马丁·路德撰写了《论基督徒的自由》。作为路德作品中"最优美的篇章",《关于基督徒的自由的论文》(其正式篇名)是一篇宣言而不是一份抗议书。路德称自己这篇随笔是呈送给罗马教皇立奥十世的一份礼物。

许多人都认为基督徒的信仰轻松易得,而很少有人将之置于美德之列。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也从未体验过信仰中究竟蕴涵着多么伟大的德行。除非曾经领略过信仰在危厄之时给予一个人的勇气,否则不可能很好地表达它或理解那些既成文字。但是那些模糊意识到它的人也不能写出、说出、思考或聆听到充分的相关事宜。因为它是流入永恒的生命的泉,一如《约翰福音》第四章中的基督徒所使用的称谓。至于我,尽管我有信仰的财富可以夸耀,而且知晓我的珍藏多么芳香,然而我希望在其伟大的、与众不同的吸引力的作用下已经获致了些许信仰,希望能够谈论它,即使不像那些咬文嚼字者和所有过于狡黠的辩论者所论及的那么优美,但肯定要比他们说得更中肯,因为他们甚至根本不理解自己写下的内容。

为了让那些未受教育者——因为他们是我确实要为之服务的——更容易理解,我首先确定了两个关于精神的自由与束缚的命题:

基督徒是最自由的君王,无须臣服于任何人。

基督徒是最恭顺的仆从,臣服于任何人。

尽管这两个命题看似彼此矛盾，然而，如果能够将之合为一体，那么它们就可以完美地为我们的目标服务。因为它们既是保罗本人在《柯林斯前书》第九章中所言，即“我原本是自由的，所以我让自己成为所有人的仆从”，同时也是他在《罗马人书》第八章所言，即“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爱在本质上是乐于服务，并且臣服于所爱之人。因此尽管基督是所有世人的主，他还是使自己受造于妇人，并置身于世间的法律之下，他借此既拥有自由也分享了服从，既是上帝之形也是仆从之身……

Martin Luther, *Christian Liberty*, trans. W. A. Lambert(Philadelphia: Muhlenberg Press, 1943), pp. 5—6. Used by permission of Fortress Press.

为了赢得尽可能多的读者，他用德语撰写了《致基督教贵族书》，而其愿望的进一步实现则不仅展现了本国语与印刷术相结合的强大力量，同时也表明了新生的民族认同感。路德对教皇权的挑战在德国人尽皆知，它表达了帝国中普遍存在的与罗马教皇之间的距离感。路德与一名前修女之间的婚姻生活戏剧性地结束了他与罗马之间的关系。路德的《圣经》译本及其编写的赞美诗集已演化为德国文化的一部分，而路德的德语也的确是现代德语的范本。

然而，就路德的成功而言，其原因也在于对立势力的相对瓦解。宗教上的敌对势力主要集中在罗马天主教会的上层。许多温和的天主教徒则更急于妥协以避免产生分裂。伟大的天主教历史学家埃克顿(1834—1902)曾提出，即使路德一直妥协，天主

教会是否会由一个愿意改革以保持教会统一的教皇充当领袖?路德的才智卓越的助手菲利普·梅兰希顿(1834—1902)是一名温和的人文主义者。但是,一旦路德被革除了教籍,被宣布为逃犯,并得到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那么妥协就不太可能了。

路德的政治敌对势力集中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小查理,即1519年登基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周围。查理是中世纪长子继承体制的最大受益人,依据该原则,由长子来继承家族的头衔和土地。当查理登基之时,他已经以外孙的身份继承了阿拉贡和卡斯提尔的王位,包括其在美洲的占领区。而当其祖父死后,他又直接继承了哈布斯堡家族在蒂罗尔、斯提里亚、奥地利以及匈牙利。同时,他还从祖母手中继承了勃艮第——这是他成长的地方——及其在意大利的据点。对查理而言,这些不同的领地既是一笔举世无双的财富,也是不能将精力集中于一方的根源,因为他寻求依据各地特有的政治惯例来进行统治。纵观其整个统治过程,他一直面临着西班牙贵族、尼德兰臣属、帝国诸侯及各地新教徒的反叛。然而,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帝国东部边境出现相比,这些几乎都没有引起他的注意。我们也许认为,路德是其最重要的对手,但对查理而言,真正的敌人是土耳其人。为了寻求攻打土耳其人的战争经费,查理一次又一次地与德国诸侯达成妥协,只能在与土耳其帝国作战的间隙中转而镇压他们。

查理主要通过代理人来实行统治。1522年,他任命其兄费迪南代管帝国德语区,委托其对数以百计的诸侯国及帝国城市进行日常和定期管理。费迪南将巴伐利亚和美因兹结成联盟,并在其他地方建立了一个天主教政治联盟来反对路德教诸侯。



提香的《皇帝查理五世像》。(Erich Lessing/Art Resource,NY)

新教诸侯和城市的军队结成了由黑森伯爵菲利普(1504—1567)领导下的"士马尔登同盟"(该名称取自于士马尔登城，1531年同盟成立于此)。查理最终于1547年绞杀了该同盟，但

其胜利却极为短暂,因为这威胁到并且打破了从前的实力平衡,同时也为教皇和德国的天主教及新教诸侯敲响了警钟。1555年,在查理统治末期,他被迫接受了由帝国会议磋商制定的宗教协定——《奥格斯堡和约》。

该和约正式承认了路德教徒在其控制的德意志各邦的合法地位。其指导原则是拉丁文短语"教随国定"。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如果萨克森选帝侯是路德教徒,那么其臣民也是理所当然地是路德教徒;如果巴伐利亚公爵是天主教徒,那么所有的巴伐利亚人都将是天主教徒。对于新教诸侯国中的少数天主教徒,抑或天主教各邦中的少数新教徒,该和约没有制定相关条款。《奥格斯堡和约》也没有承认路德宗以外的其他新教派。日益增多的加尔文派教徒和一些更为激进的新教徒在神圣罗马帝国都没有取得合法地位。此外,尚未达成协议的有关"教会财产权益保留"问题,即究竟应如何处理那些皈依新教的原教会领地的教产问题,势必将引发更大的麻烦。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不足,但《奥格斯堡和约》的确为新教在德国的和平永久确立构筑了可能性。

## 3. 一场保守的革命

路德并未将其"因信称义"和"平信徒皆为祭司"的教义推至其逻辑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宗教完全是"人与神"之间的事,那么也就不需要一个有组织的教会。16 世纪 20 年代早期,当激进的改革家们试图在萨克森教会中贯彻这些理念时,出现了观念混淆的状况,接下来就是毁坏圣像和宗教革命。路德对此并未给予同情,他曾离开受庇护的瓦特堡,前往威滕堡去驱散那些

激进派。然后，他与其追随者一同建立了一个萨克森教会，不仅允许教士结婚、强调布道，而且也囊括了圣职授予、例行仪式、信纲以及三种圣礼（洗礼、告解和圣餐）等内容。

路德派信徒并未建立一个与天主教会相对的对立教会，而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纯正教会。虽然在路德宗建立的地方，天主教会都停止实行神权，但路德教徒通常只是接收了教会建筑而已。在路德及其宗教和学术门徒的促进下，改革进程最初只是在没有政治领袖干预的德国人中推进。1525 年，条顿骑士团团长在皈依路德宗以后解散了骑士团，并成为第一任普鲁士公爵。与此同时，许多自由城市也选择了路德派教会。

近年来，历史学家的相关争论主要集中于城市在新教兴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一些人认为神圣罗马帝国的自由城市往往会受路德教义的吸引，因为市政机构已经强调了那些最为路德看重的基督教元素。那些正在朝有限中央集权方向发展政治体制，无论是城市国家还是新兴的中央集权君主国，都明显倾向于新教，因为超验上帝的观念与强调同上帝沟通渠道的唯一性的观点颇为相容，一如其与那种复杂的多方位范式的对立一样。此外，中央集权政府，尤其是那些商会代表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政府，发现自己很容易认同那些教导人性本质堕落的宗教思想。路德关于人性本质的观点为市民阶层对被称为“巨兽”的任性暴民的恐惧提供了依据。因此，路德在政治上偏爱其人性观念的地区最为成功。

另一些学者驳斥了上述观念，他们认为政治或社会结构先于观念，即使某种结构是从某一信仰模式中发展起来的，或者反映了后者。然而，所有人基本上都认同城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人口集中于城市，印刷术的威力在城市背景下可以

更迅速地发挥效力。

其他社会群体也借助路德教徒的起义来表达自己的主张。在德国的社会金字塔内,位列于教俗诸侯之下的是骑士——小贵族。其中一些人拥有一座城堡以及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土地,并且在理论上也拥有同萨克森或勃兰登堡选帝侯一样的主权;另外一些则只是单纯的小领主。许多骑士都生为幼子,是无地贵族,唯一的事业是从军。路德对现存秩序的挑战以及他给予骑士的接管教会地产的机会,实在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良机。

然而,早期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中最惨烈的社会冲突是1524—1525年的平民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它与14世纪英法的农民起义相仿:许多不满情绪都来自乡村,并且直接指向领主。在另外一些层面,平民革命又与中世纪的农民起义划清了界限:不论在领导层还是普通成员中,都有手工工匠,其中一些很贫困,但更多的是发达的有责任感的市民。依据同时代人的记载,这场革命在地理范围和绝对人数上都是空前的:可能超过10万"平民"加入,席卷了修道院、庄园和城镇。此外,引人注目的是,其不满情绪同时融合了经济和宗教要求。那份最广泛地体现了不满情绪的请愿书——《十二条款》,首先提出了祭司选举权,而只是在接下来的条款中才列举了较传统的自由使用森林和草场的要求。

也许最重要的是,在平民革命的领导者中有一些神学家。他们号召将所有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活动皆置于神法准则之下。他们并未寻求废除什一税,但要求公平地使用它。一些人试图建立一个人世间的基督教乌托邦。这是宗教改革早期最激进的一派,如其所为,他们追溯到基督教的根源,试图仿效使徒时代的平等主义和自治主义的生活方式。

路德和全帝国的市民们一样都为这种独特的圣经主义所骇然。他不只是简单地批判其阅读《圣经》的方式，而且呼吁为了正义而根除这些“谋杀的、偷盗的农民部落”，路德曾在大革命期间发表了一本以此为题的小册子。路德与政治权贵之间的联盟也是届时而建立的。他认为世俗权威对人类的罪恶本性进行统治是必要的，而且为了控制人的行为，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也有必要合作——这就是“双剑说”教义。直至 1525 年，路德在政治上都是保守的。他对全体基督徒明确表示其反对利用《圣经》重塑社会秩序或政治秩序。神的正义不能等同于社会正义。而且，路德宗将成为各德意志诸侯国、丹麦以及瑞典的“国家宗教”，为各个王朝的政治目标服务。

路德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中的保守性，无疑与其在精神上的根本主张相互矛盾。对路德而言，假如可视的外部世界真的完全从属于不可视的精神世界，那么人们渴望从政治世界中获得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尽可能地维持外部世界的良好秩序，以便精神能够勃兴。权威、习俗、法律以及现存的制度将共同为这种秩序提供保证。

路德拒绝承认《圣经》的革命性潜质是以失去在农民和手工业者中的群众基础为代价的。他的吸引力主要保持在城市市民和贵族层面。在那些更讲求公社式管理传统的地方——尤其在瑞士邦联、斯瓦比亚、帝国的自由城市以及低地国家，路德的保守性促成了一种早期觉醒。在这些地方，瑞士神学家乌里希·茨温利和法国人文主义者约翰·加尔文的观点更引人注目，他们努力组织一个与路德的主教制教会相比更弱化等级、更贴近使徒传统的教会，进而能够与商会管理传统和广大市民阶层更相容。尤其是茨温利，即使当其部分思想有所改变之时，依然呼

吁用“基督徒的兄弟之爱”来组建社会。直至1531年战死,茨温利在帝国南部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都比路德更受欢迎。

## 4. 乌里希·茨温利(1484—1531)

16世纪并非因对教会流弊,甚至教皇的批判而闻名。将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与同时代的天主教改革家以及中世纪的先驱者们区别开来的,是他们对“罗马教会”的否定。“罗马教会”是16世纪新出现的短语,标志着人们已经普遍感觉到教阶制与世俗男女需要的分离,同时也表明世人在语言和民族意识层面认同感日益增强:对世人而言,教皇是意大利人,而不是一个普世教会的领袖。的确,约翰·加尔文曾经称其教会为“普世教会”,以期贯彻古而有之的全体真信徒共同所属的普世教会的概念。正是由于它也是罗马教会的一个名称,新教改革家便不再分享这一概念。

16世纪出现的魅力超凡、充满热情的宣教者和神学家,在绝对数量上也是无与伦比的。没有两个人的观点彼此完全一致。每个人都在《圣经》中发现了“真正的教会”,只是他们在不同的篇章、依据不同的言辞达成了各自的主张。对路德而言,《保罗书信》是开启其发现的关键。构筑1525年革命纲领的神学家之一托马斯·闵采尔(约1470—1525年),则在《圣经》中发现了有关平等的基督徒公社的概念。伴随着多数宣教者相继销声匿迹,其中的两位却塑造了16世纪的第三大传统:改革的传统。其中,乌里希·茨温利(1484—1531)出现得较早,但约翰·加尔文却证明自己更具影响力。

乌里希·茨温利与路德的出身背景截然不同。作为一名瑞

士农民之子，他在瑞士山区长大，其所在的村庄有着较强的自治传统。他最早凭借自己的嗓音脱颖而出，曾被送去学习歌唱，预示着将来有可能承担教职。在瑞士人文主义者的影响下，同时也由于他本人对《圣经》语言的浓厚兴趣，他所接受的教育要比路德更具中性色彩。后来，他便开始用哲学和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神学。

1519 年，他应邀来到瑞士的苏黎世城，这里地处南北贸易通道，当时正对周边乡村实行一种扩张主义政策。根据各种记载，茨温利都是一位颇具天赋的宣道者，其布道易于理解又有极强的说服力。在第一次布道时，他就背离了中世纪的教会实践，改为阅读正翻开的那页《马太福音》，并讲解这一段落。然后，他继续在布道中沿用这种释经法，系统地讲解了整篇《马太福音》。这令苏黎世人深感震惊。

正如加尔文在日内瓦一样，茨温利努力在自己的教区中建立"真正的教会"。他与苏黎世的政治权威合作，改革礼仪，停止"弥撒"。他曾像路德一样继续沿用圣礼，但到后来却只保留了圣餐礼，其间向世俗信徒同时提供葡萄酒和面包，直接背离了中世纪的教会实践。这种圣餐倾向更加贴近原初的逾越节安排，完全是在一张餐桌上而并非祭坛上向所有基督徒提供简单的面包和葡萄酒。苏黎世市议会还改革了对穷人的救济政策，建立了婚姻法庭和道德法庭。它呈现出先前属于教会的司法权限，虽然没有将之世俗化，但提出日常生活应该置于道德和司法的监督之下。

苏黎世是第一个让宗教改革完全合法化的社会，礼仪书以法律的形式在市议会通过，基督徒的道德规范也被市议会法律化了。古代的尘世与精神分野在苏黎世已经被重新界定。茨温

利的人性本质论呼吁全体基督徒都要做真正的基督徒,政府也积极参与对基督徒行为的惩戒和塑造事务,而《圣经》的教促力量更是历久弥新的。在苏黎世,茨温利创办了第一个以研究《圣经》为目的的团体"牧师学园",以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为基本研究语言。苏黎世最有学识的神学家们,即茨温利、其同事牧师立奥·郏德以及人文主义者们在此共同研究《圣经》。与此同时,年轻人坐在周围学习《圣经》语言以及释经原则。

路德和茨温利因圣餐礼的教义而绝交。路德持一种被称为"圣体共在论"的复杂观点,认为面包和葡萄酒将与基督的血和肉共存并交融在一起。圣餐礼的核心部分的神秘很难概念化——事实上,许多路德的追随者都因此而与其分道扬镳。茨温利构想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圣餐。出于人文主义者对人类心理学和想象力的关注,茨温利呼吁再现这一历史事件,这将使信徒感到自身临在于基督的生命之中。他对天主教的圣餐变体论——其间,物质的面包和葡萄酒将借助教士的言辞转变为基督的血和肉——深感恐惧。他形容那种感觉就仿佛是在用我们的牙齿磨碎基督的肉一样。路德讽刺茨温利的观点"只是纪念",但茨温利却对物质与信仰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复杂的辩驳。对他而言,基督的确以加尔文所承继的方式"临在"。茨温利的观点不仅有助于形成加尔文对圣餐礼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形成安立甘宗的传统,尽管后二者在表述上皆非纯粹的"茨温利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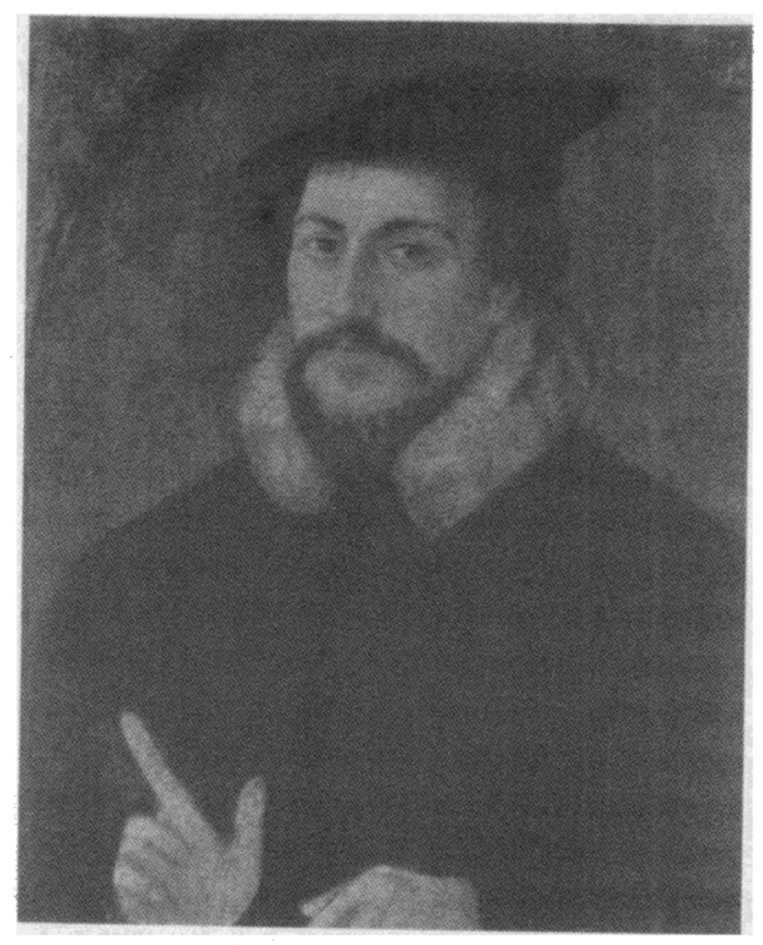
## 5. 约翰·加尔文(1509—1564)

尽管茨温利和加尔文都运用独特的政治手段和虔诚的宗教实践努力在特定社会中建立真正的教会,但茨温利是以本地人

身份来到苏黎世，他本人就曾在类似环境中成长。加尔文则是以一个法国难民的身份来到日内瓦，其大部分成年时期都是在流放中度过的。在日内瓦，加尔文将努力打造一个能让全欧洲的流亡者都能强烈表达其无家可归的混乱之感的“教会”概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加尔文的教会没有特殊的地点要求，甚至可以没有教会建筑。它能够——而且也曾经——在对立邦国的少数人群中建立，秘密地生存，并为近代早期欧洲提供了唯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宗教认同感。差不多有数以千计的加尔文派信徒在法国、尼德兰、苏格兰以及英国受到迫害，在部分波西米亚帝国也同样如此。然而，加尔文的教会构想却为每一位信徒提供了内在和外在的教会组织及教规，同时也提供了选民可以被呼召以见证信仰的观念。比之于其他教会，加尔文宗更多地援引了早期基督徒的经验，后者被迫避开公共监视来进行礼拜，很容易受到国家政权的一时之念的冲击，必须有坚定信仰，即使它只是认同感的一部分。

加尔文的事业与路德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有一个努力攀越经济和社会阶梯的野心勃勃的父亲，他们都曾给予子弟优良的教育。年轻的加尔文曾学习神学，并且为了取悦其父亲，他还学习了法律。两位年轻人都经历了精神危机，加尔文在 20 岁之初即转向了新教。然而，在性格方面，这两个人却迥然不同。与感性而外向的路德相对，加尔文是一个非常讲求隐私之人，一位知识分子，行事一丝不苟并且对皈依他人的使命充满信心，但同时又对试图背离教义的不规范生活充满了忧虑。

1536 年，加尔文在巴塞尔出版了《基督教原理》，为像茨温利的教会那样完全与天主教会的组织和礼仪划清界限的新教奠定了教义基础。加尔文的体系逻辑严谨全面，能够使人充满信心。



汉斯·霍尔拜因的《约翰·加尔文像》。(Hekman Digital Library, Calvin College)

同年,加尔文途经日内瓦,并受邀停留。在此,他开始组建“上帝之城”,使日内瓦成为吸引欧洲各地新教流亡者的一块磁石,让他们接受加尔文教义的洗礼,然后再返回各自国度去促进

该教义的传播。在一代或两代人的时间内，加尔文主义就传播到苏格兰，那里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伟大的传教士约翰·诺克斯（约 1510—1572 年）。然后又传至英格兰，并从那里被带到新英格兰的普利茅斯。同时也传至部分莱茵地区，传至低地国家，并在荷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还传到了波西米亚、匈牙利和波兰。

在法国，有许多关注罗马天主教会世俗化的地方，加尔文思想也在这里找到了接受者。不久，就出现了被称为“胡格诺派”的有组织的加尔文教会，主要集中在西南部。但是，国王弗兰西斯一世并不急于向罗马教会挑战。1516 年，他与教皇签署了《波伦亚宗教协定》，将皇族权威凌驾在高卢教会之上，希望换回流向罗马的财政收益。在 16 世纪中期，几乎没有人能够想象臣民可以宣告并实践与统治者不同的宗教信仰。因此，法国的新教徒必须为成为继天主教后的国教而战。但是，仅仅在一场于 16 世纪后期持续了一代之久的宗教战争（详见第六章）以后，并且在加尔文主义于法国思想界产生影响后，新教徒的努力就陷入了失败。

## 6. 亨利八世(1509—1547)

在英国，合法的宗教改革运动伴随着国王亨利八世（生于 1491 年，1509—1547 年在位）的离婚问题而展开，因为他的妻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姑母阿拉贡的凯瑟琳（1485—1536），没能为他生育一个男性继承人。1533 年，亨利与已经怀孕的安妮·博林（1507—1536）结婚。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1489—1556）宣告亨利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罗马教皇

仿效 1527 年的罗马绝罚令，开除了亨利的教籍，并声称克兰默对亨利与凯瑟琳婚姻的判决无效。亨利的答复是在 1534 年颁布了《最高权力法令》，宣布英国国王为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领袖。

然而，卷入英国宗教改革运动的远不止亨利八世的个人生活。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群体支持他与罗马断绝关系，那么，亨利就不能保证议会能够通过《最高权力法令》和其他新教法案。许多英国学者都与大陆的改革家有联系，其中之一便是威廉·廷代尔（1494—1536），他热衷于路德式的工作，并出版了一部英文版的《新约全书》。反教权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威克里夫，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反教权主义尤其指向修道院。在许多英国人的眼中，修道院对于他们的目标而言毫无益处，必须改革或取消。

在 1535—1540 年间，亨利八世关闭了修道院，并没收了其财产。在 16 世纪 40 年代，国王出售了其中的大部分土地。主要购地者是新兴的商人阶层和贵族成员，尤其是乡绅或地主。伴随着乡绅阶层的财富的增长，修道院的衰落日益发展成为一场社会经济变革。

亨利八世并不承认自己是一名新教徒。建立在《最高权力法令》基础上的英格兰教会在其眼中依然是一个天主教会。亨利希望能够保留天主教的教义和礼仪，除取消修道院和否定罗马教皇在英国教会中的领袖地位以外，他没有进行更多的改革。他的政策不可避免地招致了反对意见，其中部分来自于英国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们反对切断与罗马教会之间的联系。更多的是来自于激进的新教徒，他们开始向英国教会引介新教的教会实践，例如主张教士婚姻、以英语取代礼拜中的拉丁语、取消告解礼以及取消圣徒祷告等。



小汉斯·霍尔拜因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像》(1540 年)，该画显示了主人公的决心和力量。(Royal Collection © 2002, 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

亨利动用军队镇压了天主教徒的反抗，并处死了一些领袖人物。然后他试图请求议会来遏制新教徒。1539 年，在亨利的请求下，议会通过了《六项条款》，重申变体说、教士独身制、告解

礼以及其他天主教教义和礼仪,将持否定意见者斥为异端。但是,此时需要镇压的异端已经太多。英国正在演变为一个宗教变异和宗教实验的中心,而安立甘教会也比亨利预想的更富新教气质,并转化为民族精神的精髓。尽管亨利可能自认为是天主教会的保持者,但他实际上却是第一个国家教会——英国国教的创立者。

## 7. 再洗礼派和其他激进派别(1521—1604)

新教革命的左翼,即一系列激进派别,在社会和知性意义上不如已经确立的路德宗和安立甘宗,抑或冷静的加尔文派那么"体面"。16 世纪,多数激进派别都被称为"再洗礼派教徒"(源于希腊文"再次洗礼"一词)。许多欧洲的基督教徒逐渐意识到天主教的婴儿洗礼是无效的,因为婴儿太小,还不能"产生信念"或"理解"。最初,再洗礼派在信众自愿加入时为其再次施洗。以后的再洗礼派信徒则要等到一定年龄才获施洗,所以前缀"ana-"就被去掉了,形成了现代的"浸礼宗信徒"(Baptists)一词。

在迫害的高压之下,同时也由于个人阅读和理解《圣经》的普及,再洗礼派发生了分裂。一些评论家认为新教派别日益增多是其宗教实践的必然结果,他们总是在《圣经》中寻求其拒绝在天主教的权威信条中发现的权威。《圣经》涵盖了非同寻常的多样化的宗教体验,从严苛的礼仪到情感强烈的承诺以及神秘主义的舍弃行为。《圣经》也是简单中的迷惑,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而且经常是充满矛盾的解释。许多新派别的领袖都想把天堂直接引入人间。

在 1534—1535 年间,一群再洗礼派教徒在莱顿人裁缝约

翰·布克尔森的领导下占领了德国西北部的明斯特，驱逐了那里的主教领主，并试图依照《圣经》建立一个乌托邦。再洗礼派教徒将路德的因信称义的教义推进到其逻辑上的极致状态，用神学语言描述，就是“唯信仰论”(源于希腊语“反律法”)：每个人都将在各自良知的范围内发现上帝的法律，虽然它不以成文法或传统的形式显现。他们不相信阶级分层或惯有的私有财产形式。现行秩序——即由信奉天主教的明斯特主教和信奉路德宗的黑森伯爵组成的联盟——以武力平定了他们。其领导人皆被处决，而且军队还对该派成员进行了搜捕，直至最后一位信徒。

多数再洗礼派教徒都远离了明斯特一派的狂热。许多人寻求在人世间静静地或以更保守的方式实践基督徒的生活。他们建立了与其崇信的原始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一致的社团——成员彼此皆为兄弟，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并且共同祈祷。这些冷静的多数派再洗礼教徒在 16 世纪也曾遭遇暴力迫害，但是感谢其颇具天赋的领导者门诺·西蒙所坚持的节制和柔顺的主张，他们劫后余生，并演化为门诺派教徒。

另外两个激进的新教教派是神秘主义派和一神教派。前者以皈依路德宗的条顿骑士卡斯帕·施文克斐尔德(1489—1561)为榜样，相信真正的教会只出现在每个人的内在精神中。他强调精神的和神秘主义的层面，其与正统宗教之间的对立，对于反对现存路德宗教会的虔诚派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唯一神教派普遍拒绝承认“三位一体”，认为它是一个非理性的概念，提出基督只是一个富于创造力的人。在 16 世纪，被认为是唯一神教创始人的西班牙内科医生迈克尔·塞尔维特(1511—1553)却持不同观点。效仿他所了解的血液循环理论，他提出了单一神性的上帝的说法，否定基督的救赎作用。正当

塞尔维特希望西班牙的犹太教和穆斯林传统可以与基督教和睦相处的时候，其教义及其毫不妥协的表述方式被许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斥为异端。塞尔维特被加尔文以异端罪起诉，然后于1533年被烧死在日内瓦的火刑柱上。

## 二、新教的信仰与实践

### 1. 共性

一些具有共性的信仰和宗教实践将所有新教派别连为一体，并使之与天主教分离开来。共性之一，即对罗马宣称自己是唯一真正信仰的说法进行批驳。在此，难点是每个新教派别最初都认为自己是唯一真正的信仰、基督及使徒的合法继承人。一些早期新教徒坚信其独特的信仰最终将在缓慢的教育和转变的过程中占据优势。然而，另一些新教派则不能等待，尽管他们本身也曾被迫害，但是掌权以后却毫不犹豫地迫害他人。

人文主义者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1515—1563）在《关于异端》（1554年）中反对加尔文对塞尔维特的迫害，提出权力不应该用来改变宗教观念。然而，这只是少数人意见。在16世纪和17世纪，很少有人能够接受政教分离以及帝国政府承认的多种宗教信条共存的局面。

新教的共性之二是不像天主教会那样强调组织、礼仪以及其他外化之物。所有新教派别都在教士独身制的问题上放松了要求，也禁止或弱化了修道生活。所有新教派别都减少了圣礼，

只保留洗礼和圣餐礼。在所有新教徒中，对圣徒的崇拜衰落了，朝圣和使用玫瑰念珠及护身符的现象也消失了。一些更激进的派别甚至禁止乐器、雕塑、绘画以及彩绘玻璃，因为这些会使人冥思上帝的时候分散注意力。

## 2. 保守的教会

使新教各派彼此分离的信仰与实践上的分歧，可以依据他们与天主教神学的距离的顺序排列。英国国教会千方百计地要囊括所有新教派别，从高派教会到低派教会。然而，它也保留了一种天主教教阶制的形式，设有会督和会吏，尽管它并不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也许安立甘宗的主旨就是要成为一种在等级性和权威性方面较具弹性的信仰，一种简化的仪式主义以及对不完美世界的一种现实主义的认同。

但是，在安立甘宗内部也存在一种强烈的清教思潮。清教主张将朴素的生活与真挚虔诚的思考相结合，是低派教会观念的一个重要变种。在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早期，一些清教徒勉强离开了安立甘教派，而另一些人依然留在该派教会中。

英国国教会在亨利八世和安妮・博林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统治时期确定其权威形式。英国议会于 1563 年通过的《三十九条信纲》是一部关于教会的宪法。其条款反对采用更明显的天主教化的形式：如使用拉丁语、告解礼、教士独身制以及拥护教皇。《信纲》也确认了新教对现今最具象征意义的问题之一——圣餐礼——的态度，一如改革者长期要求的，同时给予圣餐领取者面包和葡萄酒，这与天主教会的只给予圣饼的惯例完全相反。










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的木刻画。这是1521年维滕堡出版的小册子《慈爱的基督与反基督》的13组木刻画中的一组。每组都将《福音书》中所描绘的基督的生活与教皇现行宗教实践相对比。在此，左边一幅表现了基督正在驱逐神庙中的高利贷者；右边一幅则表现了教皇正在收取其运用教皇令迫使普通基督徒缴纳的进贡。(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 Yale University)

英国国教会似乎总是国家万能论的信奉者，即以瑞士神学家托马斯·埃拉斯都(1524—1583)命名的学说，后者是茨温利的门徒，反对加尔文的神权政治实践。埃拉斯都希望提高政治权威的权力来控制宗教权威的妄用。然而，“埃拉斯都主义”一词，逐渐含有国家对教会拥有全权之意，教士只是道德警察。由于安立甘宗在宗教实践中很少走得很远，因此这种改良的“埃拉斯都主义”并未出现于英国教会。

对于局外人而言，路德宗比安立甘宗更像埃拉斯都主义者。作为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多数地区的国家宗教，路德宗通

常是政治权威的驯服工具；而且由于与普鲁士的兴起密切相关，它已经被纳入到普鲁士国家官僚机构的强力控制之下。

路德在内心是一名保守主义者。他希望路德宗的信仰形式能够唤起他过去习惯的林林总总。在确立之初，路德宗保留了许多看似天主教的原初宗教实践，而实际上是路德所展现的向未被罗马腐蚀的早期基督教会的回归。路德宗保留了现今被阐释为"圣体共在论"圣餐礼。优美的教堂音乐传统则不仅予以保留，而且得以强化。然而，路德教会既有强势的福音派，也有保守的高派教会党群。

## 3. 加尔文教派和预定论

如果路德在宗教改革中保存了中世纪教会的大部分内容，那么加尔文则是将难题快刀斩去。基督教最古老的矛盾之一是全能上帝与人类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人类怎能拥有真正自由的抉择？如果人类的选择是自由的，那么上帝又何以是真正全能的？这一论题的核心是奥古斯丁的疑问：罪从何来？如果是人类创造，那么上帝就并非全能。如果不是人类创造的，那么上帝又怎么能创造罪？谁应为原罪负责？

奥古斯丁不是面对这一难题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中世纪神学家不断挑战这一难题，并得到了一些微妙的、略有细微差别的答案。奥古斯丁指出了一条路径，认为上帝存在于时间之外，但同时可以预知人类将有的一切作为，并且只是在人类行为的背景之内保留了自由。在这一细节中，解决方案基于对上帝与人类之间差距的预期，这也是被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是原罪最真实的本质的那种距离：原罪是对上帝的疏离。

对加尔文而言,上帝的全能是杰出的:在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威及其创世者的威力面前,其他疑虑都将不复存在。上帝选择拯救那些愿意被拯救之人,上帝也将选择惩罚那些愿意被罚入地狱之人。人类没有自我拯救的权威——善功对于人类救赎无效。上帝对要施以拯救之人——选民——的选择,对人类而言是不可理解的。上帝的设计是理性的,但人类却不能明辨,因为其理性能力尚存瑕疵。一些似乎是被列入永罚者之中的,由于上帝的智慧,后来可能被证明是选民,所以没有人是确定的选民或弃民。他与路德一样确信人类在本质上犯有原罪。对加尔文而言,信仰是一种复杂得多的经历。信仰不能使人确定自己已被救赎,而是对上帝救赎世人的仁慈充满感激。信仰使人类可以认识到自己罪恶本质以及上帝拯救人类的伟大仁慈。此外,信仰也是来自于上帝的礼物,不是一种人类可以自由选择的心理状态,而是来自于仁慈上帝的无偿的礼物。

加尔文的预定论教义与近代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并不适宜。然而,它当时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被接受的,因为从一切重负中解脱出来的虔诚的基督徒也试图愉悦上帝,即使他们承认自己在本质上并非完美。依据加尔文的观点,人皆有瑕疵。将选民凸显出来的,不是完美无瑕,而是谦卑和感恩。与该教义一致,加尔文构筑了一个首先要对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进行监督的教会——通过教会法庭机构——并且通过经常参加布道和规范私人与公共行为强化信徒的信仰。加尔文将基督徒的生活理解为一个过程,从接受自身的缺失,到渴望通过微小的日常行为、祈祷以及圣礼来敬拜上帝。基督徒试图通过终生的自我反省、谦卑、自我批判以及对神奇而仁慈的上帝的虔诚,来寻求“成圣”,而在这一过程中,上帝的博大和荣耀与人类的脆弱

及缺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加尔文并没有预料到这一教义的许多后果，诸如清教徒的自以为是以及许多改革教会的偏执。他在人性的缺失面前呼吁谦卑，而且他本人终身都在怀疑自己能够被救赎。对加尔文而言，“确定”并非获救赎的迹象。相反，怀疑才是救赎之更为确定的标志，因为它显示了对于人性缺失的内在理解以及上帝的全能。他在日内瓦协助建立的教会监督法庭，为大西洋两岸的改革教会提供了一个或多或少可以追随的楷模，它不仅是一个监督和警示机制，一如其在日内瓦所显现出来的，而且也是一种严格的管理和严苛的强制，这主要表现在其他宗教社团中。

加尔文塑造的宗教监督法庭是牧师起主导作用的机构，意欲训诫和劝告日内瓦市民执著而始终如一地遵守标准的行为准则：即衣着审慎；言辞友善；避免轻浮或诱惑的举动，例如跳舞、打牌或酗酒。16世纪末，荷兰画家记录了一种新式审美观：世人衣着深沉，一身黑色，衣领光秃僵硬，没有文艺复兴时期精致的蕾丝装饰，或者从东南亚进口的珍珠。加尔文教徒的社会风气勤奋而忧郁，摒弃了所有炫耀形式，诸如珠宝或奢侈品，因此在海外发展中积累了大量投资资本。苏格兰的改革教会、英格兰和新英格兰的清教会，以及日内瓦教会都给尘世带来了一种灵魂的外化显现，即在自律的日常生活寻求成圣。不仅星期天在教堂中敬拜上帝，而且在一周七天的每一个清醒的时刻，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从最普通的到最欢愉的事物中，皆应敬拜上帝。加尔文及其追随者没有将“尘世”与“精神”分开，而是认为精神就显现在个人的尘世生活方式中。

加尔文主义以某种方式显现在许多派别中：如英国的长老会和公理宗，欧洲大陆的改革教会。它甚至影响到了安立甘宗

和路德宗。在神学上,其主要对手是阿米纽斯思想,它最早是由莱顿的教授雅各布斯·阿米纽斯(1560—1609)提出的,认为上帝心目中的选民或弃民是有条件的——并非像加尔文所坚持的那样绝对——因此个人在尘世中的作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加尔文宗在哪里成为既定的国家教会——例如在日内瓦、17 世纪 50 年代的英格兰以及马萨诸塞——它就在哪里控制或试图控制其国家。然而,这种神权政治并未完全实现,甚至在日内瓦,市议会也拒绝交出权力。在加尔文主义已经存在的地方,它宣扬并努力摒弃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力。后世加尔文教徒从这种对大众权力的肯定转向运用自身的斗争来反对国王和教士。

## 4. 激进派

在激进派别中,宣教甚至比其他新教形式更重要,而且激情洋溢,充满了对天堂的向往和对地狱的恐惧。许多派别盼望着基督复临的直接到来以及尘世的终结。许多派别是经济上的平均主义者,勉强可以称为共产主义者。然而,他们共享财富不如共享贫困多,贫穷对其而言是基督徒之路的本质。

这些派别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其理想与行为中的某些特殊领域。莱顿的约翰——被冠以明斯特的“大卫王”,有两个饰满珠宝的金冠:一个王冠、一个帝冠,有皇后蒂亚维拉和许多照料他的妇女——仿佛是尊依《圣经》的新教徒的疯狂的代名词。然而,多数再洗礼派教徒都对明斯特的这一幕表示震惊,对多数虔诚的、真挚的和平主义者而言,基督徒应该过简朴而有成就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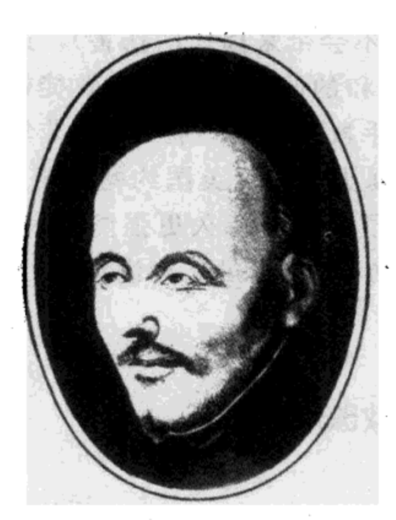
这些派别经常明显地表现出和平主义与欣然参战相融合的

倾向(只要其手段不会带来肉体的伤害)。这样的人也是殉道者,并且是被更温和的改革家们以新教徒惯常会归于天主教宗教法庭的暴力手段所迫害。但是,并非所有的派系主义者都一贯地坚持非暴力主义。英国约翰·班扬(1628—1688)的《天路历程》探讨了一种更持久更强烈的观念,后者展现了一则终生朝圣者的传奇,其间虽然充满荆棘,却导向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 三、天主教的宗教改革

虽然新教经常置于16世纪宗教变革的核心,但是它依旧是少数人宗教——迄今依然如此。以教皇为领袖的天主教和新教都源于中世纪。然而,与新教不同的是,天主教信奉其中世纪之源,宣称其"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圣·彼得时期。那些称自己为"天主教教徒"的人并不拒绝改革,但是却试图从其传统内部进行改革,消除"恶习",一如他们保留了那些源于中世纪早期,并在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上得以确认的宗教实践。一切改革都越来越关注世俗的精神需求。的确,使天主教的改革闻名于世的,主要是改革了教区教士的训治,并创建了以服务世俗为要务的新修会。

天主教进行了大规模的内部改革,并取得了成就。由于重新夺回了在德国、波西米亚、匈牙利、荷兰和波兰的教区,天主教限制了新教在西方的传播。虽然许多人把天主教改革的特点概括为"反宗教改革",但是欧洲大地上再天主教化的成功是一种更加积极的、灵性的再生,它使天主教的基本信仰和宗教实践得以复兴。



西班牙画家克劳迪奥·科埃略所画的《依纳爵·罗耀拉肖像》,这是他的唯一一幅写真肖像。(Credit TK)

然而,倘若没有世俗的帮助,这些信仰和宗教实践就不可能保留下来。强大的哈布斯堡家族,无论在西班牙还是在奥地利,在以后的几代,都是活跃的政治层面的天主教领袖。虽然法国君主对天主教支持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而非宗教,但是他们却以实际行动在法国保留了天主教。在德国南部和意大利,在位的小国君主们都是天主教的强有力的支持者。

新修会基本上有助于天主教的复兴。在教皇立奥任职期间,有个团体在罗马组成了神爱社。他们励志通过特别的宗教仪式和实践来深化灵性体验。在 16 世纪 20 年代,神爱社创建了一个特别致力于教士培训的戴蒂尼修会。方济会的一个分支嘉布遣修会也得以复兴,它主要致力于使修会回归弗兰西斯本人神贫理想,并且面向穷人传道。在随后的 10 年间,还另外建立了 6 个新修会,其中娥苏兰修女会成为启发青年女子的先锋。

## 1. 耶稣会和宗教裁判所

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颁布《军旅教会》诏令，正式承认耶稣会。新修会的目标是："要在十字架的旗帜下为上帝而战，要侍奉我们的主及其在世上的代理人罗马教皇。"新修会的成员们要依照惯例立下三大誓言——贫穷、独身和服从——并且还要加上第四个："为了拯救灵魂和传播信仰，要毫不犹豫地和无条件地服从教皇所下达的每一个命令。"这是第一个为传播信仰而特别建立的修会。它是一个只对教皇负责的修会——主教或大主教都无权召唤耶稣会会士。

该修会大约20年前就在潘普洛纳开始活动了。当时一位巴斯克贵族，伊格·洛佩兹·德·罗耀拉(1491—1556)因在战斗中负伤，被迫休息。他开始阅读各种圣徒传，试图模仿圣·弗兰西斯和多米尼克的生活——两个传道托钵修会的最有影响的创立者。仅在几年之内，同样希望过行乞和传道生活的"志同道合者"也加入到伊纳爵(这是我们现今熟知的一个名字)的行动之中。他曾产生幻象，并且引起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注意。但是这些幻象最终还是使宗教裁判所和教皇相信他的确是受神护佑的。

耶稣会的规则强调了三个要素。全体成员都是"上帝的战士"，表现出一种好战的、守纪律的虔诚。修会按照军事等级制度组建：其领袖为"总会长"，被推举并终身任职；其下为"省会长"，统治各"教省"；然后是"区会长"，负责监管每个人修室。

第二要素是对儿童教育：耶稣会是第一个将儿童教育视为传道特色的修会。因此，他们不仅为禁欲色彩浓厚的修会培养了继承人，而且还塑造了一代代天主教徒的品质、意志及头脑。这些学校对波兰的再天主教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

1551 年的罗马大学建立开始,耶稣会也陆续创办了一些大学。到 1556 年,他们已经创办了 26 所大学,在校生达 5700 人。

第三要素是对告解的特别理解。耶稣会实践了“决疑法”,一种已被其批评者接受但持怀疑态度的概念。决疑法,或对良心问题的研究,其出发点认为对罪性和道德性的质疑是可能的。它试图将道德权威从抽象之领域带到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带到人类的个别体验之中。耶稣会士成为最好的告解神甫,他们以告解神甫的身份为君主、王子和权威人物服务。他们被认为是廉洁的、离散的和无可指责的。

最初,修会无论在绝对数量上,还是在地理范围上,都成倍地增长。当罗耀拉 1556 年去世时,耶稣会已有 1000 名修士分布在 12 个教省中;到 1565 年,修士已达 3500 名,分布在 18 个教省;而且,在天主教在诸多地区都受到攻击的时代,耶稣会却依然有等待见习的修士,甚至还不得不拒绝超出了接受限量的人。比会员增长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它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传播。及至罗耀拉去世时,已有 12 个教省:意大利(罗马除外)、西西里岛、上德意志、下德意志(耶稣会士专心于帝国的再天主教化)、法国、阿拉贡、卡斯提尔、安达路西亚、葡萄牙、巴西、印度和埃塞俄比亚。

耶稣会并非是通过隐居,通过将自已围在高墙之内而组成一个修会:“我们并非僧侣……世界就是我们的家。”他们通过通信网形成了一种“感情的结合”,分享来信,大声阅读,抄写并传阅。经常会有某位修士只身去遥远的地方传教:例如,现代巴拉圭的热带雨林。第一位耶稣会士于 1555 年踏上中国大地。他们是一个没有固定宗教服务场所的“修会”。将他们从地球上最遥远和最与世隔绝地方团结起来的,是一部名为《神操》的书,它是罗耀拉于 16 世纪 20 年代草拟的。在书中,罗耀拉概述了见

习修士必须在高级修士陪伴下完成的一种“心灵训练”,这是一种使意志专注于某种偶像和主题的内心训练,终其一生都需进行。正如诸多的耶稣会著作一样,该书是中世纪宗教实践与原始教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也许最为重要的是,《神操》是便携的。一经掌握,他们就可以被携带到远离欧洲的地区,由一位孤独的修士携带到完全不熟悉的文化、语言以及宗教之中。耶稣会体现了对“天主教”内涵的不同理解:它不再依附于一个有形的地方,无论是具体教区还是欧洲大地,而是依附于“感情的结合”——一种不依赖于高墙或教堂,而是依靠训导意志和心理认同感的灵性。

耶稣会士将天主教传播到南美和中南美洲的雨林地区、印度、日本(时间很短)以及中国(并未成功)。他们在匈牙利和波兰的再天主教化,以及在强化巴伐利亚天主教徒的宗教虔诚方面也起到了作用。他们不是在宣讲《圣经》,而是在宣讲具有神秘幻象的基督教,关于耶稣的受难和死亡的基督教,其间舞蹈服务于仪态,音乐向不懂拉丁语的心灵倾诉,下一代修士将通过宗教剧学习拉丁语。即使他们表现出简朴和教规严苛的风格,但是他们传播的天主教还是将艺术、音乐、舞蹈,甚至是戏剧包容在“感情结合”式的宗教仪式之中。

耶稣会是天主教改革的主要新式工具,与此同时,教会的旧有工具也被利用起来——那就是宗教裁判所。由罗马教皇于13世纪建立的特殊教会法庭,是为了取缔阿比尔派异端。而在15世纪依据西班牙形式建立的特殊法庭,则是为了支持西班牙新君主国在臣民中强制推行宗教同一的政策。无论是罗马教廷的宗教裁判所,还是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都是将刑罚用做寻找真理的方式,而且二者均被用来镇压16世纪的新教徒。

文献记载

## 宗教裁判所

在16世纪,宗教裁判所对许多自认为是基督教徒之人的信仰和观点的纯正性进行了调查。1583年,多米尼克·斯堪德拉,又名梅诺乔(Menocchio,1532—1599),因为异端邪说受到公开指责。梅诺乔被问及上帝与混沌的关系,他答道:"二者从未分离,既不存在没有上帝的混沌,也不存在没有混沌的上帝。"这导致了对梅诺乔观点的进一步努力澄清。这里所选的文献结束于梅诺乔因犯有异端罪在法庭上答辩的那一刻。

检察官:你以前似乎在谈及上帝的讯问中自相矛盾。因为你在一个例证中说上帝与混沌是永恒的,而在另一例证中却说上帝来自混沌,因此请澄清事实并说明你的宗教信仰。

梅诺乔:我认为上帝与混沌是永恒的,但是上帝并不知道自己的存在,他也并不在世,但是后来他意识到他自己,所以这就是我为何说上帝来自混沌。

检察官:你以前说上帝是有智慧的,那么,怎么可能起初上帝不知道自己的存在?可后来他又知道了,这又是为什么呢?也请说明都发生了什么,才使上帝有可能从不在世转变为在世。

梅诺乔:我认为,上帝就像世上万物一样,一切都从不完美到完美,就像一个婴儿,当他还在母亲的子宫里时,他既没有理解力,也没有生命,但是当他来到子宫之外,就开始有了生命,并在成长的过程中开始有了理解力。因此,当上帝与混沌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不完美的,既不能理解,也没有生命,但是以后,随着在混沌中发展,他开始有了生命和理解。

检察官：神圣的智慧清楚地知道一切吗？尤其是在最初？

梅诺乔：他知道即将出现的一切，他知道有关人类的情况，他还知道其他人的出生源于他们。但是他并非知道所有那些即将出生之人，例如，那些牧羊人，他们知道其他的羊生自这些羊，但是他们并不明确知道所有那些即将出生的羊，因此上帝目睹了万物，但是他并没有看见所有即将出现的具体事物。

检察官：这个神圣的智慧起初就有关于万物的知识：他是从哪获取这些信息的？从其自身还是以其他方式？

梅诺乔：万物一起混杂于混沌之中，神圣的智慧从混沌那里接受知识：然后它（混沌）给神圣的智慧以秩序和理解力，正如我们知道土、水、空气和火一样，然后将它们区别开来……我认为创造没有内容的万物是不可能的，甚至上帝也不可能创造过没有内容的万物……圣灵并不像上帝那样强大，基督也并不像上帝和圣灵那样强大。

检察官：你是说上帝是由别的什么人创造的吗？

梅诺乔：他并非由他人产生，而是接受了其在混沌转换中的趋向，然后从不完美进化到完美。

检察官：谁使混沌变换？

梅诺乔：是其自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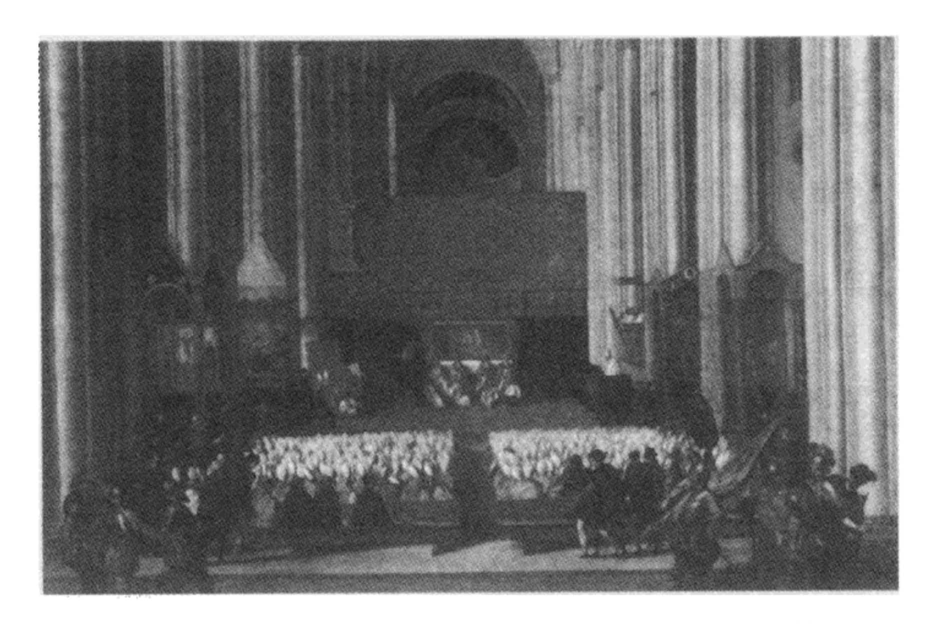
Quoted in Carlo Gins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s. John and Anne Tedeschi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2), pp. 54—56.

新教徒的传统有时使宗教裁判所和耶稣会陷入恐怖统治促进者的境地。当然，耶稣会及其盟友充分利用了一些组织严密的团体所能施加于新教徒的诸多压力和劝说。宗教裁判所也的确制造了一些恐怖活动镇压西班牙的穆斯林和改宗者，并且迫害低地国家的新教徒。但是在南欧的一些国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那里的新教从来不构成真正的威胁，所以它还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德国和东欧，天主教改革成功，使大批人重新皈依罗马天主教，但迫害并非决定性的因素，教育和世俗的虔诚才是至关重要的。

## 2. 特伦托会议(1545—1564)

总之，对于新教的“平信徒皆为祭司”倾向的强烈反感，使天主教更加坚持教士的神赋力量。新教的变化促进了天主教的不变。甚至对于赎罪券教义，天主教也没有做出让步。特伦托会议再次确认了赎罪券，并将之释义为灵性的而非金钱的交易。

保罗三世(1534—1549)，一系列改革教皇中的第一位，于1545年在意大利阿尔卑斯的边境小城特伦托召开了特伦托会议。保罗与许多天主教教徒一样，看到了彻底改革教会的必要性。然而，对于其他天主教教徒而言，特伦托会议似乎是教皇和耶稣会手中的一个工具而已。在理论上，它至少意味着提供一次与新教徒和解的机会，而且一些重要的保守派新教徒也被邀请了，只是他们并未与会。法国教士没有自愿遵从，特伦托会议的部分成果在50年内没有在法国得到认可。会议遭遇了一系列宗教战争和政治阴谋，其工作曾经被中断过七次。然而，会议时断时续地进行了20年，直到1564年才完成了重申教义并将之编成法典的工作。



1555 年的特伦托会议。(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Art Resource ,NY)

特伦托会议重新确认了教士的基本作用、七项圣事以及信仰与善功的重要性。它主张《圣经》和教会的发言人是神学权威。它强调要严格遵守教士的誓言,终止妄用教权,诸如主教空职以及买卖教职之类。它大规模地强制推行审查制度以促进对平信徒的训导,与此同时还公布禁书录——即一系列因为对天主教徒的信仰有危害而不允许阅读的书目,包括反教权主义者薄伽丘、马基雅维利和伊拉斯谟的著作,以及异端和新教徒的作品。

天主教的宗教改革一经发起,新教的控制区域就很少再有进一步的拓展,这显示出这一改革的力量。在路德起义的一个世纪之内,以罗马天主教为主的地区和以新教为主的地区之间

的领地分界线被清楚地划定了。1580 年后——荷兰联合省建立之时——欧洲的重要地区没有继续转变为新教地区，而到 1650 年为止，却有许多中欧地区或者依靠说服(如波兰)，或者凭借武力(如波西米亚)从新教转皈了天主教。此后，英格兰、苏格兰、荷兰、北德和东德(包括南部向瑞士突出地带)以及斯堪的纳维亚成为新教徒占主导地位的地区。而在爱尔兰、比利时、法国、南德(包括在莱茵河流域向北部突出地带)、哈布斯堡家族领地、波兰、意大利、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则是天主教占据主导地位。在英格兰、苏格兰以及荷兰，还有一些虔诚的天主教徒居于少数，而在德国则是两种信仰令人困惑地混杂在一起的局面。在耶稣会已经夺回的爱尔兰、法国以及部分哈布斯堡家族领地，主要是匈牙利，也有少数新教徒。

## 四、新教教义和进步思想

### 1. 新教教义有多么“现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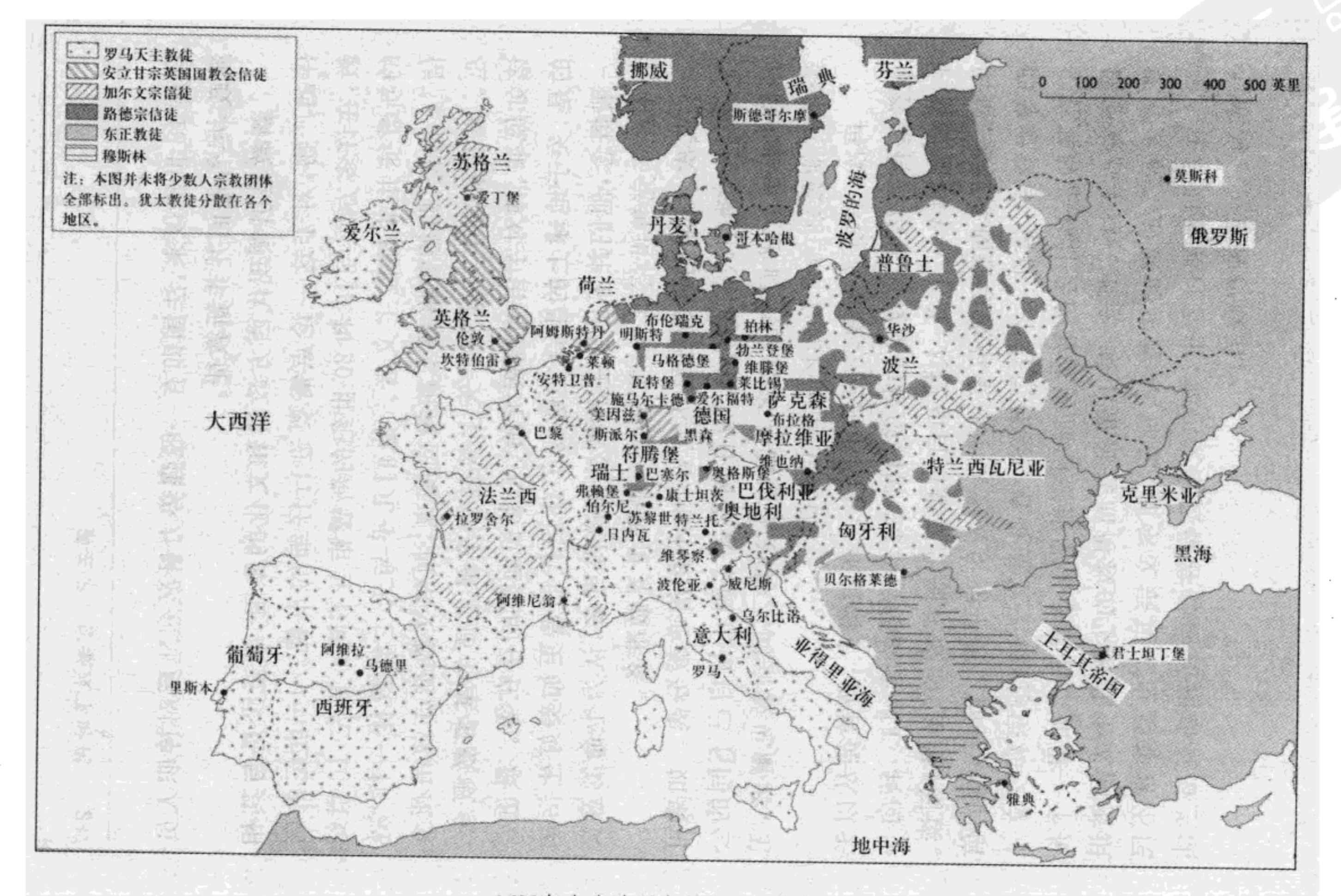
宗教改革经常被看做，尤其被新教徒看做是特别现代的、有远见的和民主的——与停滞的和有阶级意识的中世纪迥然不同。在新教徒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这一观点似乎可以赢得支持，因为这些地区在最近的 300 年间一直都极其繁荣，已经极其成功地建立了民主的政府，并且经常对科技和文化做出突出贡献。此外，自 1600 年西班牙衰落以来，在西方崛起并且声威赫赫的大国——例如法国、英帝国、德国和美国——中，除了一个国家例外，其余均为新教徒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唯一的例外是法国。

自从18世纪以来,法国即有一股强势力量激烈地反对神职人员涉政,尽管他们并非新教徒。

新教是引领现代西方政治和文化的原因,或至少是与其相伴的产物,对于这一论点需要进行仔细的审视。16世纪的新教,在许多方面与19和20世纪的新教相当不同。首先,16世纪的新教徒并非理性主义者。他们几乎与天主教教徒一样"迷信"。据说,路德曾将墨水瓶投向魔鬼,加尔文教徒亦曾吊死女巫。新教徒多半与其对手天主教徒分享最本质的基督教概念,诸如原罪、神对宇宙的直接统治、天堂和地狱的存在等。最重要的是,关于地球上的生命能够为子孙后代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一般概念,他们并不比天主教教徒知道得更多,认为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完善世俗世界,而是要为精神世界做准备。

其次,早期的新教徒既不宽容,也不相信政教分离。如果可能,他们就动用政府的力量,以任何方式去阻止与自己不同的公开信仰形式。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迫害过持不同宗教见解者,无论是其他派别的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

再次,早期的新教教徒并不民主。在逻辑上,新教徒从以天主教圣传为依托的教皇的权威,转向每个信徒的道德心,转向与日益成熟的个人主义、人权和自由思想相辅相成的《圣经》阅读。但是,多数早期新教改革家并不认为人生而平等。而且,他们信仰等级秩序,信仰一个分层社会。在此意义上,路德宗和安立甘宗在其政治和社会的教义方面明显地呈保守状态。如果一个批评家专心于这一概念:蒙上帝挑选而得救的少数几个人和被诅咒落入永久地狱的多数人,那么,加尔文宗其实也是非常不民主。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加尔文宗逐渐在日内瓦和新英格兰演变成为一种近神权政治。




1600年左右欧洲宗教人口分布图

然而，长远来看，加尔文宗赞成通过数量可观、经济富足的中产阶级来进行统治，特别是在城市中。关于新教和现代西方民主生活之间因果关系的雄辩，与其说是来自早期新教徒的社会思想，不如说是来自新教的道德理想强化工商中产阶级的方式。

改革对妇女的影响起初被认为是有益的：宗教改革引入了离婚的可能性。然而，这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推翻。虽然"离婚"在中世纪的欧洲是被禁止的，但是人们通过许多合法与非法的手段，的确有效地终止了婚姻。而且在16世纪，离婚不一定是一件好事。那时，正如现在一样，许多妇女与其丈夫相比在经济上缺乏保障，个人财富也相当少。考虑到家庭，经济上的保障措施以及一些合法权益，维持婚姻对于多数妇女而言，还是有利的。

在某些方面，新教改革对于妇女的生活产生了直接而清晰的影响：例如，女修道院的关闭。特别是对贵族妇女而言，女修道院一直是她们可以较为自由地生活的少数场所之一——但是并非完全自由于男性的监管之下。贵族妇女经常抗拒离开修道院，她们发现修道院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可以实践其宗教信仰，可以读书，甚至可以从事哲学或古典文献的研究。虽然修道院呈现的是女性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是在一些地方，其作用相当于一种岛屿。此外，正如《阿维拉的特莉萨》所证实的那样，她们受女修道院院长的管理。虽然院长们也服从于男性的监管，但是在回廊墙内，她们实际上具有一定的自治权。天主教继续给妇女提供那种有意义的形式用以表达信仰，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在女性社区内单独居住的生活模式，后者在他处是罕见的。

宗教改革世纪之成效难以描述。一些学者已经唤起人们对

路德语言的关注,不仅涉及其坚持父亲在家庭和家庭人员内的统治作用的观点,而且也涉及他对“圣父”概念的表述。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对于现实中的家庭和家庭权威的分布究竟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但是很少有人不认同在路德的作品中展现了某种家长式情结。当然,对于16世纪的各主要教会而言,妇女不能担任教士或牧师,这也是事实。妇女在天主教会中仍然不能被授予神职,只是最近,她们才在圣公会中被允许担任神职。在新教教会中,男女被分隔开来,虽然都被允许接近圣坛,但是女性在一侧,男性在另一侧。同样重要的是,耶稣会,这个引人注目的新式修会,严格保留男性会员制,甚至坚决反对实行女性第三修道会会员制,一如中世纪的一些修会的做法。在任何新教教会,离婚都是极其不容易的。对于妇女而言,打破婚姻永远不像男人来得那么容易,无论她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所有的教会都试图维持婚姻,使之成为国家秩序的一个缩影。

印刷机使更多文献的印刷版本变得唾手可得,我们甚至还有证据表明妇女曾出版过一些小册子。各种受教育者,无论男女,都很大程度上保留着思考的特质:我们没有办法对此进行准确的衡量。一切改革均强调布道的重要性,它可以将经典中的内容传播给更多的人,与此同时,也有比以往更多的家庭阅读《圣经》。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新教的某些更为“激进”的仪式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再洗礼派传教士和殉教者中,妇女大有人在。一些教派即为妇女所建,例如震颤派,而另一些则认为性别平等与社会地位平等一样重要。虽然多数教派被消灭了,但是该实践的事实却产生了强有力的结果:这是可以预期的。像玛格丽特·德·纳瓦尔以及伊丽莎白一世这样的妇女,由于向少数人

教会和经常被迫害的教会提供庇护所和财政资助，因此她们都是新兴教会的关键资助人。

要理解宗教改革对于妇女的重大意义，或许更重要的是，理解两种在某种意义上间接相关的转变。首先是城市人口对新教的皈依，特别是加尔文宗，它促进了颇与商业文化相适宜的道德规范和美学原则的发展。不同社会阶层的妇女具有不同的机会和自由，但是新教并非是封建的，因为它接受了一个由武士和农民组成的社会，其间“权力”像一把高悬的利剑控制着一切。所有的新教教会都出现在一个商业财富正在起着日益重要作用的社会，其间社会关系更加易变。

其次，在耶稣会会士、多明我会修士和新世界美洲征服者之间的冲突中，产生了一个具有不可估量的反响的问题：人的内涵是什么？基于古典的传统，人类的模式一直是男性的——女性的身体甚至被理解为对男性身体的“否定”。当欧洲人试图去理解他们在横渡大西洋所遇到的各民族时，他们就形成了这种将在 18 世纪产生巨大的回响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提及了“女权”问题。这些直接关于美洲土著居民的争论，也逐渐渗入到有关奴隶制道德的争论中来——如果一个人还有人性的话，那么对于他或她的一系列行为，按照基督教教徒的标准就是不道德的，无论他或她是一位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虽然奴隶制度的繁荣贯穿于宗教改革的整个过程之中，但是毁灭的种子已经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极度痛苦的争论中埋下了伏笔。

## 2. 有争议的观点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 1904 年首次出版的《新教伦

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探讨了这一问题。韦伯以证据开始了其探讨。这些证据表明:在同时代,德国新教徒对于商业世界的兴趣与人口的比率成正比,而德国天主教徒对之的兴趣则与人口比率成反比。这很让人期待。为什么如此?韦伯的回答可以概括如下:资本的积累需要减少一些立即消费,真正的资本家必须再将利润回投到生意中去,以便他们能够扩大再生产并赚取更高的利润,即具有较高的积累未来资本的潜力。而要实现这一目的,他们不仅要抑制消费,还要努力生产,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赚取利润。

新教,特别是以加尔文宗形式存在的新教,鼓励这种生活方式。它鼓励世人努力工作,因为工作能够使人免于性的诱惑,不去玩愚蠢的游戏,远离酗酒或免于以其他方式从事使上帝不悦之事。此外,工作也是一种积极的美德,一种奉献给上帝的颂歌。

新教,尤其是加尔文宗,不鼓励多种消费,因为消费会导致已成为现代经济制度之本的大规模生产,进而消耗能源。加尔文教徒也不提倡绘画、戏剧、舞蹈以及昂贵的服饰。但是,他们强调满足人们的朴素需求,诸如对基本的食品需求,对适当的住房、服装以及类似物品的需求——那些由为大众服务的大工业所供给的需求。一个加尔文教徒众多的社会逐渐趋于生产充足,消费稳定,但是却没有浪费和炫耀的行为。因此,在竞争的条件下,其企业领袖积累了资本,并把它投资于生产之中,使西方富裕起来。努力工作和清心寡欲使加尔文信徒的社会蓬勃发展。处于支配地位的商人强调经济增长、谨慎和对于可以预期的(稳定的)工作条件的渴望。

苏格兰人、荷兰人、瑞士人、新英格兰的美国人——所有加

尔文教徒——都普遍地获得了节俭、勤奋和极力讨价还价的声誉。新教社会立即减少了宗教节日——不需工作的假日——的数量。由于礼拜日被严格地恪守为非工作日，其余六天则成为更加完整的工作日。

许多新教神学家排斥中世纪天主教的教义，后者将投资利息视为一种超出低利率或“合理”利率的高利贷，同时他们也拒绝中世纪暗含“合理”价格的多数观点。他们赞成更加接近市场自由竞争的思想。在市场上，上帝会照料他自己。财富已成为美好人生——有道德的人生——完满进行的标志。

不必将韦伯的论点看做是对近代早期资本主义唯一的或充分的解释。其实，近代经济生活的迹象在路德和加尔文以前就早已开始了，首先在新教从未取胜的地区明显地显示出来：意大利、南部德国和比利时。银行业始于佛罗伦萨和天主教统治下的意大利其他北部城市。几乎可以肯定，即使没有新教改革，反对高利贷的原则也会松懈。而且，一方面，新教和工业发展之间并非完全相关；另一方面，天主教和发展相对缓慢之间也没有完全相关性。比利时、德国莱茵地区，以及意大利北部都是富饶的天主教繁荣区。最后，对于现代工业经济的崛起而言，没有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可以忽略地理和自然资源这一简单的事实。即使意大利转化为加尔文教国家，它仍然缺乏煤炭和铁的储存，而后者对信奉新教的英国工业的领先地位做出了贡献。

当欧洲人同时在海外进行扩张之时，我们能够轻易地将一种道德规范分离出来作为“新教的规范”，并给予它非凡的效力吗？如果有关系的话，那么，“道德规范”与北欧和西欧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有助于高强度和长时间工作的，尤其是室内工作的潮湿而温和的北方气候与较为温和的地中海的气候之

间的关系又是什么?信奉天主教的思想家伽利略和勒内·笛卡尔之间的关系又怎样?

## 3. 民族主义,现代性和宗教改革

在16世纪大分裂之后,新教和天主教都成为构成近代民族主义的重要因素。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直都不是爱国主义者。法国的新教徒从英国敌人那里获得帮助,法国的天主教徒从西班牙敌人那里获得支持。但是,在某一特定的宗教支持某一特定的政治团体的地方,宗教情感就和爱国情感相互强化。这极为明显地表现在政治团体不得不为其独立而斗争的地方。新教加强了荷兰人对西班牙人的抵抗,天主教加强了爱尔兰人对英国人的抵抗。即使在16世纪已经独立的国家之中,宗教也加强了爱国主义。尽管天主教有少数信徒存在,但是从伊丽莎白一世开始,英国就自豪地将自己当做一个信仰新教的国家。西班牙同样自豪地将自己认同为一个天主教国家。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战争中,宗教和政治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当学者们越来越深入了解宗教改革期间宗教变化的地方性时,他们发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在纯粹的教义方面之差别并不像初看起来的那样巨大。二者皆信仰魔法,并且都迫害女巫。二者皆在原罪和恶行之间加以区别,即在民法(越来越应用于市场和公共事务方面)和教会法(应用于私人事务,以及到17世纪更具体地应用于性行为方面的事务)之间加以区别。二者皆承认劳动在世俗世界范围内的必要性。此外,虽然程度不同,目的也不一致,但二者皆与资本主义相容。新教徒强调教育和对道德的操控,但是天主教改革中的耶稣会士亦是如此。二者

起初皆将个人的精神失常界定为“不同形式的理性”，而之所以将那些被认为是精神失常的人分隔开来，是因为假设他们拥有一种独特的灵性；二者皆经历了向17世纪的“精神失常”观念的转变，即视其为疾病，不再与之保持一段“神圣”的距离以期他们可以获得拯救，而是将他们限制起来以保护社会。在慈善（越来越依靠修道院的帮助）事务、宗教实践、婚姻、家庭和两性关系方面——总之，在人类观念和实践发生变化的广阔领域——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是不同的，但是就一般而言，这些区别似乎比学者们曾经假设的要小一些。

因此，宗教改革的“现代性”问题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被问及。在许多方面，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似乎相当“现代”，因为他们的观点在17世纪早期已经与今天的观点非常类似。然而，也存在一些有意义的例外，例如，在巫术审判方面，宗教改革时代的信仰和21世纪的信仰似乎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的确，历史学家不再认为对于现代性的争论是非常有益的，因为他们现在对探讨政治经验和宗教体验之间的联系更感兴趣。政治经验和宗教体验是人类经验领域之间的一种交换的概念，而这些领域经常被较早的史学家单独地地进行分析。

## 五、本章小结

1517年，马丁·路德草拟了95个论题用于辩论。在论文中，他质疑了教会实践，尤其颁发赎罪券的实践——这被普遍地认为是对原罪的宽恕和对惩罚的豁免。路德本人已经逐渐信奉信仰对于善功的优先原则，并信仰平信徒皆为祭司。

路德的挑战在教会内部掀起了一场风暴，这场风暴最终驱

使他反对天主教的一些教义,并组织了他自己的教会。1521 年路德被逐出教会,在萨克森选帝侯的保护下,他成为一名民族英雄,并且不久德国其他诸侯也加入了起义。

路德的成功部分地归功于宗教观点,部分地归功于政治问题。路德关于因信称义的教义具有广泛的吸引力。此外,许多天主教徒同情改革的需要。

尽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曾经与新教徒交战,但是他同时也被庞大帝国的其他许多事情弄得心烦意乱。1555 年,他不得不接受《奥格斯堡和约》。该和约承认各诸侯有权决定其属地信仰天主教或路德宗。然而,该和约并没有承认任何其他新教团体。

乌尔里希·茨温利在瑞士领导了一场平静的改革。他与路德一起反对善功神学,分享唯信称义的教义。比路德更进一步的是,他拒绝了中世纪的礼拜仪式,主张回归到早期教会的朴素的圣餐礼。约翰·加尔文将新教塑造为一种生活方式,并在其向法国、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英国的宗教改革是由皇权实施的。按照 1534 年的《最高权利法案》,亨利八世成为英国教会领袖。他保留了天主教教义和仪式,但是终止了罗马的权威。亨利享有中产阶级对其行动的支持。他没收了修道院的土地,解散修道院,这一切都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变革。

虽然新教徒的信仰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批判了罗马天主教会,弱化仪式和组织,限制圣礼的数量,并成为叛逆制源。

加尔文宗信徒反对天主教的救赎观,代之以强调只有少数人可以成为上帝的选民并得到救赎。虽然加尔文宗起初并不民主,但是其教义将个人置于国家之上,也许已经为现代民主思想

作出了贡献。

最初，天主教对于新教徒的挑战的反应是试图镇压起义。后来，它决心从内部对自身进行改革，这种努力而今被称为“天主教宗教改革”。哈布斯堡皇室在西班牙和德国的统治者积极领导了天主教改革。由依纳爵·罗耀拉创立并组织和训练的耶稣会，从新教徒那里夺回了一些教区，并在海外发展了一批新皈依者。

1545 年召开的特伦托会议，引发了改革，但是也重新确认了天主教教义，令某些天主教徒要同新教徒妥协的希望破灭。天主教改革成功地遏制了新教的发展。因此，到 1580 年，天主教和新教在欧洲教区分界线得以明晰。

关于新教和现代西方民主兴起之间因果关系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多数历史学家同意：新教的道德思想巩固了工商业中产阶级，并引导人们重新审视旧的观念和制度。1904 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非常具有争议的论点：新教，特别是加尔文宗，确立了有利于刻苦勤奋的戒律和价值观，这是一种凸显现代经济生活精髓的价值观念。一种较广泛认同的结论是：新教和天主教的宗教改革，与其他潮流一起，构成了现代民族主义兴起的要素。



# 第六章

# 大国的冲突

关于划分中世纪与近代的日期抑或历史事件,迄今还没有形成普遍一致的意见。有些人坚持认为这样的日期应该与具有远大抱负的伟大君主的出现相关:例如,1461 年法国的路易十一,或者是 1469 年联姻的阿拉贡的费迪南以及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抑或是 1485 年亨利七世和英国都铎王朝的出现。重视国际关系的学者们倾向于选择 1494 年,当时法国的查理八世率领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开始了对意大利的战争,后者经常被称之为"首次近代战争"。另外一些史学家认为 1492 年是一个合适的日期,因为美洲的发现开启了欧洲海外扩张的大时代。然而,还有其他人强调 1517 年,因为是年马丁·路德公开抨击罗马天主教会。所有这些日期都是人们主观的看法,因为正如我们对文艺复兴的讨论所显示的那样,中世纪文化和近代文化之间的分界线不可能置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年。此外,可以争论的是,真正使近代世界呈现近代特征的是理性主义、自然科学、技术和经济组织的结合,这些给予我们利用自然资源的力

量。按照这一标准，伟大的变化发生于18世纪，而16和17世纪只不过是前期准备而已。

## 一、一个漫长的时期

在欧洲国家谋求势力范围的长期斗争中，有一个永恒的主题——人口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漫长的16世纪”，或一个漫长的时期。在这个世纪，地中海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的经济和军事中心。在过去，人口的稳定增长往往超出一个社会满足新添人口的承受能力。直到18世纪，欧洲都是如此，而在世界的某些地方，至今依然这样。1450—1650年之间人口的大量增长导致了社会的衰退，而1750年之后，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因为社会在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使满足人口因增长所引发的需求成为可能。这些变化——政治、社会、家庭和经济结构上的变化——在漫长的16世纪进行着，但是其影响至少有一个世纪都没有为人们所感受到。

然而，由于首次真正的人口普查直到1801年才进行，而且当时仅在英国，所以16世纪的所有人口数字就都是凭猜测所为。1300年世界人口的保守估计为2.5亿，1780年世界人口的最高估计为13.8亿。保守地看，历史学家认为，从15到18世纪，尽管发生了经济灾难和自然灾害，世界人口至少翻了一番。欧洲人在此期间扩张到辽阔的新的大陆，那里还没有被土著居民进行系统地耕种。虽然具体的解释还有争议，但是今天的历史学家一般认为，由于社会进步与科学技术进步相结合，加之掌握了气候变化的规律，工农业在新地区的系统扩展已成为可能。

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
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
神圣罗马帝国的边境线
战场

0 100 200 300 英里

1555年的欧洲

## 1. 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国(1450—1650)

在近代早期，欧洲由一些国家组成，后者通常都通过兼并他国或至少将它们置于某种控制之下而获得发展。在特定的时刻，一些国家处于攻势，试图获取土地、势力及财富；另一些则处于守势，试图保护他们所有的一切。这种竞争体系下的统一体通常被称为主权国，其实际含义为，他们的统治者具有武装力量执行其政策，并可以不依赖于他国而采取主动行为。

到中世纪结束之时，多数较小的封建国家已经被并入较大的国家，只有德国和意大利除外。当近代国家体系于 15 世纪和 16 世纪开始形成之时，三个结构完善的君主国，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统治了西欧；苏格兰、葡萄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般扮演次要的角色。在中欧，拥有许多半主权诸侯国的神圣罗马帝国不具有大西洋国家所享有的那种内在统一。然而，在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导下，该帝国却是一个主要的国际竞争者。在法国和该帝国之间的区域有一些小的主权国，15 世纪时，勃艮第公爵试图在此建立一个复兴的法德间的中王国。从这个虚幻的王国里，最终走出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公国、瑞士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在欧洲东南部，新兴的、正处于扩张中的土耳其帝国，已经延伸到多瑙河流域中部。在东欧，莫斯科公国开始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而波兰—立陶宛公国，如果不是在势力上，那么至少在面积上已经成为一个大国。

许多政治统一体构成了竞争的国家体系：王朝国家大约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末，而后是民族国家。一些早期的近代国家是以前的独立统一体的集团，这些统一体彼此有时由于异质疆域

而分离,有时由于操不同的语言而分离,而将其维系在一起的似乎只有现行的统治王朝。早期的近代战争并非全面战争,除非对政府的金融和税收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几乎不伤害平民的生命,但是平民不能为了耕种土地而阻碍交战中的军队。在和平的居住地,从一个朝代到另一个朝代,没有人对交接地区和人口感到特别担心。

然而,对于王朝国家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别,不能过分渲染。特别是在靠近大西洋的伟大的君主国中,一定程度的民族认同感在 16 世纪既已存在,而在英国和法国,它在百年战争期间就已经清晰可见了。在西班牙强大的无敌舰队的时代,英国人表现出引人注目的民族认同感,他们对西班牙外来者和天主教徒既憎恨又恐惧。即使在分离的德国,路德也能鼓动德国人去厌恶意大利人。在 16 世纪民族认同感日益被宗教认同感所强化。

## 2. 外交政策的手段

到 1500 年,几乎所有的欧洲主权国家至少已经初步拥有了近代国家的大部分社会和政治机构。它们具有两种基本工具:专业的外交部门和专业的军队。15 世纪和 16 世纪见证了近代外交机构和方法的稳步发展。政府设立了为中央所掌握的外交部,派遣外交官以及定期的驻外国宫廷使节,并在公开外交的掩护之下组织间谍活动。举行正式的和平会议,签署正式条约,为使这些正式的关系有法可依,欧洲开始形成一套原则或某些预期方案。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国际政治的机构经过精心策划

后，得到迅猛发展，特别是在威尼斯共和国的驻外部门。威尼斯大使从国外驻地发回给议会的详细报告，对所涉及的人物和国家进行了细致的政治和社会分析。在报告中，搬弄是非的闲谈和传闻的相对价值都会得到权衡——因为后者经常被外交官用以达到进一步目的。外交官经常以自己的权力制定重要的政策。由于交通不便，其政府不可能及时与之沟通，具体指挥他，因而他就经常不得不自己做出重要的决定。良好或拙劣的外交，关于他国有益或有害的情报，在一个角逐权力的国家的成败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军队也造成了近代国家间差异，由于不受封建战争的限制，军官阶层可以计划、训练，并进行相当规模的可控作战。普通士兵多数是外国雇佣兵（士兵一词来自拉丁语“solidus”，意为“钱币”）。一些雇佣兵在本国招募，通常在穷人和无财产的人之中进行，有时是强行征用的。其他为外国人，尤其是瑞士人和德国人，他们以军旅为生。数以千计的德、瑞雇佣兵，在法国弗兰西斯一世的军队中服役，和英国人、苏格兰人、波兰人、意大利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希腊人在一起。

近代早期的军队在组织和装备方面表现出许多封建残余。军官阶层依旧保留着某些中世纪骑士习俗，例如决斗。如果封建君主不再给他自己的骑士带来收入，骑士的后代们就经常以陆军团长的身份募集自己的军团，并对其进行资助。开小差是常见之事，鞭笞是对它的惩罚。每个军团都可以着规定的制服，但是整个军队并非如此，以致在作战中很难区分敌我。武器种类繁多，令人回忆起白刃战时代的武器，剑和矛依然被使用，还有一种由步兵使用的、对付披甲的骑士及其坐骑的长矛柄。手动轻武器——火绳钩枪、步枪、手枪以及许多其他火器——是指

那种装载慢、发射慢而且很少能够精确瞄准的火器。火炮,其零部件和口径皆为定型的,很难移动,发射的是固体弹丸而非爆炸性的炮弹。行军中的部队大部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甚至当他们在本国之时亦是如此。但是,他们也开始组织军需,并且开始使用机械师。

军事技术的成长以及民族气质的差异,均体现在 1600 年左右的军事优势从西班牙向法国的过渡。西班牙在步兵方面取胜,矛是其主要的武器。法国则以炮兵、工程学以及防御工事见长。到 16 世纪,法国的人口相对于其资源过于稠密,而西班牙和英国则不同,所以许多法国人想成为雇佣军,并满足于去学习不那么浪漫的军事差事。

与此同时,首批近代海军也正处于发展之中。在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兵工厂和海事管理细则皆处于领先地位。海军组织、海军补给、船只的派遣和操作,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比陆军更加有序的集中管理方法。海军不能容许缺乏纪律和计划。和陆军一样,海军的军官阶层也明显具有贵族气派。

在 16 世纪期间,海上霸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它曾在西班牙人手中短暂停留,然后于 17 世纪转移至荷兰、法国和英国等北方海上强国。这种转移是海军结构、海军科技和知识进步的结果,也是势力平衡以及中央集权国家机构发生变化的结果。当然,对外政策的这些手段既是由“漫长的 16 世纪”的经济发展所促成的,同时也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人口、贸易,以及物价的增长使战争更加可能发生。在新资金注入欧洲经济港口城市的时候,首先出现于此的新贸易趋势使这些城市的市议会,在国家事务方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并且使港口成为对外交或军事行为越来越有吸引力的目标。

然而，外交和军事战略上的失败，在汉萨同盟的衰退方面、在意大利和黎凡特之间贸易的中断方面、在英国地中海布料贸易竞争的崛起方面以及在欧洲政治地图和宗教地图的重塑方面，均是极其重要的。经过半个世纪，世人已清晰可见：在损害西班牙帝国、法兰西帝国以及哈布斯堡家族（神圣罗马）的帝国的利益的前提下，荷兰人与英国人正朝统治地位迈进。

## 二、错综复杂的战争

### 1. 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的意大利战争(1483—1515)

法国的查理八世（1483—1498 年在位）通过与布列塔尼公爵领的女继承人联姻，继续奉行路易十一扩展皇家版图的政策。在战争后方明显安全的情况下，查理决定向国外扩展。作为安茹王朝的旁系继承人，查理对阿拉贡人的权利进行质疑，但是后者却在费迪南（1458—1494）的率领下，登上了那不勒斯的王位。然而，查理决定入侵意大利，这不仅是因为其家族已申明主权，也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既富有又被分为若干独立的小政体。简而言之，它看起来易于征服。因此，在 1494—1495 年的冬季，查理首次穿越意大利进军那不勒斯，并取得了胜利。但是，他获取布列塔尼已经扰乱了邻国，而对那不勒斯的占领又威胁到了意大利的势力平衡。

法国的入侵惹怒了第一个近代大同盟，即由教皇国（作为意大利地区的一个国家）、神圣罗马帝国、威尼斯、米兰、西班牙和紧随其后的英国组成的所谓“神圣同盟”。这一同盟强迫法国军

队于1495年撤离意大利。此后,便有各种不同的同盟试图阻止任何一个强国对意大利的控制。

查理死后,其堂兄弟路易十二(Louis XII,1498—1515年在位)登上法国王位。为了确保布列塔尼的安全,路易娶了查理的遗孀为妻,然后,在家族的再次支持下尝试入侵意大利,这次目标是米兰。1499年,路易将路多维科·斯弗尔查(Ludovico Sforza)逐出米兰。在法国的这一次入侵中,同盟游戏更加复杂。路易试图确保自己能够抵御同盟的孤立政策,后者曾经毁灭了查理。路易于1500年与阿拉贡的费迪南结盟,并同意与其分割那不勒斯。于是,在1508年路易促成了"康布雷同盟",其中,路易、费迪南、教皇朱利叶斯二世,以及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共同分割了位置较低的靠近富饶的威尼斯共和国的波河河谷地区的土地。

对于同盟者而言,直到费迪南夺取了那不勒斯王国的某些城镇并决定背弃路易以前,一切都非常顺利。教皇对于法国及德皇可能完全将自己挤出意大利的前景感到恐惧,遂于1511年与威尼斯和费迪南组成了另一个神圣同盟共同抗衡法国,后来英国亨利八世以及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也加入进来。法国现在面临双线战争,根本不能顶住如此强大的同盟。亨利八世进攻法国的北部后,路易十二世也如同查理八世一样被彻底击败。

## 2. 弗兰西斯一世与查理六世(1515—1559)

此时欧洲存在两个侵略者:仍然爱好扩张的法国瓦罗亚王室和哈布斯堡皇室。当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的查理一世于1519年继承了其祖父马克西米利安的皇位,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之时,他早已从其母亲那里继承了西班牙及其在美

洲的土地，从其父亲那里继承了低地国家和位于中欧的哈布斯堡家族领地，于是，意大利出现了一种新的数量对比优势。他以其非凡的个人财富购得了帝国的皇冠。他显然使法国挤进了自己的“虎头钳”里。1525 年，路易十二世的继任者，弗兰西斯一世(1515—1547 年在位)在帕维亚被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军队击败，并被俘获和囚禁在马德里，直至他签署了条约，宣布放弃所有瓦罗亚王室在意大利的主权，并割让了勃艮第公爵领。但是，他一安全返回法国，就拒绝承认这一条约。

帕维亚之战的帝国指挥官之一，是波旁王室总管，一个与国王不和的法国贵族。这个波旁贵族接下去竟命令西班牙和德国雇佣兵去洗劫罗马。教皇克莱门特七世(1523—1534)是美第奇家族的成员，他在帕维亚之战以后即转而反对查理五世。在科涅克同盟中(1526 年)，他与意大利其他主要的势力以及弗兰西斯联合起来。查理包围了罗马，但是他最初并不想洗劫。可是当其雇佣兵薪水和补给被拖欠之时，洗劫发生了。10 年过后，查理与教皇和弗兰西斯签订了和约，并于 1530 年由教皇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意大利的国王。

法国仍然处于西班牙、德国以及查理控制的尼德兰之间的“虎头钳”之中。弗兰西斯一世并非一个愿意接受如此不稳定地位之人。1535 年，他利用米兰统治者斯弗尔扎去世之机，重提过去对米兰的领土要求，并再次开始进行斗争。双方均没有获得决定性的胜利。1559 年，《卡托康布雷西斯条约》确认了哈布斯堡皇室对米兰和那不勒斯的控制权。法国在意大利未能获得一个真正的据点，但是哈布斯堡皇室也没能真正减弱法国的实力。哈布斯堡皇室的“虎头钳”并没有合拢，这主要是因为法国从军事、经济和政治上都证明了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抵御这种压力。



《法国弗兰西斯一世像》(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Art Resource,NY)

查理和弗兰西斯,这两个年迈的竞争对手之间的最后决斗阶段,向世人显示了究竟有多少可变因素能够影响势力平衡。为了获得同盟者,弗兰西斯毫不犹豫地求助于查理难以控制的德国臣属。虽然他是天主教国家的领袖,他却与克雷夫的新教

公爵联合起来,甚至与穆斯林土耳其苏丹、伟大的苏莱曼缔结同盟,后者当时正从匈牙利的东部向查理发动进攻。

在16世纪上半叶复杂的斗争中,英国是另外一个参与者。在英国北部边境有一个独立的苏格兰,它趋向于站在英国的夙敌法国一边。然而,英国人如果认为查理太强大,也可能支持法国。查理在帕维亚获胜,并占领了罗马之后,英国大臣——红衣主教沃尔西于1527年与法国缔结同盟。英国人也能使自己倒戈。1543年,查理被新教徒和土耳其人围困,亨利八世就前来助阵,抗击法国。

## 3. 腓力二世统治时期的战争与荷兰起义(1556—1598)

1556年,查理五世放弃了统治西班牙和帝国的权力,退位回到一个修道院,两年后,他在此去世。其兄即位为皇帝费迪南一世(1556—1564),得到了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领地,其子即位成为西班牙(1556—1598年在位)的腓力二世,另外还继承了西班牙海外(墨西哥、秘鲁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领土、勃艮第的尼德兰遗产,还有意大利的米兰和那不勒斯。即使德国不包括在内,腓力的王国也是一个超国家的国家。他从新世界提取黄金和白银,并对法国、英国以及整个欧洲的均势都构成威胁。由于意识到如此强大的潜力,同时代的意大利人说:“上帝已经变成了西班牙人。”

腓力二世同其父一样认为新教是无法忍受的。他试图入侵英国并恢复天主教,这使他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新教传统的罪人之一。事实上,就其个人而言,他并不热衷于战争,而是一位严肃的、勤劳的管理者。他既是最强有力的君主,又是那个时

代最伟大的文职人员。

查理五世一开始非常指望尼德兰的财富能够资助他不断地进行战争。但是,他加入了一个由尼德兰 17 省组成的联合国家,尼德兰人很看重其传统的自治。每个省都由贵族阶层和富有的商人控制,其中世纪的三级会议或议会,负责征税和招募军队。在 16 世纪中期,该地区的天主教仍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然而,查理五世虽然喜欢尼德兰,但腓力二世在观念方面彻底地西班牙化了。不仅是腓力的性情引起低地国家臣民的对抗,而且其关于中央集权的高效统治的思想也是如此,因为该思想致使他取消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的特权。这里的居民希望在经营工商业时,不再受到来自西班牙规章的强制性限制。其中的新教徒则憎恨并惧怕腓力在尼德兰启用的宗教裁判所。

腓力将西班牙的守备部队派往尼德兰,并试图实施镇压异端的法令。最初以尼德兰特权阶层为核心的反抗,很快就向下展开。1566 年,当 200 名贵族向腓力的总督请愿,要求采用一种较为温和的政策之时,一位官员轻蔑地称之为“这些乞丐”。这一名称起了作用,并很快被反叛者自豪地采用。政治上的焦躁不安,加上经济衰退以及加尔文宗在赢得会众方面的日益成功,引发了 1566 年 8 月的骚乱,导致根特、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地区的天主教教堂受到严重破坏。

腓力的反应是,派遣一支由一万名西班牙人组成的军队前往尼德兰,统帅是强硬的、缺乏政治技巧的阿尔瓦公爵。阿尔瓦建立了一个“动乱议会”——后来被戏称为“血腥议会”——该议会采取大规模处决、没收财产和罚款措施。被“血腥议会”处决的受害者数量总计约 1500 人。然而,镇压只能强化对西班牙政治统治的反抗。1573 年,阿尔瓦被召回西班牙。

与此同时,"乞丐"叛乱者们转向游击式海战,获得了对人口众多的荷兰省北部港口的控制,这里成为来自其他省份新教徒的庇护所。在以天主教为主的南部和以新教为主的北方之间——用现代术语来讲,即比利时与荷兰之间,裂痕越来越大。南北方在很多方面需要团结,而将17省全部团结在一起就是叛乱领袖、奥伦治家族的威廉王子的目标。

随着人们对1576年"西班牙复仇"——是年西班牙的军队洗劫了安特卫普,并屠杀了几千名居民——的普遍厌恶,威廉的团结目标似乎是有把握实现的。但是,当帕尔玛公爵于1578年统治荷兰的时候,腓力似乎终于愿意妥协了。虽然战争的代价变得无法容忍,但西班牙的杀戳还是使尼德兰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人。帕尔玛通过恢复过去的自治权重新赢得了南方十省,这里依旧多数是天主教徒,但是,重新赢得北方各省已为时已晚。

1581年,荷兰人采取了决定性的一步,宣布从西班牙王国独立。由于果断地使用了组织有序的陆军,他们实现了自己的宣言。此时腓力正被拖入到其他战场,所以他正面临着严重的内部经济问题。他不得不对付土耳其人、法国的新教徒以及反西班牙的法国温和派天主教徒。1585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出面支持荷兰人,并派遣一支军队助阵。腓力派出入侵英国的强大的无敌舰队,桀骜不驯的"战争之人",于1588年在英吉利海峡被一支部署巧妙的英国轻型舰队击败,接着又被风暴进一步毁坏。这次战斗是西班牙优势地位的终结,是英国在国际政治中走向强盛的开端,同时也是荷兰迈向独立的关键步骤。但是,即使在无敌舰队的失败被视为重大事件的那一时刻,即使在毁坏它的风暴被命名为"新教之风"的时候,这些预兆的结果在1588年也并不像后来那样明显。

1598年,腓力二世去世。除了荷兰北方7省,从他即位开始为其所有的庞大领地依然完整无缺。1580年,他又通过征服葡萄牙,将其纳入版图,并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置于其一人统治之下。然而,经过40多年的统治,他已经使国家筋疲力尽,耗尽了人力和物力,只能迟缓地处理一个庞大帝国的基本需求。

## 三、在封建王国和民族国家之间:绝对主义

在1648年之前,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由家族统治,家族的血统、家族的世系,被理解为“王室”的(royal)血统和世系——其统治的能力和权利被视为“与生俱来”(natural)。王朝控制着欧洲的政治版图:法国有瓦罗亚王朝和其后的波旁王朝;英国有都铎王朝和后来的斯图亚特王朝;哈布斯堡王朝主要在西班牙、奥地利和神圣罗马帝国。威尼斯的特殊共和制政府形式比佛罗伦萨的共和主义实验存续得更长久,但是二者都时或遭受法国、神圣罗马帝国或教皇的干涉。

正是在多种不同的王朝背景下,我们才谈及“绝对主义”。难以理解的是,“绝对主义”一词一直用于指近代欧洲早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王权实践。当今多数学者不再认为它是对历史现实的命名。另一方面,多数学者认为,“绝对主义”一词准确地捕捉到了近代早期的君主们通过各种策略追求政治势力的本质。最好从统治者的意志方面理解绝对主义:其目标为消除任何对君主贯彻其意志的能力的各种限制。没有一位近代早期君主能够完全自由地实现其政治意志,但是每个君主都在三个多世纪中寻求弱化从中世纪封建体制继承来的地方及个人特权,因为这些特权抑制了君主们制定法律,界定和执行司法,控制一切暴

力，并使之以军力和警力的形式服务于王权的能力。

在某些方面，绝对主义可以看做是以下几个方面合乎常理的延续：中世纪的个人统治实践，君主对更多个人权力的追求，以及在自己不能成为权威的地方利用代理人和封臣来“代表”其权威。然而，在实行“绝对主义”政策之时，近代早期的君主们试图广泛取消各种特权，以及臣民所得到的一系列免税优惠。他们试图使权威一脉相承，并消除王国内臣民之间的差别。在这个意义上，绝对主义体制看起来就像近代国家意义上的统一体。文艺复兴时期，君主们追求个人权力的扩展，绝对主义政策的结果是断绝了与封臣的相互隶属关系及其替代物委托关系，促进法庭发展并将之作为展示权力和采用手段的地方——其中许多都与《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的建议如出一辙——并且出现了一种不再被认为是神赐的政治权力，它更为抽象：它以服务于王权的官僚主义者的形式体现出来，它以王权为核心，而不是以具体的国王为中心。

近代早期的君主均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试图“集权”——用另一个术语就是——集权威于一身，不仅要设立终审上诉法庭或成为最有权势的君主，而且本人要成为法律的来源、司法定义和规定的来源、合法暴力（无论是警察或军队）的唯一形式的来源。为了扩大政府财政的基础，他们既与具有立税和收税权力的议会进行交涉，又试图限制它。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和法国波旁国王，分别于 17 世纪和 18 世纪长期停止召开议会，在没有正式立法机构的情况下进行统治。每个君主都寻求用各种手段来维持一支常备军，既通过各种新形式的税收也通过各种新型军事建制，来筹建不依赖于封臣的军力。总之，君主们追求新型税收体制及新税种，追求构建军事组织的新办法，追求对王室财力和支配力的空前展现。

中世纪的国王是巡回者,其“宫廷”是移动的,由仆人和其他一些通过忠诚和保护誓约而依附于君主的人组成。无论是地理上的疆域扩展,还是招募军队,他们都依靠这样的个人关系。在实行绝对主义政策时,近代早期的君主们都试图使统治者成为全部政府机构——包括立法、司法以及行政机构——的核心。西班牙的腓力二世、瓦罗亚王朝以及英国都铎王朝无一不选择一个城市作为王国的首都——马德里、巴黎、伦敦——在地理上将“中央”政府的位置固定下来,在此,王室的官僚机构日益具有各种“办公机构”,里面的办公人员均非凭借地位身份纳人的,而是具有才智和技能之人。在这些都城,君主们建起了不再移动的宫庭,王宫成为精心展示权力的焦点:财富和地位之权、王族非凡之权以及王国独特的政治权。每个王室,部分地通过王宫的展品和剧院,而且还通过法律和收回特权,试图改变王权和贵族之间的地位关系,试图从最初“王在贵族中”的地位转变为国王是“盖世无双”的:即国王是唯一的,不仅凌驾于贵族之上,而且是孤高的,具有完全与众不同地位。路易十四时期的凡尔赛宫就是这种追求的顶峰:最富特色的是长长的镜厅,朝臣们可以在里面照着镜子看到自己如何向国王表示敬意。

然而,对于每一个君主而言,这些追求都是为习俗、现存制度、贵族、商人、商业企业家所限制的,而且最终是被农民、技工、“普通人”或“平民”所限制的。在神圣罗马帝国,诸侯和议会对哈布斯堡皇室实现自己的宗教和宪法意愿的努力进行抵制。在英国,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一个由绅士、具有中等地位的土地贵族以及成功商人组成的联盟,对斯图亚特国王的叛逆进行审判和谴责。在法国,大约在 150 年之后,第三等级,即一个由资产阶级、律师、技工和农民组成的联盟也推翻了一个孤高、冷漠、

易违反传统权利的君主的统治。对于绝对主义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本章的内容，但是早在 1641 年，英国绅士和伦敦商人就有效地阻止了斯图亚特王室在统辖范围内对于绝对权力的要求，而且正如我们即将见到的，一个由德国诸侯与狡猾的外国同盟者组成的联盟，于 1648 年打破了哈布斯堡皇室在中欧的统治。

## 四、天主教君主国：西班牙和法国

近代早期的君主国具有许多共同特点：华丽的宫廷、某类代表议会、复杂的外交政策及相关的外事部门、开支庞大的军队以及最重要的新兴的官僚机构。对于西班牙而言，政府的效率取决于腓力二世所培养的官僚机构。对于法国而言，由于深受宗教内战之苦，官僚主义更多地依赖于君主的个人声望。对于英国而言，都铎王朝的君主在现实与皇室和议会权力的表象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平衡。地方主义保持强势，而真正的民族爱国主义尚未得到发展。但是对于从表面上产生于君主和议会的政府结构的日益强调，意味着一个分裂的欧洲正在国家概念上寻求安全与稳定。

### 1. 西班牙的绝对主义(1516—1659)

处于 1516—1659 年黄金时代的西班牙，为绝对主义理想和各种集团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个研究案例，其君主曾试图将中央集权的、标准化的统治强加于上述集团。西班牙的两位勤勉的君主，查理一世（1516—1556 年在位）和腓力二世的统治几乎跨越了整个世纪。查理从小在低地国家长大，他来到西班牙时，

完全是一位陌生人。1519年,查理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他在西班牙受到进一步的猜疑,贵族们看到其为哈布斯堡皇室的责任而分心时感到焦躁不安,而且自治地区对于帝国财政控制的增长也深感不满。1520年,以托莱多为首的西班牙城市联盟,以卡斯提尔公社的名义举行起义,最后于1521年被镇压。查理因此而感到恐惧,后来他尽最大可能不再公开冒犯其西班牙臣民。

与其父不同的是,腓力二世从小就是西班牙人,他更愿意在西班牙建立一个专业的、中央集权的政体。他设计了一种议会制度,以国家议会为最高议会,成员由大贵族担任,但是他们只有提供咨询的权力,最终的决定取决于腓力。腓力还大大减少了立法院,即代表会议的权力。在卡斯提尔,由于贵族和教士不交纳直接税,因此他们不再参加立法院的会议。虽然阿拉贡的立法院保留了较多的权力,但是腓力很少召集开会。尤其重要的是,腓力一切以保证收入的来源为重:来自美洲的贵重货物要交纳其价值五分之一的税款;王国境内诸侯国要交纳直接税;王室庄园、买卖官职和贵族的专利权也将提供税收进项;为了王家的利益,专卖权、罗马教皇特许令(例如,在星期五和四旬斋期间吃肉的特许)也都伴有税收。

即使在税收这件事上,对绝对君主的限制也是明确的。除了借款和像买卖官职一类的权宜之计之外,他不能明显地在国内增加收入;他不能将任何代表制的团体召集在一起,让他们为新货币投票。首先,其王国的每个部分都不得不作为一个单独实体来处理,而且其辽阔疆域迟缓的通信进一步延误了制定决策的过程。就绝大部分而言,贵族和教士是免税的,因此不可能被召集进行不同寻常的经济上的捐献。收税的困难、行贿的可能性以及缺乏行政和金融的经验,均是腓力不可能提出更加系

统的普遍性税收的额外理由。

在金融领域之外,对于有效的中央集权的妨碍甚至更加严重。由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婚姻而达成的阿拉贡和卡斯提尔王权的结合,绝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西班牙。在16世纪,一些省份甚至不能引渡半岛内的罪犯,许多省向其他地方的货物征收海关税。北方地区保留了许多古老的特权,被称做"市镇特许状"。阿拉贡仍然保留着"justicia mayor"之职,即由国王提名为候选人的终身法官,并被委托以较大的公共权利。

如果能够用全部精力来统一并发展西班牙领土,那么哈布斯堡王朝究竟会如何?对此,人们一无所知。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在试图取得欧洲势力范围,以及征服新教异端的过程中,它使这个半岛疲惫不堪,并削弱了其海外属国。这就是西班牙的伟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西班牙似乎是各国中最为富有的,并注定要统治美洲,这也是西班牙宗教、文学和艺术的鼎盛时期。然而,这也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时代,因为西班牙的辉煌在17世纪突然消失殆尽。

## 2. 西班牙的经济

伊比利亚半岛是多山的,其中部高原常遭受干旱的侵袭,但是其农业的潜力也相当大,而且它拥有矿石资源,特别是铁资源。西班牙是第一个获得海外土地、发展海军和商船队使新世界的大量资源与旧大陆的基地相结合的欧洲主要国家。然而,所有这一切财富,在几代人之后,从西班牙的指尖滑落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发动的战争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16世纪的西班牙从新世界获取了数量巨大的白银和许多

产品——食糖、靛蓝染料、烟草、可可粉、兽皮。但是所有这些收入并不足以偿付统治世界的耗费。贵金属,从西班牙之手流入欧洲其他国家的银行家和商人之手,部分用于支付西班牙陆军和海军的费用,部分用于支付发往新世界的商品。这些商品是禁止殖民地自己生产的,西班牙不能从自己贫乏的工业品中提供。虽然一道王室法令给予了西班牙商人对印度群岛贸易的垄断权,但是随着这个世纪的慢慢逝去,他们变成了经纪人,把从欧洲其余的地方进口的货物发往印度群岛。这样一来,西班牙的政府支出只是为外国经济的发展做了准备,到 1600 年,西班牙的本土经济已经走向衰落。

16 世纪的西班牙无疑正朝着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方向迈进。虽然西班牙缺乏在政府保护下创建国家财富的真正的重商主义热情,但是它却使用了许多重商主义的手法:普遍的狭窄范围调节,尤其是殖民地贸易的有限注入。在卡斯提尔,一个单独的机构"塞维利亚的贸易部"控制着与印度群岛的每一笔交易,负责给进出口业务颁发许可证。文书工作难以置信地拖后,它使贸易流动减缓,并导致了走私,后者可以避免令人沮丧的耽搁和高税收。

新世界的大量财富,并非是纯粹的神佑。为了黄金白银而进行的竞争,增加了与欧洲其他列强进行战争的可能性。贵金属史无前例的大批的流入刺激了通胀率,这是腓力的行动迟缓的官僚机构所无法控制的。当然,通货膨胀是贯穿于 16 世纪的问题,持续的通货膨胀通常会使经济生活发生彻底的变化。卡斯提尔的物价在那个世纪的上半叶,不可遏制地翻了一番还多,而在下半叶,再次稳步上涨并翻了一番,如此之高的物价上涨率,在此之前闻所未闻。

在 1600 年和 1620 年之间的某个时候,西班牙从一个扩张

主义者转变为经济萧条国家。此外,在16世纪期间,气候的变化严重地影响了西班牙。虽然无论是新世界还是腓力的政策,都不应因为大自然的异动而受到责怪,但是人们无法适应气候从世纪初的干旱和晴朗到以严冬为标志的潮湿寒冷之年的周期变化,这反映出西班牙农业的保守性。

无论如何,西班牙的通货膨胀之事比较复杂,还没有完全为世人所理解。来自新世界的极为重要的贵金属,并非黄金,而是白银,它在16世纪30年代比黄金更为丰富。白银的实际流动尚不能充分地被人所知,其中很多显然是用于购买亚洲的奢侈品,而多数可能没有进入西班牙的金融系统。白银的大量涌入和物价动向之间的任何直接关系不可能显示出来。我们所能谈及的是,新世界贸易,以及认为黄金白银为财富的最佳表现形式的传统信念,无疑吸引了公司中的一些人(也包括一些女性),他们视新世界的白银为被风吹落的果子,如果拥有了它,就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仍然是腓力的帝国战争将西班牙带到了近乎崩溃的边缘。仅丧失的无敌舰队就花费1000万达克特。在尼德兰的战争每年又耗尽200万达克特,而派发给法国天主教领袖的补贴达300万达克特。1589年,立法院表决了一项应急性的新税收,它在10年期间带来800万的收入。甚至在此之前,据估计,卡斯提尔农民将以租税、什一税以及封建费的形式交出自己的一半收入。

然而,所有这些收入仍然不够。腓力二世不得不举债度日,公债翻了4倍。最终,欠息至少占了王国收入的一半,以至于经费不足以满足军需,因此导致更多借款的恶性循环。此外,公款的支出并非仅限于西班牙,因为那些军事部门的工资都花在士兵所在之处:意大利、法国或荷兰。到16世纪90年代,西班牙处于

严重的危机之中,而全欧洲范围的农业减产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在1598—1599年,大瘟疫袭击了营养不良的人口,仅在卡斯提尔就可能死亡60万人;在有些地方,半数人口失去了生命。

虽然如此,腓力还没有撤离战争,因为他认为宗教问题至高无上。1596年以后,腓力经常患病,可是他对公开焚烧异端以及反犹太主义的兴趣不减。腓力死后,西班牙经济更加糟糕。然而,虽然其政策可能已经开始导致了这场经济下滑,但是他对详情的关注,处理堆积如山工作的能力,加之他一直将除尼德兰以外的帝国团结在一起的事实,都阻止了经济明显地下滑。当腓力四世于1621年即位之时,要扭转局面为时已晚。

### 3."西班牙的世纪"

16世纪被认为是西班牙的黄金时代。美洲的财富,对大西洋的控制,以及凭财富激活的军事力量,所有这一切都为西班牙在16世纪国家中间的脱颖而出做出了贡献。一批格外专业的外交官和政治家,将西班牙人的感性、西班牙的宫廷文化,以及西班牙的美学原则带到了欧洲的许多地方。这种美学原则以很多形式呈现出来:哈布斯堡王宫的画家委拉斯奎兹(Velásquez)的光影层次分明的绘画;米格尔·塞万提斯(1547—1616)作品的主人公骑士堂吉诃德的诚挚谦恭的风度;以及来源于西班牙的宗教修会,例如,耶稣会和革新的赤脚修女圣·特里萨的修会。意大利人和法国人还对非凡的西班牙贵族的风度发表了评论——傲慢与朴素的结合。同样,欧洲人想起耶稣会,就联想起他们朴素的黑色的袍子引人注目的深红色的腰带;就联想起他们的风度,那种引人注目的尊贵和拘谨;就联想到西班牙。耶稣

会士的仪表在英国、低地国家和德国所激起的仇外情绪，甚至比对再天主教化的恐惧还要严重。

西班牙是巴洛克风格天主教艺术的肥沃土壤。最有影响的“反宗教改革”（自觉地开始对抗新教的天主教改革）的圣徒中有三位是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阿维拉的特里萨（1515—1582年）和十字架上的圣·约翰（1542—1591）。每一相关作品都体现了16世纪复兴的天主教艺术风格：在神秘幻象的引导下，体验着一生中神秘变化的瞬间，以给人印象深刻的忠诚姿态和十足行动力，来表达肉体的虔诚。依纳爵和特里萨都是被以巴洛克风格的雕塑加以表现的，其中圣·特里萨是由伟大的巴洛克雕刻家济安·洛仑佐·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来完成的。贝尼尼的雕刻捕捉到了特里萨看见天使时发光的脸庞，以及被运送到一个更高的精神王国那一狂喜的瞬间。她的脚她的手她的脸，甚至她的躯干对于她的灵性生活都给予了物质的表达。她与十字架上的圣·约翰一起改革了西班牙的隐修生活，特别将祈祷、冥思和神秘的幻象的结合渗透到改革之中。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表现了西班牙有矛盾特点的人物。堂吉诃德是一位骑士，最大程度的表现了骑士的理想，几个世纪以来，读者将其表现视为一种疯癫的状态。其仆人桑丘·潘沙，是他的对立面：一位农民，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而且正如他本人所承认的，没有进行过任何探求，更不用说主人的那种“无理性的”探究。在整部小说中，桑丘·潘沙对“理性”、“现实主义”、“常识”进行了评说。但是，堂吉诃德既是小说中的“英雄”，又是主人公。多数评论者并不认同堂吉诃德，但是他们一直都感到着迷或挫败，被他所激怒，因为桑丘·潘沙可能永远都不会这样。《堂吉诃德》的“骑士品质”是不现实的，但是它还是俘获了人的想象力，

并将叙事的力量带入其生活之中。“理智”和幻象被置于紧张状态之中,常识对于读者似乎是宝贵的,但是想象、幻象却使《堂吉诃德》成为一部异乎寻常的难以忘怀的著作。西班牙迷住了欧洲人的想象力,即使他们认为那些举止太过于正式,压倒一切的黑色太过朴素,甚至罗耀拉和特里萨的幻觉都是“恶魔一般”。

极度的骄傲——以地位、信仰、国家为骄傲——经常被视为西班牙的标志。500 年前,埃尔·熙德(约 1040—1099 年),这位从穆斯林手中收复失地的传奇英雄,是一位骄傲的宿命论者。这曾为西班牙黄金时代的作家们所表现,虽然也许画家艾尔·格列柯(El Greco, 1541—1614)最佳地展现了对于那个时代西班牙领导者而言最为重要的东西。艾尔·格列柯出生于克里特岛。在威尼斯学习之后,他曾于 16 世纪 70 年代定居托莱多。其作品表现出其他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提香和丁托列托(Tintoretto)对于其早期发展至关重要。然而他也树立了他自己的风格。他是一位使天主教改革的争论在其艺术中得以明确发展的知识分子。著名的《哭泣中的圣·彼得》,画于 1580—1585 年间,主要强调了忏悔的重要性,甚至对教会的创立者亦是如此。他创作该画的确切原因是反对新教徒对忏悔礼的轻视。他还将圣徒个性化,鼓励人们去膜拜某位圣徒,并以其作品中的圣母玛利亚为荣。为使圣父和圣徒更加接近人们,他将这些人的形象描绘于 16 世纪的服装中。

历史学家不太严格地提及过一些曾经拥有过或统治某一个世纪的世界强国:20 世纪经常被称做“美国人的世纪”。当然,19 世纪为“英国人的世纪”,而 17 世纪为“法国人的世纪”。16 世纪是西班牙的黄金时代,特别以西班牙的时尚感以及西班牙在西欧事务中的原创精神为标志。

## 4. 迈向绝对主义的法国(1547—1588)

建立已久的法国君主国在百年战争之后,特别是在路易斯十一的领导下,开始向更有效率的绝对君主制迈进。在其发展过程中,法国具有一些优势。法国各省没有一个表现出见之于加泰罗尼亚或西班牙巴斯克人中的强烈的地方(分权)主义。此外,与伊比利亚半岛不同的是,法国多数地区没有被山脉切割成隔离的区域,没有交通和通信不便的问题。然而,尽管有这些长处,法国仍然只是松散地维系在弗兰西斯一世之下。许多省区保留着他们自己的地方三级会议、地方法院(最高法院)以及许多其他特权。

虽然如此,但是弗兰西斯一世的王国一直很强大,足以对抗被查理五世包围的威胁。然而,国王本人也并非另一个路易斯十一。自我放任不仅削弱了其健康,而且使他不能专心于政务,其奢侈的宫廷,以及频繁的战争则耗尽了法国的财力。弗兰西斯过着显赫的生活。据说,在频繁的旅行中,国王和宫室需要18,000匹马和畜群承担运输任务。他修建了香波城堡和枫丹白露,还改建了巴黎壮观的卢浮宫,并创建了法兰西学院。他赞助了达·芬奇、切利尼以及其他的艺术家和文人墨客。

在其统治之初,他扩大了王室的财政收入,首笔增加的财政收入是按1438年《布尔日国诏》中教皇支出名义取得的。通过1516年教皇与法国所缔结的《波伦亚条约》,教皇给予了国王更多的对高卢教会的控制权,包括选派主教和神甫的重要权利。但是,弗兰西斯是瓦罗亚王室最后一位最强有力的君主。16世纪下半叶是法国宗教内战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几乎毁掉路易十四及其后世君主的中央集权事业的危机时代。



埃尔·格列柯是西班牙黄金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他运用强烈的戏剧感描绘了托莱多城,仿佛他正在揭示那些等待入画者的紧张、苦行主义和偏执性。《托莱多风景》不仅是第一幅西班牙著名的风景画,而且也是世界著名画作之一。其延长的结构,弥漫夜空的云朵及其反射出的光芒,与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和戏剧性特征相适宜的对城市标志物的重新布局,都给予该画一种阴森怪诞的预示之感。(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equest of Mrs. H. O. Havemeyer, 1929, the H. O. Havemeyer Collection)

16 世纪 50 年代，法国的宗教分布图显现出一种阶级的和地域性的分化。虽然新教徒很少触及法国农民，尤其是南部农民，但胡格诺派在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技工中颇具影响力。巴黎、布列塔尼、诺曼底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法国东北部一直是虔诚的天主教区。新教则正在赢得西南地区。然而，即使在这些地区，雇主阶层更倾向于新教，而雇工们则倾向于天主教。

在亨利二世于 1559 年去世之后，突发的战事迅速出现。此后，王位在他的三个儿子中间传递——弗兰西斯二世(1559—1560 年在位)、查理九世(1560—1574 年在位)和亨利三世(1574—1589 年在位)。因为查理九世即位的时候只有 10 岁，所以由其母美第奇家族的凯瑟琳来行使权力，后者没有确定的宗教信仰。凯瑟琳决心将其子继承的庞大的王家遗产保持得完好无损。然而，这似乎受到了迅速兴起的胡格诺派的威胁。最令她忧虑的是大贵族已经因宗教问题而明显分化为两大阵营。介斯家族虔诚地献身于天主教的事业之中，而颇有势力的波旁家族和蒙特莫伦西家族(Montmorency)则支持胡格诺派。

在 16 世纪 60 年代的分散战斗中，胡格诺派信徒赢得了一些地盘。该派野心勃勃的领袖加斯帕·德·柯里格尼(Gaspard de Coligny, 1519—1572)也对善变的理查九世产生了巨大影响。面对自己和儿子地位不保而惊慌失措的凯瑟琳，更多地站在了介斯一边，并劝查理保持同一立扬。其结果便是圣·巴塞洛缪之夜(1572 年 8 月 24 日)的大屠杀。约有 6000 名新教徒在巴黎被杀，但胡格诺派的势力依然很强。战事在继续，天主教贵族组织了一个以介斯为首的同盟，而且双方都与外部势力签约换取帮助——天主教阵营加入了西班牙，而新教一方则加入了英国。

法国内战和宗教冲突的高潮是“三亨利之战”——该名取自三位亨利,瓦罗亚王朝的国王亨利三世,他是弗兰西斯一世最后一位子孙;介斯公爵亨利,是天主教同盟的首领;波旁家族纳瓦尔的亨利,信仰新教,是国王的堂兄,也是国王无子嗣时的假定继承人。新教徒可能会继承王位的威胁,迫使天主教同盟提出了一个违背王位继承原则的议案,即让国王的叔叔纳瓦尔的亨利当国王。但是,这一改变继承原则的举动使他们与那些深受天主教派别和新教派别困扰的温和派之间产生了距离。

巴黎是一个极端天主教区,而那里爆发的一场民众暴乱(1558 年 5 月)将亨利三世吓得惊慌出城,于是介斯公爵亨利被拥立为国王。亨利三世的反击是秘密暗杀天主教同盟两位首领,介斯的亨利及其兄弟路易。天主教同盟因义愤而起兵反叛,亨利三世只好逃往纳瓦尔亨利的军营,但在路上被一位修士所杀。

## 5. 波旁王朝的第一位国王亨利四世(1589—1610)

纳瓦尔的亨利现已依法成为亨利四世(Henry IV,1589—1610 年在位),他是波旁家族的第一位国王。在 1590 年 3 月的伊夫里(Ivry)决战中,他击败了天主教徒,后者曾拥立年迈的波旁红衣主教为查理十世。但是,亨利围困巴黎的努力都被腓力二世从佛兰德尔派出的西班牙军队所挫败。腓力打算让法国的三级会议废掉亨利,然后让他与第三任妻子瓦罗亚的伊丽莎白所生的女儿伊莎贝拉当女王,因为伊丽莎白是亨利二世和美第奇的凯瑟琳所生之女。面对新的威胁,亨利被说服正式放弃了新教信仰,先恢复天主教,然后再给予新教徒以宽容政策。1593 年,他皈依了天主教,巴黎归降于他。此间还产生了一个谣传,

说亨利曾公开言及“巴黎完全值得去做一次弥撒”。亨利于是对西班牙宣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双方签订了《韦尔温条约》(*Treaty of Vervins*, 1598)。

在法国国内，《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也于1598年颁布，它试图达成永久性的宗教协定。虽然它没有带来彻底的宗教自由，但却规定了较多的宗教宽容政策。胡格诺教徒被赐予基本的公民权，在一些城镇和胡格诺大贵族的家中，他们还被允许进行宗教实践。虽然在天主教主教所在城市内禁止胡格诺派做礼拜，尤其是巴黎。但是在其他200余个城镇中，他们有权进行宗教实践，有权让政府出资组成100人的防御队，以象征其享有被保护权。

《南特敕令》的文字拟定以及亨利四世统治时期法国君主制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些被称为“政治派”人所为，这个词的含义不是“政治家”而与“政治说教者”比较接近。其中最伟大的人物是让·博丹(Jean Bodin, 1530—1596)。他与同僚们都认为，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需要实现政治统一，但他并没有强调盲目地服从国王。政治派确信，在法兰西国家的最高权力统治下，国民应该被允许进行不同形式的基督教信仰实践。

亨利四世很幸运，在其登基之时，法国的内战情绪已经耗尽，国民盼望和平。战争的伤亡率已经成为灾难性的数字，一般认为，约三分之一的参战者都亡于战争。逐渐衍生出来的厌战情绪抵消了参战双方表现出来的狂热。为了达到政治平衡，亨利在对胡格诺派妥协的同时，也慷慨地给予天主教联盟津贴来解散军队，并且逐渐减少了召开三级会议的次数，因为它可能会制造麻烦。亨利是法国长久以来最人性化的国王，同时也是最受人爱戴的君主，因为他使其臣民确信他真正关心他们的福利。

文献记载

## 南特敕令

亨利四世通过该敕令赐予胡格诺派信徒以宗教自由。其主要条款如下:

通过这份永久的和不可改变的敕令,我们宣布、说明并且神圣地判定了一切。我们宣布、说明和判定的内容如下:

I. 首先,对从1585年3月至国王登基期间发生在双方身上的每一件事的记忆,对在其他时间发生的矛盾及其爆发过程的记忆,都将从此不复存在,一如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II. 禁止任何臣民,无论何种爵位、何种品级,去复活这些记忆,禁止他们以任何理由或借口,为了过去的仇恨而彼此攻击、对抗、伤害或挑衅……他们应该自持,并像兄弟、朋友和同乡一样和平相处。

III. 陛下命令在王国及服从陛下统治的各邦内,源自使徒的罗马天主教的礼拜,如果被迫中断,则必须恢复和重建。

IV. 允许那些新教徒生活和定居在王国及其所属各邦的一切城市和地区,不受骚扰、欺侮或强迫在宗教方面做任何有违良心之事,只要他们在其他方面都依从本敕令,也不得因此而在他们愿意居住的地点进行搜查。

XXII. 陛下命令,大中小学在接受学生入学时对上述教派不得歧视,在接纳病患、穷人入医院、收容所以及公共慈善机构时,也不得有所歧视。

XXIII. 为了重新有效地统一臣民的意愿,消除未来的积怨,陛下宣布所有公开或即将公开上述新教信仰的人,都能……

在王国的各城镇中……获得和使用公开的身份、荣誉、公职及其义务，而不必忍受违心的誓言。

The Edict of Nantes, in *Church and State through the Centuries: A Collection of Historic Documents*, ed. and trans. S. Z. Ehler and John B. Morrall(New York: Biblo and Tannen, 1967), pp. 185—187.

发展经济的各项举措所涉及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和创新。亨利的经济顾问重申开发沼泽和鼓励发展巴黎的奢侈品制造业的政策，并且种植了上千棵桑树来促进丝织品制造业。他们拓展运河、修建道路桥梁，让法国拥有欧洲最好的公路。面对即位时的沉重的赤字，亨利的主要大臣，胡格诺派的马克西米利安·苏利(Maximilien Sully, 1560—1641)有计划地减少赤字额度直至最终使政府财政收支平衡。然而，他对新财源的寻求也导致了一些不良后果。他不仅延续了买卖官职的旧习，而且允许受益者以缴纳年费的方式将官职传给继承人——对于王室而言，这的确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新财源，但也是更大的未来危机之源。另外，税收的分布也不平衡，某些省份过于沉重，穷人要缴纳的赋税也比其分担量要多。

## 五、新教诸国：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与荷兰共和国

### 1. 亨利八世(1059—1547年)

批评家经常指责欧洲王室在宫殿、随员、年金、情妇、奢华生

活方面耗资巨大，然而这不过是政府开支中相对较小的一部分。战争才是近代政府灾难性的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亨利八世的六位妻子、宫廷、经常性的王室旅行，都没有使英国陷入贫困，但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战争却的确给西班牙带来了窘困。

亨利八世曾经非常审慎地开战，但从未使大批英国军队真正在欧洲大陆冒险。他利用英国宗教改革来增加王室收入，没收了修道院财产，并将其赐给王室随员。因此亨利步其父之后尘，促进了新阶层的兴起，后者迅速成为贵族。其结果是形成了稳定的王权，虽然或多或少受到限制，但权限广泛。

在亨利八世及其后继者的统治下，新兴富裕阶层不断成长，许多其他阶层的人也都发达起来。但是都铎时代的英国也出现了一个新贫困阶层，这是圈地运动的结果。这些小农失去了在从前的公有地上放牧的权利，失去了使其能够补足收支差额的额外经济来源，这些土地现在已经被圈为私有地产。

由于缺乏耐心去处理行政细节，亨利非常依赖都铎王朝的新贵族成员，令其成为自己的主要助手——其中，尤其以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约 1485—1540 年)最为重要。克伦威尔是一位行政管理大师，他热衷于将王室行政机构变得更忠诚、更专业、更有效率，而较少将之与国王的家政和个人兴趣联系起来。在取得了许多进展后，他成为其他野心勃勃的王室随员的公敌。在政敌的运作下，克伦威尔不再被国王信任，并于 1540 年以叛国罪被处死。

亨利很无情，然而他也非常灵活和擅长外交，他有效地控制了议会来达成每一个愿望，包括同意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皇、批准有关战争和协商会议的提案。亨利的议会还远非经广泛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上议院里还存在着一个安全的多数票，这些

议员都是都铎王朝的元老或拥护者。正在进化中的复杂的下议院由各郡地主推举出的骑士代表以及各城镇或有选举权的行政大区的代表组成。在多数行政大区都采取狭义的全民选举来推举议会成员。此外,由于各郡的多数人口都是农业工人或佃农而非地主,因此郡县的选举权也是有限的。

但是,即使都铎王朝的议会也比欧洲大陆的议会更接近现代的立法机关。主要区别在于下议院的结构,它从中世纪开始就是代表市民阶层利益的团体,而不是乡村土地贵族与城市上层的混合体。在欧洲大陆,与英国议会相对应的议会通常分为三级:一级代表教士,另一级代表大小贵族,第三级代表平民。

在都铎时代之初,议会既已赢得了建议咨询以外的权力。议会出现于中世纪,具有制定法律法规的权力,即使最后还需要获得王室的同意。然而,尽管都铎王朝的君主与议会之间有矛盾,他们通常不必引发严重的立宪危机就可以达成愿望。这在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尤其明显,后者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其议会通常从对王室心存感激的人中吸纳新成员。但是,都铎君主的成功,也因为他们都是政治御术高超的君主,愿意运用其威望和说服他人的天赋去赢得议会的支持。

## 2. 爱德华六世与玛丽的统治(1547—1558)

亨利八世于 1547 年去世,这标志着一个极端的宗教转型时期的开始。亨利的继承人是年仅 10 岁的爱德华六世(Edward VI,1547—1553 年在位),其母是亨利的第三个妻子简・西摩(Jane Seymour)。在幼王的叔父,其保护人萨默塞公爵的带领下,爱德华的政府继续在新教的道路上前行。亨利试图保存天

主教的神学要义、礼仪以及教会组织形式的《六条论纲》，于1547年被废除。在爱德华六世的短暂统治期间，英国还曾努力通过由议会颁布的《祈祷书》和信仰论纲来达成宗教仪式的统一。

1553年，年轻的国王，那个一直很脆弱的男孩去世了。新教阴谋家们徒劳地想让信仰新教的简·格雷(Lady Jane Grey)即位，她是亨利七世的曾孙女，安静而富于学者气质。但是爱德华六世的姐姐玛丽，与亨利八世离婚的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女儿登上了王位。玛丽从小就被教育成一位天主教徒，所以立刻开始恢复旧法。当玛丽宣布她将与西班牙的腓力二世结婚时，反抗陷入公开化。玛丽镇压了反叛者，简·格雷因为一场她从未参与的叛乱而被处决。

天主教的信仰又在各个教区恢复，尽管值得关注的是，亨利八世所做的土地安排并未受到干扰。1554年，英国重新出台了三个异端法令，接着就是对新教徒的强力迫害，约有300人被烧死。玛丽女王也因此获得了一个永恒的称号"血腥的玛丽"，英国至今仍然存在的某些迹象，即新教徒的仇恨和天主教徒的怀疑，其基础就是在此时奠定的。

### 3. 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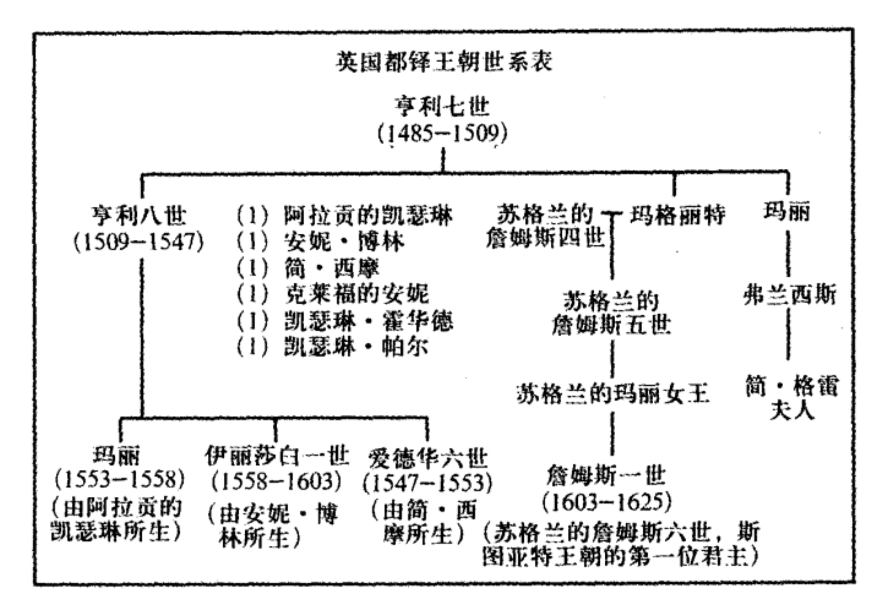
当玛丽于1558年去世之后，亨利八世最后一个幸存于世的孩子就是伊丽莎白——安妮·博林的女儿。1536年，应其父亲的要求，她被议会宣布为私生子，然而，亨利的最后遗嘱又为其恢复了名誉，因此她得以即位，称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58—1603年在位)。她从小被教养成为一位新教徒，因此去

教会做礼拜的人又再次被要求改宗。这一次,安立甘宗被稳固地确立下来,在伊丽莎白统治下颁布的《祈祷书》和《三十九条信纲》(1563 年)至今仍是安立甘宗的基本文献。

尽管伊丽莎白的政策非常温和,但也没有完全解决宗教问题。英国仍然有许多天主教徒,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也一直是英国的夙敌,而独立的苏格兰则永远都站在反对英国的阵营之中。苏格兰的新女王是亨利八世的姐姐玛格丽特的孙女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1542—1567 年在位),她因此有权在伊丽莎白无子嗣而死时继承王位。玛丽是一位天主教徒,她无法等到伊丽莎白去世就迫其宣布让位。她以伊丽莎白是私生子为借口,要求兼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王位。

同时,无数新教群体也因对《三十九条信纲》不满而走到政治舞台的前端。他们统一被称为"不墨守成规者"或清教徒,因为他们要纯洁安立甘教会,净化那些被其视为天主教残余的信仰和礼仪。在教会实践中,其主张包容的范围很广,从温和的到激进的内容兼具。温和派只满足于简化礼仪,保留主教职位。长老派则要以长老会取代主教,并完全采用加尔文神学。布朗派,其名称源于他们的领袖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e,约1550—1633 年),该派走得更远,其宗教团体彼此独立。后来,在这一派中产生了公理宗信徒。

因此,伊丽莎白在其统治之初所面对的是一个宗教分立的王国。各种分歧似乎一直围绕着她,然而她却统治了将近 50 年。她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现实主义者,亲自制定政策,并允许对之进行广泛的讨论。即使她的情人们都不爱她,她依然为臣民所爱戴。她终身未婚,却假装要结婚,让国内外的追求者彼此相争,进而在外交上取得了绝佳效果。她尽可能地避免浪费和




英国都铎王朝世系表

涉入战争之险,而且总是想做无本生意。最重要的是,她意识到公开卷入对西班牙的战争以保护尼德兰将是一场灾难,因为这个联盟可能很快就不复存在。

伊丽莎白不相信英国的大贵族,她从贵族以下的阶层中,从有才干的人中挑选大臣,后者令其政府秩序井然。由于运用圆滑的外交手段有效地利用了法国和荷兰与西班牙的矛盾,她同腓力的最终对峙拖至 1588 年,而此时英国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苏格兰女王玛丽,根本无法与其才华横溢的表姐相提并论。玛丽是天主教徒,但处于约翰·诺克斯领导下的苏格兰正日益演变为加尔文宗的一个中心。苏格兰爆发起义后,玛丽被迫到英格兰避难,伊丽莎白乘机将之监禁起来。对于那些要推翻伊丽莎白的人而言,活着的玛丽永远是一个诱惑。玛丽的一些宣

称自己被蒙骗的信件，使她卷入了一场反对伊丽莎白的阴谋。她受到了审判，被宣判有罪，并于1587年被处死。

伊丽莎白统治的危机发生在对西班牙战争期间，1588年无敌舰队被击败，危机宣告解除。这场胜利源于前所未有的资源投入，尤其在欧洲大陆，有4.8万名英国士兵参战。由于经常被迫要求议会支持其财政政策，伊丽莎白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主要是下议院清教徒议员对其宗教政策的批评。通过勉强对下议院让渡更多的权力，她得到了资金。但下议院却对伊丽莎白的政策进行了更大胆的批判。由此，17世纪王权与议会冲突的舞台已经开始搭建。

在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后几年，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幕需要耗时更久的戏剧——爱尔兰问题。有一半英国血统的爱尔兰统治阶级早已失去了与当地人口，尤其是农民的联系。1542年，爱尔兰既已成为一个王国，但很难称之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因为英格兰和爱尔兰的王冠都属于同一个人。1495年，一项法令致使爱尔兰议会完全处于英格兰议会的控制之下，所制定的适于爱尔兰的法律必须得经过英议会的同意。试图强制实施新教的立法由英议会通过后，激起了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地方民众的愤怒。1597年，爱尔兰人在蒂龙伯爵(earl of Tyrone)的领导下爆发了起义。伊丽莎白晚年最宠爱的埃塞克斯伯爵因在处理爱尔兰问题失利而丧失了权势。后来，他卷入了一场反对女王的阴谋而被处死。1601年，起义遭到血腥镇压，但爱尔兰问题并未得以解决。伊丽莎白的后继者，詹姆斯一世，寻求与爱尔兰天主教徒进一步对话，他将一些新教移民迁入爱尔兰岛的北部，就是我们所知的阿尔斯特(Ulster)。

## 4. 英国文艺复兴

伊丽莎白的统治以阴谋、战争、叛乱以及个人和党派冲突为特征。然而,在国家和社会之下,还存在着稳固的社会基础,他们创造了伊丽莎白时代财富、胜利以及在文学、音乐、建筑和科学领域的成就。经济在这个私人企业盛行的时代蓬勃发展。稳固的行政管理体系建立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之上。民族共同感将所有英国人凝聚在一起,进而对超越其上的分离情绪进行限制。伊丽莎白本人也为其臣民的凝聚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其宗教政策的主旨在于进一步扩展本来已经很宽泛的英国教会的教义和教会实践,以便它既可以涵盖亲天主教的极端,同时也可以包容亲公理宗的另一极端。

伊丽莎白的时代也以引人注目的文化繁荣为特征。这就是英国的文艺复兴。当时,绅士淑女们喜欢弹鲁特琴,哼唱乐曲,崇尚绘画,并寻求像意大利人那样的穿着打扮。英国文艺复兴的最高成就呈现于文学领域,尤其是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爱德蒙·斯宾塞(1552—1599),以及其他为后世塑造英语语言的人们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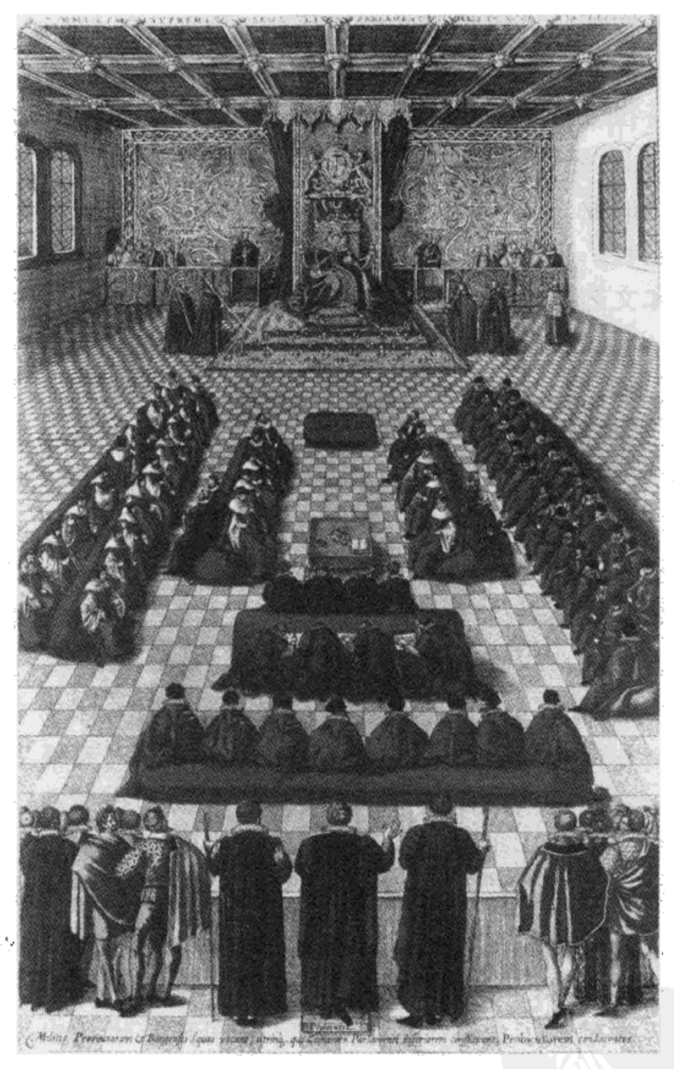
这些伊丽莎白时代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人们是如此地令人愉悦和生机勃勃,甚至连行为举止和学术研究都是如此。到了其后的一代,则变得粗野而没有修养,太过于重视生活乐趣。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对某种表达方式的过分喜爱:如《仙后》中大段引经据典的、寓言式的诗节;如杂乱堆积的古希腊罗马文献的引文;如莎士比亚对双关语和修辞的热爱;如那些令伊丽莎白时代戏剧地位卓然,仅次于古希腊的极度

血腥的悲剧和令人愉悦的喜剧形式。

莎士比亚在各个时代都是作品被援引最多的作者。他是埃文郡斯特拉福德的一位手套制造商之子，从伦敦的舞台开始了自己的事业，还不到30岁即已获得了广泛的承认。他后来成为环球剧院的业主之一，从1603年开始在这里为喧闹的伦敦人上演他的剧目。自从那时开始，他就被认为是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天才和文艺复兴时代个人主义思想的杰出典范。他撰写了经典戏剧《尤利乌斯·凯撒》和《安东尼和克列奥佩特拉》；著名喜剧《暴风雨》；令人激动的并且令英国人深感骄傲的历史剧《理查二世》和《亨利四世》；此外，最重要的，是自古希腊以来最伟大的悲剧《奥赛罗》、《麦克白》、《哈姆莱特》和《李尔王》。他涉及了文学史上的几个重大主题：罪恶、复仇、爱情、荣誉。

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也对伊丽莎白时代的文艺复兴卓有贡献。爱德蒙·斯宾塞的《仙后》被视为西方作品中最好的一部道德史诗。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是一部早些时候的作品，却在莎士比亚时代引发了一场革命性的辩论，因为它描述了一个远离新世界的孤岛上的理想社会，提出罪恶和暴力并非源于人类固有的堕落的本性，而是社会的产物。这种观念与前几个世纪的观念恰好相反。该观念在今天是非常普通的——人们普遍相信教育、环境、社会法律、惩罚的本性、工厂以及家庭塑造了人的行为——但在16世纪和17世纪，这是革命性的观念。

伊丽莎白时代的文艺复兴，结束于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它后来融入了詹姆斯一世时期，其间莎士比亚也写出了部分优秀作品。这一时期的另一重要作品，是国王詹姆斯版《圣经》。1604年，清教神学家请求詹姆斯一世资助《圣经》新译本，而被委以重任的学者委员会于1611年完成了这部《圣经》译本，



伊丽莎白女王是16世纪最成功的统治者,她将自己的名字赐予了一个时代。画中的女王正召开议会。这幅雕版画取自1608年于伦敦出版的《新贵政治家与平民》。该书刻画了英国政要和贵族的形象。(By permission of the 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

其形式正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一样，将内容分成章节段落。因为是英文译本，许多世俗读者都可以阅读，所以他提高识字率，并从根本上影响到英语语言和英国人自我意识的发展。

当今历史学家强调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政治分歧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差异。英国有一个贵族阶层，从男爵到公爵皆被包容在内。这些贵族，加上安立甘宗主教，构成了上议院。但在英国，贵族的幼子本身不是受封贵族，这就像在欧洲大陆一样。然而，他们却是另一个由乡绅、富有的银行家和商人组成的较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群体的成员，通常是地位较高的成员，而且他们本人也几乎都通过购得地产而变成了乡绅。此外，这个群体还包括领军型的律师和文职人员、安立甘宗教士、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教授（他们通常都是教士）、陆军和海军军官以及其他自由职业人士。这个由众多不同人士组成的群体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等级，它一直对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保持开放。有时，一些不很准确的术语“乡绅”和“绅士”会被用于这个群体，前者在内涵上有强烈的排外的乡村气质，而后者在内涵上也不总是准确，因为绅士需要拥有足够的财产或资本，他们不必为了生存而工作。也许，“统治精英”或“当权派”更适于这个独特的英国阶层。

## 5. 荷兰共和国（1602—1672）

尼德兰北方联合省在腓力二世去世之前已从西班牙取得独立地位，尽管对其正式承认是在 1648 年。荷兰是一个商人贵族的社会，是欧洲第一个中产阶级的国家，在本质上根本不存在土地贵族。尽管面积狭小，但却是一个强国，在亚洲、非洲以及美洲都有殖民地，在世界各处进行贸易，并拥有一支灵活而有效率

的海军。

荷兰船在国际航运贸易中起到了显著作用,在17世纪中期,荷兰人可能操纵着世界上一半或四分之三的商船。荷兰也控制着利润丰厚的北海渔场。他们的东印度公司建于1602年,曾调集并开发了一个商业帝国。它支付较高的正常股息,是世界上最早的股份公司的案例,由国家发起,将那些不愿单独冒险的商人的资金集中起来加以利用。阿姆斯特丹银行于1609年创办,也是一个典型案例,它铸有自己的弗罗林币,并在为储户服务方面颇有创新。它将阿姆斯特丹变为欧洲金融中心。

荷兰人还创立了人寿险,并且完善了保险精算师对该险种确立基础的计算。专门制造业在某些城镇特别繁荣:阿姆斯特丹的钻石切割业、印刷业和书籍装订业;赞丹的造船业;斯希丹的金酒蒸馏业;代夫特的制陶业;莱顿的毛织业;哈勒姆的麻织业。荷兰人在欧洲农业进步上也处于前沿。他们通过围海造田创造了称做"开拓地"的新型农场,同时还进行科学种田技术实验和育种实验。在育种方面,较为突出的是从土耳其引进的郁金香。在哈勒姆周围的农田里生长的郁金香球茎曾经引发过一次狂热的金融投机——17世纪30年代的"郁金香狂"。

在政府方面,荷兰共和国并非效率的楷模,因为联合省只是在名义上的联合。七个省各自派代表到三级会议,后者的运作很像是一个外交会议而非核心立法机关。每个省都有一个行政长官,即省长。多数省都选奥伦治家族中的在职子弟出任省长,将其作为国家统一的象征。然而,在17世纪,奥伦治家族的多数票却有两次都遭到了来自最重要省份的杰出地方官员的挑战。在那个世纪的第一个25年中,财政长官约翰·奥登·巴纳威特(Jan van Olden Barneveldt, 1547—1619)控制了荷兰的政

治，直至他被处死，因为他支持阿米尼乌派的自由意志论，反对加尔文宗的预定论。财政长官约翰・德・威特(Jan De Witt，1625—1672)也曾统治了共和国，直至17世纪70年代当路易十四的军队攻入了毫无准备的荷兰时，他被一伙暴民以私刑处死。

荷兰的自由的加尔文教徒感到宗教狂热阻碍了贸易和国家的发展。尽管17世纪末的宗教宽容政策已经有所弱化，但联合省的居民对占少数的天主教信徒依然相对温和。尤其是从1604年开始任治安官的威斯特伐利亚人约翰内斯・阿尔图休斯(Johannes Althusius，1557—1638)，详细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即应该允许对宗教信仰进行相对自由的选择。他不能容忍无神论，但将其宽容的范围扩展至犹太人。后来，阿尔图休斯的宗教自由思想为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所发展，后者是一位荷兰—犹太人，他假设人类自由是国家公民和平、服从与稳定的基础；假设在宗教事务中，人类一定要有绝对的信仰自由。在这些理论家关于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理论的影响下，阿姆斯特丹尤其演变为一个宗教上持不同政见者的天堂。

在尼德兰，宗教宽容的受益者是少数人的天主教，来自西班牙、葡萄牙和立陶宛的犹太避难者，以及从加尔文宗盛行的欧洲大陆逃离出来的持不同观点的新教徒：主要有路德派信徒、再洗礼派信徒，甚至阿米尼乌派信徒。因为尼德兰的南部(现在的比利时)已成为严厉的天主教区，来自南方的加尔文派避难者也加入到北部的旺盛的经济增长之中。

在这个伟大的年代，荷兰文化的风格非常稳固、理性、冷静，但远非没有色彩。该共和国通过知识、辛勤劳作、频繁的贸易以及海外探险，在世界上赢得了最有价值的地方。但到1700年，荷兰共和国的光辉被其强大的邻国所掩映。尽管有时它还与英

国竞争,但荷兰的命运已经被写进了都铎王朝的政策之中,而国家之间的交流——在贸易、技术、人力,甚至艺术领域——都已终止。

## 六、神圣罗马帝国和三十年战争

像16世纪的战争一样,1618—1648年间的三十年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宗教冲突。然而,这次的大部分战斗都发生在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费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要在政治和军事上尽全力将帝国统一于天主教的控制之下。三十年战争始于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冲突,却结束于一场重在弱化哈布斯堡王朝实力的争斗。多数欧洲列强及其殖民地最终都卷入了战争。在17世纪的时代背景下,这场战争可谓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17世纪开端,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宗教形势日益动荡。自1555年以来,加尔文宗扩展非常迅速。加尔文宗诸侯不断资助传教团体,并组成了"新教联盟"(1608年),致使天主教诸侯国也成立了一个与之抗衡的"天主教同盟"(1609年)。两个组织都有政治野心,代表了德国各州分立观念——建立独立国家——的支持者的利益,反对帝国观念。

宗教形势主要涉及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在荷兰起义之后,西班牙人一心想要巩固从比利时跨越莱茵河谷和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的一条交通线。然而,荷兰人和法国人则都想遏制西班牙人捍卫这条路上交通线的计划。

## 1. 争夺波西米亚和巴拉丁伯爵领的斗争(1618—1625)

横在西班牙人那条陆路通道上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巴拉丁伯爵领,这是由信仰加尔文教的巴拉丁选帝侯统治的一块富饶的莱茵之地。1618年,巴拉丁选帝侯弗雷德里克五世出任新教同盟的领袖。弗雷德里克希望打破自从无子嗣的皇帝马提亚(1612—1619年在位)以来天主教会对帝位的把持局面。萨克森选帝侯和勃兰登堡选帝侯也是新教徒。如果皇帝去世时能有四个新教选帝侯而不是三个的话,那么这个多数票就能让一名新教徒登基。因为有三个选帝侯都是大主教,因此增加一个新教徒的唯一办法就是革除唯一的世俗天主教选帝侯波西米亚国王——该职位在名义上是由皇帝来兼任,而实际上是由其继承人费迪南出任,后者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国王—选帝侯。

波西米亚是现今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当时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捷克居民希望能够从讲德语的帝国统治者那里,同时也从维也纳,实现地方独立。一些捷克人通过追随两个世纪以前的扬·胡斯的教义,即"饼酒同领论"(源于拉丁词汇"二者")表达了他们对天主教的蔑视,因为该教义主张世人在领取圣餐时既可以领取面包同时也可以领葡萄酒。当时,饼酒同领论者、路德宗和加尔文宗都被允许在波西米亚存在,天主教只是官方宗教。费迪南将成为波西米亚国王并继而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前景,加之强加于他的保持宗教正统性的义务,令捷克的新教徒深感忧虑。当新教领袖因反对侵害宗教自由而被捕时,捷克便爆发了起义。起义以"布拉格抛出窗外事件"(1618年5月23日)为发端,其间有两名信仰天主教的帝国官员被从

70 米高的窗户扔到了庭院中。由于侥幸落在肥堆上,他们得以保全性命。

捷克的反叛者将波西米亚王冠献给巴拉丁伯爵弗里德里克。弗里德里克如约前往布拉格,由于他没能确保莱茵家园的防御安全,所以西班牙人于 1620 年占领了巴拉丁伯爵领。与此同时,波西米亚、西班牙以及佛兰德尔的天主教徒也联合起来镇压捷克的反叛。在 1619 年皇帝马提亚去世之时,选帝侯们适时地选举了信仰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家族的费迪南二世作为继承人。天主教联盟的领袖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积极支持费迪南在波西米亚的举动,作为回报,后者允诺要接受其选举投票。信仰路德宗的萨克森选帝侯也支持费迪南。

在波西米亚,马克西米利安和天主教军队赢得了白山战役(1620 年)。弗里德里克逃跑,费迪南遂使波西米亚王位继续在自己家族中世袭。他也取消了对饼酒同领论者和加尔文派的宽容法令。但是,因为有萨克森选帝侯的约束,该法令对路德派依然暂时有效。他处决了叛军领袖,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并正式批准法令以摧毁波西米亚新教运动。

然而,西班牙军队在巴拉丁伯爵领的继续留驻打破了势力平衡。信仰路德宗的丹麦国王克里斯丁四世(Christian IV, 1588—1648 年在位)唯恐哈布斯堡王朝会向北挺进波罗的海;法国国王也将面临新一轮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包围;荷兰则将受到西班牙进攻的威胁:因此,荷兰先与克里斯丁四世结盟,而后又与逃亡的弗里德里克联合,并同意为他重新占领巴拉丁提供经费。当战争再次拉开帷幕,弗里德里克再次战败,在此之后,德皇费迪南就将巴拉丁选帝侯的资格转给了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1625 年)。



《绞刑》。由蚀刻版画大师雅克·卡洛(1592—1635)绘制。取自雅克的系列作品《战争的痛苦》,后者强调了三十年战争的野蛮性。(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Gift of Junius S. Morgan, Class of 1888.)

## 2. 丹麦和瑞典的武装干涉(1625—1635)

丹麦野心勃勃的君主克里斯丁四世一心想把丹麦的政治和经济势力扩展到德国北部。为了阻止丹麦的入侵,德国天主教徒接受了瓦伦斯坦的阿尔伯特(Albert of Wallenstein, 1583—1634)的私家军队的帮助。后者招募并维持了一支以土地为生的军队。他购买了大片从叛乱者手中没收的波西米亚地产,在本质上就是一个谋求成为一方诸侯的普通公民。尽管他几乎从未成功,但其军队却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瓦伦斯坦的军队和天主教同盟一起击败了丹麦人,并侵入丹麦。

然而,就在成功之际,皇帝费迪南及其幕僚却走过了头。在《归还敕令》(*Edict of Restitution*, 1629)中,他们要求归还自1551年以来从天主教流入路德教会的全部教产。该《敕令》还明确了《奥格斯堡宗教协定》将从宽容法中排除加尔文派信徒和

激进的路德派教徒的规定。两个月后签订的《卢卑克和约》(*Treaty of Lübeck*),允许克里斯丁四世恢复其丹麦领土,但迫使他保证不再干涉德国内政。

费迪南的严厉与红衣主教黎塞留在围困拉罗舍尔时处理胡格诺教派问题时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拉罗舍尔的包围于1628年结束,尽管这场围困空前地漫长和残酷,而且沦陷之城可以被洗劫也广为世人所认同,但是皇家军队还是保持了严明的纪律,同时也给城中饥民提供了食物。黎塞留表现出宽宏大量,明确表示只要拉罗舍尔城放弃政治独立、回归天主教会,异端无须付出血的代价。使黎塞留担忧的是如何保持权力平衡。哈布斯堡王朝正在向波罗的海推进,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其势力范围,尽管同为天主教徒,但前者是应该被强制撤退的入侵者。

皇帝费迪南越蒙受瓦伦斯坦的恩惠,就越不能控制他。瓦伦斯坦计划利用汉萨同盟的残余势力组建一个新波罗的海贸易公司,通过向西班牙人开放波罗的海,来彻底战胜荷兰。因此,当费迪南让他出兵参加对法战争时,他执意于北方计划,拒绝了德皇。于是,费迪南罢免了瓦伦斯坦,将帝国军队置于冯·提利伯爵和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的统帅之下,后者一直因瓦伦斯坦的功勋而恐慌,现在则为其离去而窃喜。如果费迪南也能通过取消《归还敕令》让新教徒得以安抚的话,那么和平也许是可能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于是新教捍卫者古斯塔夫·阿道弗斯再次掀起战事。

古斯塔夫·阿道弗斯(Gustavus Adolphus, 1611—1632年在位)被称做"北方之狮",是一个比丹麦的克里斯丁更强势的保卫者。像克里斯丁一样,他在政治上也有控制德国北部的野心,而且他还希望能够承担从前汉萨同盟的经济领导地位。古斯塔

夫本来就率领着一支训练有素的大军,同时还将能够劝诱加入的所有新募士兵,甚至包括囚徒都加入到南下大军中。他不仅身先士卒,而且通常会限制军队劫掠。黎塞留曾同意资助其军费,但古斯塔夫不赞同攻打马克西米利安,也不愿意为天主教会捍卫信仰自由。信仰新教的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选帝侯也都行动起来,一方面要复兴新教,另一方面则要保卫德国使之免遭瑞典人的进攻。

在天主教阵营取得了一次比失败更有害的胜利——攻陷和洗劫了马格德堡之后,德国新教徒不再犹豫徘徊,这是新教事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 1631 年 5 月帝制拥护者的猛烈进攻下,马格德堡几乎完全被烧毁并劫掠一空。新友和天主友都谴责对方的劫掠,并诉诸印刷界以便在全欧洲的范围内为各自的事业赢得公众支持。新教徒指责帝国总司令提利计划摧毁了这座城市及其居民——这一谴责有力地使新教一方幸免于历史学家的审判,因为帝国军队的确明显地难以控制。天主教一方则指控新教徒自己纵火。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印刷品的作用,新教的事业得以加强。

现在,信仰新教的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选帝侯也同古斯塔夫联合起来。1631 年 9 月,古斯塔夫战败了提利。加之西班牙人也在远离荷兰海岸的地方受挫,于是战事急转直下将矛头指向了哈布斯堡王朝。萨克森选帝侯入侵了波西米亚,并以巴拉丁伯爵弗里德里克的名义重新占领了布拉格,而古斯塔夫则侵入了德国南部的天主教地区,赢得了许多诸侯和自由城市的加盟。在危机之下,费迪南又重新起用瓦伦斯坦。

古斯塔夫计划重组德国,要将路德宗和加尔文宗信徒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帝国——这一目标被德国新教和天主教诸侯一致

反对。面对其野心,同盟者被证明都是不可信任的,而其对手马克西米利安和瓦伦斯坦却彼此更加靠近。1632 年 11 月,瑞典军队在吕岑打败了瓦伦斯坦,但古斯塔夫却战死沙场。

现在,媾和已经有了可能性,然而战争还在继续。黎塞留很愿意战火进一步向法国在莱茵流域的目标蔓延;瑞典人需要保护其巨额投资,因此必须获得一些疆土才肯退出战争;西班牙人希望古斯塔夫的战死意味着哈布斯堡王朝的事业可以被拯救,至少应该战胜荷兰。当瓦伦斯坦与帝国的敌人媾和并希望法国承认他为波西米亚之王的时候,其军力已经开始衰退,因此他再次被皇帝费迪南罢免。1634 年 2 月,一位为帝国服务的英国雇佣军谋杀了瓦伦斯坦并获得了赏赐。

### 3. 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的冲突(1635—1648)

三十年战争的遗留问题是哈布斯堡王朝与波旁王朝的冲突。新教联盟的指挥官不得不允诺未来对德国的天主教实行宽容政策,并且以无限期地承担军务来换取法国人的保证和金钱。战争转为新兴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冲突。双方的军队皆为欧洲各民族的人员的混合体,他们作为职业军人而战,经常频繁易主。由于这些军队遍布中欧,结果土地都荒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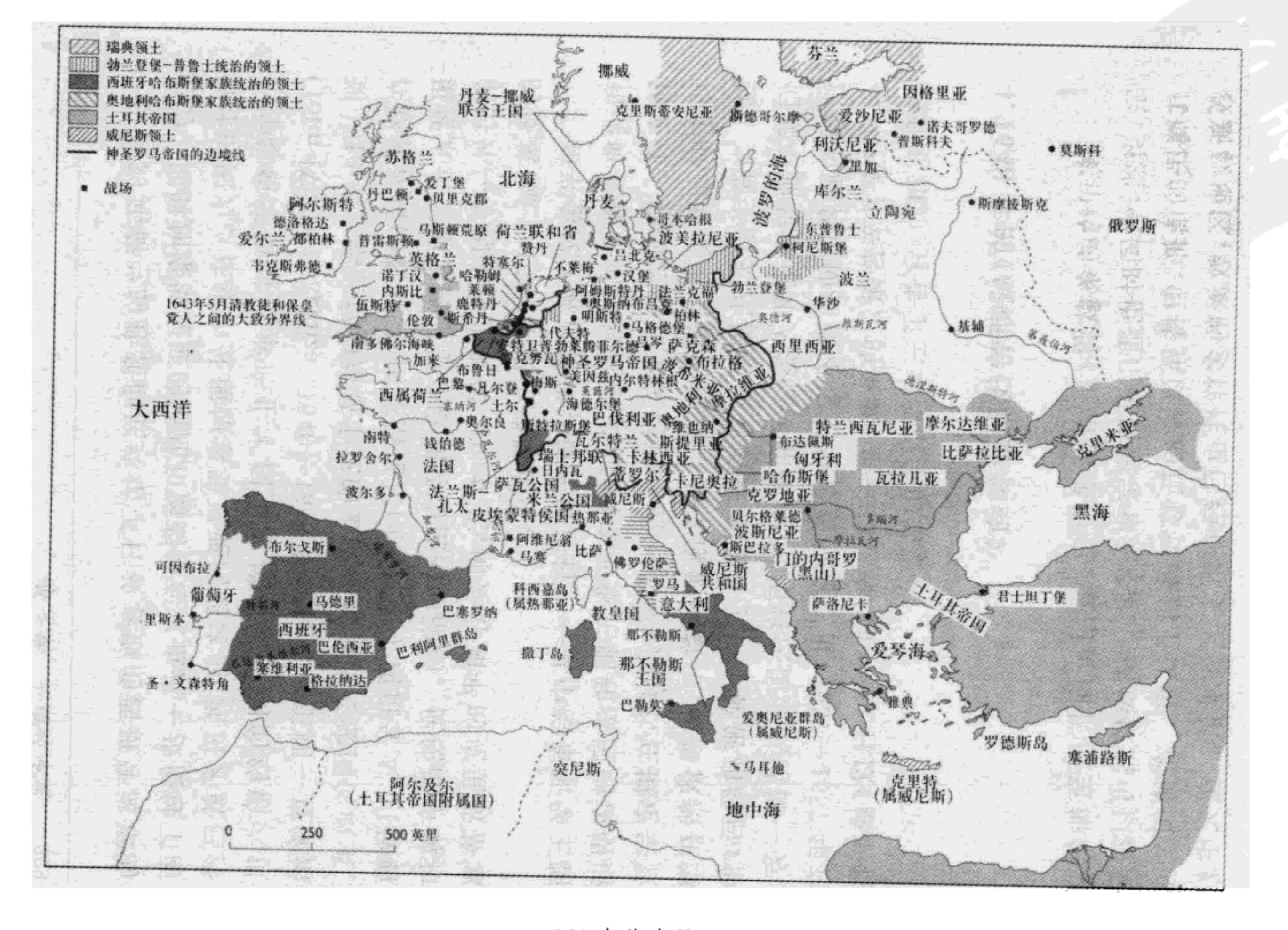
1635 年,皇帝费迪南终于放弃了《归还敕令》,并与信仰新教的萨克森选帝侯达成了一份妥协的和约。其他多数路德宗诸侯也签署了这份和约。黎塞留因神圣罗马帝国所赢得的利益以及西班牙在低地国家的东山再起而深感忧虑,于是便与德国人达成协议,同时也与荷兰形成了一个新联盟,公开对西班牙宣战。

1639年荷兰的胜利彻底终结了日益衰败的西班牙海军的势力。同时加泰罗尼亚的骚乱和葡萄牙起义也进一步侵蚀了西班牙的国力。在集中处理加泰罗尼亚问题之前,西班牙就已经允许葡萄牙通过选举产生了国王布拉干萨王朝的约翰六世(John IV, of Braganza ,1640—1656年在位),该王朝一直统治到1910年。黎塞留和路易十三的去世都没有改变法国的政策。在路易死后的数日,法国在洛克瓦彻底打败了西班牙人,以致西班牙人永久地远离了争夺欧洲势力范围的战场。促使战争媾和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古斯塔夫的女儿,即爱好和平的克里斯蒂娜的登基,她于1644年成为瑞典女王。

和平会议在威斯特伐利亚地区进行——其中哈布斯堡王朝和瑞典在奥斯纳布吕克会谈,而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则在明斯特交锋。盟国之间在交战时的一些不重要的分歧,在拟定宗教协定时却变成了关键性问题。会议拖延了数年,战事依然在继续。当荷兰获知法国已经与西班牙签订了一个秘密和约后,他们就单独与西班牙人签订了和平协定,而将法国盟友抛掷一旁。法国的胜利迫使摇摆不定的皇帝费迪南三世(1637—1657年在位)同意了辛苦敲定的条款,并于1648年10月24日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宣告了三十年战争的结束。

## 4.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该和约的条款将《奥格斯堡协定》适用范围扩展至加尔文宗,当然,它同时也适用于路德宗和天主教。诸侯依然可以决定其属民的信仰,但持异议者的迁移权得到了认可。在德国的多数新教地区,教派的多样性也已经在事实上被承认。在天主教



瑞典领土
勃兰登堡－普鲁士统治的领土
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领土
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领土
土耳其帝国
威尼斯领土
神圣罗马帝国的边境线
战场
挪威
芬兰
丹麦－挪威联合王国
克里斯蒂安尼亚
斯德哥尔摩
因格里亚
爱沙尼亚
诺夫哥罗德
利沃尼亚
普斯科夫
里加
莫斯科
苏格兰
北海
爱丁堡
丹巴顿
贝里克郡
阿尔斯特
丹麦
波罗的海
库尔兰
立陶宛
斯摩棱斯克
德洛格达
爱尔兰
都柏林
普雷斯顿
马斯顿荒原
荷兰联和省
哥本哈根
波美拉尼亚
东普鲁士
柯尼斯堡
俄罗斯
韦克斯弗德
英格兰
赞丹
吕北克
特塞尔
不莱梅
汉堡
勃兰登堡
波兰
诺丁汉
哈勒姆
内斯比
莱顿
鹿特丹
阿姆斯特丹
奥斯纳布吕克
法兰克福
华沙
伍斯特
1643年5月清教徒和保皇党人之间的大致分界线
伦敦
斯希丹
明斯特
柏林
马格德堡
基辅
南多佛尔海峡
代夫特
吕岑
萨克森
西里西亚
加来
布鲁日
神圣罗马帝国
布拉格
波希米亚
摩拉维亚
西属荷兰
巴黎
凡尔登
梅斯
美因兹
内尔特林根
大西洋
土尔
海德尔堡
奥尔良
巴伐利亚
奥地利
维也纳
特兰西瓦尼亚
摩尔达维亚
克里米亚
南特
钱伯德
斯特拉斯堡
斯提里亚
布达佩斯
拉罗舍尔
法国
瓦尔特兰
瑞士邦联
卡林西亚
匈牙利
比萨拉比亚
日内瓦
蒂罗尔
卡尼奥拉
哈布斯堡
瓦拉几亚
波尔多
法兰斯－孔太
萨瓦公国
米兰公国
威尼斯
克罗地亚
黑海
皮埃蒙特侯国
热那亚
贝尔格莱德
波斯尼亚
布尔戈斯
阿维尼翁
马赛
比萨
斯巴拉多
可因布拉
佛罗伦萨
威尼斯共和国
门的内哥罗（黑山）
科西嘉岛（属热那亚）
罗马
葡萄牙
马德里
巴塞罗纳
教皇国
意大利
萨洛尼卡
君士坦丁堡
土耳其帝国
里斯本
西班牙
巴伦西亚
巴利阿里群岛
那不勒斯
撒丁岛
爱琴海
那不勒斯王国
塞维利亚
格拉纳达
圣·文森特角
雅典
巴勒莫
爱奥尼亚群岛（属威尼斯）
罗德斯岛
塞浦路斯
突尼斯
马耳他
阿尔及尔（土耳其帝国附属国）
克里特（属威尼斯）
地中海
0
250
500 英里


1648年的欧洲

会的居留地问题上，和约确定1624年为核定教会财产状况的基本年限。对新教而言，这意味着针对《归还敕令》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因为在战争期间被强制皈依天主教的诸侯国赢得了重新皈依新教的权利。然而，处于哈布斯堡家族领地的新教徒依然不能享有宽容政策。

尽管一些独立的德国诸侯国得以脱颖而出，然而神圣罗马帝国本身却成为一个牺牲品。法国得到了部分阿尔萨斯地区，并拥有了对美茵兹大主教区、土尔及凡尔登的主权。瑞典接收了波美拉尼亚，外加在帝国议会中的三票席位和大量赔款。作为损失了波美拉尼亚地区的补偿，勃兰登堡选帝侯得到了马格德堡大主教区和另外几个主教区。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家族继续保有巴拉丁伯爵的选帝侯资格及其部分领地；巴拉丁伯爵领的其他地区被交还给弗里德里克之子，同时后者还恢复了选帝侯资格，选帝侯的人数也因此而上升至八名。

德国的诸侯国获得了处理外交事务权、诸侯之间的缔约结盟权，以及在不反对帝国皇帝的前提下与外国的缔约结盟权。自治权的原则只是为了保全哈布斯堡家族的面子，因为各立宪诸侯国事实上已经拥有自己的对外机构、军队、财政，这表明神圣罗马帝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现行的政治实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还正式承认了已经在事实上独立了半世纪的荷兰共和国的独立，以及瑞士邦联的独立，后者的核心部分在中世纪末期就已经脱离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控制。

战争的最终结果导致的问题几乎与其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它没有终止两大主要交战国，即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对立，二者又继续交锋了11年之久，直至双方于1659年签订了《比利牛斯条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不能使教皇满意，他后来宣布废

止该和约。许多新教徒也没有因之而感到欣慰,他们认为自己遭到了背叛。在政治上,德国的分立主义者将哈布斯堡王朝的直接权力限制在其家族领地以内,同时使得巴伐利亚、萨克森,尤其是勃兰登堡—普鲁士登上了处理德国事务的显要地位。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当代史家认为三十年战争是 17 世纪欧洲危机发展过程中的至关重要的事件。无论缘起于三十年战争的问题是否导致了、延长了,抑或只是揭示了欧洲社会的一场危机,它无疑已经使欧洲人意识到稳定在国家事务中的必要性,并且开始关注如何创建他们所缺乏的稳定与安全问题。

## 七、绝对主义与奴隶制

摆在现代史学家面前的难题之一是近代早期奴隶制的扩展问题。伴随着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的“尊严”问题的讨论,奴隶交易似乎是一种最残酷的虚伪。虽然对于近代早期的奴隶制历史不得不进行深入研究,但是捕捉该段历史的某些复杂性的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

这段历史始于葡萄牙人对非洲海岸的探险,特别是其独特的开发方式。沿着非洲海岸,葡萄牙人在整个 15 世纪都与非洲的奴隶贩子保持着联系,后者很愿意将已经被制伏的其他部落的敌人卖到大市场去。对葡萄牙人而言,那些奴隶就是有价值的商品:具有异国情调,可以作为家用奴隶来装饰富商之家,同时对葡萄牙人一直要在欧洲市场推销的农产品生产,特别是蔗糖生产而言,奴隶还是一种耐用的劳动力。

奴隶制在多数文化的多数时期都存在过。葡萄牙人并非第一个买卖奴隶劳动力的商人:在古希腊和罗马,这是符合习俗

的;在中世纪的多数时期,奴隶买卖在欧洲及其周边地区就像在战争中对敌人进行报复一样平常。然而,当葡萄牙人开始大批量出口非洲奴隶时,农奴制——与奴隶相似但不完全相同——已经在西欧取消,尽管在东欧或俄国还保留着。劳动力的所有制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欧洲的部分经济结构,但劳动力与具体拥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例如契约服务,在近代早期的英格兰和北美曾有数千人欠另一个人一段时期的劳动,因此被限制在那个人的身边,但他们不是法律上的财产,而奴隶则属于财产范畴。

近代早期的奴隶制,与全球市场的出现和某些欧洲不能在本国生产的商品密切相关:其中蔗糖、烟草和棉花依次是最重要的作物。此外,每一种作物都需要劳动密集型生产,需要比小麦或葡萄多花费几倍的劳动时间。当葡萄牙人首次将进口的非洲奴隶劳动力用于马德拉岛和加那利群岛的殖民地时,加勒比地区使用非洲奴隶进行经济作物生产便迅速风靡起来。到 17 世纪中叶,所有欧洲的主要贸易帝国——英国、荷兰、西班牙以及葡萄牙——都在殖民地使用进口非洲奴隶进行劳动。

有关美洲土著居民的人性问题的讨论并没有立刻转向非洲奴隶问题。伴随着与美洲土著居民的首次相遇,欧洲的神学家、人文主义者以及修士都提出这样的问题:人是什么?什么是野蛮人?野蛮人是否是人?最初,这些问题都是受到要使美洲居民皈依基督的愿望的驱使而提出的。如果他们不是人类,那么他们就没有资格成为基督徒。如果他们能够被皈依,那么即使他们是野蛮人,也仍然与欧洲人一样分有某些人类的本质。西班牙修士巴托洛米·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1484—1566)热切地指出,美洲土著人富于人性和纯洁的本质,

应该通过教育的方式对之进行“温和”的传教。最后,西班牙国王和教皇也部分认同了卡萨斯的观点,即认为美洲土著人的确具有与欧洲人相同人类本质,因此可以皈依基督教;但是没有认同卡萨斯的其他观点,例如,国王和教皇都同意强迫皈依的方式,完全没有虑及这位修士所坚持的自愿皈依原则。

然而,非洲奴隶几乎一直被视为为全球市场提供各种经济作物的劳动力的专有名词。从公司组织的劳动力——主要是各同业行会所组织的——向领取工资的劳动力的转变,以及从自我管理的技术阶层向作为商品的具有市场价值的劳动力的转变,都与非洲奴隶密切相连。上述转变的受益者是同一批买卖奴隶和寻求控制国际贸易之人:荷兰、英国、西班牙及葡萄牙的企业巨头。

许多抽象化进程在近代早期都可以辨明,例如文艺复兴时期君主的个人统治被转化成为一些较抽象的权力概念;例如“国家”与“公民”概念需要某种在封建主义关系内部不可能产生的现实。而“劳动力”则演变为某种与实施劳动者本身、其特殊技能及所受到的训练完全分离的事物。在这个抽象化过程中,奴隶制只是管理劳动力的一种有效方法。从事某种劳动的人完全消失在利润和生产的微积分之中。

对奴隶制的批判应属于18世纪和19世纪。从近代早期欧洲的视角来看,奴隶制只有在“人类拥有不可让与的自由权”观念演变为普遍的政治信念,而不只是某些绝对主义批评家的理想以后,才受到有效的驳斥。自由权的概念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尚很含蓄,及至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才较全面地对之加以阐释,最后是约翰·洛克的《政府论》给予其一种现代表达方式。出乎意料的是,在欧洲人尚未开始在反对绝对

主义时表达出一种天赋人权的概念，即不依赖于社团、家庭、血统、同业行会以及财产而存在的权利的时候，在政治理论家尚未在反对绝对主义时阐释人性的自由概念的时候，欧洲的确已经拥有了这些术语，即有效评判奴隶制前提所必需的道德框架。

## 八、科学与宗教

> 由太阳、行星及彗星组成的唯美的天文系，只有在那智慧与力量的存在的控制和引导下，才会运行。他是永恒的、无限的、全能的和全知的。或言之，他的持续从永恒到永恒；他的显现从无限到无限；他统治着万物，了解万物及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只能透过他所创造的最智慧、最完美的事物及其终极原因去认识他。我们崇敬其完美，但我们敬拜他是由于其统治：因为我们愿意作为他的仆从去爱他，而一个没有控制、天意和终极原因的神，只能是命运和自然。看不见的自然规律同样永久而无所不在，却不能够创造万物。我们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发现的万物只能源于永恒存在的思想和意志。（选自艾萨克·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在 12 世纪主要是对立的，但也并非总是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伽利略而言，自然就是两部天启中的一部。其中上帝的设计，确切地说，就是上帝的真理和自然中的某些事物，可以被加以辨明。在前现代的欧洲，这个问题既涉

* Trans. Andrew Motte, ed. Florian Cajor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4), pp. 544—546.

及自然的特性,同时也涵盖了上帝与自然的关系。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而言,自然揭示了上帝创世的丰富与多样性,向上帝的子民展示了上帝的神奇。伽利略借用了阿奎那关于自然的丰富与多样性的表达,该观念后来又为"新世界"发现的"新物种群"进一步强化。甚至牛顿也将科学观察理解为启示,但到他写前述引文时,欧洲人已经逐渐从根本上重新构思了自然的特性及其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在近代早期,科学与宗教尚不能分离。二者的关系已经不是原初的对立:教会经常提供关于古典文献的教育,后者为那些被当代人视为"科学的"观察奠定了基础。在16世纪,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主要存在于解释自然的工具上。正如教会一贯坚持并在特兰托会议上所重申的,《圣经》是对自然的解释,而人类观察所用的望远镜只是为了了解自然。16世纪,人类越来越运用数学作为了解自然的工具。对伽利略而言,上帝已经用数学语言写下了"自然之书"——数学是一套数的体系,其本身即是纯粹的象征,其定项原则可以适用于任何不同的情形。例如,对开普勒而言,数学提供了解释行星沿椭圆轨道运动的方法。换言之,伽利略和开普勒都将《圣经》与自然视为相互独立的启示之书,一部是用生活中的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另一部是用数学语言写成,而后一种语言被伽利略视为神的语言。

伽利略和教会日益走向冲突并非为了研究自然的重要性问题,或者神在创造自然中的作用问题,而是关于权威问题:由于对光学数据的各种解释日益矛盾,究竟何种权威能够决定答案的正确性? 教会认为《圣经》及学院派的一贯解释传统,是解释自然的一切问题的权威。伽利略、开普勒以及牛顿将会对数学规律展开争论——伽利略提出数学是写下"自然之书"的语言,

牛顿认为数学是上帝所设定的运动的组织原则。伽利略作为科学史上最好斗的人物之一，嘲笑对古典权威的盲目接受，提出无论是亚里士多德抑或托勒密，以及哲罗姆和奥古斯丁，在面对光学资料时都将放弃自己的主张——因为那些都不是真理。

艾萨克·牛顿出生于伽利略去世的那一年。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表达的上帝观念与伽利略的完全不同。将那些被现代人视为"科学的"思想家与教会分离的，不是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上帝创造了自然和已知世界，这是为世人所认同的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伽利略无疑是一位基督徒。年轻的时候，他甚至考虑过要进入修道院。他相信道成肉身的教义，即使是当其实验已向中世纪的物理学发出了挑战的时候。也许揭示得越多，他越喜欢神创世界及其创造力的丰富：他将上帝视为最富于创造力的，同时也是最仁慈的。

牛顿是一位一神论者，许多学者都认为牛顿并非是一位基督徒。其上帝观念一直受到中世纪犹太学者摩西·迈蒙尼德的著作的影响。正像前述取材于《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那段引文所表明的，牛顿信仰的上帝，是一个统治多于创造的上帝，是一个存在而非圣父。牛顿的上帝给予宇宙秩序，不是出于怜悯或仁慈，而是出于智慧和目的。

## 1. 实验科学

由于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反对以《圣经》作为最准确的解释工具，所以另外两种"方法"开始被界定。一种源于中世纪哲学，被现代人称为演绎法：即根据经验资料去验证假设。假设先于验证，它在运用经验直接验证其准确性之前既已形成。另外一种

方法是由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弗兰西斯·培根为之命名的方法,即归纳法,它指明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思维过程:即从经验到假设。在《新工具论》(1620 年)一书中,培根提出任何事物在被检验之前都只是可能的论断。培根称这种源于经验的方法为"经验法",并阐明了从具体观察中的现象到一般结论的方法的优越性。多数现代科学有赖于两种方法的综合,但在法国数学家勒内·笛卡尔(1596—1650)赋予演绎法以现行的缜密思维之前,后者一直苦于培根的论断:这是一种易于受到人类思想和假设影响的方法,蒙田早在 40 年前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经验论"是用于指代某种认识世界和发现真理的方式的现代术语,在本质上它认为归纳法是一种认识方法。其核心是以观察数据为重。随着时间的过去,人们可以从观察中得到常量、规则和定理。在 16 世纪,观察法已经得到了认识论意义上的认可。欧洲人随之认识到,人类的眼睛并非像在中世纪的光学中所认为的,只是客体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接受者。眼睛不仅接受光学信息,而且首先通过眼睛中的"透镜"对之进行加工——这种迹象表明人们逐渐将眼睛视为一种科学的仪器——然后再通过大脑的复杂机制来理解这些资料。在反复实验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发明出更多的新仪器,从望远镜和显微镜到单片镜,进而拓展了人类的观察力。

伽利略也是新仪器发明家之一,这些仪器使他可以获得归纳法所需要的更精密的测量数据和更详细的观测资料。例如,最早可能是荷兰的玻璃工人发现将两片透镜放在一起可以获得较高的放大率。伽利略却改进了原始的望远镜,使之具有十倍的放大率。借助于新式望远镜,他有史以来首次看到了月球上的环形山、山中的某些事物以及月球表面的质感。后来改进的

望远镜又使他能够对木星的卫星进行观测。当两个镜片被固定在预设距离的位置之后，简单的透镜重叠技术却如此的拓展了人类的视野，使人类首次能够观测到范围成倍增加的天空：更多的行星和环绕行星的卫星，月球的地表形态，尤其重要的是，更多的星体。在观测的基础上，多得难以计数的星体数量使伽利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天体是无限的。

在17世纪下半叶，有两位荷兰人运用两片透镜技术制作了显微镜——简·施旺麦丹（Jan Swammerdam，1637—1680）用之分析血液（他可能发现了红血球），而安东尼·冯·列文虎克（Anthony Van Leeuwenhoek，1632—1723）则发现并描述了原生动物和细菌。望远镜和显微镜使欧洲人难以想象的世界变为可视世界：他们看到了从不知晓的星体，以及从未想到过的微生物。那些微生物终将给医学提供资料并形成“细菌”概念，后者普遍地解释了那些在辨明病因前无可救药的疾病。在16世纪和17世纪，“已观测的”世界的范围成倍增长，对欧洲人以前所认定的“可视”的概念提出了挑战。

继伽利略的实验之后，其他人也发明了诸如温度计和气压表之类的测量仪器。法国数学家布勒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证明了气压将随高度的增加而减少。据此，他还曾质疑拉伯雷的格言“自然憎恶真空”，提出真空是可能的。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发现也同真空概念的形成密不可分：那些裸眼不能看到的事物并非不存在，它们只是一些需要借助观察仪器加以测量的事物。论及17世纪的科学信念，还要涉及爱尔兰伯爵之子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虽然他最终没能阐释真空的存在——12世纪的科学家曾运用高度易感的仪器和物理学的理论证明了真空是不存在的——但是

成功地证明了其方法的可靠性。他尝试以完全复制经验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该方法已经演变为一种标准的科学实践。

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在被告之其皇家学会正在测量空气的时候曾经哈哈大笑。然而,为探索自然而于 1662 年创建的皇家学会,与其法国同行法国科学院(1666 年),都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资助人。双方通过通信秘书之间的正式交流、学术出版物,同时也通过其成员和熟人之间的大量私人通信,促成了国际学术界的兴起。专业人士和贵族都纷纷加入到学术团体中来,许多绅士间或也有女士都在私人实验室或观测所中进行研究。罗伯特·波义耳发现了以其名字命名的物理学定律——在温度一定的条件下气体的压强与体积成反比。科学发现的出版有助于缩短理论和实践的差距,因为它可以向科学家展示出其研究领域与他人的关联之处,并有助于明确哪些问题最值得关注。

17 世纪堪称数学的世纪。许多聪颖的天才、最有原创性的头脑都为数学而着迷,这几乎与此前神学的魅力如出一辙。伽利略曾提出数学为上帝撰写自然之书的语言。在 17 世纪,数学被应用到人类经验的许多层面,应用于获取更多的精确性与发现更多的新定律的过程中。1585 年,弗兰芒人西蒙·斯蒂文(Simon Stevin, 1548—1620)出版了《论十进制》。另一项伟大的省时法宝是由苏格兰人约翰·耐普尔(1550—1617)运用其不可思议的对数法则(1616 年)设计的,缩短了复杂的乘法、除法和寻找平方根的过程。笛卡尔主要致力于解析几何。那个世纪数学成就的巅峰是发现了处理可变因数和概率的方法。帕斯卡开创了研究运气游戏的发端,然后荷兰保险精算师设计了表格来预测其客户的平均寿命。英国人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 1642—1727)和德国的莱布尼茨男爵(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1646—1716)各自独立发明了微积分。如果没有笛卡尔的解析几何以及微积分,牛顿可能永远也计算不出结果来支持其革命性的天文学和物理学假说。

在天文学领域,由哥白尼发展的太阳中心说理论证明只是一个开始。当对行星轨道的观测不能证明哥白尼关于行星依照圆形轨道围绕着太阳运转的理论时,出现了许多反对意见。德国人约翰尼斯·开普勒从数学的角度证明了轨道实际上是椭圆的。然后,伽利略的天文望远镜揭示了太阳斑点,土星上的环,像月亮一样环绕着木星的卫星。所有这些证据最终导致伽利略于1632年发表著作来捍卫太阳中心说,并嘲笑了传统的地心说理论的支持者。

一个著名的故事记述了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即让两个重量不同的球体从比萨斜塔上坠落,借以验证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降落的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理论。虽然这个故事本身也许不是真的,但伽利略的确证明亚里士多德是错的。尽管有点儿自我提升的倾向,但伽利略对抛物线、钟摆、自由落体和滚动物体的研究的确有助于建立现代加速度和惯性理论,这也是牛顿后来从数学的角度加以阐释的。

1687年,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发表了运动定律和其他伟大发现。其中许多发现都是在20年前探寻到的,当时他还只是一名未获学位的大学生。他在晚年得到了世人的承认,享有剑桥大学教授之职、骑士封号,出任了皇家学会会长,以及收入颇丰的铸币厂厂长。但是,牛顿的最伟大贡献在于万有引力定律。它源于其运动定律,即运动的物体对作用于它的力具有一个反作用力。这些力共同作用、相互吸引,使得太阳、行星及其卫星固定在其轨道上。牛顿还通过使用棱镜将阳光分离成光谱,促进了光学的发展。他解释道,色彩对于一个物体而

言是不固定的,它只是反射和吸纳光源的结果。在这个小小的发现中,再次嵌入了一个彻底改观的世界:色彩不再是物体的固有属性,而是因作用于其上的光而存在,换言之,它存在于观察者和物体之间的空间里。这就是我们现在认识世界的方式,但它同时也是欧洲人认知观念上的另一次微型革命。

同时,物理学家的机械论观点也进入了地质学和生理学的范畴。在 1600 年,英国物理学家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 1540—1603)提出地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磁场。1628 年,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 1578—1657)出版了论著,提出人类的心脏是一个气泵,驱动周身血液通过一个单独的系统循环。他拒绝相信从伽林流传下来的假说,即动脉与静脉中的血液是完全分开流动的。哈维的理论,为下一代学者通过显微镜观察而加以确认。1679 年,意大利的解剖学家阿尔方索·波雷利(Alphonso Borelli, 1608—1679)向世人展示了人类的手臂是一个杠杆,并且是由肌肉在做机械运动。

## 2. 世界机器与理性主义

所有这些科学研究都在暗中动摇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万物是完美的观点。后哥白尼时代的天文学家假想出椭圆来代替完美的圆;牛顿描绘出能对作用力施以反作用力的天体,借以替代自行运动的天体。所有这些研究,都提出了共同规律,即可以将许多独立的规律简化、解释、协调成一个普遍规律。牛顿最终将一切抽象为巨型机械概念,长久以来一直被称之为"牛顿世界机器"。

新科学带有明显的神学和哲学暗示。自然科学本身并不解决神学和哲学问题,然而近代科学的兴起却与一个新的价值体系密切相连,这就是理性主义的价值体系。理性主义是一个宽泛的

概念。一个人可能既是一名理性主义者同时也是信仰超自然的上帝之人，例如，托马斯·阿奎那以及其他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然而，在近代早期的西方，理性主义倾向于将上帝降格为启动世界机器的原动力，然后就不再干预其运行。新机械论对宇宙的解释，不再将上帝视为难以理解的创始者和审判者，而是世界机器的建筑师，世人只要适当地运用理性就能够了解世界机器的运行。

理性主义以勒内·笛卡尔为最激进的代言人。笛卡尔认为蒙田关于人类知识是主观的和有条件的观点是一场灾难性的毁灭。他寻求为确定之事奠定基础，因为知识不能像偏见和没有确实依据之事一样时刻面临着挑战。在笛卡尔年轻的时候，正如他在《方法论》(1637 年)中所阐明的，他断然怀疑一切神学界和知识界的权威。其怀疑论将一切都拂至一旁，直至他得出结论：只有一件事是他不能怀疑的，那就是其本身的存在。世界上一定有一种存在，它处于思维的、怀疑的过程之中：事实上，如果将他创立的命题“我思故我在”表述为“我怀疑，故我在”可能会更好。笛卡尔从构建这一事实开始，重新构建了世界，直到他追溯到上帝——一位至高无上的几何学者，他所创立的数学秩序是“牛顿世界机器”的先兆。

但是，牛顿即将进行的，是归纳定义，至少部分地依赖于科学观测和实验数据，而笛卡尔则是进行演绎推导，最终从公式中推导出了宇宙和上帝。笛卡尔重建的世界证明是两个分离的世界——一方面是思想的和灵魂的世界；另一方面则是肉体和物质的世界。这就是笛卡尔的二元主义。他认为自己的能力只能详细地认识物质世界。然而，其认识世界的方式却暗示了这是唯一有价值的世界——其夸口见证了这一点，他说如果给他物质和空间，他自己就能建造宇宙。



弗朗斯·哈尔斯绘制的《笛卡尔像》。(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Art Resource,NY)

最终的问题是,笛卡尔的方法能够假定完美事物、优秀的品质、权力、理智以及知识的存在,但是无法为基督教上帝的存在提供理由。笛卡尔主义者不能解释道成肉身、基督耶稣的降生,以及在16世纪神学中占据核心位置的神圣的仁慈与爱心的品质。笛卡尔的上帝是理性和机械的,但没有爱,宽恕,或在人类

生活中的历史性的存在——从上帝到原动力，抑或更流行的术语“钟表师”，只是很短的距离。然而，上帝的情感遗失了。

从后人的角度看，我们已经逐渐在光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植物学、地质学以及医学领域看到许多不同的“发现”，它们会聚成一场革命。其核心部分是观念的转变，这将改变欧洲人理解世界及自己所处的位置的方式。首先是给予观察研究以权力。对新世界的发现被认为是真实的，即使它们违背了古典传统和基督教传统所教诲的一切。针对人类眼睛的认识更为全面，许多欧洲人寻求发明更精确的仪器以扩展视觉空间。在给予观察以如此重要的认识论地位的时候，欧洲人在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面临着完全对立的方法：演绎与归纳。在 16 和 17 世纪，那些相信归纳法的正确性的人们需要想办法将收集到的资料有序化，而后再对这些可视资料进行解释。这些方法已经演变为现代科学方法的基础：“实验，”罗伯特·波义耳道，“已经成为知识的一种可信来源。”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也许最伟大的转变始于笛卡尔对演绎方法的阐释。笛卡尔主义切断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切割了道成肉身教义的复杂的内在联系。与此同时，笛卡尔坚持人类的理性是一切知识的基础，该主张既为牛顿的理性主义奠定了基础，同时也预先接受了信仰不能作为任何真正知识的基础的思想。信仰和知识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是彼此分离的。笛卡尔的观念转变为重新认识世界做好了准备：在新的认识中，世界是一个残酷的理性世界，是一个从属于规律的世界，该世界的统治者曾经一度将规律置于运动中，而现在则远离了人类事务的范畴。奇迹的时代结束于笛卡尔。

虽然许多人仍然认为其工作是在研究上帝在自然界的启

示,但是对方法的关注、对自然受规律控制的坚定信念,已经改变了世人对上帝与自然及人类的关系的构想。牛顿的世界机器观念被其本身的信仰所弱化,认为机器依赖一种非机械的原理,即上帝而运行。他写道:行星体系正是强有力的原动力的智慧与技巧的结果。原动力可以使世界呈现不同的种类和不同的部分。* 尘世和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不再是一切存在的中心。上帝与物质的关系被重新构想,逐步地发展,并为牛顿的原动力学说发展到极致。变幻莫测、奇迹显现——上帝选择将推翻其世界秩序的时刻——在新认识论中都不能被容纳。对奇迹的信仰只是一种信仰行为,而不再是理智行为。

同时,这些观念转变还改变了教授、医生以及其他学术精英看待世界及自身位置的方式。"科学"成为一种被认可的知识。它不是取代了神学或古典哲学——这些仍然是研究的主题——而是"科学"自身被视为某种可以被验证的知识,是缜密的训练有素的理性的产物。虽然在 20 世纪以前,多数欧洲人和美洲人尚未将科学视为知识,但在 17 世纪末,欧洲最智慧的人对实验科学的兴趣已经远远超越了神学。对他们而言,获取知识的最佳工具不再是辩证法(经院哲学时代)、哲学(人文主义时代),抑或圣经解释学(宗教改革时代),而是归纳法或者推演法。对人类理性构建知识体系力量的信念不仅表现为在其后两个世纪中的乐观主义精神——坚信人类完全能够发现宇宙的统一规律——而且还表现为 20 世纪所面对的分裂、失衡、特殊性、主观性和偶然性。

* Quoted in *Main Currents of Western Thought*, ed. Franklin Le Van Baum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323—325.

## 九、本章小结

16 世纪，标志着历史学的近代之开端的政治、社会、家庭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正在进行之中。在 15 世纪和 16 世纪，近代国家塑造了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国家形态，并为争夺西欧霸权而彼此竞争。伴随着西班牙、法国及英国的出现，民族爱国主义精神既已产生。欧洲国家也发展了外交事务和职业军队。第一支近代海军也于此间创建。人口、贸易和物价的增长都为战争的爆发准备了条件。

一些历史学家称法国的查理八世对意大利的入侵是“第一次现代战争”。这场侵略使法国长期陷于同哈布斯堡王朝的复杂的权势之争。

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是一位有权势的、勤勉的君主，曾在多方发动征战：主要包括对新教徒的战争、对法战争、对土耳其战争，以及对其属国尼德兰的战争。荷兰人爆发了起义，主要反对腓力限制其自治权和运用宗教法庭对付新教徒的做法。在漫长的、耗资巨大的战争中，北方各省宣布从西班牙独立。当伊丽莎白一世帮助荷兰人时，腓力派出无敌舰队进攻英国。无敌舰队的毁灭对西班牙(在国际上日益衰败的)和英国(在国际上日益崛起的)而言都是一个转折点。

在西班牙，绝对主义的增长像在其他地区一样都以不断反对地方势力为标志。腓力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并弱化了贵族院和代表会议的权力。然而，西班牙没能为其权力建立一个健全的经济基础。尽管新世界的金银不断流入，但西班牙的经济仍然停滞不前，因为腓力的战争已经使财政枯竭。

在西班牙的黄金时代(1516—1659),塞万提斯撰写了《堂吉诃德》,这是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宗教领域,阿维拉的特里萨和十字架上的圣·约翰成为世界各地区的重要人物。埃尔·格列柯的绘画表现了天主教宗教改革的思想。

在16世纪晚期,法国陷入内战和宗教冲突。最后,纳瓦尔的亨利,即波旁王朝的开国君主即位并平息了战乱。至《南特敕令》(1598年)颁布,亨利四世已经确保对胡格诺派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他试图使经济好转,但没有解决财政稳定问题。

在英国,亨利八世慎重地涉入战争,并将其取得的修道院土地投入国库。亨利及其后的伊丽莎白一世在灵活地操纵拥有立法权的议会的同时,也在反抗英国的夙敌:西班牙和罗马天主教会。伊丽莎白强硬地在英国确立新教为国教,同时也赢得了对西班牙的战争。

但是,她不得不对下议院妥协,这预示了下个世纪王权与议会斗争的征兆。都铎王朝时期也是爱尔兰问题的发端。在文学上,威廉·莎士比亚表现出了伊丽莎白时代的繁荣,这是一个在音乐、建筑和科学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的时代。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始于一场宗教冲突,但结束于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权利之争。在战争期间,军队在各地劫掠。在威斯特伐利亚和明斯特和平会议上达成的最终协定,将《奥格斯堡和约》扩展至加尔文宗;对法国、瑞典和勃兰登堡割让了领土;同时承认了德国诸侯国的外交权。

在16世纪宗教派系确立的灾难性冲突之后,欧洲人开始寻求知识依据。17世纪,欧洲出现了两种方法:归纳法和演绎法。两种方法都有各自的支持者,断言这就是验证某种知识的依据——在此,知识不再是有条件的、主观的和怀有偏见的。最

后，两种方法都促进了关于上帝及其与宇宙关系的新观念的形成。二者都承认自然世界受规律控制，而规律可以通过数学加以探寻。它们与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一样承认，上帝可以在自然界中加以辨明。与其中世纪的前辈不同的是，他们不是在惊奇和尊崇中接近世界，而是相信其内在的理性，相信世界与数学法则——纯粹而完美的抽象法则——的和谐。上帝的人性的一面，其仁慈与爱心隐去了，他越来越被视为数学法则统治的宇宙的第一动因。



# 大事年表

| | |
|---|---|
| 1254—1273 | 德国大空位时期 |
| 1273—1291 | 哈布斯堡王朝的鲁道夫在位 |
| 1254—1324 | 马可·波罗 |
| 1265—1321 | 但丁 |
| 1276—1337 | 乔托 |
| 1291 | 瑞士的三个州组成瑞士邦联,保护其权利免受神圣罗马帝国的侵犯 |
| 13世纪晚期—14世纪早期 | “伦巴第”银行家的时代 |
| 14世纪 | 下议院的发展 |
| 14—15世纪 | “伪封建主义” |
| 1304—1374 | 弗兰西斯科·彼得拉克 |
| 1307—1327 | 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在位(金雀花王朝) |
| 1313—1375 | 乔万尼·薄伽丘 |
| 1317 | 威尼斯船队首次抵达佛兰德尔 |
| 1327—1377 | 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在位 |

| | |
|---|---|
| 约 1332—1400 年 | 威廉·朗兰(英国诗人) |
| 1337—1453 | 百年战争 |
| 1346 | 克雷西战役 |
| 1347—1351 | 黑死病 |
| 1348 年以后 | 劳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
| 14 世纪中期 | 专业医学的发展 |
| 1356 | 黄金诏书 |
| 1358 | 扎克雷起义 |
| 1364—1380 | 法国国王"智者"查理五世在位(瓦罗亚王朝) |
| 约 1370—1380 年 | 三级会议的衰落 |
| 1377—1446 | 菲利普·布鲁内莱斯基(意大利建筑家) |
| 1378—1417 | 大分裂时期(西部基督教会) |
| 1378 | 佛罗伦萨的梳毛工起义 |
| 约 1380—1483 年 | 法国的勃艮第派和阿马尼亚克派的斗争 |
| 1381 | 英国农民起义 |
| 1386—1466 | 多那太罗 |
| 1394—1460 | 葡萄牙的亨利王子 |
| 1399 | 英国首次召开经常性议会 |
| 15 世纪 | 贸易、货币经济增长 |
| | 意大利的第一个近代图书馆 |
| | 梅毒迅速传播 |
| | 罗盘和航海图的普遍使用 |
| 15 世纪早期 | 火药在欧洲战争中首次使用 |
| 1405—1471 | 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 |
| 约 1412—1431 年 | 圣女贞德 |
| 1414—1417 | 康士坦斯宗教会议 |

| | |
|---|---|
| 1415 | 阿金库尔战役 |
| 1420 | 特鲁瓦条约 |
| 约 1422—1461 年 | 法国国王查理七世在位 |
| 1432 | 吴哥古城被弃 |
| 15 世纪 40 年代 | 活字印刷在莱茵地区日益完善 |
| 约 1444—1510 年 | 桑德罗·波提切利 |
| 1450—1466 | 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斯弗尔查在位 |
| 1452—1498 | 吉罗拉莫·萨佛纳罗拉(意大利的宗教政治改革家) |
| 1452—1519 | 列昂纳多·达·芬奇 |
| 1455—1485 | 英国的玫瑰战争 |
| 1461—1483 | 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在位,亦称"蜘蛛王" |
| 1462 | 科西莫·德·美第奇创立柏拉图学园 |
| 1466—1536 |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 |
| 1469—1492 | 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德·美第奇在位,亦称"伟大的洛伦佐" |
| 1469—1527 | 尼古拉·马基雅维利 |
| 1469 | 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和阿拉贡的费迪南联姻 |
| 1471—1528 | 阿尔伯特·丢勒 |
| 1472—1553 | 卢卡斯·克拉纳赫 |
| 1474—1504 | 卡斯提尔女王伊莎贝拉在位 |
| 1474—1566 | 巴托洛米·德拉斯·卡萨斯 |
| 1475—1519 | 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 |
| 1478 | 初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
| 1478—1535 | 托马斯·莫尔 |
| 约 1478—1541 年 | 弗兰西斯科·皮萨罗 |

| | |
|---|---|
| 1479—1516 | 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在位（1504—1516 年兼任卡斯提尔国王） |
| 约 1480—1547 年 | 费迪南·麦哲伦 |
| 1483—1498 | 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在位 |
| 1483—1485 | 英国国王理查三世在位(来自约克郡) |
| 1483 | 俄罗斯跨过乌拉尔山进入亚洲 |
| 1483—1546 | 马丁·路德 |
| 1484—1531 | 乌里希·茨温利 |
| 1485—1509 | 英国国王亨利七世在位(都铎王朝) |
| 1485—1547 | 赫尔南·科茨 |
| 1488 | 巴塞洛缪·迪亚士绕过好望角 |
| 1490—1553 | 弗朗索瓦·拉伯雷 |
| 1491—1556 | 依纳爵·罗耀拉 |
| 1492 | 收复失地运动最终宣告结束：穆斯林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林纳达向伊莎贝拉和费迪南投降；全部犹太人被逐出伊比利亚半岛（1502 年，所有穆斯林被驱逐） |
| | 哥伦布首次横渡大西洋 |
| 1492—1503 |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地位(波基亚家族) |
| 1493—1519 |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位(哈布斯堡家族) |
| 1494—1525 | 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克在位，亦称“智者” |
| 1494 | 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 |
| 1495 | 第一神圣同盟 |
| 1497 | 达·伽马抵达印度 |
| 1497—1543 | 汉斯·霍尔拜因 |

| | |
|---|---|
| 1498—1515 | 法国国王路易十二 |
| 16世纪 | 军事革命 |
| | 英国圈地运动开始 |
| | 农奴制在西欧事实上解体 |
| | 汉萨同盟的衰落 |
| 1503—1513 |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在位(德拉·罗维莱家族) |
| 1509—1547 | 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在位 |
| 1509—1564 | 约翰·加尔文 |
| 1511 | 伊拉斯谟发表《愚人颂》 |
| 1513—1521 | 教皇利奥十世在位(美第奇家族) |
| 1513 |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发表(后人整理) |
| 1515—1582 | 阿维拉的特里萨 |
| 1516 | 伊拉斯谟出版希腊语《新约》 |
| 1516 |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发表 |
| | 弗兰西斯一世签署《波伦亚协定》 |
| 1516—1556 | 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在位(哈布斯堡家族) |
| 1519—1556 |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位(哈布斯堡家族) |
| 1519—1522 | 首次环球航行 |
| 1520 | 马丁·路德发表《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书》 |
| 约1520—约1600年 | 大批屠杀美洲土著居民 |
| 1523—1534 | 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在位(美第奇家族) |
| 1524—1525 | 德国农民战争 |
| 1525 | 颁布《十二条款》 |
| | 帕维亚战役 |
| 1525—1569 | 彼得·勃鲁盖尔 |
| 1530—1596 | 让·博丹 |

| | |
|---|---|
| 1533—1592 | 米歇尔·德·蒙田 |
| 1534—1549 | 教皇保罗三世在位(亚历山大·法尔内塞) |
| 1535—1540 | 英国取消修道院 |
| 1541—1614 | 埃尔·格列柯 |
| 1542—1621 | 罗伯特·贝拉明 |
| 1543 | 安德里亚·维萨琉发表《关于人体的结构》 |
| | 尼古拉·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 |
| 1545 | 特兰托会议召开 |
| 1547 | 皇帝查理五世战败施马尔卡尔登同盟 |
| 1547—1553 | 英国国王爱德华六世在位 |
| 1547—1616 |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 |
| 约 1552—1599 年 | 埃德蒙·斯宾塞 |
| 约 1552—1616 年 | 理查德·哈克卢特 |
| 1553—1558 | 英国玛丽女王在位 |
| 1555—1559 | 教皇保罗四世在位(卡拉法家族) |
| 1556—1598 |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在位(哈布斯堡家族) |
| 1558—1603 |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位 |
| 1559—1565 | 教皇庇护五世(美第奇家族) |
| 1559 | 《卡托康布雷西斯条约》 |
| | 禁书名录 |
| 1561—1626 | 弗兰西斯·培根 |
| 1562—1598 | 法国的宗教战争 |
| 1563 | 特兰托会议结束 |
| 1564—1616 | 威廉·莎士比亚 |
| 1566—1572 | 教皇庇护五世在位(熙列里家族)(被封为圣徒) |
| 1566—1648 | 尼德兰革命 |

| | |
|---|---|
| 1571 | 勒班多战役 |
| 1572—1585 | 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在位(邦孔帕尼家族) |
| 1572 | 法国发生圣・巴塞洛缪之夜大屠杀 |
| 1573—1631 | 约翰・多恩 |
| 1577—1640 | 彼得・保罗・鲁本斯 |
| 1579 | 乌特勒支同盟 |
| 1582 | 格里高利历法改革 |
| 1583—1645 | 雨果・格老秀斯 |
| 1588 | 无敌舰队被击败 |
| 1588—1679 | 托马斯・霍布斯 |
| 1589—1610 | 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位(波旁王朝) |
| 1592—1605 | 教皇克莱门特八世在位(依波利托・阿尔多布兰迪尼) |
| 1598 | 颁布《南特敕令》 |
| 1599—1641 | 安东尼・凡・戴克 |
| 1599—1660 | 迪亚哥・德・委拉斯奎兹 |
| 1603—1625 | 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在位(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斯图亚特王朝) |
| 1605—1621 | 教皇保罗五世在位 |
| 1606—1669 | 伦勃朗・范・林 |
| 1608—1674 | 约翰・弥尔顿 |
| 1623—1644 | 教皇乌尔班八世在位(玛菲欧・巴贝里尼) |
| 1625—1649 | 英国国王查尔斯一世在位 |
| 1632—1675 | 扬・维梅尔 |
| 1648 |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 |
| 1649—1660 | 英格兰联邦 |

# 中英文词汇对照表

## A

| | |
|---|---|
| Absolutism | 绝对主义 |
| Acre, in Third Crusade |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的艾克 |
| Acton, Lord | 阿克顿爵士 |
| Adrianople | 亚德里亚那堡 |
| Africa | 非洲 |
| Agriculture | 农业 |
| Albert of Brandenburg | 勃兰登堡的阿尔伯特 |
| Albuquerque, Afonso de | 阿方索·德·阿尔布科尔科 |
| Aldine Press | 阿尔杜斯印刷所 |
| Alexander VI, Pope |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
| Alexis (Russian czar) | 阿历克塞(俄国沙皇) |
| Alexius I Comnenus (Byzantine emperor) | 科穆宁王朝的阿历克修斯一世(拜占庭皇帝) |
| Alexius III (Byzantine emperor) | 阿历克修斯三世(拜占庭皇帝) |

| | |
|---|---|
| Alexius IV (Byzantine emperor) | 阿历克修斯四世(拜占庭皇帝) |
| Alfonso V the Magnanimous (king of Aragon), | “有雅量的”阿方索五世(阿拉贡国王) |
| Alkindi (Arabian philosopher) | 阿尔基缔(阿拉伯哲学家) |
| *Allegory of Spring* (*Primavera*) (Botticelli) | 《春天的寓言》(《春》)(波提切利) |
| Althusius, Johannes | 阿尔图休斯·约翰内斯 |
| Alva, duke of | 阿尔瓦公爵 |
| Alvarado, Pedro de | 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 |
| Anabaptists | 再洗礼派教徒 |
| Anatomical studies | 解剖学研究 |
| Andronicus I (Byzantine emperor) | 安德罗尼库斯一世(拜占庭皇帝) |
| Anglican church | 安利甘宗 |
| Anne Boleyn | 安妮·博林 |
| Anticlericalism | 反教权主义 |
| Antinomianism | 反律法主义，唯信仰论 |
| Antioch, as crusader state | 十字军国家安条克 |
| Apanages | 属地 |
| Apothecaries | 药剂师 |
| Aquinas, Thomas | 托马斯·阿奎那 |
| Aragon | 阿拉贡 |
| Architecture, Renaissance | 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 |
| Arctic explorations | 北极探险 |
| Aristotle | 亚里士多德 |
| Armagnacs, and French monarchy | 阿马尼亚克派和法国君主政治 |
| Armed forces, rise of | 军队的兴起 |
| Arminianism | 阿米纽斯派 |
| Arminius, Jacobus | 雅各布斯·阿米纽斯 |
| Arnald of Villanova | 维拉诺瓦的阿诺德 |
| Arsenal, in Venice | 威尼斯的军械厂 |

| | |
|---|---|
| Art(s) | 艺术 |
| Astronomy | 天文学 |
| Audiencia | 检审区 |
| Augsburg, banking in | 奥格斯堡的银行业 |
| *Augsburg, Peace of* | 《奥格斯堡和约》 |
| Augustine, Saint | 圣・奥古斯丁 |
| Aurangzeb (Mogul emperor) | 奥朗则布(莫卧儿帝国皇帝) |
| Austria, Habsburgs in | 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 |
| *Autobiography*(Cellini) | 《自传》(切里尼) |
| Aztec empire | 阿兹特克帝国 |

## B

| | |
|---|---|
| Bacon, Francis | 弗兰西斯・培根 |
| Baibars (Mamluk general) | 贝巴尔(马穆路克将军) |
| Balboa, Vasco Nuñez de | 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 |
| Baldwin I (Norman noble) | 鲍德温一世(诺曼贵族) |
| Baldwin of Flanders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 佛兰德尔的鲍德温(君士坦丁堡皇帝) |
| Ball, John | 约翰・保尔 |
| Bank of Amsterdam | 阿姆斯特丹银行 |
| Bank of St. George | 圣・乔治银行 |
| Banking, during Renaissance | 文艺复兴时期的银行业 |
| Baptism, Anabaptists on | 再洗礼派教徒论洗礼 |
| Baptist church | 浸礼宗 |
| Barents, William | 威廉・巴伦支 |
| Barometer, Development of | 气压表的新发明 |
| Basel, Council of(1436) | 巴塞尔会议(1436年) |
| Bastard feudalism | 伪封建主义 |
| Batu Khan (Mongolian leader) | 拔都汗(蒙古统治者) |
| Bellini, Gentile | 简泰尔・贝利尼 |

| | |
|---|---|
| Bering, Vitus | 维图斯·白令 |
| Bernard, Saint | 圣·伯尔纳 |
| Bernard (count of Armagnac) | 伯尔纳(阿马尼亚克伯爵) |
| Bernini, Gian Lorenzo | 济安·洛仑佐·贝尼尼 |
| *Bible* | 《圣经》 |
| Black Death | 黑死病 |
| Blacks, during Renaissance | 文艺复兴时期的黑人 |
| Blood, Council of | 血腥议会 |
| Boccaccio, Giovanni | 乔万尼·薄伽丘 |
| Bockelson, John | 约翰·布克尔森 |
| Bodin, Jean | 让·博丹 |
| Bohemia, in Thirty Years' War | 三十年战争中的波希米亚 |
| *Bologna, Concordat of* | 《波伦亚协定》 |
| Book production | 图书制造 |
| Borelli, Alphonso | 阿方索·博雷利 |
| Bosch, Hieronymus | 希罗尼格斯·博斯 |
| Botticelli, Sandro | 桑德洛·波提切利 |
| Bourbons, in conflict with Habsburgs | 与哈布斯堡王朝陷人冲突中的波旁王朝 |
| Bourgeoisie | 中产阶级 |
| Boyle, Robert | 罗伯特·波义耳 |
| Brahmins | 婆罗门 |
| Brazil, Portuguese exploration of | 葡萄牙人对巴西的探险 |
| 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 | 共同兄弟会 |
| Brown, Robert | 罗伯特·布朗 |
| Brownists | 布朗派 |
| Brueghel, Pieter | 彼得·勃鲁盖尔 |
| Bubonic plague | 淋巴腺鼠疫 |
| Buddhism | 佛教 |
| Bulgaria | 保加利亚 |
| Bunyan, John, *Pilgrim's Progress* | 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 |

| | |
|---|---|
| Burckhardt, Jacob | 雅各布·布克哈特 |
| Burgundy | 勃艮第 |
| Butterfield, Herbert |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
| Byzantine Empire | 拜占庭帝国 |

## C

| | |
|---|---|
| Cabeza de Vaca, Alvar | 奥瓦尔·卡别扎·德·瓦卡 |
| Cabot, John | 约翰·卡伯特 |
| Cabot, Sebastian | 塞巴斯蒂安·卡伯特 |
| Cabral, Pedro | 佩德罗·卡布拉尔 |
| Callot, Jacques, *The Hanging* | 雅克·卡洛的《绞刑》 |
| Calvin, John | 约翰·加尔文 |
| Calvinism | 加尔文宗 |
| Camöes, Liuz de, *Lusiads* | 路易·德·卡蒙斯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 |
| Capitalism | 资本主义 |
| Capuchins | 嘉布遣修会 |
| Caravaggio, Michelangelo, *The Musicians* | 米开朗基罗·卡拉瓦乔的《乐师》 |
| Caribbean | 加勒比海 |
| Carnival | 狂欢节 |
| Carolingian Renaissance | 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 |
| Cartesian dualism | 笛卡尔二元论 |
| Cartier, Jacques | 雅克·卡蒂埃 |
| Castellio, Sebastian, *Concerning Heretics* |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的《关于异端》 |
| Castes of India | 印度的种姓制度 |
| Castiglione, Baldassare, *The Courtier* | 巴尔达萨雷·卡斯第里欧尼的《完美朝臣》 |
| Castile | 卡斯提尔 |
| Castile, Council of | 卡斯提尔议会 |
| Castilian language | 卡斯提尔语 |

| | |
|---|---|
| Casuistry | 决疑法 |
| *Cateau-Cambrésis, Treaty of* | 《卡托康布雷西斯条约》 |
| Catherine de' Medici | 美第奇家族的凯瑟琳 |
| Catherine of Aragon | 阿拉贡的凯瑟琳 |
| Catholic League | 天主教联盟 |
| Catholicism | 天主教 |
| Cellini, Benvenuto | 贝温尤托·切利尼 |
| Censorship, in Council of Trent | 特伦托会议所确立的审查制度 |
|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 中央集权 |
| Cervantes, Miguel de, *Don Quixote* |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
| Champlain, Samuel de | 萨缪尔·德·尚普林 |
| Charles II (king of England) | 查理二世(英国国王) |
| Charles IV (king of Germany) | 查理四世(德国国王) |
| Charles IX (king of France) | 查理九世(法国国王) |
| Charles V (Holy Roman emperor) | 查理五世(神圣罗马帝国) |
| Charles V the Wise (king of France) | 智者查理五世(法国国王) |
| Charles VI (king of France) | 查理六世(法国国王) |
| Charles VII (king of France) | 查理七世(法国国王) |
| Charles VIII (king of France) | 查理八世(法国国王) |
| Charles of Anjou | 安茹的查理 |
| Charles the Bold (duke of Burgundy) | 勇者查理(勃艮第公爵) |
| Chiaroscuro | 明暗对照法 |
| Children | 儿童 |
| China | 中国 |
| Christian IV(king of Denmark) | 克里斯丁四世(丹麦国王) |
| Christianity | 基督教 |
| Christina (queen of Sweden) | 克里斯蒂娜(瑞典女王) |
| Christine de Pisan | 比萨的克里斯丁 |
| Chrysoloras, Manuel | 曼努尔·赫利索罗拉斯 |
| Church(es) | 教会 |

| | |
|---|---|
| Church of England | 英国国教会 |
| Cicero | 西塞罗 |
| Cid, El | 埃尔·熙德 |
| Ciompi | 梳毛工 |
| Civilization | 文明 |
| Clare, Elizabeth de Burgh, Lady of | 伊丽莎白·德·伯格·克莱尔夫人 |
| Classical heritage, humanism and | 人文主义与古典传统 |
| Classical scholarship, in Renaissance | 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 |
| Clement VII, Pope | 克莱门特七世教皇 |
| Climate change | 气候变化 |
| Coello, Claudio | 克劳迪奥·科埃略 |
| Coeur, Jacques | 雅克·科尔 |
| Cognac, League of | 科涅克联盟 |
| Coligny, Gaspard de | 加斯帕·德·柯里格尼 |
| Colleoni, Bartolomeo | 巴托罗米奥·科勒尼 |
|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 殖民制度 |
| Colonies | 殖民地 |
| Columbus, Christopher |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
| *Combat of Carnival and Lent* (Brueghel) | 《狂欢节与大斋节之战》(勃鲁盖尔) |
| Commerce | 商业 |
| Common Man, Revolution of the | 平民革命 |
| Communion | 圣餐礼 |
| 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 | 东印度公司 |
| Compass, magnetic | 罗盘 |
| *Concerning Heretics* (Castellio) | 《关于异端》(卡斯特利奥) |
| *Concerning the Revolutions of Heavenly Bodies* (Copernicus) | 《天体运行论》(哥白尼) |
| *Concern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Human Body* (Vesalius) | 《关于人体的结构》(维萨琉) |
| Conciliar movement | 宗教会议运动 |

Czech Republic　捷克共和国

## D

*Dance of Death* (Holbein)　《死亡之舞》(霍尔拜因)
Dandolo, Enrico　恩里科・丹德罗
Dante Alighieri　阿利盖利・但丁
Darwin, Charles　查尔斯・达尔文
*David* (Donatello)　《大卫》(多那太罗)
*David* (Michelangelo)　《大卫》(米开朗基罗)
*Decameron* (Boccaccio)　《十日谈》(薄伽丘)
Deduction　演绎法
Defenestration of Prague (1618)　布拉格“抛出窗外事件”(1618年)
Democracy　民主
Denmark, in Thirty Years' War　三十年战争中的丹麦
Descartes, René　雷勒・笛卡尔
Dias, Bartholomeu　巴塞洛缪・迪亚士
Diet　帝国会议
Diplomacy　外交
*Discourse of Method* (Descartes)　《方法论》(笛卡尔)
Discovery　大发现
Disease　疾病
*Divine Comedy* (Dante)　《神曲》(但丁)
Divorce　离婚
Doges　道奇
*Don Quixote* (Cervantes)　《堂吉诃德》(塞万提斯)
Donatello (Betto Bardi, Donato di Niccolò), *David*　多那太罗(贝托・巴尔迪,多那托・迪・尼古拉)的《大卫》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君士坦丁赠契》
Donne, John　约翰・多恩
Drake, Francis　弗兰西斯・德雷克

| | |
|---|---|
| Dürer, Albrecht | 阿尔伯特·丢勒 |
| Dutch republic | 荷兰共和国 |

## E

| | |
|---|---|
| East India Company | 东印度公司 |
| Eastern Europe | 东欧 |
| Eck, John | 约翰·埃克 |
| Economy | 经济 |
| Edessa | 爱德萨 |
| *Edict of Restitution*(1629), | 《归还敕令》(1629年) |
| Education | 教育 |
| Edward II (king of England) | 爱德华二世(英国国王) |
| Edward III (king of England) | 爱德华三世(英国国王) |
| Edward IV (king of England) | 爱德华四世(英国国王) |
| Edward V (king of England) | 爱德华五世(英国国王) |
| Edward VI (king of England) | 爱德华六世(英国国王) |
| Egypt | 埃及 |
| Eleanor of Aquitaine | 阿奎塔尼的埃莉诺 |
| Eliot, John | 约翰·艾略特 |
| Elizabeth I (queen of England) | 伊丽莎白一世(英国女王) |
| Elizabeth of York (queen of England) | 约克的伊丽莎白(英国女王) |
| Empiricism | 经验主义 |
| Encomienda | 恩康米恩达制 |
| Encounters, connotations of term | "碰撞"的含义 |
| England | 英国 |
| England, Church of | 英国国教 |
| Erasmus, Desiderius |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 |
| Erastianism | 国家万能论 |
| Erastus, Thomas | 托马斯·埃拉斯都 |
| Ericson, Leif | 雷夫·埃里克森 |

Essex,earl of　埃塞克斯伯爵
Estates General, and French monarchy　三级会议和法国君主制
Eucharist (communion)　圣体(圣餐礼)
Exploration and expansion　探险与扩张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中国的治外法权

## F

Faith　信仰
Famine of 1315—1317　1315—1317 年的饥荒
Fëauedor III(Russian czar)　费奥多尔三世(俄国沙皇)
Ferdinand (king of Aragon)　费迪南(阿拉贡国王)
Ferdinand I (Ferrante) (king of Naples)　费迪南一世(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
Ferdinand I (Holy Roman emperor)　费迪南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Ferdinand II (Holy Roman emperor)　费迪南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Feudalism　封建主义
Ficino,Marsilio　马西利奥・费西诺
Filaret (Orthodox patriarch)　费拉莱特(东正教的大教长)
Firearms, in Western expansion　西方扩张中的火器
Flanders,commerce in　佛兰德尔的商业
Florence　佛罗伦萨
Foods, new, from colonies　来自殖民地的新食物
Foreign policy　对外政策
Foxe,John　约翰・福克斯
France　法国
Francis I (king of France)　弗兰西斯一世(法国国王)
Francis II (king of France)　弗兰西斯二世(法国国王)
Frederick II (Holy Roman emperor)　弗里德里克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Frederick V (Elector Palatine)　弗里德里克五世(巴拉丁选帝侯)
Frederick Barbarossa (Holy Roman emperor)　弗里德里克・巴巴罗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 G

| | |
|---|---|
| Great Council of Venice | 威尼斯大议会 |
| Great Interregnum | 大空位时期 |
| Great Schism | 教会大分裂 |
| Great Wall of China | 中国的长城 |
| Great War for Empire | 帝国大战 |
| Greco,El | 艾尔·格列柯 |
| Greek language | 希腊语 |
| Greek studies,Renaissance revival of | 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研究的复兴 |
| Greeks, in Constantinople | 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 |
| Gregorian chants | 格里高利圣咏 |
| Gregory of Sinai,Saint | 西奈的圣·格里高利 |
| Grey,Lady Jane | 简·格雷 |
| Guilds, in Florence | 佛罗伦萨的行会 |
| Guise family | 介斯家族 |
| Gunpowder | 火药 |
| Gustavus Adolphus (king of Sweden) | 古斯塔夫·阿道弗斯(瑞典国王) |
| Gutenberg,Johann | 约翰内斯·古腾堡 |

## H

| | |
|---|---|
| Habsburgs | 哈布斯堡王朝 |
| Hakluyt,Richard | 理查德·哈克卢特 |
| Hals,Frans | 弗朗斯·哈尔斯 |
| Hansa | 汉萨同盟 |
| Hansen's disease | 麻风病 |
| Harvey,William | 威廉·哈维 |
| Hawkins,John | 约翰·霍金斯 |
| Hawkwood,Sir John | 约翰·豪克武德爵士 |
| Henry (duke of Guise) | 亨利(介斯公爵) |
| Henry III (king of France) | 亨利三世(法国国王) |
| Henry IV (king of England) | 亨利四世(英国国王) |

**I**

| | |
|---|---|
| Il Moro, Ludovico | 路多维科·伊尔·莫罗 |
| *Imitation of Christ* (Thomas à Kempis) | 《效法基督》(托马斯·坎皮斯) |
| Imperialism | 帝国主义 |
| Inca empire | 印加帝国 |
| Indentured servants, vs. slaves | 契约佣工与奴隶 |
| India | 印度 |
| Individual freedom, vs. absolutism | 个人自由与绝对主义 |
| Individualism | 个人主义 |
| Induction | 归纳法 |
| Indulgences | 赎罪券 |
|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formation and | 宗教改革与工业发展 |
| Industry, during Renaissance | 文艺复兴时期的工业 |
| Infant mortality rates | 婴儿死亡率 |
| Innocent III, Pope | 教皇英诺森三世 |
| Inquisition | 宗教裁判所 |
|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Calvin) | 《基督教原理》(加尔文) |
| Interregnum, Great | 大空位时期 |
| Ireland | 爱尔兰 |
| Isabella (queen consort of England) | 伊莎贝拉(英国王后) |
| Isabella (queen of Castile) | 伊莎贝拉(卡斯提尔女王) |
| Islam | 伊斯兰教 |
| Italian Renaissance | 意大利文艺复兴 |
| Italy | 意大利 |
| Ivan III (grand prince of Moscow) | 伊凡三世(莫斯科大公) |
| Ivan IV the Terrible (Russian czar) | 伊凡四世，亦称“恐怖的伊凡四世”(俄国沙皇) |

## J

| | |
|---|---|
| Jacquerie | 扎克雷起义 |

## K

| | |
|---|---|
| Kremlin, construction of | 克里姆林宫的建筑 |
| Kshatriya | 刹帝利 |

## L

| | |
|---|---|
| La Rochelle, Siege of | 对拉罗舍尔的围困 |
| La Salle, sieur de | 拉萨尔先生 |
| Labor, ownership of | 劳动力的所有制 |
| *Laborers, Statute of* | 《雇工法》 |
| Laity | 平信徒 |
| Lancaster, house of | 兰开斯特家族 |
| las Casas, Bartolomé de | 巴特罗米·德·拉斯·卡撒斯 |
| *Last Judgment* (Giotto) | 《末日审判》(乔托) |
| Latin America | 拉丁美洲 |
| Latin Empire, in Constantinople | 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 |
| Latin language | 拉丁语 |
| Leeuwenhoek, Anthony Van | 安东尼·范·列文虎克 |
| Legitim | 特留份惯例 |
|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von | 戈特弗里德·威尔海姆·冯·莱布尼茨 |
| Lent, vs. Carnival | 《大斋节与狂欢节之战》 |
| Leo X, Pope | 教皇立奥十世 |
| Leonardo da Vinci | 列昂纳多·达·芬奇 |
| Leprosy | 麻风病 |
| Libraries, private, rise of | 私人图书馆的兴起 |
| Literacy | 识字率 |
| Literature | 文学 |
| Lithuania | 立陶宛 |
| Livery and maintenance | 侍从—赡养关系 |
| Lollardy | 罗拉德派 |
| Lombard League | 伦巴德同盟 |
| Lords ordainers | 教会领主 |

**M**

| | |
|---|---|
| Martin V, Pope | 教皇马丁五世 |
| Mary (queen of England) | 英国女王玛丽 |
| Mary of Burgundy | 勃艮第的玛丽 |
| Mary Stuart (queen of Scotland) | 玛丽·斯图亚特(苏格兰女王) |
| Maryland, colonial, religious freedom in | 在马里兰殖民地的宗教自由 |
| Masaccio, Tommaso Guidi, *The Expulsion of Adam and Eve* | 托马佐·圭第·马萨乔绘制的《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 |
| Mathematics | 数学 |
| Matthias (Holy Roman emperor) |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马提亚 |
| Maurice, Saint | 圣·莫里斯 |
| Maximilian I (duke of Bavaria) |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巴伐利亚公爵) |
| Maximilian I (Holy Roman emperor) |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
| Medici, Cosimo de' | 克斯莫·德·美第奇 |
| Medici, Lorenzo de' | 洛伦佐·德·美第奇 |
| Medici family | 美第奇家族 |
| Medicine | 医药学 |
| Melanchthon, Philip | 菲利普·梅兰希顿 |
| Mendoza, Pedro de | 佩德罗·德·门多萨 |
| Mennonites | 门诺派教徒 |
| Menocchio (Domenico Scandella) | 梅诺乔(多莫尼科·斯堪德拉) |
| Mercantilism | 重商主义 |
| Mercenaries, in state armed forces | 国家军队中的雇佣军 |
| Mesta | 美斯塔(牧场主同盟) |
| Mestizos | 梅索蒂斯混血儿 |
| Metals, in American colonies | 美洲殖民地的金属 |
| Method, scientific | 科学方法 |
| Michael Romanov (Russian czar) | 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俄国沙皇) |
| Michael VIII Palaeologus (Byzantine emperor) | 帕略奥格王朝的米哈伊尔八世(拜占庭皇帝) |
| Michelangelo Buonarotti | 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 |

N

| | |
|---|---|
| Nationalism | 民族主义 |
| Native Americans | 美洲土著人 |
| Navies, development of | 海军的发展 |
| Navigation, advances in, and Western expansion | 航海的发展与西方的扩张 |
| *Nerchinsk, Treaty of* | 《涅尔琴斯克条约》(《尼布楚条约》) |
| Netherlands | 尼德兰 |
| New Amsterdam | 新阿姆斯特丹 |
| New England colonies | 新英格兰殖民地 |
| *New Laws* of 1542 | 1542 年颁布的《新法》 |
| Newton, Sir Isaac | 艾萨克・牛顿爵士 |
| Nicholas II (Russian czar) | 尼古拉二世(俄国沙皇) |
| Nikon (Russian religious leader) | 尼康(俄罗斯的宗教领袖) |
| Nobility | 贵族 |
| North America | 北美 |
| Novgorod (Russia) | 诺夫哥罗德(俄罗斯) |
| *Novum Organum* (Bacon) | 《新工具论》(培根) |
| Nureddin (Muslim ruler) | 努莱丁(穆斯林统治者) |

## O

| | |
|---|---|
| Observation, in experimental science | 实验科学中的观察 |
| Olden Barneveldt, Jan van | 扬・凡・奥登・巴纳威特 |
| *On Christian Liberty* (Luther) | 《论基督徒的自由》(路德) |
| Oprichnina | 沙皇特辖区 |
| Optics | 光学 |
| Orange, house of | 奥伦治家族 |
| *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 (Pico della Mirandola) | 《演讲录:人之尊严》(皮科・德・米兰德拉) |
| Oratory of Divine Love | 神爱社 |
| *Ordinances of* 1311 | 《1311 年条例》 |

## P

| | |
|---|---|
| Peter the Hermit | 隐修士彼得 |
| Petrarch | 彼得拉克 |
| Pharmacology | 药物学 |
| Philip (landgrave of Hesse) | (黑森伯爵)菲利普 |
| Philip II (duke of Burgundy) | (勃艮第公爵)腓力二世 |
| Philip II (king of Spain) |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 |
| Philip IV (king of Spain) | (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 |
| Philip VI (king of France) | (法国国王)腓力六世 |
| Philip Augustus (king of France) | 腓力·奥古斯都(法国国王) |
| Philip of Swabia (king of Germany) | 德国诸侯斯瓦比亚的腓力(德国国王) |
| Philip the Fair (king of France) | 美男子腓力(法国国王) |
| Philip the Good (duke of Burgundy) | 慈心腓力(勃艮第公爵) |
| Philippines, Spanish claim to | 西班牙对菲律宾宣布领土权 |
| Physicians | 内科医生 |
| Physiology | 生理学 |
| Pico della Mirandola, Giovanni | 乔瓦尼·皮科·德·米兰多拉 |
| *Pietà* (Michelangelo) | 《怜悯》(米开朗基罗) |
| *Pilgrim's Progress* (Bunyan) | 《天路历程》(班扬) |
| Pisa, Council of | 比萨会议 |
| Pizarro, Francisco | 弗兰西斯科·皮萨罗 |
| Place names, bias in | 对地名的偏见 |
| Plague | 瘟疫 |
| Plainsong | 单声圣歌 |
| Plato | 柏拉图 |
| Platonic Academy | 柏拉图学园 |
| Platonic love | 柏拉图之爱 |
| Plymouth | 普利茅斯 |
| Poetry, of Italian Renaissance |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 |
| Poland | 波兰 |
| Polders | 开拓地 |

**Q**

## R

| English | 中文 |
|---|---|
| Rabelais, François | 弗兰西斯·拉伯雷 |
| Radical Protestantism | 新教激进派 |
| Raleigh, Sir Walter | 华特·拉雷爵士 |
| Rationalism | 理性主义 |
| Reformation | 宗教改革 |
| Religion | 宗教 |
| Religious freedom | 宗教自由 |
| Renaissance | 文艺复兴 |
| Revolution of the Common Man | 平民革命 |
| Rhode Island, colonial, religious freedom in | 在罗德斯岛的殖民和宗教自由 |
| Ricci, Matteo | 利玛窦 |
| Richard I the Lionhearted (king of England) | (英国国王)理查一世,亦称"狮心查理" |
| Richard II (king of England) | (英国国王)理查二世 |
| Richard III (king of England) | (英国国王)理查三世 |
| Richelieu, Cardinal | 红衣主教黎塞留 |
| *Robin Hood, legend of* | 《罗宾汉传奇》 |
| Romance languages | 罗曼斯语 |
| Romanov dynasty | 罗曼诺夫王朝 |
| Rome, papacy in politics of | 罗马政治中的教皇 |
| Rudolf of Habsburg (king of Germany) | 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德国王公) |
| Rural areas | 乡村地区 |
| Rurik (Russian leader) | 留里克(古罗斯王公) |
| Ruskin, John | 约翰·拉斯金 |
| Russia | 俄罗斯 |

## S

| English | 中文 |
|---|---|
| St. Basil's Cathedral | 圣·瓦西里大教堂 |

| | |
|---|---|
| Sistine Chapel | 西斯廷小教堂 |
| *Six Articles, statute of* | 《六条论纲》(或《六项条款》) |
| Sixtus IV, Pope | 教皇西克斯图斯六世 |
| Slave trade | 奴隶贸易 |
| Slavery | 奴隶制 |
| Slaves | 奴隶 |
| Smith, John | 约翰·史密斯 |
| Society of Jesus | 耶稣会 |
| Soto, Hernando de | 荷南多·德·索托 |
| South America | 南美洲 |
| Sovereign states, definition of | 主权国家概念 |
| Spain | 西班牙 |
| Spanish Aramada | 西班牙无敌舰队 |
| Spenser, Edmund | 埃德蒙·斯宾塞 |
| Spinoza, Baruch | 巴鲁·斯宾诺莎 |
| State(s) | 国家 |
| Stevin, Simon | 西蒙·斯蒂文 |
| Stroganov family | 斯特罗加诺夫家族 |
| Suleiman I the Magnificent (Ottoman leader) | 高贵的苏莱曼一世(土耳其帝国首脑) |
| Sully, Maximilien | 马克西米利安·苏利 |
| *Supremacy, Act of* (1534) | 《最高权力法案》(1534 年) |
| Surgeons | 外科 |
| Swammerdam, Jan | 简·施旺麦丹 |
| Sweden | 瑞典 |
| Swiss Confederation | 瑞士邦联 |
| Switzerland | 瑞士 |
| Syphilis | 梅毒 |

**T**

| | |
|---|---|
| Tatars | 鞑靼人 |

| | |
|---|---|
| Taxation | 税收 |
| Technology | 技术 |
| Telescope, development of | 望远镜的发明 |
| Tempera | 蛋彩画 |
| Templars | 圣殿骑士团 |
| Ten, Council of | 十人议会 |
| Teresa of Avila, Saint | 阿维拉的圣·特里萨 |
| Tetzel, Johann | 约翰·泰臣 |
| Teutonic Knights | 条顿骑士团 |
| Theatines | 戴蒂尼修会 |
| Theophrastus Bombastus von Hohenheim (Paracelsus), | 泰奥弗拉斯托斯·冯·霍恩海姆(帕拉塞尔苏斯) |
| Thermometer, development of | 温度计的发明 |
| Thessalonica | 萨洛尼卡 |
| *Thirty-nine Articles* (1563) | 《三十九条信纲》(1563 年) |
| Thirty Years' War | 三十年战争 |
| Thomas *à* Kempis | 托马斯·坎佩斯 |
| Thrace, Ottoman Empire in | 土耳其帝国占领下的色雷斯 |
| Three Henrys, War of the | 三亨利战争 |
| Thucydides | 修昔底德 |
| Tilly, count von | 冯·提利伯爵 |
| Time line | 编年表 |
| Timur the Lame (Turkish leader) | 跛足的帖木儿(土耳其首领) |
| Tintoretto, Il (Robusti, Jacopo) | 埃尔·丁托列托(雅各布·罗布斯蒂) |
| Titian (Vecellio, Tiziano) | 提香(蒂齐亚诺·韦切利奥) |
|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Luther) | 《致基督教贵族书》(路德) |
| Tokugawa family | 德川家族 |
| *Tordesillas, Treaty of* | 《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 |
| Trade | 贸易 |
| Trading companies, colonial | 殖民贸易公司 |

Transubstantiation 变体说
Treasury of Merit 善功宝库
Trent, Council of 特伦托会议
Tripoli, in Crusades 十字军运动时期的的黎波里
Troubles, Council of “动乱议会”
Troubles, Time of 动乱的年代
Tuberculosis 肺结核
Tudors 都铎王朝
Tulip cultivation 郁金香的培植
Turks 土耳其
*Twelve Articles* 《十二条款》
Tyler, Wat 瓦特・泰勒
Tyndale, William 威廉・廷代尔

## U

Unitarianism 唯一神教派
University of Padua 帕多亚大学
Urban areas, Renaissance economy of 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经济
Urban II, Pope 教皇乌尔班二世
Urban VI, Pope 教皇乌尔班六世
Usury 高利贷
*Utopia* (More) 《乌托邦》(莫尔)
Utraquism 饼酒同领论

## V

Vacuum, existence of 真空存在理论
Vaisya 吠舍
Valdivia, Pedro de 佩德罗・德・瓦尔迪维亚
Valla, Lorenzo 洛伦佐・瓦拉
Van Artevelde, Jacob 雅各布・冯・阿尔特维尔德

| | |
|---|---|
| Veillée | 不眠聚会 |
| Velásquez, Diego | 迪亚哥·委拉斯奎兹 |
| Venice | 威尼斯 |
| Vernaculars | 本地语 |
| Verrazano, Giovanni da | 乔瓦尼·达·韦拉察诺 |
| Verrocchio, Andrea del | 安德烈亚·德尔·韦罗基奥 |
| *Vervins, Treaty of* | 《韦尔温条约》 |
| Vesalius, Andreas | 安德里亚·维萨琉 |
| Vespucci, Amerigo | 亚美利哥·韦斯浦奇 |
| Vikings, explorations of | 维京人的探险 |
| Virginia, English settlement in | 英国的弗吉尼亚殖民地 |
| Visconti family of Milan | 米兰的维斯康蒂家族 |

## W

| | |
|---|---|
| Waldseemüller, Martin | 马丁·瓦尔德斯密勒 |
| Wallenstein, Albert of | 阿尔伯特·瓦伦斯坦 |
| Wars of the Roses | 玫瑰战争 |
| Warwick, earl of | 沃里克伯爵 |
| Weber, Max | 马克斯·韦伯 |
| Western civilization, problems with term | 西欧文明问题术语 |
| Western Europe | 西欧 |
| Western Holy League | 西部神圣同盟 |
| *Westphalia, Peace of* (1648) |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 |
| White, John | 约翰·怀特 |
| Widows, Standing of | 孀妇的地位 |
| William of Orange (prince of Netherlands) | 奥伦治的威廉(尼德兰王子) |
| Williams, Roger | 罗杰·威廉 |
| Witt, Jan De | 约翰·德·威特 |
| Wollstonecraft, Mary |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
| Wolsey, Cardinal | 沃尔西大主教 |

| | |
|---|---|
| Women | 妇女 |
| Work ethic, Protestant | 新教的劳动伦理 |
| Works, vs. faith, Luther on | 路德论善功与信仰 |
| World-machine, Newtonian | 牛顿的世界机器理论 |
| Wycliffe, John | 约翰·威克里夫 |

## X

| | |
|---|---|
| Xavier, Francis | 弗兰西斯·泽维尔 |

## Y

| | |
|---|---|
| Yaws | 雅司病 |
| Yermak, Timofeyevich | 季莫费耶维奇·雅尔马克 |
| York, house of | 约克家族 |
| York, Richard, duke of | 约克公爵理查德 |

## Z

| | |
|---|---|
| Zangi (Mosul governor) | 赞吉(摩苏尔的统治者) |
| Zara, crusader assault on | 扎拉(十字军曾攻占过该城市) |
| Zemski sobor | 缙绅会议 |
| Zoe (grand princess of Moscow) | 佐伊(莫斯科公国的王后) |
| Zurich, Reformation in | 苏黎世宗教改革 |
| Zwingli, Huldrych | 乌里希·茨温利 |

EUROPE
1350-1650